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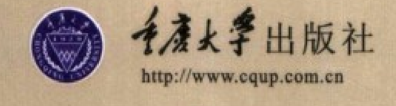
第4卷

定性研究：

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主编

风笑天 等
译



封面设计/黄河封面工作室

这是一部在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全书约200万字，对定性研究的近40个专题进行了讨论，其中每一个专题的作者都是该领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其主编诺曼·K·邓津(Norman·K·Denzin)和伊冯娜·S·林肯(Yvonna·S·Lincoln)更是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面的国际旗手。即便是这样一个精英的团队，面对这个庞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仍然需要艰苦卓绝的工作，正如两位主编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

> 在许多情形下，关于谁应该写作某个章节或者某个章节应该如何写，我们常常不情愿地进入了一场政治斗争……
>
> ……为了最后期限和页数的要求，我们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的理论性以及关于那些我们能够明白但其他人却未必明白的内容，我们也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何时完成，我们还得做斗争；而且，当我们要求更多的修改时，我们是在不断地测试着作者们的耐性。

正是这些一流学者的艰苦和“斗争”，才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个定性研究方面的精神盛宴。为了使国内的学者也能享此盛宴，我们组织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历时三年完成了本书中文版本的翻译和出版。考虑到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在征得原出版公司的同意后，将本书中文版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版，分别是：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原书第1、2部分）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原书第3部分）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原书第4部分）
《定性研究(第4卷)：评估、解释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原书第5、6部分）



ISBN 978-7-5624-3948-6

定价：38.00元

万卷方法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第4卷

定性研究：

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主编

风笑天　易松国　徐连明
习　涓　陈　璇　乐　章
唐美玲　苏莹荣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版贸渝核字(2003)第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定性研究(第4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美)邓津(Denzin,N.K.),(美)林肯(Lincoln,Y.S.)著;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4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SBN 978-7-5624-3948-6

Ⅰ.定… Ⅱ.①邓…②林…③风… Ⅲ.定性分析—研究方法 Ⅳ.C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017724号

定性研究(第4卷):
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
定性研究的未来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主编
风笑天 等译
责任编辑:雷少波 陈 荟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李定群 责任印制: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市场营销部)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3.75 字数:289千 插页:16开2页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3948-6 定价:3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H·拉塞尔·伯纳德(H. Russell Bernard)　弗罗里达大学人类学教授
埃本·A·维茨曼(Eben A. Weitzman)　马萨诸塞大学社会与组织心理学副教授
埃斯特·麻德里兹(Esther Madriz)　圣弗罗西斯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安德里亚·方塔纳(Andrea Fontana)　内华达大学社会学教授
巴巴拉·泰德洛克(Barbara Tedlock)　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
本杰明·F·克莱布特里(Benjamin F. Crabtree)　新泽西药学与牙医大学教授
彼特·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学教授
道哥拉斯·哈珀(Douglas Harper)　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大卫·西尔弗曼(David Silverman)　伦敦大学教授
戴维·J·格林伍德(Davydd J. Greenwood)　康奈尔大学人类学教授
迪博拉·K·迪默(Deborah K. Deemer)　北衣奥华大学教育学副教授
厄弗·钱姆伯斯(Erve Chambers)　马里兰大学人类学教授
弗吉尼亚·L·奥利森(Virginia L. Olesen)　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格洛利亚·拉德森—比林斯(Gloria Ladson-Billings)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课程与教学论教授
基姆伯利·A·梅斯·德培雷(Kimberly A. Mays de Pérez)　塔帕德医疗翻译师
杰瑞·W·瑞安(Gery W. Ryan)　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副教授
卡洛琳·艾利丝(Carolyn Ellis)　南弗罗里达大学传播学和社会学教授
凯西·查马兹(Kathy Charmaz)　索诺马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
克里福德·G·克里斯琴斯(Clifford G. Christians)　伊利诺大学传播学教授
肯尼斯·J·格根(Kenneth J. Gergen)　斯沃斯莫尔学院心理学教授
拉雷尔·里查德森(Laurel Richardson)　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女性研究方面的教授
雷·C·里斯特(Ray C. Rist)　世界银行评估顾问
卢恩曼·王(Loonmun Wong)　服务于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心理学家

罗宾·麦克塔格特(Robin McTaggart) 詹姆斯库克大学教育学教授
罗伯特·E·斯泰克(Robert E. Stake) 伊利诺大学教育学教授
洛伊丝·韦斯(Lois Weis) 纽约州立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
玛莉·M·格根(Mary M. Gergen)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
迈克尔·V·安格罗西诺(Michael V. Angrosino) 南弗罗里达大学人类学教授
麦克尔·M·麦考(Michal M. McCall) 马克里斯特学院社会学教授
米甘·莫里斯(Meaghan Morris)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首席教授
米歇尔·法恩(Michelle Fine) 纽约城市大学社会/人格心理学教授
默顿·勒温(Morten Levin) 挪威湾大学社会学与政治科学教授
诺曼·K·邓津(Norman K. Denzin) 伊利诺大学传播学教授
乔·L·金奇洛(Joe L. Kincheloe) 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化研究与教学教授
乔舒亚·加默森(Joshua Gamson) 耶鲁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斯蒂芬·凯米斯(Stephen Kemmis) 巴拉腊特大学教授
斯坦福·M·莱曼(Stanford M. Lyman) 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社会科学教授
苏珊·维辛(Susan Weseen) 社会人格心理学方面的博士研究生
托玛斯·A·施瓦特(Thomas A. Schwandt) 伊利诺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
瓦莱丽·J·简西克(Valerie J. Janesick) 罗斯福大学教育领导与组织变革教授
威廉姆·L·米勒(William L. Miller) 宾夕法尼亚某医院家庭医学部主席
威廉姆·G·蒂尔尼(William G. Tierney)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
雅伯·F·古布里厄姆(Jaber F. Gubrium) 弗罗里达大学社会学教授
亚瑟·P·博克纳(Arthur P. Bochner) 南弗罗里达大学传播学教授
亚瑟·J·维迪奇(Arthur J. Vidich) 社会学与人类学荣誉教授
伊恩·霍德(Ian Hodder) 斯坦福大学文化与社会人类学教授
伊冯娜·S·林肯(Yvonna S. Lincoln) 德克萨斯 A & M 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
伊贡·G·古巴(Egon G. Guba) 印第安娜大学教育学教授
伊万·布莱迪(Ivan Brady) 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
约翰·K·史密斯(John K. Smith) 北罗万大学教育学教授
约翰·弗劳(John Frow) 爱丁堡大学英语文学教授
约翰·贝弗利(John Beverley) 匹兹堡大学西班牙与拉美文学与文化研究教授
詹姆斯·H·弗里(James H. Frey) 内华达大学社会学教授
詹姆斯·A·霍尔斯泰因(James A. Holstein) 马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
珍妮弗·C·格林尼(Jennifer C. Greene) 伊利诺大学教育与社会项目评估教授
朱莉安娜·奇克(Julianne Cheek) 南澳大利亚大学健康学教授

译者简介

风笑天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易松国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博士，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系主任
赵延东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科技部科学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田　凯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郝玉章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乐　章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教授
孙　龙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邓　锁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研究人员
唐利平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苏州科技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徐连明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唐美玲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聂春雷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东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龙书芹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黄　河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讲师
张艳霞　南开大学社会学硕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讲师
陈　璇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讲师
习　涓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美国阿拉巴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张　莉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美国德克萨斯 A & M 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王晓晖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生，讲师
苏莹荣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培训司干部
周晓春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
罗凌云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四川师范大学政治系讲师

译者前言

经过二十多人将近三年紧张的翻译工作，这本在国际社会科学界享有盛誉的著作终于要以中文的形式出版了。在译稿即将付梓之际，心中充满了感慨。

2000 年 8 月，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参加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美国社会学协会（ASA）第 95 届学术年会”。每年年会中的一项常规活动是各家出版社都将自己出版的社会学方面的新书拿到会场上来展览销售。那真是一些好书啊！在书展期间，我很快发现了这本刚刚修订出版的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这部有着蓝色硬皮封面、大开本、厚达一千多页的、重重的“砖头式”著作，深深地吸引了我。虽没有购买，但心中却留下了印象深刻的一笔。

时间真快，转眼两年半过去了。当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拿着一堆英文方法著作请我帮他们筛选时，我首先推荐了这本书。其原因除了这本书的影响大以外，更主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我国学术界的实际需要。国外社会研究方法的著作已有一些先后译成了中文，但专门介绍定性研究方法的著作则基本没有中文译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和遗憾。

但当出版社邀请我主持这本著作的翻译工作时，我的确十分犹豫。一方面，定性研究方法对于我（以及所有译者）来说相对生疏，翻译的难度相对较大。另一方面，此书的篇幅巨大，非一两个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所能完成，必须组织起一个较大规模的团队来承担。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手头不仅压着几本早就该写的书，同时还承担有几项科研课题，再加上平时的教学和指导研究生工作，实在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承担这一工作。后来，当出版社的编辑两次专程到南京拜访，我最终还是无法推托出版社的真诚邀请，接受了这份“苦差”，为此，我又付出了整整两年半的紧张生活。

实事求是地说，翻译工作既非我们的专业，也不是我们的长项。特别是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这更是一件极不划算的事情——一千字的译稿通常要花费译者大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和精力，而区区几十元钱的翻译稿酬是无法用来衡量这种翻译工作的艰苦和价值的。细想起来，当初之所以承担此项苦差，一是出版社的盛情之邀难以推托，二是心中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提高做点贡献的情感使然。

在这本著作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我的学生们。他们

有的获得社会学博士、硕士学位后已参加工作好几年,自身承担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有的在撰写自己的著作和论文;有的正在美国、香港的大学以及国内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紧张地攻读博士学位,特别是有的正在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或为博士生入学考试而紧张地做着准备。但当我邀请他们参加翻译此书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问过报酬,有的只是不计得失,认真尽力地查找资料,斟字酌句地翻译每一段话。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合作,此书是难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在此,请允许我真诚地向他们道一句: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深感这本著作翻译的困难。虽然译者们的英文水平可以阅读英文书籍和资料,但自己看明白和将它们用准确、恰当,甚至用地道的中文表达出来却并不是同一件事情,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深感翻译工作的责任重大,非常认真地对待。在翻译过程中,当听到学生们一个个叫苦不迭、一个个被翻译工作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我心中反倒充满了踏实感——只有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对待翻译工作、对译文反复推敲、不轻易放过一处疑问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才会使翻译者有这样一种感受,才会有这样一种工作状态。

关于书名的翻译,需要略作说明。之所以用"定性研究"的概念,而不用诸如"质的研究"、"质性研究"、"质化研究"等概念,主要考虑的是国内社会科学界的习惯和误解。与有的学者采用换一个名称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我们依旧使用定性研究这一名称,其目的就是为了直接说明,定性研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方法;就是为了纠正目前存在的对定性研究方法认识上的偏误;就是为了明确地告诉读者,定性研究也是一种类似于定量研究那样的,有特定的哲学基础、特定的视角和策略、特定的操作方法和技术的具体研究方式,而不是像许多人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非定量"意义上的泛泛而论或纯粹的主观思考(那种泛泛而论和主观思考或许只能称为议论、只能称为思考,而不能称作研究)。简言之,定性研究也有着一整套相对成形的、具体的方式方法,当然,其方式方法与定量研究的方式方法之间有着较大的不同。

各部分的译者是:第 1 章,风笑天;第Ⅰ部分序言、第 2 章,田凯;第 3 章、第 14 章,周晓春;第 4 章、第 9 章、第 33 章,邓锁;第 5 章、第 23 章,张艳霞;第Ⅱ部分序言、第 6 章、第 7 章,赵延东;第 8 章、第Ⅲ部分序言、第Ⅴ部分序言,唐美玲;第 10 章、第 11 章,孙龙;第 12 章、第 21 章,张莉;作者前言、第 13 章、第 19 章、第 20 章、第 36 章,陈璇;第 15 章、第 17 章,王晓晖;第 16 章、第 24 章,郝玉章;第 18 章、第 34 章、第 40 章,易松国;第 22 章、第Ⅳ部分序言,唐利平;第 25 章,黄河;第 26 章、第 29 章、第 30 章,龙书芹;第 27 章、第 28 章,聂春雷;第 31 章、第 32 章,罗凌云;第 35 章,乐章;第 37 章,习涓、徐连明;第 38 章、第 39 章、第Ⅵ部分序言,苏莹荣;第 41 章,徐连明。各章译者翻译完后,由风笑天与陈璇进行了校订。

由于译者的学识水平所限,译文中肯定会存在一些误译和错译的地方,欢迎各位专家和读者随时批评指正,以便重印时及时校正。

风笑天

2006 年 12 月于南京

作者前言

本书第2版几乎是一本新书,第1版中的多半章节都由新的著述所替换。本版新增了33位各章节的作者(含合著者),新增了6个全新的主题内容,包括酷儿理论、表演民族志、证词法、女性研究中的焦点群体、应用民族志、人类学诗歌等。在第2版中保留下来的章节都作了大量的修改,有的甚至完全改头换面。

第2版是第1版的继续。在第1版的前言中,我们曾断言,过去的20年在社会科学领域悄然进行了一场方法革命,学科间的界线正在模糊化。在理论与研究中对诠释性定性方法的共同关注使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越来越靠近。我们认为,尽管这些趋势并非什么新趋势,但是社会科学及相关专业领域所发生的"定性革命"影响范围之广还是非常令人惊奇。人们对于第1版强烈、积极的反馈也肯定了我们的断言。对于第1版如此受欢迎我们也感到诧异。研究与教学人员都可从该版本中找到进行教学与开展新研究所需的有用资料。

本书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的三大读者群依然是:想学习如何做定性研究的研究生,希望对本领域有更多了解的有兴趣的教学人员,那些已经是本书所讨论的某个领域或几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仍然希望了解该领域最新发展的学者。我们未敢设想本书有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也不敢想象本书会成为本科生、研究生的研究方法课程的课本,但它确实做到了。1998年,在第1版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三册平装本的课本,即《定性研究方法导论》、《定性研究策略》和《定性资料的诠释》。

正如托马斯·施瓦特所言(见本书第7章),我们可能发现定性研究即是"开始于1970年代的学术界的改革运动"的别名。在这场运动中,诠释范式和批判范式以其多种不同形式成为讨论的核心。托马斯·施瓦特认为实际上这场运动包含了多重范式的理论,还包含了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的认识论与伦理的批判。现在该运动已经有了自己的期刊、科学协会、学术会议和大学教学岗位等。

发生于1990年代早期的定性研究领域的转型在随后这十年中继续不断地获得动力。到了20世纪末,现在几乎没有人带着怀疑的目光去回顾这次叙述性转型。现在我们进而知道男人和女人对文化的写作是不同的,而且写作本身并非一个简单的实践活动。

用实验法写作第一人称民族志文本现在已非常普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继续在探索民族志写作的新方法,其中许多人在写作小说、戏剧、表演文本,以及民族志诗歌等。社会科学的期刊在主持着关于虚构文本的辩论。公民新闻学正在塑造、在呼吁一种公民的或曰公众的民族志。

目前迫切需要知道的是定性研究实践如何能够帮助这个世界朝着积极的方向改变。所以,值此 21 世纪来临之际,非常有必要对作为生产性调查形式(Peshkin,1993)和作为激进的民主实践形式的定性研究的理论前提进行再一次地探讨。本书第 2 版的这一纲要就是要展示定性研究的话语如何能够被用来帮助创造、想象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书中的每一章都以某种形式支持这一课题。

出版商告诉我们,理想的手册应该代表某一领域知识的浓缩;它应该成为一本综合现存文献的标志性的书卷,有助于界定和塑造该学科的现状与未来。正是这一训令指导了本书第 1 版的组稿。打个比方,如果你要带一本定性研究方面的书去一个荒岛(或者准备一次研究生的综合考试),那么你需要的就是一本手册。1996 年的春夏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一训令之下,问自己如何能够最好地展现本领域自 1994 年以来所产生的新成果。

定性研究的"领域"

本书封面设计(指英文原版)的布兰克林大桥图片别有蕴涵。就像这座复杂的建筑一样,本书在新与旧之间架起了桥梁。它连接了多种诠释群体,延伸到不同的领地,提供了一条在公与私、科学与神圣、学科研究与艺术表达之间自由进退的通道。

无需花费太多时间我们就能发现,定性研究"领域"自 1991 年春以来已经经历了大幅度的跳跃,当时我们正开始计划本书的第 1 版。我们再一次地了解到定性研究领域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根本性的紧张、矛盾和犹豫徘徊来加以界定。这些紧张(许多都是 1991 年以后出现的)在本领域相互竞争的定义与概念之间纵横捭阖。

这些紧张并非存在于一个统一的舞台之上。我们发现护理与传播学方面的定性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象征互动主义社会学家所处理的问题与教育研究中批判理论家的兴趣也迥然不同。而且,定性研究者的学科网络未必相互连接,他们未必相互对话、相互阅读。

那么面对这些根本性的范式差异,不同风格、类型研究的内在矛盾,以及跨越不同学科、民族、种族、文化和性别所造成的障碍,我们再一次试图将定性研究领域凝聚、诠释、组织起来。在导语和结论章节,我们对这些张力如何自我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各章节作者中很多人对于这一领域的看法与我们的大不相同,这一点在我们与许多作者的隐含对话中表现明显。为了读者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以那种方式来处理这些困境,那么首先我们必须将自己置于这些张力与矛盾之中。

诺曼·邓津负责的是文化研究、表演文本、后现代、后结构主义部分,强调社会文本及其建构的重要性。伊冯娜·林肯宣称是建构主义者,她极为注重的是理论和范式的形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实证主义及其后继者后实证主义有其局限性。林

肯给本课题带来的学科有教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而邓津的基地是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和人文学科。这些倾向塑造了本书的结构，让我们直接进人彼此的对话。尽管我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例如，关于各范式是否可以相互沟通、整合的问题），但我们俩的声音在本书中都常常可以听到。其他的编者也纷纷从不同的视野，用不同的方法界定这一领域、建构本书。他们为每一主题选择不同的代言人，关注不同的问题，强调不同的方法，或者干脆组织完全不同的内容。

本书的组织结构

本书的组织是从一般到具体，从过去到现在。第Ⅰ部分是对本领域的定位，从历史开始，然后转到应用定性研究传统，探讨实地研究的他者、政治与伦理。第Ⅱ部分专门讨论现在正建构并影响着人类各学科之定性研究的我们所认为的历史与当代的主要范式。其相关章节包含从相互竞争的各范式（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的论述到具体诠释性的视角。第Ⅲ部分专门讨论研究者可以用于具体研究的主要研究策略（历史地讲是研究方法）。方法问题以定性研究课题的设计为起点。而这种设计又总是开始于一个社会情境中的研究者，他的探索从研究的问题到范式（视角）再到经验的世界。如此定位之后，研究者然后才提出在任何研究中都能运用的方法的范围。第Ⅲ部分的11章广泛探讨了这些研究策略的历史与应用。

第Ⅳ部分检视了收集与分析经验材料的方法。它探讨的内容从访谈到观察，到运用文化物质文献和历史记录，到视觉的、个人的经历，再到数据资料管理、计算机应用、叙述、内容分析和语义分析等分析方法。第Ⅴ部分探讨的是解释的艺术，包括定性资料之适合性的判断标准、诠释的过程、写作文本，以及定性政策研究与评估等。第Ⅵ部分着重论述定性研究的未来与前景。

修订版的准备工作

1996年春在多伦多举行的一次全天的会议上开始了关于修订版的慎重讨论。作者中有两人，彼特·拉贝拉（Peter Labella）和米奇·艾伦（Mitch Allen），参加了与来自Sage和AltaMira出版社的编辑的会谈。我们冗长的讨论再一次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从外部注入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新的视角。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我们聚集了在国际上和跨学科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组成编委会，这有助于我们挑选同样著名的作者、准备全书的内容，以及阅读每一章的草稿（通常有多个草稿）。我们将编委会各成员视为一扇通往他们各自领域的窗口。我们就那些需要探讨的关键主题、视角和歧见搜索相关信息。在彼特·拉贝拉的帮助下，我们还回顾了来自选用本书第1版作为教材者的调查反馈。我们寻求发现他们认为本书最大的价值在哪里。在选择编委会成员和各章节作者时，我们试图跨越学科、性别、种族、范式和民族的界限。我们希望借助他们的视野来实现我们自己学科盲点的最小化。

我们从编委会那里获得了全面的反馈，包括对于新章节以及每一章中不同倾向的

建议,还有对于不同章节之作者的建议等。本书的每一作者(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都获得了国际承认)都被要求探讨以下这些问题,例如历史、认识论、本体论、试验文本、关键分歧、竞争性范式以及对未来的预测等。

对批评家的反应

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实地的对本书第1版的巨大反响,特别是成百上千来自世界各地将本书(以某种形式)选作学生必读书目的教授们的反馈①。我们也感谢对本书的批判性反应。本书有助于开启一块长期被遗忘的对话的空间。许多读者将我们的方法用于实地时发现了问题,这些问题指出了更多需要对话的地方。

对于第1版的批判包括以下这些:框架不够张扬、对于芝加哥学派关注不够、太注重后现代时期、有一个过于武断的历史模型、选择性太强、过分强调第五阶段和代表性危机、太重视政治正确而对知识本身重视不够、对如何去做的相关论述不够。有些人觉得并没有发生一场革命,他们也感到很疑惑:既然已经发生了叙述的转型,那么我们如何对定性研究进行评价呢?

我们不可能为本书第1版和第2版中总共八十多位各章节的作者进行辩护。每个作者在这些问题上都采取了某个立场。作为编者,我们试图展现多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和参考文献框架。本书既不是,也不试图成为邓津和林肯观点的传声筒。我们并不是在说,做研究只有唯一一种方法,也不是说我们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或者说所谓的旧方法就是坏的。我们只是在讲,这是将这一领域理论化的方法之一,而且我们发现这种方法很有用。

当然,这本书也并不简单。它超越了各部分之和,而且每一章节内部及各章节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多样性。我们希望读者在这些空间之中发现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我们渴望在这些空间之中产生新的对话。这将是一种温和的、探索性的、邻里式的且具有批判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将在构成今天所谓定性研究领域的众多各不相同的诠释性群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界定本领域

这些诠释性群体是由散布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组成。他们在尝试运用定性的、诠释性的方法帮助他们(以及其他人)理解那些用以界定世纪之初日常生活之令人生畏的背景②。这些人应用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酷儿理论、批判种族理论以及文化研究等模式进行诠释。他们运用了本书第Ⅲ部分所讨论的所有研究策略(个案研究、民族志、现象学、扎根理论、自传法、历史法、参与法以及临床法等)。作为诠释性研究者,这个群体的成员精于使用本书第Ⅳ部分所讨论的所有经验资料收集与分

---

① 我们感谢伊萨穆·以托(Isamu Ito)教授对本部分的建议,感谢彼特·拉贝拉做出的评论。

② 这一部延伸了邓津和林肯(Denzin & Lincoln,1995)的观点。

析的方法。而且,作为本书章节的作者和诠释者,这些人在评价他们的文章时运用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标准①。

这些学者构成了松散定义的国际诠释研究群体。对于什么是"好的"、"坏的"、淡然无味的、解放性的还是有问题的分析与诠释,他们逐渐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他们不断地挑战"真实"与建构之间的界线;他们认识到所有的事件和理解都可以调节,都可以通过人际互动和物质材料的实践,通过本领域的话语、对话、写作、叙述、科学论文、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和表演故事等变为真实。

这个群体在正在浮现的跨学科态势的中心与边缘都能起作用,而这一态势跨越了原来各自独立的一些学科之间的界线,如传播学、种族、民族、宗教与妇女研究、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工作、健康护理,以及教育学等。这一点鲜明地表现为其整体状况上的悄然变迁,表现为跨国的、跨学科的对话,表现为实践与习惯上倾向实用的变化。

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实用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十字路口)一场革命悄然发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实用主义本身是一种理论与哲学的关注,它牢牢地扎根于现实主义传统。因而,它是一种理论立场,它认为实践与方法优先于反思与有意识行动。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本身并没有预设话语对观察的优先权。与之相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只是让我们对待话语要像对待观察(或者其他实地方法)一样严肃,让我们认识到话语是让我们与那些未亲临实地的人分享我们的观察的路径。

正是这种焦虑帮助我们认识话语的潜在力量,该力量现在将我们留在了后现代主义的门槛边,向我们暗示着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的来临。事实上,当代定性的、诠释性研究存在于相互竞争的话语场域之中。本领域目前的历史分六个阶段再加一个第七阶段——未来。这些阶段在相互循环、相互竞争、相互界定。在同一时间,话语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其效果就是,既为定性研究方法同时创造新空间、新机会和新局势,又将其他的方法搁置一旁。

有些人会将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版本的定性研究边缘化和政治化,将其等同于激进的相对主义、自我叙事和摇椅上的评论。有些人批评本书对于亲历亲为的实地法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对于那些告诉我们如何研究"真实的"世界的文本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还有一些人想为本课题寻找一种有倾向性的、正统的,却机敏灵活的版本,他们回归到芝加哥学派,或回归到当前正式的、分析性的、现实主义的版本。有些人会从目前局势的内部进行批判,认为话语对观察的优先并未产生评价诠释性研究的合适标准。当只剩下声音与诠释之时,他们疑惑的是以后怎么办。许多人还要求一个规范的框架评价他们的研究。然而,所有这些愿望短期内都不可能实现。竞争、矛盾以及哲学上的紧张使得在这些问题上业已取得的共识显得不甚突出。

在这里,我们不是在做详细的历史比较,尽管每一章节都包含了描述历史的内容。我们所有作者的目的都是指向未来,指向十年以后定性研究方法领域的态势。当然,

---

① 这些标准包括从后实证主义的(信度与效度的变异,如信用与信任)到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的立场注重强调合著的、唤起式表演文本,这些文本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创造了伦理上负责任的关系。

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还是在早期历史阶段所界定的框架之下进行。它也应该如此。做诠释性的定性研究并非只有某一种方法。我们这些诠释性研究者都是在比照着过去进行着现在的研究并探索着走向未来。

定性研究方法的一些竞争性定义

定性研究课题的开放性特征导致了人们永远抵制任何企图给该课题强加某个唯一的、像伞一样笼罩性的范式的做法。诠释性的课题有多种,包括表演民族志,立场认识论,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民族志,与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相联系的课题,几种不同的扎根理论,民族方法论的多个分支,预言性的、后现代以及新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美国为基础的批判文化研究模式,国际文化研究课题,等等。

这些定性研究课题中的每一种一般都同时沿着四个方向发展:①"在诠释理论中迂回徘徊";②对代表政治的分析和对文学、文化形式的文本分析,包括其生产、分配与消费;③日常生活中这些形式的民族志研究、定性研究;④对介入课堂与地方社区批判文化研究的新的教育与诠释性实践的调查。

谁的革命

总之,一个统一的但由几个部分组成的论点组织了对本书中今日之定性研究方法论状况的讨论。首先,这个课题发生了变化,因为定性研究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变化了,也因为各地的诠释性研究者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管是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分裂与差异界定着全球文化经济。这是一个后殖民的世界。在研究中有必要超越国家或当地群体来进行思考。

其次,现在是这样一个世界,民族志文本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在电子化世界经济中流通。民族志可能是后现代世界中主要话语形式之一,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理所当然地了解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民族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即便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定性研究(参见:Snow, 1999, p. 97)①。全球与地方性的法律过程已经抹去了民族志研究者与他们的作品之间的个人的与制度的差距。我们并不"拥有"关于我们研究对象的那些实地记录。我们并不具有毫无争议的正当理由去研究某个人、某件事。研究的主体现在开始挑战他们是如何被描写的,而且,不止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已受到起诉。

第三,这是一个性别化的课题。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的理论家质疑这样一种异性的、民族志叙事文本的传统逻辑,即,在实际的叙述中,将民族志研究者反思性地定位成性别中性化(或男性化)的自我。经历、话语、自我理解和更宽泛的关

---

① 詹姆森(Jameson,1990)认为,现实主义文本建构其版本的世界是通过"将读者……编入程序;在新习惯新实践中训练读者……这种叙述最终必须产生关于现实……关于真实、客观或外在世界的类型,这种类型本身是历史的,它可能在其他生产模式下进行决定性的修正,如果不是在以后阶段的话"(p. 166)。新民族志文本正在生产自己版本的现实,正在教读者如何介入这一视野的社会世界。

于种族、民族、国家、性别、阶级、年龄等的文化假设相互碰撞。确定的身份已经决不可能存在;民族志研究者必须不断要问的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在何时何地,我是何种状况?"(Trinh, 1992, p. 157)。

第四,定性研究既是一个研究课题,但它也是道德的、讽喻的、治疗性的课题。民族志不仅仅是对人类经验的记录。民族志研究者写作一些小的道德故事,这些故事不仅仅是文化差异的汇聚,也不仅仅是另一种文化重生。正如威廉姆·福克纳(Faulkner, 1967, p. 724)所言,研究者的故事写作是一种支柱,它帮助男人和女人们忍受和超越21世纪的黎明岁月。

第五,尽管对定性研究领域的界定常常存在断裂与分歧,但是该课题一直有一个中心:即明确地宣称从互动个体的视角人道主义地研究社会世界。从这一原则分化出自由与激进的行动政治学,其研究者分别来自女性主义、临床研究、民族研究、批判理论、酷儿理论、批判种族理论和文化研究等领域。虽然在定性研究领域存在多种诠释性群体,但是它们都统一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

最后,定性研究的第七阶段将由民族志研究者贯彻以上假设所做的研究来进行界定。这些状况为定性研究在21世纪的转型支起了一个平台①。

本书背后的故事

写作诸如此类的一本书所遭遇的许多困难和任何其他相同规模课题的困难相似。而另一些困难则是在本领域活动中产生的根本性张力与矛盾。在本书第1版中,许多"适合"某些章节写作的学者或者联络不到、太忙、负荷过重或者去海外做实地研究去了。因此,我们找其他的学者,而这些学者却证明比我们所想象的更"适合"。几乎没有重叠的网络覆盖我们所试图囊括的众多学科。尽管这一次我们对该领域了解更多了一点,但是关于应该向谁询问如何去做我们依然不甚知晓,还有许多未知空间。我们遭遇了学科的界线——包括我们自己的——发现了在不同的诠释性群体的内部围绕我们的每一主题存在不同的传统。要知道如何跨越这些常常很困难,而我们的桥梁又常常是移动性的建构。我们还不得不应对关于一系列不同主题的、迥异的理论风格,其建构的基础包括学科的、认识论的、性别的、种族的、民族的以及国家的信仰、疆界、意识形态等。

在许多情形下,关于谁应该写作某个章节或者某个章节应该如何写,我们常常不情愿地进入了一场政治斗争。这些争端清楚地指出了本课题的政治特性,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每一章节都是一个潜在的(如果不是真实的话)多重诠释的领地。不止一次,我们和某个作者以及某个编委会成员产生了分歧。我们常常发现自己要在编委们相互竞争的观点中做出裁决,在意义形成与交际手段之间进行连接。很遗憾,在某些情形下我们造成了感情伤害,或者甚至损害了长期的友谊。如果有先见之明,许多事情今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在这里,我们为我们所造成的伤害真诚致歉。

---

① 最后,我期待一个持续的定性研究的表演转向,作者为他人表演其文本。

我们,以及作者与顾问专家,努力地探询我们想要讨论的一些术语的意义,这些术语包括理论、范式、认识论、诠释性框架、经验资料与数据、研究策略等。我们发现,定性研究这一术语对于不同的人意义是不同的。

即使有两千多页的初稿,我们还是放弃了追求全面的目标。为了最后期限和页数的要求,我们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的理论性以及关于那些我们能够明白但其他人却未必明白的内容,我们也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何时完成,我们还得做斗争。而且,当我们要求更多的修改时,我们是在不断地测试着作者们的耐性。

本书的阅读

如果我们自己对本书作评论,我们将指出我们自己所见的不足。在某些意义上,这些不足类似于我们在1994年版本中的发现——过分依赖各自学科(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的视角,缺乏对自我及其在实地研究情境中的位置的研究,对新的社会与文化历史的研究太少——尽管我们努力地想避免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涉及了第1版中所体现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努力地试图涵盖应用定性研究的更多领域。我们帮助开启了各章节作者之间的对话。我们为来自其他学科(特别是人类学)的更多的声音创造了空间,但是我们依然缺少代表有色的及第三世界人们的声音。而你,读者,肯定对本书有你自己的反应,可能关注另一些我们所没有看到的问题。

这些都体现了本书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做定性研究的本质特征。这本书是一种社会建构,一种社会实施的、共同创造的实体。而且,尽管它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但是随着一代代的学者、研究生反复地使用它、修改它,从它发起更多的方法论范式的、理论的、实践的研究,它将毫无疑问地被再创造。它并非一个最终的论断。它是一个起点,一个新思想、新研究的跳板。新的研究新鲜而敏感,模糊了学科间的界线,但总能深化我们对较大的人类研究课题的理解。

尽管既有优势也有缺陷,我们希望这个课题有助于定性研究在人类研究学科中逐渐成熟并扩大影响。而且,正如我们原来所受到的训令,我们希望它能说服你——读者,相信现在定性研究本身已构成了一个研究领域,使你能更好地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于定性研究传统之中。如果能这样,我们就成功地架起了一座为我们所有人服务的桥梁。

致 谢

如果没有各章节的作者及编委会各成员对本书无偿付出的时间、意见与真诚的建议（常常未被给予足够的注意），本书将不能得以出版。在这里我们一并感谢所有作者与编委会成员，他们的名字列在本书的扉页上。他们既能够为本课题提供长期的、持续的支持，又能提供短期的、应急式的帮助。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人情债，非常个人化和家庭式的。如果没有我们的编辑彼特·拉贝拉及其前任米奇·艾伦无处不在的帮助、支持、智慧与鼓励，将不可能有本书的出版。他们对本领域及其历史与多样性的把握是非凡的。他们对本课题的性质的构想极具价值。是他们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向前。而且，不管我们何时碰到问题，彼特总是耐心地在那里提供帮助。回到家，回到萨基（Sage）出版社这支舰队，托马斯·盖伊（Thomas Gay），罗尔夫·詹卡（Rolf Janke），萨拉·米勒·麦克丘恩（Sara Miller McCune）在许多情况下保证了本书这条舰船向着正确的方向行驶。

我们也要感谢以下这些个人与院系给我们的帮助、支持、洞见与耐心，包括我们各自的大学与院系等。尤其要感谢伊冯娜的院长琼·康诺莉（Jane Conoley），副院长欧内斯特·戈茨（Ernest Goetz）和系主任布赖恩·R·科尔（Bryan R. Cole），他们每个人都以某种重要的方式为本研究提供了方便。在厄巴纳（Urbana），杰克·布拉奇（Jack Bratich）提供了必要条件。他的幽默与优雅使我们不断增加的文档井然有序，使每个人都按部就班。没有杰克，这个课题决不能够完成。还有伊利诺斯大学的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吉纳·曼宁（Gina Manning）和德洛斯·简·希尔（Delores Jean Hill），她们保证了传真在厄巴纳、沃尔纳特·克里克、波士顿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之间的通畅。

诺曼真诚感谢传播学院的院长金·罗茨奥（Kim Rotzoll）和传播研究所的所长克利福德·克利斯琴斯（Clifford Christians）在道义上、知识上和经济上给予本课题的支持。他也感谢黛安娜·蒂普斯（Diane Tipps）和汤姆·吉勒·安蒂（Tom Galer-Unti）对经济账目的管理，以及社会学系的主任约翰·利（John Lie）对本课题的慷慨资助。在萨基出版社那边，阿斯特里德·弗丁（Astrid Virding）负责本课题的出版；我们非常感谢她和塞尔霍斯特（Judy Selhorst），还要感谢彼隆纽（Eileen Peronneau），伯格斯泰德

(Kris Bergstad),哈利(Cristina Haley)和波姆普拉斯卡(Uma Pimplaskar),她们娴熟的校对与索引技术使本书在形式上更完善。勒梅斯特(Janelle LeMaster)负责页面设计,巴拉素里亚(Ravi Balasuriya)设计了书的封面,沃伦(Marion Warren)负责的是排版部分。凯瑟林·瑞安(Katherine Ryan)和埃贡·古巴(Egon Guba)夫妇帮助我们保持课题的正常运作,聆听我们的抱怨,表现出非凡的耐性与支持。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一群人,他们在我们需要读者时毫不吝啬时间与精力为我们提供专业的、深思熟虑的观点。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会常常发现自己对本书中所提出的不同的传统、视角与方法缺乏全面的理解。我们要感谢下列各位对于本课题的重大贡献,他们是:米歇尔·阿加(Michael Agar),马里兰大学人类学系;大卫·费特尔曼(David Fetterman),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系;埃贡·古巴(Egon G. Guba),印第安那大学教育学系;杰夫里·M·约翰逊(Jeffrey M. Johnson),东卡罗莱纳大学海事学院;史蒂芬·凯米斯(Stephen Kemmis),史蒂芬·凯米斯研究咨询有限公司;J·加里·诺尔斯(J. Gary Knowles),密西根大学教育学系;雷蒙德·李(Raymond Lee),伦敦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伦基拉(Markku Lonkila),赫尔辛基大学社会学系;马休·B·迈尔斯(Matthew B. Miles),纽约政策研究中心;约翰·奥格布(John Ogbu),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丹尼斯·帕隆博(Dennis Palumbo),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正研究系;乔恩·H·里格(Jon H. Rieger),路易斯维尔大学社会学系;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汤姆·施瓦特(Tom Schwandt),伊利诺大学教育学系;约翰·赛德尔(John Seidel),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Amherst)定性研究会;雷纳塔·泰什(Renata Tesch),定性研究管理;迪塞特·斯普林斯(Desert Springs),加里弗尼亚;亨里·T·特鲁巴(Henry T. Trueba),维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系。

诺曼·K·邓津

伊利诺斯大学厄巴纳分校

伊冯娜·S·林肯

德克萨斯 A&M 大学

参考文献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1995).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s it a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 349-358.

Faulkner, W. (1967). Address upon receiving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The portable Faulkner* (Rev. ed.; M. Cowley, Ed.; pp. 723-724). New York: Viking.

Jameson, F. (1990).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New York: Routledge.

Peshkin, A. (1993). The goodnes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2(2), 24-30.

Snow, D. (1999). Assessing the ways in which qualitative/ethnographic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social psychology: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2, 97-100.

Trinh T. M. (1992). *Framer framed.* New York: Routledge.

本卷目录

第Ⅴ部分　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与实践

第Ⅵ部分　定性研究的未来

相对主义的标准问题 34

THE PROBLEM OF CRITERIA IN THE AGE OF RELATIVISM

⊙ 约翰·K·史密斯　迪博拉·K·迪默

在黑兹尔里格(Hazelrigg,1995)关于研究本质系列论著的第三册介绍部分,他谈到了"相对主义及其对立面"的问题(Hazelrigg,1995,p. IX)。他在谈论后者时接着说:"既然我们现在能够坦然地谈论绝对主义,那相对主义又是什么呢?"(p. IX)。他有一个观点曾被伯恩斯坦(Bernssein,1983)等人提及,即不再有与相对主义相对的"对立面"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很显然在这个不能再指望上帝观点的时代,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相对主义就是必然的结果,赫西(Hesse,1980,p. XIV)。因此,任何关于判断社会及教育研究标准的讨论都必须面对相对主义的问题——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如何理解或界定相对主义至关重要。

这一章从简要的历史回顾开始,回顾我们为何必须接受相对主义,不仅是作为讨论标准时的重要特征,而且也是作为我们社会存在的主要条件。其中核心问题是认知,认知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即所有的观察都是有理论支撑的,或者说不可能存在不带理论的观察或知识。虽然这个观点早于汉森(Hanson,1958)和库恩(Kuhn,1962)等人的思想,但正是他们的论著才使我们意识到,作为认知主体,我们构成了对知识的理解或主张中非常紧密的部分。在我们不再可能认为自己是知识游戏中的中立观察者时,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困扰许多研究者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做?"这是一个经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问题:加拉格尔(Gallagher,1993)重新审视她在博士论文研究中的角色,斯帕克斯(Sparkes,1993)考虑互惠的问题,沃尔科特(Wolcott,1995)讨论田野工作的艺术,庞奇(Punch,1994)讨论实地研究的政治与伦理,等等。关于研究者地位或作用的讨论似乎没有止境。

在简要的历史回顾之后,我们将考察相对主义时代关于标准问题的一些讨论。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我们称之为准基础主义(quasi-foundationalism)的回应。准基础主义的核心观点是极力否认相对主义,即认为没有不带理论的知识或观察。这些基础主义者得到了不同的新实在论(neorealist)哲学家的支持(新实在论者是一个泛称,用来把这一群人与经常所指的,特别是新实在论者自己所指的幼稚的、直接的或单纯的实在论者区分开来)。至少从波普(Popper,1995)拒绝

实证主义而赞成成熟的或科学的实在论开始,新实在论者试图一方面接受建构主义认识论,而另一方面又采纳新实在论的本体论。基于后者,他们承认存在一个对知识的主张起制约作用的实体,这种实体是可以认识的,至少原则上如此。基于前者,他们声称不存在不带理论的知识或不带理论的观察。

在本章第二部分,我们阐述当意识到认识论已经过时而必须接受相对主义时,我们关于标准的观点该如何改变。这一阐述首先从很重要的一点开始,即相对主义不需要也不能够被看成是"怎么样都行"(anything goes)。相反,相对主义或多或少只是反映我们社会的实际情形——相对主义认为,作为人类,我们是而且只能是有限的。在这样理解相对主义时,我们必须将想象和比喻由探索和发现改变为建构和制定。在这种转变之后的主要问题就成为,作为个人我们如何判断,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做的,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的判断进入公共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必须的),以便听取别人的判断。

按照惯例,在本章开始之前,我们提出两点告诫:第一,我们谈论的是复杂的问题。由于篇幅,更主要的是能力所限,我们无法做到完全公允。第二,与其他人谈这个话题的通常做法相反,我们没有提供特定的标准以及如何应用的说明。我们的目的是讨论相对主义时代判断的限制性及可能性——包括个人的及社会空间范围内的。

历史背景

经验主义者为自己造成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将他们曾经分割开的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重新联系起来。在创立主客二元论以后,各种形式的经验主义者都被迫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试图在允许他们主张认知主体可以精确描述实体的情况下重新组织或传播这种二元论。换言之,经验主义者此前已经达至这一情形,即判断知识主张的参照点是,而且也只能够是独立存在于认识者之外。知识是一种精确描述出来的东西,因此才产生了"对应真实"的理论。正如我们在关于研究的教材中早已讲到的,完善对应理论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这种观点非常直截了当:如果采取了适当程序或方法,认知主体的主观性就可以包容,认识者就可以获得对实体的精确、客观的描述。克宁尔(Kerlinger,1979)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他(1979)说:"科学的程序是客观的——而科学家不是(客观的)。科学家就像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一样,是武断的,教条的,意识形态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坚持程序客观的原因;将所有的程序都置于我们之外"(p. 264)。

基于这种考虑,关于研究质量的判断至少首先就是判断是不是已经应用了适当的程序。研究方法是中立的,因此也就建立了一种中立的平台,可以对单个研究的好坏做出判断。当然,还有一个第二层次的兴趣——即任何特定研究的意义问题。程序主义者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即使以最适当的方法做出来的研究也可能被判定为无意义,因为其所研究的是很小的问题。总之,经验主义者的观点

可以概括如下:方法可以做到对现实的真实的接触,所以它是区分好坏研究的基础,但不区分重要研究和非重要研究。

不需要讨论过去几百年经验主义者为重新将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所做的努力——从洛克(Locke)的"白板"到逻辑经验主义者的以事实为例证的参考。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讨论会使人们远离目前的主题(对这段历史的简要介绍参见:Smith,1993)。然而,有必要对过去30或40年里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简评,在这些年里,传统经验主义发生分裂,我们见证了从方法论上解决标准问题的办法走入死胡同。主客二元论相关的问题对于许多20世纪中叶以前的哲学家来说是很显然的。然而,在盎格鲁-美国人的哲学圈内,可以说是汉森(Hanson,1958),然后很可能是库恩(Kuhn,1962)才将与主客二元论相关的问题提了出来。

汉森(Hanson,1958)的核心观点现在看起来非常显而易见,即"研究者的理论、假设、框架或者背景知识对所观察的东西可能有很大的影响"(p.7)。短短几年之后,库恩(Kuhn,1962)在谈到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范式转换的原因时承袭了这种观点,即知识依赖于框架等。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无数人的研究都清楚地表明,任何主张或者希望"不带理论的知识"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略举几例,帕特南(Putnam,1981)关于"没有上帝之眼的观点"的论证;内格尔(Nagel,1986)声称不可能存在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观点";伯恩斯坦(Bernstein,1983)的关于没有"阿基米德观点"的讨论;泰勒(Taylor,1971)对希望得到"纯正数据"的贬损;伽达默尔(Gadamer,1995)关于"效果历史"的讨论;以及古德曼(Goodman,1978)对我们创造世界的方式的说明。

所有这些及其他争论,与其他一系列讨论相结合,这些讨论直接集中于并极度怀疑那种认为方法自身是中立的因此可以是程序客观性来源的主张。这是赫西(Hesse,1980)、古登斯(Giddens,1976)、麦克齐(Mackenzie,1981)、彻里霍姆斯(Cherryholmes,1988)、史密斯(Smith,1985)等论著所表达的主要内容之一。最后,所有这些学术发酵的结果是对讨论标准的重要后果的诸多观点的说明:不可能存在不带理论的观察和知识;主客二元论是站不住脚的;不存在某种方法或一套方法在认识上有优越性;我们不能运用客观的外在语言指示物来对不同知识主张进行评判。

这些讨论的结果当然是我们不再能够谈论基础认识论和直接的本体论的实在论。相反,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的讨论让我们弄清什么的话,那就是我们不能接受上帝之眼的观点;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不同人的观点反映出促进描述和理论的不同的兴趣和目的"普特南(Putunam,1981,p.50)。在这种情形下,随着经验主义及其方法走到尽头,任何对标准的讨论都必须以某种形式或方法与相对主义联系起来。

准基础主义者的回应

准基础主义者试图从某种形式的非单纯实在论的角度来讲述标准,他们面

临着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对研究问题的任何说明都必须符合如下承诺:一方面是本体论的实在论,而另一方面又要意识到他们应接受建构主义者的认识论。前者宣称忠实于这样的一个命题,即存在一个独立于兴趣或知识之外的真实世界;后者要遵循的命题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我们是否真实地描述了这个实在世界。简言之,非单纯实在论者或新实在论者"相信存在一个独立于知识之外的实在世界而同时又认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很容易出错"(Leary,1984,p.918)。

由于这双重承诺,许多新实在论哲学家都认为需要使用"相对主义"这一概念来表述他们的观点。比如巴斯卡(Bhaskar,1983)说,其先验的实在论就预示着"本体论的实在论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p.259)。同样,豪斯(House,1991)也指出,"只有通过特定的描述来认识世界,从这种有限的意义上说,世界在认识论上是相对的"(p.5)。马尼卡斯(Manicas,1987)甚至更加直接地写道:"知识是社会产品,研究标准产生于研究过程。这就是相对主义,但它不是反理性主义,因为它预示着实在论"(p.261)。

那么,毫无疑问,新实在论者要接受认识论的建构主义就必须意识到不存在"上帝之眼的观点",因为任何对知识的主张都必须考虑主张者的观点。马克斯韦尔(Maxwell,1992)很清楚地讲到了新实在论者建立于该意识之上的主要反应。首先,他意识到"作为观察者和理解者……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经验,获得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经验描述。因此,总可能存在不同的、基于不同观点但同样有效的描述"(p.283)。然而,这也清楚地表明,就像其他新实在论者一样,他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即"所有可能的描述……都是同样有用的、可信的或者合法的"(p.283)。因此,"理解是相对的",不存在"独立于任何特定观点之外的描述"(p.284),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只有陷入所有的描述都是平等的或"怎么样都行"的相对主义。最后,由于新实在论者都承认经验主义先驱们的方法观行不通,因此,避免相对主义的方法是提出一个"有效性的实在论观点,即把描述的有效性看成是内在的,不在于产生并使之有效的程序,而在于它与希望被描述事情之间的关系"(p.281)。

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他们在这种准基础主义及其明显的真实即对应观点上的建树——首先需要特别强调哈墨斯利(Hammersley)的著作,因为他在书中从新实在论观点出发来创建标准的努力最为清楚和成熟。哈默斯利(Hammersley,1990)在一本目的性很强的书中开门见山地主张:"我们不需要放弃真实即独立现实对应物的概念,我们可以采取更加精细的实在论方式来保留真实的概念"(p.61)。在提出可以保留经验主义对真实的概念但必须拒绝对其单纯理解的主张之后,他接着精心地制订标准,以免陷入对他来说属于相对主义的樊篱。这些标准既要符合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又要符合实在论的本体论,不管它们多么精细。哈默斯利(Hammersley)用研究者如何证实其描述来规范这一任务。他认为,证实的唯一基础是判断"误差的可能性"(p.61)。这是一个明显带有波普(Popper)语气的观点,因此,相应地也带有波普(Popper)描述证伪的问

题,我们很快将会谈到这一点。

哈默斯利(Hammersley,1990)提出,有效性的两个关键要素是貌似有理性和可信性。前者是一个主张看起来是否看似有理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判断该主张在目前的知识下是否可能"(p.61)。他又补充说,有些主张看起来似乎很有理,可以立即接受其表面价值,而有些则需要用证据来说明。就可信性来说,对某一主张的可信性判断必须"考虑有关现象的特性和研究的环境"(p.61),等等。在这两个要素中,哈默斯利(Hammersley)意识到,当某种主张既没有表面上的看似有理性又没有表面上的可信性,那就需要提供证据。然而,他进一步认识到,研究者提供的用来支持其研究的看似有理性和可信性的证据其本身的表面有理和可信性也需要评估。正如他接着说的:"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支持这些证据,应该根据看似有理性和可信性来判断这些证据"(p.62)。

很显然,哈默斯利(Hammersley)完全承认看似有理性和可信性都是社会判断,因此,毫不奇怪,他制订标准的努力就成了完全的倒退——如果不是一个循环解释的话。因此,似乎需要谨慎地提出本体论实在论并籍之做严肃的工作——特别是与现实相联系的工作,以减缓社会判断的无限倒退,或者换言之,减缓似乎位于底端的相对主义。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管对应和实在论的观点多么精细及成熟,它们都无益于平衡其讨论。哈默斯利(Hammersley,1990)背离新实在论始于他的一段话,他说:"相对于直接根据它们与现实的对应性或依赖有效性已经得到证实的知识,看似有理性和可信性是判断主张的相对较弱的基础"(p.62)。当他重新接受建构认识论,并因此承认说判断不会"一定是最终的,因为对于什么是看似有理和可信性有着不同的看法"(p.62)时,他继续与新实在论背道而驰。

最后,哈默斯利(Hammersley)以讨论科学团体成员应遵守的谈话规范结束了他的论述。他认为科学团体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所有的发现都应经过"团体评估","要通过寻找共识……,并只在所有争论者都认为有效的基础上努力找出解决争议的办法,来努力解决观点的分歧"(p.63)。其次,参与争论者不仅要努力劝说,而且还要愿意被劝说及改变观点。最后,团体要对那些"愿意遵循前面两个规则的人"开放(p.63)。这样,关于看似有理性和可信性的判断就最终成为社会判断,应尽可能建立于自由和开放的对话和讨论基础之上。哈默斯利(Hammersley)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与外部参照物即现实相联系——这会使看似有理性和可信性的标准独立于社会过程以及隐含在社会过程之中的必然相对主义之外。

马尼卡斯(Manicas)和西科德(Secord,1983)的知名论著中也体现出了相似的观点。他们承认"知识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p.401),不存在"没有预先理解的'假定',真实的检验不是'对应'"。从认识论上讲,不可能知道思想(句子、理论)会对应什么"(p.401)。但如果这样,那正如利里(Leary,1984)所说:"到底马尼卡斯(Manicas)和西科德(Secord)建议如何将经验——他们承认是文化与历史共同作用的产物——和独立于经验之外的现实连接起来,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

说明"(p.918)。他们在这一点上说得不够清楚,因为正如利里(Leary)进一步指出的,他们最好的回答是一个否定性的声明,即不存在不带理论的观察,这"不会消除客观的可能性,此处理解为合理断言的客观性"(p.918)。但他们在这一点上面临着与哈默斯利(Hammersley,1990)相同的问题。用来作为判断证据的自身也是在社会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就像用来证明证据的证据,这样循环往复。通常对于新实在论者来说,对于上述两种情形,如要离开社会历史条件来说明标准问题,必须解释到底他们的本体论、实在论如何做严肃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一个主张。

另外一个同样的例子是马克斯韦尔(Maxwell,1992)讨论了有效性的五个方面,即描述的、解释的、理论的、可推广性及评价的。我们只将重点放在描述性效度上,因为它似乎最多地体现了实在论者的承诺。马克斯韦尔(Maxwell)认为,质性研究首先要关注的是事实描述的准确性——研究者"不会编造或弯曲其所见所闻"(p.285)。表面上,这种关注似乎毫无问题,特别是人们把描述的层次仅限于研究者实际对话的对象及其述说的行为、或者仅限于研究者进入教室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形。然而,当描述更远距离的观察,如某个学生是"在特定情况下丢黑板擦"(p.286)还是她伸出手臂在空中一甩这样的情境时,描述效度的可行概念就会消失。换句话说,一旦我们需要对时空中的身体运动做最细致的描述,主观上所需要的对真实或实际情况的强迫或强制性特征便以情境需要之名义而成为久远的历史。

马克斯韦尔(Maxwell,1992)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进一步指出,甚至描述效度也"决非独立于理论之外,……即使该理论只是盲从的或普通意识"(p.287)。这种理解会导致这样的评论,即虽然对描述效度存有异议,但可以在"原则上"通过资料得到解决。然而,他又进一步使这种争论持续下去。他说"当然,某个讨论者可能会在理论出现问题——比如说,通过怀疑'丢'在学生处理黑板擦的适用性"(p.287)。有人可能对此进行批驳,说怀疑"丢"的适用性不仅会在理论上出现问题,而且在描述上也会有问题。比如,有人可能会说"丢"不能应用如此,因为学生是"掷"黑板擦。如果有人提出这一点,那么,危险的将不仅仅是使理论上出问题,相反,它是对描述精确性的根本怀疑,每个人都说对方对事实的描述不正确或不精确。

马克斯韦尔(Maxwell,1992)通过转变效度类型来回答这个复杂情形。他说这就不再是描述效度的问题了,而是解释效度的问题。但这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不存在没有理论观察"的观点全部要点是,描述和解释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如何描述世界是一个解释的问题——或者换言之,解释是很深层的描述。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对"丢"和"掷"达成一致,并非因为现实与我们作对,而是因为我们碰巧有相同的理论或预备理论(pretheretical)观点及描述时空运动的语言。在下一段落中,马克斯韦尔(Maxwell)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描述的理解在定义上适合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一个解决争议的框架,这个框架主要由对时间、空间、物理形态、行为以及我们对这些认知的想当然的想法所组成"(p.286)。换

句话说,如果我们从相同的观点出发,使用同样的语言等,我们就会以基本相同的方式描述/解释事物。如果我们从不同的理论或预备理论观点出发,我们对事件的描述/解释就会不同。这正是汉森(Hanson,1958)、库恩(Kuhn,1962)和其他许多人包括新实在论者所持有的观点。因此,正如哈默斯利(Hammersley,1990)及马尼卡斯(Manicas)和西科德(Secord,1983)一样,马克斯韦尔(Maxwell)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对现实情况做一些严肃的工作——这种工作可以为其讨论提供有效性,并且通过标准的延伸来提供力量,使其支持、反对或置身于社会和历史限制的判断过程之外。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我们指出新实在论者所面临的问题与其杰出先驱之——波普(Popper,1959、1972)稍有不同。虽然波普(Popper)与其他人一样为退出逻辑经验主义做出了同样的贡献,但他仍努力保留经验主义的一些残余。波普(Popper)坦率地接受"不存在没有理论观察"的观点。这表明,他仍想保留对观察的判断进行理论检验的能力。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他借用实在论作为检验假设能力的关键因素。这样做的问题是,如果证伪是理论或演自理论的假设和事实之间的分离,后者必须独立于前者。如果所有观察都包含理论,那这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假设与理论作用过的事实(theory-mediated facts)的比较不同于对独立存在的现实进行的假设检验。海因兹(Hindess,1997)清楚地指出了这种观点中所表现的不连贯:"如果观察中一定带有理论,那么检验就不能是理性的程序。如果检验是理性的程序,那么就必须有一个由预先设定的语言和现实之间的一致性所主导的不含理论的观察模式。既要保持……检验的理性,又要维持观察是基于理论的解释这一论题……这是一个矛盾"(p. 186)。

波普(Popper)的实在主义问题在其关于调查及真实相似的论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的这个观点被哈默斯利(Hammersley,1990)在论述研究产生"累积知识"(cumulative knowledge, p. 62)的可能性时用稍微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出来。这些论述中包含的基本思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会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理或现实。不幸的是,正如黑兹尔里格(Hazelrigg,1989)所指出的,这些论述缺乏说服力,因为"近似的观点要求存在可以达到近似的参照物。然而,我们怎么知道那个参照物是否存在呢?根据波普(Popper)的观点,我们是不能知道的,但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又怎么可能判断近似的问题呢?"(p. 78)。新实在论宣称现实自身可以作为判断基础亦于事无补。

总之,新实在论显然不能让人接受其关于标准问题的观点。这种缺乏说服力明显体现在哈默斯利(Hammersley,1990)、马克斯韦尔(Maxwell,1992)和其他一些人的论著中。上述两人都开门见山地提出:我们可以保留"真实是独立现实的对应物"(Hammersley,1990,p. 61)以及可以根据与所描述事物的关系判断研究效度(Maxwell,1992,p. 281)。然而,这也是两个人在新实在论上走得最远的地方,而且两个人最终都转变为把判断看成是社会过程。当哈默斯利(Hammersley)无法说明如何与外部参照物相联系时,他的这种转变更加彻底。由于无法说明,他将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唯一可能的方向——指导研究者对

话的规则问题。从马克斯韦尔(Maxwell)的一些话中可以看出其对新实在论的放弃。他说,甚至对描述效度的判断,即他所说的"描述的实际精确性"(p. 285)也需要共同的框架来解决争议(p. 287),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效度是相对的,因为理解是相对的(p. 284)。

转 变

新实在论者未能保留经验主义的最后残余,因此到了转变及改变对话的时候了。换言之,应该放弃基础或准基础的认识论,把隐喻和想象由发现者转变为建构者/创造者,并把相对主义看成是有限生命的必然条件。毫无疑问,调查者及外行必须学会接受不确定的偶发性,并放弃超越人类限制的希望。但由此而产生的相对主义并不是说在评估调查质量时要有新实在论的恐惧,即所有的判断都是同等有效的,或者说"怎么样都行"。施瓦特(Schwandt,1996)非常简洁地总结了非基础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学会忍受不确定性,不需要最终的辩护,不希望从认识论上解决问题。偶发性、无法获得明确知识的理论、对话以及讨论是社会存在的特征。但这种本体论观点并非等同于永恒的不明确、承诺缺失及对不确定的无能为力。"(p. 59)简言之,非基础主义者的问题是如何在无法诉求于基础或者知识建构过程之外的事情时做出并证明判断。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无论是作为调查个体还是作为调查群体(如果有这么一个总的群体意识的话)来说都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对这个问题及其对调查判断意义的讨论应该首先理清一些问题,提出新观点。首先要求回答的被经常指责的问题是自我反驳(self-refuting)。这里的限制非常清楚: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就是做出了一个非相对的陈述。因此,相对主义是自我反驳及采取了站不住脚的立场。我们必须说明两个问题以证明这种指责是不成立的。

首先,相对主义是自我反驳的吗?从我们通常提此问题的逻辑形式来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这又会导致第二个问题:从逻辑形式上看,相对主义是自我反驳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个问题上答案是否定的。第二点显然需要做进一步说明。

有人可能会说关于自我反驳的这种观点对于非基础主义者及其对待标准的方法来说是自我毁灭的,因为其他哲学流派也在类似的情况下走入了死胡同。比如说,逻辑经验主义就是因为验证问题而瓦解了。众所周知,逻辑经验主义者说如果结论不能从经验上得到验证即无意义。但这个结论自身就得不到经验的验证,因此,从逻辑上讲,它是无意义的。正如普特南(Putman,1981)清楚指出的,正是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才导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终结。所以为什么相对主义不会出现同样的非难呢?

对这种自我反驳问题的最早回答来自于伽达默尔(Gadamer)和罗蒂(Rorty)。

伽达默尔(Gadamer,1995)同意相对主义是自我反驳的说法,但他接着不以为然地说,提出这一点没有多大意义,或者说“没有表现出更好的价值洞察力”(p. 344)。罗蒂(Rorty,1981)的策略则是争论说把相对主义看成另外一个知识理论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他无须考虑自我反驳的问题。他说,作为实用主义者,他无兴趣提出任何认识论,所以也就没有相对主义的认识论(p.6)。

虽然我们比较赞同伽达默尔(Gadamer,1995)和罗蒂(Rorty,1981)对这个问题的说法,但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说明。自我反驳对逻辑经验主义和其他思想流派来说,是而且应当是毁灭性的,但对相对主义却不会。原因之一是这些想象家所表现出来的热望。比如说,任何形式的经验主义都可以说是建立在这样的观点及希望上,即否认人类的有限性及接受上帝之眼的观点。也就是说,该主张认为,我们可以以某种形式,通过某种方法,将我们自己“括”(bracket)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抓住某些外部参照物(比如说真实的现实)来判断不同的知识,解决分歧。这个主张很适合于应用自我反驳的逻辑——主张及其所提希望的说服力必须与用来支持这些主张和希望的证据的说服力直接相关。

相反,这里所理解的相对主义不是知识理论,也没有提出我们可以逃避人类有限性的主张。因此,自我反驳的问题虽然从逻辑上讲是成立的,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从戈德尔(Godel)关于不完全性(Hofstadter,1979)的观点来看,这只是人们对人的社会和历史建构的期待。相对主义不是超越,而只是作为有限的人必须学会接受。

对相对主义的这种理解会使非基础主义者陷入“怎么样都行”的情况吗?——即所有关于研究的判断及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平等的。有两个紧密相联的原因说明相对主义不应该用这些词语进行理解。首先,对相对主义是怎么样都行的指责毫无意义,因为这个指责要求其有效性是一个绝对可行的概念。参考前面黑兹尔里格(Hazelrigg,1995)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再能坦然地讲到绝对,那么,我们就必须意识到我们也不能坦然地说“怎么样都行”。

其次,我们显然都做过判断,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还将如此。说判断必须根植于语言之中,并不是说就可以不需要尽量开放和不受限制的对话来努力证明判断,但要说服别人就要准备被别人说服。相对主义对标准问题的看法是,作为一个有限的人,要接受并跟其他有限的人共同做判断的确很难。这实际上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施瓦特(Schwandt,1996)所说的意思。他说,学会接受不确定性和最终验证的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承诺和做判断的能力。

那么,相对主义意识到并接受人的有限性的这种理解对于社会和教育研究,特别是判断研究质量的标准问题意味着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一种很重要的方法是介绍两种研究描述之间的区别,即通过隐喻和探索或发现的想象以及隐喻和创造或建构的想象。如果接受建构主义的观点,那正如罗蒂(Rorty,1979)所清楚地指出的,就意味着不可能得到好的隐喻和探索发现的想象。但罗蒂(Rorty)

同时又指出,我们也可以使用被发现世界的语言,其部分原因是“不一定非要从这两个词语之间进行选择——在创造的想象和发现的想象之间”(p. 344)。然而,黑兹尔里格(Hazelrigg,1989)令人信服地让我们明白,大量的结果都表现出这种差异,这是因为,正如他所说的:“结果的差异不仅是想象和故事的差异,而且是实践的差异——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我们创造什么样的世界?”(p. 167)问题是,继续使用“被发现世界”(discovered world)的语言即是“继续世界责任上的被动性”(p. 168)。而且,正如黑兹尔里格(Hazelrigg)接着说的,用发现来思考是把世界置于“人的愿望范围之外,对于任何坚持用被发现世界的语言来讲述故事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后果”(p. 168)。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发现在教育实践和研究方面,特别是近期,有一种很强的把孩子分为这一类或那一类的趋势——比如说分为学习残疾(learning disabled, LD)。对于那些把研究者看成是“发现者”的人来说,学习残疾是一个自然的分类———直存在学习残疾的孩子。我们最近才发现他们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熟。对于那些使用创造或建构语言的人来说,学习残疾是建构出来的类型——因为社会或历史的原因,把孩子进行分类的方式。这不是说我们分配类型,这在任何时候对于有限的人类思维来说都不可能。相反,它所强调的是需要分析和充分讨论我们如此建构世界的原因。这是实践和道德层次的讨论,建立于偶发的历史情境之中,当然不是知识的理论意义上的认识论。换言之,对于那些使用发现的隐喻的人来说,道德责任的问题至多是偶发性的,因为“发现”只是把现实及其告诉我们的事联系起来。对于那些接受建构的隐喻的人来说,道德责任至关重要,因为人们必须对其所建构或创造的事情负责(更多的例子和讨论见:Smith, 1989,特别是第4章)。

非基础主义的相对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要求把研究看成是一种实践上和道德上而非认识论上的建构行为。同理,如同必须遵循这项要求一样,任何关于研究的好或坏的判断,其自身都必须是实践和道德上的判断,而不是认识论的判断。对于非基础主义者来说,避开认识论是为了把研究看成社会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建构现实,同时还建构进行判断的标准。

改变对话

相对主义只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表述。我们必须把自己看成实际的和道德的人,并放弃非根植于历史、文化及现存的知识的希望。如果这样,那继续谈论知识理论的词汇即是继续在无法实现愿望的阴影下谈论,这个愿望是指希望发生什么事情,以使我们走出 Montaigne 的轮子或解释循环。奇泽姆(Chisholm,1973)在对 Montaigne 的分析中总结了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的认识论问题:

> 要想知道事情是否如看起来的一样,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把真的表象与假的表象区分开来。但要想知道程序是好是坏,必须知道这个程序是否

> 确实成功地区分了真的表象和假的表象。但除非已经知道哪些表象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否则就不能知道程序是否成功。这样就陷入一个循环(p.3)。

新实在论者没能坚持不受时空限制的认识论的有机描述。他们未能告诉如何走出轮子或循环。应该是往前走的时候了。是改变对话的时候了,当我们不再是认识论的时候,通过询问什么作出判断。虽然可以谈论知识,特别是其社会产品,但谈论知识的理论并致力于解决问题实在是意义甚微。

不能再玩哲学即认识论的游戏,也不能通过基本的叙述来寻找安慰,这根本做不到。这看起来是社会和教育研究上"不为"(undone)的一次破裂——"不为"是斯特罗纳克(Stronach)和马彻(Machure,1997)最近新作的书名。换句话说,不能在看起来抽象无实质的空间里谈论任何判断问题,这个空间被想象成是认识论的,因此可以具体说明实际判断过程之外的判断情形。在相对主义时代,谁来做判断、关于什么样的研究、什么目的,以及跟谁分享判断的问题至关重要。作为个体我们必须做判断,而作为社会群体的成员,不管社会群体的组织如何松散,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环境,在该环境中个人判断与其他个体的判断发生作用。

但必须指出,至少存在一个很明显且通常有效的方法来回避判断的困难,当然人们可以借助于权力,在不同的伪装形式下,来说明社会情境和判断的过程。权力被自然或公开地使用过——比如说,一个很普通的情形是,文献回顾时拒绝很少或没有解释的文章,或者很多人在被提问时拒绝回答,这种情况在今天似乎很常见,提问者因为不得要点,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在很多这种时候,还有很多其他我们熟悉的类似情况下,个人已经做出了判断,也已经使用了标准,但没有深入地探究判断和标准。在主张理论性观点或其他差异的基础上采取这种防伪性做法会减少公共空间或与人分享判断的社会群体——所有其他人都可以看得出这种关系。无论如何,虽然总可以用权力来解决标准的问题,但这种可能性似乎又是令人不满意和不希望看到的。

不要由此想象我们单纯到认为权力应该而且可以从判断中消除,就像在社会上所做的一样。我们不想采取浪漫化的"知性论者离开权力的做法"(Hazelrigg,1995,p.202)。相反,我们提出负责地使用而避免滥用权力。但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不可能永久精确地划清责任与滥用之间的界限。同样,好像总有很好的理由来挤压社会群体。当被边际化的群体希望让社会听到其声音时,团结就很重要。事实上,几年以前定性研究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在避免滥用权力时如何重视这种需要——充分意识到不能对越界进行具体准确的说明。简言之,权力是永恒的,但使用权力来避免批评及偏见的诱惑(也是永恒的吗?)抵毁了公共演讲的价值及需要。这样,问题就继续存在:当相对主义要求注意情境而忽略抽象、无实质的(认识论的)公共空间时,我们能对判断说什么呢?

一些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声称讨论标准问题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我们不

接受罗西瑙(Rosenau,1992)对肯定及怀疑的后现代和后建构主义观点的描述,但必须承认她的一些评论揭示了一直困扰学术界许多人的问题。那些罗西瑙(Rosenau)称为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我们只能够是"非判断的"(p.55),因为"不存在什么好/坏标准"(p.175),所有解释都是同等有趣或无趣的。在没有确定的标准来区分好坏时,只有甩手离开判断。这个观点当然为人所知,至少我们知道。有时当我们评审要出版的文章和年级论文,以及接收不管多么令人失望的毕业论文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评定的是谁? 这个领域应该允许差异吗? 等等。考虑到判断容易出错,自我怀疑似乎能促使进行声音、写信、代表性危机等方面的痛苦的讨论。

但由此而开始或者假装(甚至希望?)生活中不用判断,这即刻就会误入歧途。判断是要做的,而且还要辨解和证实,除非对后者来说仅仅使用自然权力。正如斯瓦特(Schwandt,1996)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接受不确定和偶发性并不是说可以放弃承诺和判断(p.59)。毫无疑问,我们都会认为某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好,并依此做出判断,甚至在我们说不这样做时通常也是如此。这种判断过程已经开始了很久,而且还将会继续下去。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生活中会不做判断或判断不会出错。这使人想起巴思(Barth)的小说《醉鬼——野草的因素》(The Sot-Weed Factor, 1960)中的人物埃比尼泽(Ebenezer)。因为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同样有趣,所以他"放弃了选择",只是"穿着睡衣静静地坐在窗子旁边的椅子上,眼睛盯着下面街道上的活动"(p.11)。那些声称发现所有事情都同样重要的人必定也会是坐而不动。泰勒(Taylor,1989)已经很清楚地讲述了这种情景及其后果:"想知道你是谁就是把自己置于道德的空间,在这里会出现什么是好或坏,什么值得做和不值得做,什么对你有意义及很重要和什么对你无意义及次要。"(p.28)不做判断就看不到自己在道德空间的位置,这将失去做人的基础。

作为研究者、教育者和评判者,我们总在对要出版的论文、研究、陈述、著作、毕业论文及学生论文做出判断。当我们对特定的研究进行判断时,我们在脑子里浮现或列出一些特点的清单用来判断所得结果的质量。这里的"清单"并非用来指被简明列出的购物或洗衣店清单之类的东西。换言之,这种意义上的清单不是指像从 1 到 5 测量的 20 个项目的集合,这样的集合可以对研究进行数字上的计分,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临界点。很显然,如果用这些词来考虑清单,那就完全离谱了,离谱到嘲弄定性研究的想法、嘲弄相对主义的含义,以及嘲弄我们意识到不再是认识论时所指的意义。

相反,我们认为特点清单必须是开放的、部分未作清晰界定的,甚至当某一特点被清楚地界定时,也总是可以不断地再解释。而且,清单上的内容永远也不会成为某种抽象认识论的精髓。它们必须根植于观点之中,或者用伽达默尔(Gadamer,1995)的话说,它们必须是产生于并且反映人的"效果的历史"(pp.301-302)。这些需要做简单的说明。

所列判断清单是而且只能是开放性的,这样才能够不断地从清单中增减项

目——虽然正如我们将要提到的,这样做会有风险。如果我们接受风险,那么修改清单的限制不在于理论,而是在于清单的使用上。修改清单的限制是一个实践上的事情。清单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得到修改,不能用抽象形式把它们固定下来。

其次,只能对判断清单做部分说明。有些项目可以说得清楚一点,而有些项目则不要详细说明。波拉尼(Polanyi,1962)默许知识的观点很适用于此。当做判断时,我们多少都能说明一些原因,但有些则可能说不清——有些可能是能力和语言所不能及。这并不是说不应该和不努力对这些部分做清晰说明,而只是说我们永远都做不到完全。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作为有限的人,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做到完全透明,不仅是对别人,甚至对自己也一样。同样,甚至清单上那些说得比较清楚的项目也可以不断地重新解释。最后,清单上项目的重要性也可能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我们认为在某时某地很重要的研究特征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可能又不那么重要了(D. Gallagher,人际沟通,1998)。

但需要强调的是,对清单的挑战、改变和修正不是通过对清单和项目自身进行抽象的讨论,而是通过研究运用。也就是说,"新"的事物经常会出现,比如说,斯派克斯(Sparkes,1996)对身体自我的脆弱、民族志小说的发展流派,或者读者剧院进行的自我反射的叙述。现存的特征清单不适合新出现的情况。要了解这些"新"情况或严肃地面对它们,可能需要重新构建清单,在永无止境的判断中不断修改原来的清单。然而,这里的关键是可能性,因为研究者可能会选择保留其清单,并判定其研究结果,很多人好像就常常这么做。顺便说一下,后者也是过去几年经常听到的对定性研究的评论。

这些清单是我们的一部分——它表现了我们特定的观点或者有效的历史。换言之,还是参考伽达默尔(Gadamer,1995)的说法,清单是偏见的一种表达形式。他说,正是人的偏见"形成了其存在的历史现实"(p. 277)。在碰到某种结果,特别是上面说的"新"情况时,我们必须愿意冒风险。正如在判断过程中我们要提情境或人的问题一样,人或情境反过来也可以向我们提问题。如上面提到的斯派克斯(Sparkes,1996)所举的例子,进行这种研究要求研究者开放,允许接受情境对其偏见的挑战,可能还会改变清单及其对什么是好研究和不好研究的看法。但这里要指出很重要的两点。首先要重申的是:"可能"这个词在这里很关键,因为开放并不意味着自动接受。研究者可能还会提出不接受新情况的理由。其次,不存在冒偏见风险的方法。如果有,冒偏见的风险是一个性格上的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道德义务的方面——它要求接受如下观点:如果想要劝说别人,必须同样愿意被别人劝说。

是轮到举例说明这些观点的时候了,拉瑟尔(Lather,1986a、1986b、1993、1998a、1998b)在过去10-12年的研究中,她不同的论文和研究陈述及其与Smithies(1997)的合著说明了一个很好的事实:我们在做研究时,头脑里都带着观念或想法。拉瑟尔(Lather)的讨论既参与又给我们对判断研究标准的谈论带来了混乱。在研究过程中,拉瑟尔(Lather)一直努力让其特征清单开放、随时改

进、不断变化和不做完全的说明。拉瑟尔(Lather)所提项目这些年来在效度方面显然有了很多改变。在1986年,拉瑟尔(Lather)谈论时提到了三角测量、事实效度和接触反应效度等等。到了1993年,她的清单变为对违反性效度的讨论,其主要兴趣集中在如下概念:模拟的/与真实相反的效度(simulacra/ironic validity),形似的/视幻想为真实的效度(paralogy/neopragmatic validity),似根茎状态的潜伏式效度(rhizomatic validity),表面满足的/确定为某一范畴的效度(voluptuous/situated validity)。

这里强调两点:第一,拉瑟尔(Lather)充分意识到她的清单不是由非常详细的项目组成,这些清单不是封闭、完全的,不能用数字来计算。事实上,她制订"检查清单"只是为了模仿并籍之贬损检查清单的想法或可能性。第二,她还充分意识到她的理论建构只是根植于实践或者应用清单和做判断的过程。这一点她在1986年的著作中提到过,在近几年的著作中(1998a、1998b)中也反复重申过。

拉瑟尔(Lather)看到,判断既是实践工作,也是道德上的事情。虽然她拒绝接受后结构主义观点,但她显然很关心诸如压迫、剥削和统治等问题。毫无疑问,她有一个标准化的参考框架,反映了她的某些倾向。因此,很自然,如大多数研究者一样,拉瑟尔(Lather)认为社会和教育研究可以、应该和必须有一个改善的目的——研究者所做的应该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创造更好的未来(同时充分意识到,特定情境下更好的意义也是不能做具体说明的)。

然而,在这一点上似乎潜伏着与埃比尼泽(Ebenezer)的麻痹(上面提到的)相同的问题。拉瑟尔(Lather,1993,pp.684-685)提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她参加有关爱滋病妇女的一项研究时发现的。她说,这些问题"根植于代表性危机中"(p.684)。她关心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包括声音、其他人、她提出的方法论兴趣,以及她作为研究者的目标等等。苏尔茨(Scheurich,1997)的担心似乎回应了她的这些关心,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术语。苏尔茨(Scheurich)担心"同样的情形以不同的面貌再次出现,好像是另外一种"(p.90),以及"匿名的强权暴力悄然地变成我们最好的愿望和行动"(p.90)。这两种情况的核心问题在于,这些作者关心的是判断必须排除别的可能性,文中通过沉默所掩盖的东西与其通过详述所揭示的东西一样多,论及他者是合理化他者,以及任何判断都会悄然但立即支持其自身,等等。

我们不怀疑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及关心的真实性。我们赞成必须不断地怀疑我们所做的判断并防止同样情形的再次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讲,拉瑟尔(Lather)和苏尔茨(Scheurich)所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至少让我们部分地离开了认识论。但我们还是要问:这种提问能走多远?是否要寻求永远都不会有的答案以及永远都得不到的保证?在描写那些HIV呈阳性的妇女声音的文本中,拉瑟尔(Lather)和史密斯(Smith,1997)表明他们理解在讲述这些妇女故事时可被称为强权主义的作者的地位:根据自己的判断做某一件事而不做其他的事。然而,在后来讨论她的判断时,拉瑟尔(Lather,1998a、1998b)似乎努力解脱她的责任,重

新表明她仍然在寻找办法,减少判断中人的弱点及偶发性。

这些从拉瑟尔(Lather,1993)和苏尔茨(Scheurich,1997)对她的提问以及他所表现出的担心的回答中也可以看出。我们认为,由于无法得到问题的答案及排除担忧,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提出把"多元的、开放的、喧嚣的和颠覆性的关于效度的对话看成是差异的、野性的和不可知的差异的表演"(Scheurich,1997,p.90),以及"不相称的分离性的肯定"(Lather,1993,p.687)。但如果认真考虑这种分离性,即所有事情都应该是差异的不可知的表演,以及所有结果都是不相称的,并把它们作为结论,它们就到了"怎么样都行"而没什么可作判断的地步了吗?他们对认识论的担心使他们陷入站不住脚的境地。从理论和概念上看,他们使判断变得毫无意义,而从实践和道德上看,他们做而且必须做判断。需要假设一个例子来讲清这一点。如果拉瑟尔(Lather)和苏尔茨(Scheurich)带着种族主义的眼镜来评审一篇想出版的论文,从实践及道德上讲他们会因此而拒绝。然而,从其他层面上看,这样做的基础是什么呢?从上面他们的评论来看,这篇论文为什么不应被看成只是差异表演的另外一种情形或者是不相称的另外一种肯定呢?

该是我们接受人的弱点和偶发性,彻底放弃认识论并改变会话的时候了。我们无法走出轮子或循环。很奇怪,没有认识论的代表性危机,而只有实际和道德上的代表性问题。我们是有限的人,必须学会接受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所写的总是而且必然会留下一些东西;如果要讲话,就总是和必然地要为别的人讲话;我们不能既做判断,同时又"不断改变讲话的立场,从主体到客体"(Lather,1993,p.684)。痛感这种情况并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是痛感我们人的限制性并寻求解决办法。但对有限性我们毫无办法。黑兹尔里格(Hazelrigg,1995)说得好,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的"缺憾"。但它们"属于人的知和行方面的"的"缺憾",因为,"不管意愿多强,人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p.102)。

但有一点需要重申一下,以免引起误解。毫无疑问,存在着代表性的问题。沉默需要质问,我们在为别人讲话时必须谨慎,在做判断时要谨慎,在公共空间分享和证明判断时也要愿意冒偏见的风险。但这些不是认识论的问题。相反,它们是实践及道德上的问题。我们做研究,对研究进行判断,必须说明判断的理由,把这些理由告诉别人,还要尽力做好。知识是人类的社会产品。作为有限的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建构社会的和教育的世界。我们从道德上要为所建构社会和教育的现实负责。意识到我们是有限的人就是意识到我们在判断标准和效度方面是有限的。

我们在剩下的部分将要更直接地讨论判断显然并非孤独的活动这一事实。作为教师和研究者,我们是社会团体成员。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个人的判断必然要放到公共空间与其他人的判断相互作用。由于制度和组织性的安排,分享判断的公共空间,亦即最初的和即时性的公共空间,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是先决的。比如说,给论文评分必须至少涉及一个学生的公共空间,论文通过/不通过必须涉及学生、委员会以及参加答辩的人;评审要发表的论文必然涉及作者和编辑。

然而,在更广的意义上讲,我们可以选择相互作用的公共空间,以及允许偏见被检验和挑战的程度。这是可能的,因为虽然团体的理想很重要,但在实践上不存在扭曲的社会和/或者教育研究团体。举例来说,教育研究者的分布就极其广泛,从被称为分支领域到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再到基于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的差异等。正因为我们的分布如此广泛,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跟谁分享判断和冒偏见的风险。

毫无疑问,在过去几年里,对元叙述的拒绝和对最后辩护的诉求使人们更关心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增加可能群体的数量,不管其组成形式多么松散,人们可以选择是否要跟这些群体分享判断。这种意识反映在很多人的论著中,比如说包括登泽恩(Denzin,1997)和林肯(Lincoln,1995)。后者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所有的文本都"总是局部和不完全的,根植于社会、文化、历史、人种和性方面的,因此永远都不可能表现现实,除非一些现实有同样的特征"(p. 280)。他进一步认识到"研究发生且公布于团体之中;它还被精确地标明,因为讨论研究的人希望该研究服务于团体的目的"(p. 280)。重要的是,林肯(Lincoln)说必须在伦理和社会改善的情境内来理解这些观点。关于后者,她说我们必须具有"能够促进社会公正、团体、差异性、市民谈话以及照顾的研究视野"(pp. 277-278)。

对于登泽恩(Denzin,1997)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种学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超越了科学,"经验活动……理论建构和社会批评之间不存在破裂"(p. 86),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将会遇到"种族、阶级、民族、性别和性的立场认识论"的持续发展(p. 87)。登泽恩(Denzin)继续指出了立场认识论之后的三种共享承诺。首先必须从"立足于历史和文化的个人观点"(p. 87)进行研究。第二,"人种学家将继续从事野外工作,从其自己的传记到其新经历的世界"(p. 87)。第三,希望进行"清楚有力的说明(所经历)世界的研究"(p. 87)。因此,最终"人种学家互相讲述的故事以及听故事的标准都将发生变化"(p. 87)。

这种新的人种学增加了多元性、多样性及差异的相互作用,开辟了新的空间和新的未来。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是值得欢迎的。然而,正如上面所间接提到的,欢迎多元性和多样性而避免过度的问题是永远都存在的。施拉格(Schrag,1992)分析了这种可能性。一方面,他说"可以通过保留相似、记录不同的谈话和行动的方式"(p. 33)来达到故事的多样性,如能这样,我们就可能以"理性批评、清晰及揭示" 的名义提出判断,"因为这些有助于理解共同的经历、评价及解放"(p. 49)。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如果这种多样性和多元性只是没完没了地讲述本地及地方化的故事、词汇和判断,那我们可能永远陷入"分离、不能比较、理解冲突和解释怀疑论"的过程(p. 33)。

作为实践及道德上的事情,施拉格(Schrag,1992)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问题:如何既保留多样性和多元性又避免过度,或我们必须跟谁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冒偏见的风险,把自己的研究及判断拿出去听取意见和批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凭什么要相信登泽恩(Denzin,1997)所提出的主张,即在这个新人种学时代,研究者将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进行研究?但有两点立即会使这些问题的讨论白热

化。首先,说多样性过度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知道越过了过度的界限?其次,认为应该将研究和判断提交给完全不同的地方性团体和社会空间是很天真的。有时可能有很好的理由,除身体和精神疲惫以外,不去与别人进行广泛对话。比如说,有时候进行了对话却没有什么结果,而且没有理由再继续对话下去。由于这种会话的变化如此之大,问题确实很复杂,难于解决。

施拉格(Schrag,1992)希望在谈话和行动中保持相似点的开放和有效性,这种希望是很有意义的。其原因是研究不会发现现实,而只是建构现实———个被建构的、我们个人和集体都要为之负道德责任的社会和教育的现实。这一点还应结合马克思的观点,即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认识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因此,我们从道义上需要尽可能地对实际政策和实践施加影响。这样做要求我们不要局限于语句以及跳出个人的观点,冒个人偏见之风险以向别人公开结果。

如果这些结果不能开放,那就会形成建立于研究者观点之上的、有理论差异的等情形的割据或异质性,其结果很可能是分离和永远的理解冲突。开放差异相互作用的空间可以容易地发现差异,不可比性亦会名副其实。这似乎会导致研究者通过彼此来谈论,或者根本就不相互谈论,因为他们建构其地方化的社团、现实及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我们的研究如何会有道德目的和社会影响。很显然地,如果互相之间不进行交流,很难想象还有谁愿意跟我们交谈、听我们的观点,或者注意我们的判断。

但主要问题在于,没有什么方法或程序可以实现登泽恩(Denzin)的主张(希望?),即在这个新的人种学时代,研究者将放弃自己的传记而致力于别人的传记。如果研究者这样做,那就只是一个观点而非方法的问题。这是一个观点——或者上面所说到的道德上的义务——迫使人们冒偏见的风险,在与别人一起的社会空间中,甚至在观点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的面前辩护自己的判断。这种道德义务的核心是要求我们,在试图劝说别人接受我们对好坏研究的判断时,同样也要愿意被别人的判断说服。再重申一下,只有记住这个义务,才能够使我们的研究最大限度地帮助建构更加公正的社会和教育世界。

小 结

准基础主义者试图在认识论建构主义和本体论实在论的情境内建立标准。后者声称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的、可以认识的现实——至少在原则上如此;前者认为社会是被建构的、总是容易出错的。这使他们谈论标准时先后用了“似乎有理性”、“可信性”和“描述效度”等术语。而且,由于新实在论者声称他们可以与现实相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是多么少,他们进一步声称这些标准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时空。

不幸的是,新实在论者未能举出令人信服的例子或合适的证据来说明其观点。比如说,哈默尔斯利(Hammersley,1990)和马克斯韦尔(Maxwell,1992)都不

能说明其实在论承诺如何让我们避开连续的社会判断过程。事实上,如果新实在论者放弃实在论本体论及其挽救经验主义残余的意图,他们就会很像加登梅里安德(Gadameriand)式的相对主义者。

非基础主义者完全接受相对主义对事实的看法,即不可能存在不带理论的观察或知识。然而,对于他们来说,相对主义并非问题,而只是作为有限的人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学会接受这种限制性而不必感到悲伤。非基础主义者认为,判断研究标准的问题是一个实践和道德上的事情,而非认识论的问题。他们很重视罗蒂(Rorty,1985)的观点,即人类社会活动对知识的追求"只存在一个伦理基础,而非认识论或者形而上学的基础"(p.6)。因此,不应该把标准看成抽象的东西,而应看成是一列特征清单,这些是我们想出来的、在特定时空和一定程度上接受的以及把好坏研究区分开来的清单。该清单在实际应用中——用于不同的研究时可以被质疑、增减和修改等。相对主义者同样也意识到了多元性、多样性以及接受差异等的价值和必要性。然而,主要问题是重视这种需要但不要过度——对于那些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以及有碍于社会进步的研究。

因此,正如前面承诺的,我们在结尾部分不讨论特定标准及其应用问题,而只是试图说明一些情形,在这些情形下,我们必须考虑在相对主义时代标准的可能性以及个人和集体判断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Barth, J. (1960). *The sot-weed facto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Bernstein, R. (1983).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haskar, R. (1983). [Review of the book *Scientific revolutions*]. *Isis*, 74, 259.

Cherryholmes, C. (1988). *Power and criticis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hisholm, R. (1973). *The problem of the criterion*. Milwaukee, WI: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Gadamer, H.-G. (1995).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 ed.; J. Weinsheimer & D. G. Marshall, Trans.). New York: Crossroad.

Gallagher, D. (1995). In search of the rightful role of method: Reflections on conducting a qualitative dissertation. In T. Tiller, A. Sparkes, S. Karhus, & F. Dowling-Naess (Eds.), *The qualitative challenge* (pp. 17-35). Oslo, Norway: Casper.

Giddens, A. (1976).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Goodman, N. (1978). *Ways of worldmaking*. Indianapolis: Hackett.

Hammersley, M. (1990). *Read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critical guide*. London: Longman.

Hanson, N. (1958). *Patterns of discov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zelrigg, L. (1989). *Claims of knowledge*.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Hazelrigg, L. (1995). *Cultures of nature*.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Hesse, M. (1980). *Revol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Brighton: Harvester.

Hindess, B. (1977).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Hofstadter, D. (1979). *Go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New York: Basic Books.

House, E. (1991). Realism in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6), 2-9.

Kerlinger, F. (1979). *Behavioral research.*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ther, P. (1986a). Issues of validity in openly ideological research: Between a rock and a soft place. *Interchange*, 17(4), 63-84.

Lather, P (1986b). Research as prax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6, 257-277.

Lather, P. (1993). Fertile obsession: Validity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673-693.

Lather, P. (1998a, April). *Against empathy, voice, and authentic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

Lather, P. (1998b, April). *Troubling praxis: The work of mourn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

Lather, P., & Smithies, C. (1997). *Troubling the angels: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Boulder, CO: Westview.

Leary, D. (1984).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re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917-919.

Lincoln, Y. S. (1995). Emerging criteria for quality in 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ive inquiry. *Qualitative Inquiry*, 1, 275-289.

MacKenzie, D. (1981). *Statistics in Great Britain*: 1885-1930.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Manicas, P. (1987). *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Manicas, P., & Secord, P. (1983).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y of the new philosophy of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38, 399-413.

Maxwell, J. (1992). Understanding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2, 279-300.

Nagel, T. (1986). *The view from now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lanyi, M. (1962). *Personal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pper, K.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Hutchinson.

Popper, K. (1972).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Clarendon.

Punch, M. (1994). Politics and ethic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83-97).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tnam, H. (1981).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rty, R.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rty, R. (1985). Solidarity or objectivity? In J. Rajchman & C. West (Eds.),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pp. 3-1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osenau, P. M.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eurich, J. J. (1997). *Research method in the postmodern.* London: Falmer.

Schrag, C. (1992). *The resources of rational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chwandt, T. A. (1996). Farewell to criteriology. *Qualitative Inquiry*, 2, 58-72.

Smith, J. (1985). Social reality as mind-dependent versus mind-independent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st validity.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1, 1-9.

Smith, J. (1989). *The nature of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nquiry: Empiricism versus interpretation.* Norwood, NJ: Ablex.

Smith, J. (1993). *After the demise of empiricism: The problem of judging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nquiry.* Norwood, NJ: Ablex.

Sparkes, A. (1993). Reciprocity in critical research? Some unsettling thoughts. In G. Shacklock & J. Smyth (Eds.), *Being reflexive in critic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pp. 67-82). London: Falmer.

Sparkes, A. (1996). The fatal flaw: A narrative

of the fragile body-self. *Qualitative Inquiry*, 2, 463-494.

Stronach, I., & Maclure, M. (1997). *Educational research undone*. Milton Keynes,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1971).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Review of Metaphysics*, 25, 3-51.

Taylor, C.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lcott, H. F. (1995). *The art of fieldwork*.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解释的实践与政治问题[1]



THE PRACTICES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 诺曼·K·邓津

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需要警惕现实主义的诱惑性力量，要警惕所有现实主义表象的暗示（Lubiano，1997）。

你带着我的布鲁斯（blues，忧郁的蓝调歌曲）。走了——
你在百老汇演奏布鲁斯，
……但你改变了它，
所以它听起来不像我的。
是的，你带着我的布鲁斯走了。
你也带着我的灵魂走了。
……但是将来某一天会有个人，
站起来为我书写，
而且是写我的——
黑色的而且美丽的——
为我歌唱，
上演关于我的戏剧！
我坚信这将会是我，
我自己！

Langston Hughes，"Yes，It'll Be Me"，1940/1994*

我
看到了它
那是血
就像桑德克瑞克大屠杀
甚至它的名字都带来恐惧，

---

① 作者注释：我想在这里感谢莫里斯（Meaghan Morris）、布莱迪（Ivan Brady）、林肯（Yvonna Lincoln）、布莱蒂克（Jack Bratich）、里查德森（Laurel Richardson）、瑞安（Katherine Ryan）对本文初稿的评论。所有带星号的材料，其使用都获得允许。

因为我是美洲印第安人
所以我所习得的词语
是另一种暴力形式。

(Sherman Alexie, 1993)*

在第六阶段接近尾声之际,我们有必要将作为激进的民主实践形式的定性研究与解释民族志研究的前景重新规划一番①。社会科学已经有了叙事转向,我们从实地去讲述我们的故事,我们了解今天是我们在书写文化(Brady, 1998; Richardson, 1998)。写作并非是一项天真烂漫的实践,尽管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中只有解释(Rinehart, 1998)。然而,Marx(1888/1983, p. 158)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任务不仅仅要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要改变这个世界。

在本文中,我探索了写作的新(和旧)的形式,这些形式的目标是推进人们对世界的解释与改变——这是一个全球的世界,并非我们心目中的北美。具体而言,我穿梭工作于三种解释性实践:新公民新闻,亲密新闻与文学新闻(Chartity, 1995; Dash, 1997; Harrington, 1992, 1997a, 1997b; Kramer, 1995; Sims, 1995);号召批判性的,以表演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Ceglowski, 1997; Cohen-Cruz, 1998; Degh, 1995; Denison, 1996; Denzin, 1997, 1999a, 1999b, 1999c; Diversi, 1998; Dunbar, 1999; Jackson, 1998; Jones, 1999; Jordan, 1998; Lincoln, 1997; Rinehart, 1998; Ronai, 1998; Smith, 1993, 1994);墨西哥裔的各种变式(Gonzalez, 1998; Pizarro, 1998)与非裔美国人审美(Davis, 1998; hooks, 1990, 1996),以及这些实践与批判种族理论的关系(Ladson-Billings, 1998; Parker, 1998)。

尽管许多人努力地想把批判种族理论带入定性研究,但是几乎没有谁将这种理论与民族志研究的后结构转向融合起来(Hooks, 1990, pp. 123-134;本书第9章)。而且,批判种族理论与定性研究也没有和源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黑人艺术运动的激进表演文本产生联系(Baker, 1997; Baraka, 1997; Harris, 1998)。现在,在新的黑人公众学人与文化批评家们(Hall, Gilroy, hooks, Gates, West, Reed, Morrison, Wallace, Steele)关于黑人文化研究的各种课题中倒是正在建立起上述的这种跨学科联系。最新一代的布鲁斯、说唱(rap)、Hiphop等音乐,流行歌手、爵士表演者、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片人等都致于力建立这种联系(Christian, 1997, pp. 2019-2020; Harris, 1998, pp. 1344-1345)②。

本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课题,在这一课题中我试图将上述的多重话语结合

① 重申一下,正如林肯和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所提出的,定性研究的七阶段分别是传统阶段(1900—1950);现代主义阶段(1950—1970);模糊种属阶段(1970—1986);叙述危机阶段(1986—1990);后现代、实验与新民族志阶段(1990—1995);后实验研究阶段(1995—2000);目前与未来(2000—)。

② 在电影界也正上演一场与之平行的运动(见下文)。墨西哥裔和黑人电影制片人运用配音、第一人称、画外音叙事、舞台布景以及蒙太奇剪辑等表现形式来突破激进主题的那种传统的性别分化形象(Fregoso, 1993, pp. 70-76; Noriega, 1992, pp. 152-153; Hall, 1989)。这个运动部分地可以视为1968年美国"经济机会办公室"资助的"新交流者"项目的成果之一。该项目的目标是训练、培养少数族裔在电影行业中就业"(Noriega, 1996, p. 7)。

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下。每一种话语图式我都提供相应的写作实例。这样做的原因是我假定文字和语言在这个世界上有其物质的表现——词语对人们产生影响力。巴拉卡(Baraka,1996/1998,p. 1502)这样来表述*：

我们想要这样的诗
将警察摔倒在里弄胡同里
然后缴获其武器……
我们想要一首黑人的诗。
一个黑人的世界。
让我们的世界变成一首黑人的诗。
让所有的黑人读这首诗
在心中默念
或大声颂读。
词语很重要。

我所想象的世界是一个种族、民族、阶级、社会性别与性取向等相互交错的世界；是一个语言自由、人类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没有偏向、没有压迫、没有歧视的世界(Jackson, 1998, p. 21; Parker, Deyhle, Villenas & Nebeker,1998,p. 5)。那些书写文化的人必须学会以一种将人们聚合起来的方式来运用语言。其目标就是创造一些神圣的可爱的文本，这些文本"表现了强烈的……对自由的热爱以及对人的生命的深切关注"(Joyce,1987,p. 344)。这种写作描述，表现了人们相互之间应该感受到的善良与友爱(Joyce,1987,p. 344)。

因此，我考察的是一些新的文化写作方式，一些新的、对于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的研究很关键的定性研究的方式。我研究的起点是公民的公众事务以及亲密的新闻写作的记者。

亲密的公民的新闻

正当定性研究者介入实验写作形式之际，新闻界发生了一个与之平行的运动，这些运动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在早期号召新新闻(new journalism)的基础上(Wolfe,1973)，目前这一代的新闻记者(Harington,1997a,1997b; Kramer,1995; Sims,1995)正式形成了一种新的写作门类，它有不同的称谓，或曰文学新闻，亲密新闻，或曰创造性非虚构新闻等(Harrington,1997a,p. xv)。这种亲密新闻(intimate journalism)将1970年代的新新闻运动加以扩大、延伸。1970年代新新闻运动是基于以下七种背景：Wolfe那一代的新记者将事实当作社会建构；他们淡化写作的门户区分，将文学与调查新闻和现实主义小说、忏悔录、旅行报导、自传等结合起来；他们使用情景方法来展示而不是来讲述；他们描写的是真实的人物，创造着混合的个性；他们运用多重视野，包括第三人称讲述，来确立作者的存在，他们展示多重叙事策略(回放、预示、内心独白、平行情节等)来建构戏剧性

紧张气氛;他们将自己视为美国社会正在进行的激进变迁的道德见证人(Denzin,1997,p.131)。这些记者认为社会生活以及关于它的报导都是社会建构,新闻记者不是在描述或报导客观的现实。

我对于挑起一场关于是否应维持虚构(文学)文本与非虚构(新闻、民族志)文本之间区别的争论没有丝毫的兴趣。我也不想在文学与非文学,虚构与非虚构文本形式之间作无谓的区分。这些都是社会、政治建构的范畴。它们经常被用于统辖特定跨越边界的写作形式,例如虚构的民族志写作等。实际上只存在叙述这种形式——换言之,只存在不同的门类所界定的表现及写作经历和经历的多种现实的方式。后现代世界的话语中通常混合着文学的、诗歌的、新闻的、虚构的、电影的、文献的、事实的以及民族志的写作与表现。没有哪种形式优于其他形式。每种形式只不过为作者表现一种独特的功能,每种形式表现一个解释的群体。

这些实践塑造、形成了亲密性新闻记者的作品。有些记者,如哈林顿(Harrington,1992),运用描述性现实主义的方法写作深度的、叙述性的日常生活。他们应用一些方法如现实生活对话、亲密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多重视角、内心独白、逐景解说,以及平实、松散的风格等(Harrington,1997b,pp. xlii-xlv;Kramer,1995,p.24)。作者在文本可能隐而不见,或者以一个讲述者、参与者的身份出现。下面是哈林顿(Harrington,1992)讲述他自己,故事的名称是"黑人与白人家庭素描"。

> 我的旅程是从牙医的椅子上开始的。护士……和医生在讲他们的孩子的趣事,过道上另一个牙医兴奋地说"我有一个好玩的笑话",然后他就讲了一个有种族歧视的笑话。我想不起笑话的内容是什么,只记得它的结局是一个黑人很愚蠢。死一样的沉默。房间里只有我们白人,但我的牙医与护士知道我妻子是黑人,他们知道我的独生子和女儿,正如他们所描述的,是深棕色皮肤。在我的生活中已听过多少这种族歧视的玩笑呢?……第一次……我陷入深深的、切肤的痛苦之中。我看着那个人,灰白的脸,灰色的头发,虚弱的嘴唇,我在想:这个白痴是在讲我的孩子!(p.1)

这则故事是第一人称叙事,比较一下下面的这个利昂达什(Leon Dash,1997)对 Rosa Lee 的描述:

> Rosa Lee Cunningham 感到很庆幸今天早上她不必起早床。她总是在打盹,精神飘乎于睡眠与困倦之间。偶尔她会听到护士与医生们在护士室旁闲逛,压低声音谈话。她很疲劳、困顿……一个整晚上的睡眠和一整天的安静在她生活中是少有的奢侈品。这有些近似于休假了……Rosa Lee……52岁,一个长期的海洛因吸食者……城市下层人中的一员……她丝毫无意中止吸食海洛因(p.3)。

哈林顿讲的只是他自己。他完全呈献在文本之中。达什是看不见的。他是无所不知的观察者。他是墙上的一只苍蝇讲述着一个逐步展开的情景。达什描

述一个世界，而哈林顿则讲的是在这个世界里呈献的是何种感受。两个作者都创造了一个场景。每个人都将其创造的形象渗透到周围的情景之中。哈林顿和达什都应用松散、干脆的散文。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主题创造了一个生动的形象，哈林顿是他自己，达什是李(Rosa Lee)。另一方面，达什假定他知道李的感觉与思想。有一个故事在那儿，将由他来讲述。与之形成对照，哈林顿的文本则暗示，没有等待讲述的故事。相反，故事是作者建构的，作者试图将规则强加于某种经历或虚构的事件。

两个作者都将他们的散文扎根于事实及事实的意义。但是，达什遵循的是所谓的可证实的、真实准确的事实，而哈林顿写作的是审美上和情感上真实的印象与事实，尽管未必那么真实准确。如果某事没有发生，它可能已经发生了，而且它将发生在哈林顿的文本中。

诸如哈林顿和达什的这类文本激起人们所感受的生活。这类作者的目标就是"从内部了解他人的世界，理解和表现人们就像他们了解自己一样"(Harrington, 1997b, p. xxv)。其意图就是建立一种情感的关系，将作者所讲述的生活和读者联结起来。

一年以后，哈林顿(Harrington, 1992)重新回味他在牙医椅子上的经历：

> 一年多以前当我坐在牙医的椅子上等候时所发现的东西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我不得不讲出来：那个白痴在谈论我的孩子！
>
> 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儿子还是小毛毛时，夜深了……黑暗中我坐在儿子的房间……我端详着他做的小鬼脸……在阴影中。然后，在短短的一瞬间，只在我脑海中闪过，我的儿子不见了，我就是那个孩子……我爸爸就是我……突然，我又不见了，灯光落在我儿子的膝盖上，他长大了，他是个父亲，他就是我……这种体会改变了一切。只有当我在想象中变成黑人——通过我的儿子，通过我的女儿——我才能看到我曾经还能容忍的种族歧视。变成黑人，哪怕仅仅是瞬间，造成了对正义的迫切需要，这一点仅作为一名白人是感受不到的，不管是多么好心肠的白人……在今天的美国，没有哪个正常的白人愿意易位变成黑人。(p. 447)

这种写作通过对极端与普通情景中的人的描述将读者与他们的新闻报纸联结起来。这些故事，或曰新闻个案研究将日常生活世界政治化，阐明了塑造个人生活及其与他人关系的结构与过程。这样，他们就"促进形成了公民的转型"(Harrington, 1997a, p. xiv; Harrington, 1997b, p. xviii)①。

公民化转型

在公民化转型的过程中，亲密性新闻与公众新闻的意愿结合在一起。与之相结合的还有批判民族志新闻，这类新闻将个人及其问题与公共问题、公共领域联系起来，实用的、公民的新闻促使读者成为公共戏剧中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

---

① 下面的这一部分来自：Denzin, 1997, pp. 280-281。

观察者,正是这种公共戏剧界定着当今社会有意义的生活。公众新闻为有问题的社区和个人经历的本土民族志创造了空间。这是一种负有社会责任的公众新闻。它主张参与性的民主。对于那些发生在当地道德群众领域内的有传记意义的经历,公众新闻给予它公开的声音①。这种新闻民族志形式面对的是有道德取向的读者。在要求对个人与公众问题作民主解决的公众课题项目中,这些读者是共同参与者(Chrity,1995,p. 146)②。

在下一层面上,转型为"作为民族志的公众新闻",这种写作形式对应以下的目标,批判的、亲密的、公众的民族志有以下特征:

- 它以深度的、亲密的、有关日常生活的故事代表着公众。这些故事创造道德上的团结,帮助公民作明智的决定,对于那些已成为公众问题的私人问题采取公共行动(包括帮助行动议案实施)(Charity,1995,p. 2;Mills,1959,p. 8)。
- 它促进了有助于公众意识与私人意识形成的解释性研究。这些研究帮助个人通过决策过程集体地行动。这些研究还有助于孤立选择、价值中心化,有助于运用专家的、本土的知识,有助于形成深思熟虑的公民话语(Charity,1995,pp. 4-8)。
- 它拒绝经典模式的调查式新闻。调查式新闻的记者曝光腐败,热心社会改革运动,"连根拔出内幕故事,勇敢讲出事实,直面麦卡锡与尼克松,安抚受难者,刁难得意者"(Charity,1995,p. 9)。
- 它期望它的民族志研究者与新闻记者是当地社区的历史与公众生活方面的专家,他们知道如何倾听、如何与公民交谈,他们知道如何听取与展示公众意见,他们也是全职的公民,他们坚信能对公众的生活进行研究(Charity,1995,p. 10)。
- 它视作者为当地社区的守望人,他们写作的故事有助于形成深思熟虑的、参与性的话语,籍此它可以保持公众对其声音的意识(Charity,1995,pp. 104-105,127)。
- 它推崇的写作是那种促使公众做出有意义的判断与有意义的行动的写作(Charity,1995,p. 50)。一个核心的目标是公民化转型(Charistians,Ferre & Fackler,1993,p. 14)。
- 它揭露自满、自大、自负的思想(Charity,1995,p. 146),同时"试图增强社区的政治能力以更好地了解自身、组合与做选择"(Charity,1995,p. 318)。

① 同时,不难理解"参加一项某公民倡导发起的清扫一个受污染的港湾的活动和参加某文化杂志主持的关于某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恶化的表现的辩论会,前者在政治意义上毫不逊色于后者"(Benhabib,1992,p. 104)。

② 公众新闻并非没有遇到批判,有人批判它是特定群体的新闻,有人说它是一种促销报纸的市场机制,有人批评它是一种保守的改革运动,其目标是扩大职业记者的权力,有人认为它的支持者并不理解社区、公共生活、公民话语的真正意义。参见:Graber,McQuail & Norris,1998;Glaser,1999;Carey,1995。

- 它追求戏剧性的故事。这些故事与叙述将事实与故事相分离，它讲述动人的故事将个人的问题与公众的问题相结合（Charity，1995，p. 72；Mills，1959，p. 8）。
- 它主张的一种文本形式是将公民变成读者，将读者变成世界上采取民主行动的人（Charity，1995，pp. 19，83-84）。

这些目标、理想和融合批判民族志的方式与应用行动研究、新公众新闻、第七阶段的定性研究等结合起来（他们预设了女性主义、传播的伦理模式。该模式在本书第五章 Charity 探讨过）。

这些目标假定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像一个文学的、亲密的公众记者那样写作与起作用。这就意味着以表演者为中心的故事讲述形式的民族志将受到更大的重视（Degh，1995，p. 8）。社会追求一种共享的公众意识。公共领域中遇到的难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这种意识被一种将个人的、传记的与公众话题融合在一起的写作形式所塑造着。库克（Cooke，1980）的虚构故事"杰米的世界"（Jimmy's World）就是这类写作的典型。这类写作将自得与自大曝露于公共领域之中。

写作规范

女性主义传播的伦理模式为公众的民族志写作提供了一系列的规范①。这套规范建立、形成在四个无可商议的新闻规范之上，即准确、无伤害、知情权以及道德立场公开②。民族志研究者的道德故事的写作并不是为了对那些被主导的、镇压性的文化系统压抑的人们造成伤害（无伤害原则）。那些被描述者的身份永远应该受保护。这些故事在事实上与虚构上都是正确的③。当进行虚构或想象的叙述写作时，或当分散的个案熔铸成一个单一的故事时，作者有义务将这个告诉读者（Charistians，et al.，1993，p. 55）。

读者有权利阅读民族志研究者所了解的东西，但是知情权应该与无伤害原则保持平衡。叙述应该展示"解释的效率"（Charistians，et al.，1993，p. 120），即，写作应有深度、细节、情感、细微差别与连贯。这些品质帮助读者形成批判性解释意识。这类文本也应该具有典型，包括不应带有种族的、阶级的与性别的刻板印象④。

作者对读者必须诚实⑤。文本必须是现实主义的，关注人物、背景、气氛与对话。文本应该为有关自我的道德真实的追求提供一个论坛。该论坛可能探索文

---

① 该伦理规范推崇社区、团结、关心、爱、权力、有道德的观察者，以及关心与社区的关系（Denzin，1997，p. 275）。

② 这套规范是克里斯琴斯（Christians et al，1993，pp. 55-57）所主张的新闻记者规范的扩大与延伸。

③ 事情只有通过它们的表现才能知晓。每种表现形式受一套规范的制约。事实性的故事应保持客观，应该符合特定的可验证原则。虚构的故事由理解来调节，包括与情感的逼真性、情感现实主义等相关的理解。

④ 感谢克里斯琴斯对一原则的论述。

⑤ 这一段中的规则抄袭了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神秘故事的十二条注释"（1995）。

化上不可展现的东西,对当代生活的差强人意与暴力之处以叙述的形式加以记录。这个作者搅动了世界,作者本人的故事("神秘")成为了所讲述故事的一部分。关于世界如何运作作者有其理论,该理论决不会离文本的表面太远。假定读者是自我反思的——那些读者追求诚实的但有反思性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将他们吸引到许多日常生活的经历之中。

在这个领域,找寻一种反抗传统的叙述声音的斗争仍然存在。传统的写作喜欢将自传与过去的经历视为反思与自庇的场地(Clough,1994,p. 157)。这种主观反思形式可能是个圈套。它太容易复制关于自我、代理、性别、欲望、性等伤感的、赞颂的或夸大不实的概念。现在迫切需要创造一种反思性写作形式将民族志文本与实验的文学文本反过来"置换一下"(Clough,1994,p. 162;1998,p. 134)。

作为守望者,新一代作者怀疑权力的结盟、共谋和将公利变成牺牲品的欲念。如此,他们的作品给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真理观念和验证造成了麻烦,并总是在问谁从特定的立场中获利。作为公众民族志研究者的亲密记者,拥有制定委托人——公众关系道德标准的优先权。民族志研究者是公众道德鼓吹家,尽管他们个人的道德信条可能导致个别研究者的研究与他们所谓的客户或特定公众群体的最大利益背道而驰。

民族志研究者的故事总是寓言式的、象征的故事,一个不仅仅是人类经验的记录的比喻。这类故事是经历的一种方式,是授权读者的一种方法。它是一个载体,通过它读者可以发现关于他们自己的道德的真实。在更深刻意义上,这类故事是关于自我与社会补偿的乌托邦,它将道德方向带回到读者(及作者)的生活。民族志研究者发现使社会世界运作的多重"真理",这些故事是人们相互讲述对于他们自己很重要的事情。亲密的新闻记者书写着激发批判性公众话语的故事。所以说,这些故事使日常生活的公众与私人领域发生了转型。

表演民族志

现在我转而讨论下一个概念——表演文本(performance text)(Conquergood,1992;Turner,1986)。我运用从正在进行的蒙大拿(MONTANA)小镇上的解释民族志研究所获得的资料论证我的观念(Denzin,1999a,1999b,1999c)①。"

我所追求的一套写作实践将来自实地的注释转化为表演出来的文本。我的论述构成了一篇单一但精致复杂的论文。

我们生活在一种以表演为基础的、戏剧的文化中。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文化本身也成了一种戏剧表演。表演民族志进入到性别化的文化之中,以一种几乎看不到的界线将日常戏剧表演与正式的舞台表演、舞蹈、音乐、

① 这部分的材料部分来自:Denzin,1999b。

MTV、电视、电影等区分开(Birringer 1993,p. 182;Butler,1990,p. 25;1997,p. 159;1999,p. 19)。但是问题不仅仅是界限模糊那么简单。这种表演已然成为现实。关于这一点,就性别及个人身份而言,巴特勒(Butler,1990)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性别是表演性的,它总是被扮演,"虽然主体行为的发生不似据说是先天的……但是人以行为为人……行为就是全部……没有性别的表达就没有性别的认同……性别身份正是被据称是其后果的'表达'来表演性地构成的"(p. 25)。进而言之,语言行动是表演性的,词语可以产生伤害性(Butler,1997,p. 4)。

表演文本坐落于复杂的话语体系之中,在这个体系里戏剧、电影、电视、民族志、表演、文本、观众等传统的、日常的以及前卫的意义相互之间循环交流着。正如科林斯(Collins,1990, p. 210)所认为的,过去经历的意义深深地刻印在表演之上,有时候它在表演中看不见(Brady,1999,p. 245)。

史密斯(Anna Deavere Smith)的《镜中火》(*Fires in the Mirror*)(1993)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部戏中,史密斯提供的一系列的表演片段是基于对卷人 1991 年 8 月 19 日布兰克林皇家高地种族冲突的人进行的访谈。冲突发生的起因是一名年轻的黑人男孩凯图(Gavin Cato)意外地被警车护送卢巴韦切尔家族要人的车队撞死。当天晚些时候,一群黑人用刀刺死了 29 岁的澳大利亚籍学者罗森鲍姆。随后是连续三天的种族冲突,社区中许多人都卷入其中。陪审团宣判被指控杀死罗森鲍姆的嫌犯无罪,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伤害了为卢巴韦切尔家族作出牺牲的人们的感情(Smith,1993,p. xiv)①。史密斯的戏剧讲述了下列这些人,黑帮成员、警察、不知名的男孩与女孩、母亲、父亲、受人尊重的 Al Sharpto、剧作家 Ntozake Shange,以及非裔美籍文化批评家戴维斯(Angela Davis)。

韦斯特(West,1993)认为《镜中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表明艺术可以构成一个公共空间,而人们认为这个空间是授予权力的而不是解除权力的"(p. xix)。因此,黑人,黑帮成员,警察,以及犹太社区在这部戏中都聚在一起讨论。该戏剧跨越了种族的界限。史密斯的文本表明了"美国的人物角色并不是住在某一个地方或另外一个地方,他们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夹缝中,生活在异质性大但努力求同的奋斗之中"(p. xii)。

一位匿名的年轻人(一号)Wa Wa Wa,一个充满恐惧的加勒比裔美国人这样描述车祸:

> 我看见的时候
> 她正推着
> 她的弟弟骑的自行车
> 像这样
> 对吗?

---

① 正如莫里斯(Meaghan Morris)在谈话中向我指出的,卷入此案的澳大利亚人感到正义没有伸张,他们感到只能严格地在美国政治术语的范围内表达失去所爱戴之人的感受。罗森鲍姆在这些描述中成了无足轻重的小卒子。

她推着他
他遛着车
似乎不知道如何
骑自行车……
当汽车过来时
她已经跑开了
我们看到车上有人在挥手
我们正让开
“噢,是的
是个犹太人。
他闯了红灯
他们却从没有被捕。”

(Smith,1993,pp. 79-80)*

所以在表现这个年轻人的话语时,史密斯构建了戏剧的背景,展示了从那个看到了事故未被披露一面的人的立场上如何看待这个事件。

表演民族志同时创造并实施了道德文本(moral text),这些文本的范围包括从个人的到政治的,从当地的到历史的、文化的。循着康奎尔古德(Conquergood,1985)的思路,这些对话式的作品为给与取创造了空间,不仅仅是把对方变成色情的、盲目崇拜的、监管的或家长式的注视的目标。

文本变成了激进的街头表演行动去质疑与“重构根深蒂固的社会权力安排”(Cohen-Cruz,1998,p. 1)。这些写作,以集会、木偶剧、游行、守夜、唱赞歌、小丑表演、仪式表演等形式,将观众与表演者从日常生活的现实中转移到理想化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原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受到了挑战(Cohen-Cruz,1998,p. 3)。街头或公共场所的表演给文化的成员以可供选择的脚本或可供选择的表演形式,从而改变着这个世界(Cohen-Cruz, 1998,p. 1)。

克恩-克鲁兹(Cohen-Cruz,1998,p. 5)认为这些表演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相互交叉的形式,包括鼓吹—支持,试图鼓动人们接受某个派系的观点;见证,将某个可能不可改变的行动变成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对抗,将表演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藉此要求他们对抗某个原本距离他们很遥远的情景;乌托邦,将某个理想化的现实付诸实施;传统,推崇一套文化上共享的信仰,如美国小镇中的独立日大游行。

在我的表演课题中,我追求最低限度的社会科学色彩,运用很少的概念。这是一种拟剧(Branaman, 1997,p. xlix; Goffman,1959;Lemert,1997,p. xxiv)或表演人类学(Jackson, 1998; Turner,1986),它试图了解人们如何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经历。表演民族志同时写作并研究表演,提示人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赋予文化以意义。

受社会学的想象力(Mills,1959)的影响,这种定性研究试图提示诸如传记、性别、种族、民族、家庭、历史等术语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如何互相影响、交互作

用。这些研究通常以第一人称写作,通常是从社会学家的视角进行观察与写作。最低限度的表演社会科学也是关于故事、表演和故事讲述的。如果表演得好,这些故事就创造了一个仪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聚集在一起倾听、体验、更好地理解社会和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Jenkins,1999,p. 19)。

表演转向

在人文学科中的表演转向(Bochner & Ellis,1996; Conquergood,1992)为批判的、跨学科的解释研究提出了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着的问题——即,如何建构、表演并批判地分析表演文本(Stern & Henderson,1993)。要掩饰这些涉及建构与批判分析的问题,我将赋予表演与共演(观众—表演)的文本以优先特权,而不是青睐单个的表演者或文本中心法的解释(Denzin,1997,p. 96)。通过共同的参与的行动,这些研究将观众带回到文本,创造了一个情感经历共享的领域。这个现象被称为通过表现行动来创造。文本表演与解释的反抗模式最引人注目。好的表演文本必须不仅仅是抒发感情,它必须是政治性的,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与反应。

对表演的关注是跨学科的,社会学家(Bochner & Elis, 1996; Clough, 1994; Denzin, 1997; Ellis, 1997; Ellis & Bochner, 1992, 1996; Ellis & Flaherty, 1992; Kotarba, 1998; Richardson, 1997)、人类学家(Behar, 1996; Brady, 1999; Bruner, 1986, 1989, 1996; Cruikshank, 1997; Jackson, 1998; Turner, 1986)、传播学者(Conquergood, 1992; Hill, 1997)、教育理论家(Lather, 1993; Lather & Smithies, 1997; Lincoln, 1995a, 1995b, 1997; Tierney, 1997)都号召文本要超越纯粹代表性,要迈向表现性。同时,行动研究者(Stringer, 1996)、传播论者(Christians et al., 1993)、女权主义者(Lather, 1993)、建构主义者(Lincoln, 1995a, 1995b, 1997)、合作研究者(Reason, 1993, 1994)和参与研究者(Carspecken, 1996)都在探索非传统的表现性表演形式。这样的研究可以使社区研究者和社区成员通过以行动为基础的表演课题共同建构意义(Stringer, 1996; Conquergood, 1998; Schwandt, 1997, p. 307)。这个号召将女性主义、传播学伦理与道德民族志混合起来。道德民族志假设有一个研究者,他和被研究的对象建立起了合作的、互利的、互信的友好关系(Lincoln,1995a)。

表演过的文本"有讲述者、戏剧、行动、变化的观点——使经历具体化,指引它停在此时此地"(Paget, 1993, p. 27; Donmoyer & Yennie-Donmoyer, 1995; Mienczakowski, 1995)。在以观众—研究者为中心的关系中,这些文本都是神秘传说的据点(Ulmer,1989)。换言之,它们是感觉到记忆刺痛的反思性、批判的故事,使线性经历实施的故事。这些都是故事化的重新讲述,它寻求通过唤起而不是解释或分析找到生活小说的真实。在这些文本中,民族志研究者、观众和表演者在一块经历、情感、行动三者共享的领域中相遇了。

这种表演,作为批判、解释和行动的场所,回归的是记忆,而不是过去的经历。不难理解,经历仅仅存在于它的表现中,它并不外在于记忆或感觉。当事实被回忆或与其他事件相联系时,事实的意义总是在讲述中被重构。所以,对表演

文本的喜好并不在于它提供了事实的确定性。这种喜好的原因复杂得多。从记忆方面来探讨,反思性、表演性文本要求读者、审视者(或共演者)通过作者或表演者的眼睛来重新体验经历。因此,读者转而和表演者一起重新创造经历。这使他们能够重新体验他们自己的经历。

所以,当哈林顿向我们讲述他回忆起那个晚上将幼子抱在怀中的情景,我们可以分享他的经历。作者通过以这种方式行动在头脑中重新创造着一系列的情感时刻。此时,生活重新回到了那个时刻,从现在的视角解释着过去。下面是克里格尔(Krieger,1996)写的一个片段:

> 我刚刚从佛罗里达旅行归来,在那里处理我情人的姑母(Maxine)的后事。她70岁时突然去世。当她拿着一些食品上楼去她的房间时突然滑倒了,死于心肌梗塞……
>
> ……这真是一次来世的体验:去佛罗里达……清扫一位我不认识的女人的房子——整理她的衣服与首饰,发现她近期的快照,用她的卫生间,会见她的朋友。(pp. 65,68)

在佛罗里达的最后一天,克里格尔在油腻的厨房的一个角落里的一个旧风琴匣子里发现了玛克欣(Maxine)姑妈的银器。玛克欣的银器是很廉价的那种。它是后来配齐的一套银器,表面已失去了光泽,不是那种从祖母到母亲再到她那样祖传下来的真东西。克雷格尔问道,"是什么决定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如果你是女人,价值会不同吗,你如何将一个女人和她所拥有、所遗留的东西区分开来,和她的衣服、她廉价的家庭银器区分开?"(p. 70)。这套廉价的银器不足衡量玛克欣姑妈。

母亲1968年6月8日在迈阿密海滩死于乳腺癌。几乎是三十年以后,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7)写道她母亲的死:

> 6月8日,我醒来就决定当天开车去韦斯特。我用海绵给妈妈洗了澡,和护士打过招呼,和父母吻别之后开着父亲的道奇达特车走了。当我到达韦斯特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需要给我的父母打电话。父亲说,母亲刚刚过世,就在不到一分钟以前。(p. 234)

关于这则消息,里查德森写道,"我很庆幸没有亲眼见她离世。我那时才三十岁"(p. 235)。

母亲去世十年以后,里查德森写了一首诗,"最近的对话"(1997,p. 234):

> 我想抱着你
> 轻飘飘的身体在我的
> 胸前,抚摸你,
> 摇着你入睡。

关于某个人和文化的真实的方式像这样在文本中表现出来了。这种作品,不管是表演还是阅读,成为了文化与个人价值的象征表现。在他们的表演中,表演者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

现在听听戴维斯的。在她最近对女性布鲁斯歌手莱尼(Ma Rainey)、史密斯(Bessie Smith)和比利·哈乐黛(Billie Holiday)的研究中,戴维斯(Davis,1998)观察到在美国黑人文化中"布鲁斯标志着流行的表演文化的前沿,表演者和观众的界限变得越来越分明……这种表现流行音乐的模式固定成了一种表演文化,它对于美国黑人音乐产生了持久的影响"(p.5)。

在她们的表演中,莱尼、史密斯和比利·哈乐黛表现了黑人女性主义对于阶级、种族、性别、暴力、性、婚姻、男人以及亲密关系等的理解(Colling,1990,p.209)。这种布鲁斯遗风深深地嵌入到与生俱来就有阶级意识的黑人女性主义之中。女性布鲁斯歌手为黑人妇女创造了表演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演唱和体验布鲁斯,体验黑人女性的声音在舞台上谈论和表演黑人文化,体验一种公众的批判性的表演艺术(Jones,1999)。

布鲁斯是从内心流出来的关于爱、关于犯错的男人和女人的、即兴创作的歌(Collins,1990, p.210)。莱尼、史密斯和比利·哈乐黛的演唱在形式上超越了书面的文本,他们将布鲁斯变成了一种活生生的艺术形式,比利·哈乐黛还将这种艺术形式带入了爵士乐。爵士乐也像布鲁斯与文化一样,是一种即兴创作的、非静止的艺术形式。伟大的钢琴演奏家 Bill Evans 这样描述"爵士乐并不是什么……而是如何。如果它是什么,那它将是静止的,不会变化。如何是指音乐从运动中来,它是即时性的,它在被创造时存在"(引自 Lee,1996,p.426)。即兴创作的共演文本,爵士独奏,像比利·哈乐黛在演唱布鲁斯一样,它是一种即时的产物,在创造的时刻它存在着。文化的如何,就是它将人们相互之间以一种爱的、冲突的或权力的方式联系起来,它是表演民族志研究者所追求、探索的目标(Jocekson,1998,p.21)。

蒙大拿的红窗台小镇:经历与表演

基特里奇(Kittredge,1996,p.97)认为西部是一片浩大的空白,是一个等待表演的天真舞台(也见 Kittredge,1987,1994)。他说,"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表演的历史……它铭刻到了风景(篱笆、道路、运河、电线、城市规划、爆破点)之中"(p.97)。西部还存在于我们口口相传的故事之中。蒙大拿既是一种表演,也是一个表演的场所。关于蒙大拿表演,人们不太可能将其写成一个客观的、权威性的、中立的描述。每种描述都是个人的,都是基于当地背景的,下面是一些蒙大拿的表演方式。

1994 年,我和妻子在蒙大拿的红窗台小镇外买了一小块地,这个小镇上的人只有 1 875 个①。我们买了一公顷地捎带着一个小屋,小屋坐落在名叫石溪的小河边,小屋的背后是一块巨大的石崖。我们所居住的小峡谷有湖,有白雪覆盖的

① 关于这个小镇如何得名有许多不同版本的故事。"比较普遍的一种就是居住在此地的印第安乌鸦族人将他们的窗台、屋檐等用红土涂上颜色"(Graetz,1997,p.23)。

连绵山脉,有高山草地,有一望无际的牧场,那里的人们住着极为宽敞的可移动的房屋。六月刚到,原野上就开满了黄色的太阳花,印第安的画笔花与羽扇豆花。

夏天,一群群的马和鹿在去我家小屋的路上面的山谷中吃草。在巨石的旁边,在参天的木棉树下面,我欣赏着彩虹,捕捉小溪中的鳟鱼做甜美的早餐。我钓鱼;我妻子做针线、踏青、采摘野花。去年圣诞节,我妻子滑雪横穿中部。夏天,我们去拍卖行与庭院甩卖,驱车去城里采购日需品。

红窗台镇距离我们的小屋 4 英里。在 1943 年煤矿大爆炸 74 名矿工死亡的事件发生以前,这里主要是一个采煤小镇。甚至在煤矿关闭以前,大萧条就沉重打击了这个小镇,为了寻找一条新的活路,小镇的先驱们积极地打通"高速公路",该公路可以将红窗台镇和附近的两个采煤小镇库克城和银门联结起来,这两个镇正处在黄石国家公园东北出口的外侧。1931 年的国会议案和 5 年的艰苦劳动促成了这条盘山公路的建成。熊牙高速公路 1936 年正式投入使用。从那以后,红窗台镇成为了通往黄石公园的东部要塞。这就是 1990 年我们在那儿所听说的①。

看完基特里奇的描述,研究了特纳(Turner,1986)和布卢纳(Bruner,1986,1989,1996)的著作,我开始将我们的小蒙大拿视为一个小地方,一个等待新的表演、新故事的地方。受对西部文化的神话化的影响(Limerick,1997,p. 151;Wilkinson,1997,p. 114),我们在学习如何表演蒙大拿。我们学习着介入红窗台镇或附近的人们的礼节表演之中。礼节表演包括游行、在小手工艺品店和古董店购物、给小屋买些装饰品、开车越过大山、去餐馆吃饭、在路边咖啡机前饮一杯速制咖啡、在波兰(Pollar)宾馆(被列入了全国注册酒店)吃一顿美妙的晚餐、在快照冲印馆取照片、在格兰尼·哈格斯(Granny Hugs)店买床上用品,以及和乡间商店的老板聊天,他曾经和前伊利诺斯大学篮球教练的侄女恋爱过。

我们观察着他人做我们所做的事,将在蒙大拿的经历与它的表演表现区分开来,在这个过程中建构文化与意义(Bruner,1989,p. 113)。三年前,我不经意中听到一个男人和一家汽车修理店的店主的谈话。他的宝马车仍然未熄火,前门敞开。他穿一件钓鱼马甲。他和家人开车从威斯康星州来。"孩子们看了电影《淌过它的河》。我们去哪里才能像电影中那样抓鱼?附近是否有人可以教我钓鱼的技巧?"关于教钓鱼的事,店主说没有,但是他告诉那个男人:向河上游走 20 英里,经过四个桥,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方(Dawson,1996,p. 11)。

当然,这些蒙大拿表演经历的意义总是在变。根据真实性或原创性来判断它们是不太合适的,任何特定表演的衡量没有绝对原创的尺度,只存在有效果的表演和无效的表演。

---

① 该镇有一个网页。利用 Yahoo 之类的搜索引擎,你只需输入"Red Lodge, Montana",几秒钟之内你就可看到一张关于红窗台镇城区的地图。

创造当地历史

每年我们都努力地去观察红窗台镇的民族节庆祝活动。这是一个为期九天的仪式表演，它再现了这个镇上白人欧洲种族的历史。它包括了这样一些白人的仪式：多姿多彩的旧世界的服饰，芬兰、爱尔兰、苏格兰的舞蹈与歌曲，袋管、新苏格兰鼓和号角队，牛仔诗人——“作为种族特权与社会建构的白人文化”（Fine, Powell, Weis & Wong, 1997, p. vii）。这是白人的道德区域。白人的精神在公开地展示着。（Du Bois, 1920, p. 29; Hughes, 1962）。

节日的每一天都有一个名称，分别是爱尔兰-英格兰-威尔士日、德意志日、斯堪的纳维亚日、意大利日、斯拉夫日、苏格兰日、蒙大拿日和全体民族日。20世纪早期，从欧洲各国来的男人们在民族节上行礼，来到蒙大拿，成为矿工。后来，他们结婚了，他们的妻子在学校里教书，在家里做饭，生儿育女，帮忙开个小商店，从他们的家乡带来民族工艺的手工艺品。红窗台镇要努力保留这段历史的回忆。

根据当地历史记载，民族节始于二战后不久。当地社区的领袖决定建立一个民众活动中心。他们想要一个社区活动场所，使小镇上的各个民族都能聚在一起，举行每年一届的夏季音乐节、艺术与手工制品展示会、各种旗帜及文化物件的展示会等。民族节就这样诞生了，很快红窗台镇变成了一个“旅游城镇，一个提供美景、垂钓、高速公路、骑术表演、清凉夏日的地方”（红窗台商会）。而且这个小镇有更多可以奉献：“居民自己就是一种资源”（p. 4）。每个夏季在这九天里，红窗台镇都上演其版本的当地民族文化，将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变成各自民族文化遗产的表演者。

在这些表演中，居民上演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所以他们还在表演中创造历史。一天是一个民族，但每个民族都会做非常相似的事情：举着本民族的国旗沿百老汇大街游行，人们穿着民族服装，下午的表演（唱歌、讲故事、织毯），寺庙里的民族食品（每天下午3:00—5:00），晚上是在民众活动中心的音乐与舞蹈。这种即兴创作的民族特征，它和仪式表演联系在一起，将白人的特权、白人的文化记忆、蒙大拿的风格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Hill, 1997, p. 245）。

蒙大拿爵士乐

我喜欢蒙大拿日，特别是其中的牧场女人朗读她们成为蒙大拿妻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即兴创作的舞台。西部的女人演唱她们自己版本的布鲁斯和蒙大拿爵士乐。在狮子公园的舞蹈凉亭上已支起了帐篷，就在车站艺术馆旁边，这个艺术馆收藏了对面街上卡内基图书馆的一个红色的火车车厢。草地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的白色塑料椅。舞台的两边都有麦克风。然后可以享用旧式的蒙大拿牧场圣诞：烤牛肉、烤豆子、凉拌生菜丝、烤土豆、果冻沙拉、甜点以及咖啡、冰茶等。

或高或矮、皮肤黝黑的中年妇女占据着舞台。她们都是勤劳的妇女，是居住在熊牙山谷的牧场里的母亲、女儿与祖母。她们有的穿着牛仔靴子，有的穿着耐

克运动鞋。她们穿着蓝色的牛仔裤,用红的、白的、蓝的牛仔上衣或裙子点缀着,脖子上还系一条红色的大手帕。她们有的长发,有的短发,有的直发,有的卷发。她们读着牛仔诗,讲述着严冬的故事,讲述马在雪地里冻死的故事。她们中还有人在唱歌。乡村的音乐轻柔地弹奏,人们来来往往,有的驻足聆听片刻。当这些女人表演时,年长的牧场主人戴着阔边大沿牛仔帽,微闭双眼,用脚点击着音乐的节奏。年轻的男子们在人群中穿梭,丈夫们则自豪地观看着他们的妻子朗读诗歌。这些女人像莱尼、史密斯和哈乐黛一样演唱着她们版本的牛仔布鲁斯。而且,她们的表现形式展示着一种特定的真实。

印第安人死了

费尔德勒(Fiedler,1988)争论说,作为白人领地的蒙大拿只有在土著印第安各族被杀死、被驱赶或被迫迁入保留地之后,才在心理意义上成为可能。他认为消灭西部"贵族土著"和"红皮肤"的斗争是蒙大拿西部蛮荒神话不可分割的部分(p.745)。根据费尔德勒的观点,印第安人是蒙大拿的黑奴,是野外贫民窟生活的写照(p.752)。"红皮肤"消失以后,随之而来的是猎人、看山人、探险者、约瑟夫头领,然后是牧场主和居家妇孺。在印第安人的地盘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地名,死印第安人隘口(Dead Indian Pass)。

进入了红窗台小镇,你会驱车经过一处美洲印第安人的木质雕像,巨石上放着一尊印第安男人的头像。这个雕像并非出自印第安人之手。蒙大拿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关系的历史被当地的节日与庆祝活动,如红窗台镇的蒙大拿日所反映。这段历史在纪念死去的印第安人的同时极力否认曾对确立白人特权起如此关键作用的血腥往事。

两年前,我们从黄石公园取道约瑟夫首领高速公路,驱车经过死印第安人隘口。当年约瑟夫首领带领珀斯(Perce)族人抢在库斯特(Custer)族之前几个月通过这条隘口。山顶上有一块地方你可以停下来回望山谷,10 000 英尺的谷底。尽管这个地方被称为死印第安人隘口,景点的小标志牌上根本没有提到的约瑟夫首领。相反,上面记载着在这里安扎下来的牧场家庭打退了印第安人——所以命名为死印第安人隘口。在民众的记忆里,是白人而不是印第安人在享受着荣誉。

表演蒙大拿

表演蒙大拿有许多种方式,蒙大拿这个地方是当地人与游客的一个汇集所,在这个地方,来自威斯康星州、身着 Orvis 马甲的人用假苍蝇垂钓,而当地长得很像哈克费恩的孩子们却是用旧式的竹竿用虫子作饵来钓鱼。蒙大拿的表演同时混合了各种不同的东西——不同的身份认同,不同的自我:牛仔,骑术比赛,经典音乐,老式猎人,滑雪者,看山人,织毯的芬兰女人,写诗、钓鳟鱼的牧场主的妻子。

自然是蒙大拿自我的一个主要部分。我和妻子体验着自然,我们在河边散

着步，不时弯下腰来闻野花的香味。这种"和自然界接触的经历对于我们来说就像珍贵的礼物"(Kittredge，1996，p. 108)。所以我们的小蒙大拿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一个洞，或一所天上的宫殿，基特里奇(Kittredge，1994)和多伊格(Doig，1978)用了许多词藻来形容它，这个地方发生了许多美好的事情，是在我们表演时发生的。

这些事情经由故事进述、表演形式的定性研究的演绎而变得清晰可见。在这些讲述中世界变得鲜活起来。定性研究者试图将这些事情的意义传达给读者，他们希望这个充满社会学想象的转译本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重要事情。但是有时候语言也会败下阵来，因为蒙大拿是一个有着惊世之美的地方，它的形象是语言难以描绘的。

下面我将转而探讨颜色美学①和批判种族理论。我所探讨的是批判种族理论如何运用叙述的实验形式批判和抵制种族主义的文化实践。

色彩美学与批判种族理论

女性主义者、墨西哥裔以及以黑人表演为基础的审美利用艺术、摄影、音乐、舞蹈、诗歌、绘画、戏院、影院、表演文本、自传、叙述、讲故事，以及诗意的、戏剧的语言来创造一种批判种族意识，并籍此将墨西哥裔民事权和黑人艺术文化运动推进到下一个世纪(Harrington，1992，p. 208)。这些实践有利于批判种族理论(Anzaldúa，1987；Collins，1990；Davis，1998，p. 155；Gonzalez，1998；hooks②，1990，p. 105；Joyce，1987；Ladson-Billings，1998；Parker，1998；Parker et al.，1998；Scheurich，1997，pp. 144-158；Smith，1993，p. xxvi；Smith，1994，p. xxii；Trinh，1992)。批判种族理论"努力揭露美国社会中看似种族中立、不带种族色彩的……(事实上却)建构与执行支持种族倾向的法律、行政法规、选举政治……以及政治与教育话语"(Parker et al.，1998，p. 5)。

因而，Collins(1990，1998)的非洲中心论的女性主义理论跨越20世纪90年代进入21世纪；换言之，理论家与实践者实行这样一个认识论基本立场，即：用受压迫的有色人种的眼睛看世界。其有代表性的社会诗歌与解释包括巴拉卡(Baraka，1969/1998)，琼斯(Jones，1966)，沙恩奇(Shange，1977)，乔伊斯(Joyce，1987)，内尔(Neal，1988)，乔丹(Jordan，1998)的作品以及更近期的胡克斯(hooks，1990，1996)，史密斯(Smith，1993，1994)，戴维斯(Davis，1998)，安扎尔杜亚(Anzaldúa，1987)，诺里加(Noriega，1996)等的作品。接连不断的亚裔美国人和北美印第安人、妇女、同性恋等群体的激进主义浪潮也体现了这种审美倾向，他们"利用他们的艺术作为政治激进主义的武器"(Harris，1998，p. 1384；Nero，1998，p. 1973)。

① 这个词借用自胡克斯(hooks，1990)的论文"黑的美学"。

② 此处原文有误，译文已改正。

理论家批判性地介入和质疑“新权利”(New Right)提案的反民权倾向(Jordan,1998),但这并不是抗议或整合主义地只针对白人受众讲述种族不平等。它抛弃这些狭隘的观点。这样它就拒绝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评价文学、艺术与研究作品的标准。

这个复杂的理论课题包含以下这些认识:

- 伦理、审美与政治的实践是和认识论联系在一起的;每个表现的、艺术的或研究的行动都是政治与伦理的阐述(Neal,1988/1998,p. 1451)。没有受先验主义理念支配的、孤立的审美或认识领域,尽管关心他人的伦理观总是应该成为最重要的准则。
- 对真理与知识的宣称总是通过多重标准来判定,这些标准包括考察一个文本①是否质疑现存的文化的、性别主义的、种族的刻板印象,特别是有关家庭、女性、男性、婚姻、亲密性等的刻板印象(Neal, 1988/1998, p. 1457);②是否优先关注具体的过去经历;③是否运用对话,是否运用关于个人对他人的责任、审美价值、精神和爱的伦理;④是否实行关于平等、自由、社会公正,以及参与性民主实践的解放性的倡议;⑤是否注意社区、集体行动、整合和群体权力(Denzin, 1997, p. 65; hooks, 1990, p. 111; Pizarro, 1998, pp. 63-65)。
- 没有哪个主题是禁区,包括性、性虐待、死亡、暴力等。
- 这个理论课题假定有一个艺术家与社会研究者,他是当地道德社区的一部分和代言人,这个社区有自己的象征符号、神话和英雄人物。
- 这个理论课题要求作者—艺术家创作方言的、民歌的和流行文化的表现形式,包括格言、劳动歌曲、灵歌、训道、祈祷、诗歌、杂诗(Shange,1977)、民间传说、布鲁斯(Davis,1998)、爵士乐、说唱、电影、绘画、戏剧、图片、表演艺术、壁画、回廊绘画等(参见 Fregoso, 1993; Gates & McKay, 1997, p. xxvii; Hill, 1998, Noriega, 1996; Pizarro, 1998, p. 65)。
- 这个课题寻求一种面对有色的妇女与儿童的文本,一种面对那些遭受暴力、强奸、种族主义与性等不公正待遇者的文本。
- 这个课题寻求这样的艺术家—研究者—作家,他们的作品讲述和体现的是社区的需要(例如,关于吸毒、少女怀孕、谋杀、黑帮火拼、艾滋病、辍学等)。
- 当然,可以理解,没有哪个单一的作品或表现形式可以描述社区的集体需要。相反,当地社区通常依据种族、民族、性别、居住地、年龄、阶级等分化成不同的群体。

所以,这个课题追求的解放的、乌托邦式的文本扎根于鲜明的风格、神话、寓言以及当地传说与本土文化的个人认同。作为历史文献,这些文本记录了被压迫群体成员所经历的不公正历史。它们展示了当地群体的成员如何在一个充满暴力、种族主义和性的公民社会奋力地抗争以获取一席受尊重之地(Gates & Mckay, 1997, p. xxvii)。

这些文本是抵抗的据点。它们是意义、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场所。它们挑战、转变所有的文化表现形式：白人，黑人，墨西哥裔、亚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人，同性恋等等。

黑人女同性恋诗人劳德(Lorde,1978/ 1998b, p. 1627) * 在其诗歌“权力”中谈到在这个世界采取行动：

诗歌与修辞的区别
就在于
要杀死的是
你自己
而不是你的孩子

在这类诗中，批判种族理论和高度反思的、道德感的种族意识联系在一起。请看劳德(Lorde,1973/ 1998a, pp. 1626-1627) * 的另一首题为“煤”的诗：

我
浑身漆黑
声音来自地底下
世上有许多种开放的空间
钻石如何进入了一团火焰
声音如何走进了一个有颜色的词语
被那些为此付账的人……
爱是一个词，另一种开放的空间
当钻石进入了一团火焰
我是黑的因为我来自
地底下
现在把我的话带给那些阳光下的珠宝

劳德(Lorde,1986/1998c,pp. 1630-1631) * 还有一首题为“驿站”的诗：

有些女人爱
等待
一生为了一个戒指
为了抚摸……为了
女人的声音使她们完整……

有些女人等待改变
但是
改变没有发生
所以她们改变
自己

在达弗(Dove,1993/1998, pp. 1966-1967) * 的诗歌“洗的诉说”中描写了喝

酒、醉酒和家庭暴力:

爸爸回家叫着她我的珍珠
醉了,摇晃着像要被风
吹倒……妈妈还是老样子
当狗蜷缩在火炉下
当后门砰地关上
妈妈藏起了衣物……
爸爸在用手帕做船帆
她的脚下是一块绣着玫瑰的
丝帕,她等待着
他转过身,笑容僵住了
妈妈攥紧了拳头
碰那个孩子
我就砍倒你
就像砍倒一棵树

沙恩奇(Shange,1977) * 的曾获 Obie 奖的诗《献给当彩虹太甚时想过自杀的有色女孩》其结尾是这样的,公司里的 7 个女人,分别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色的服饰,其中的 6 个女人都讲完了,剩下穿红衣的女子来总结(pp. 60,63-64):

穿红衣的女郎

我正在思念着什么……
某天晚上我翻身坐起在空洞的房子里踱步
为着另一个女人的鬼魂尖叫/哭泣
她也在思念我所思念的东西
我想跳出我的骨骼
离开我自己
我陷入了麻木
直到我唯一能看到的树……
拥我在微风中
变我成清晨的一滴露
在晨曦中瑟瑟发抖
遍地抛洒的浪漫阳光将我裹住
天空将我放倒,就像一百万个男人
我冷/我燃烧/一个孩子
向着月亮不停地挥舞着衣衫
流着泪

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上帝
我爱她/我狂热地爱她

所有7个女郎自己都在轻声地颂读“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上帝，我爱她”。这很快变成了一首欢快的歌，从穿蓝衣的女子开始唱。女孩们先是相互地唱，然后逐渐面向观众。歌曲唱到高潮时，女孩们围成了一个封闭的圈。

穿黄衣的女郎

以此献给想过自杀的有色女郎

但她们正朝着自己的彩虹而去

就这样世界被找回了，我们梦想着另一天充满着阳光，自由地做我们自己的彩虹。

美学与影院实践

在当代黑人和墨西哥裔电影界，有一系列具体的电影实践和这个审美课题相联系①。这些实践影响并塑造了实验文本的叙述与视觉内容。这些实践包括：

- 关于叙述形式，民歌，回廊艺术等长期以来代表墨西哥裔话语传统的形式的实验（Fregoso, 1993, pp. 70-76; Noriega, 1992, pp. 152-153）。
- 运用即兴表演、舞台布景、蒙太奇等手法将多重种族形象注入银幕，引导双重文化的视觉与语言信号。
- 用个人自白、生活故事、画外音以及屏幕外的叙述为文本提供整体叙述的统一性（Noriega, 1992, pp. 156-159）。
- 墨西哥裔文化中的关键要素，特别是有关抵抗、维持、确定、新宗教无差别论和混血儿（Noriega, 1992, p. 150）等主题，籍此挑战同化和大熔炉叙述方式。
- 所产生的文本解构男性气概、男性身份，所关注的作品在给予墨西哥裔主题一个积极地位的同时批判一些由来已久的刻板印象，如处女、妓女、靠男人养活的妻子以及居家女孩（Fregoso, 1993, pp. 29, 93-94）。
- 拒绝对身份认同的本质化路径，强调过程的、性别化的和表演的自我观，强调身份认同是定位于文化与媒介表演系统的内部，而不是外部。
- 拒绝接受官方的对文化中种族关系的阐述，这种阐述在突出同化的意识形态之同时抨击黑人和墨西哥裔年轻人给白人社会带来威胁（Fregoso, 1993, p. 29）。

让我们再回到Anna Deavere Smith的诗“镜中火”（1993）*，倾听匿名年轻人二号坏男孩的声音。时间是一个春天的晚上。背景就是匿名年轻人一号接受访

---

① 16. 在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始推行的1968年新交流者计划产生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少数族裔电影制作人，一些洛杉矶黑人与棕色人种学校这样称呼（见Diawara, 1993; Fregoso, 1993, pp. 31, 129; Masilela, 1993; Noriega, 1992, p. 142; Noriega, 1996, pp. 7-8）。在这群电影制作人中著名的包括Burnett, Dash, Van Peebles, Rich, Duke, Trevino, Vasquez, Martinez, Valdez, Nair, Wang, hooks, Nava。还有最近的Lee, Singleton, Hughes。这些后平民权利电影制作人实行的是影院版的批判种族理论，他们的作品应该可以和hooks，West等人的比肩。对这个项目的资助在里根执政的80年代遭到削减。

谈的同一间休息室。二号年轻人很害怕,他的头上戴着"形状古怪颜色斑杂的帽子"(p. 100),他的衣服外面罩了个黑夹克,镶有一颗金牙,声音很小。

那个年轻人
十六岁的那个
没有谋杀那个犹太人
在皇冠高地的黑人青年
通常只有两件事可做
你或者
做 DJ, MC,说唱歌手
或牙买加歌手
衣衫褴褛
或者成了一个坏男孩
贩毒,抢劫
你做什么呢
我贩毒
你做什么呢
我唱歌
这就是皇冠高地的生活
(pp. 100,102)

在这首诗中 Smith 抓住了年轻人的语言,它的节奏、结构与意义。她运用个人自白这种形式将另一个声音带入了文本,也给文本带来了叙述的统一性。她的年轻人拒绝本质主义的身份观,但却注意到在皇冠高地年轻人的生活确实没有多少选择。年轻人二号抵制这些解释。

诸如劳德、达弗和史密斯(以及下文的乔丹)等所提出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念,即审美的实践是激进的和不断变化的。正如胡克斯(hooks, 1990)所认为的"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批判理论范式来评价艺术作品……激进的美学认为我们的地位,住所和需要都不断地在变化,我们的需要和关注也在变,这些不同的方向必须和批判思考的变化相协调"(p. 111)。

在这一层面上来讲,没有哪种美学享受特殊地位。例如,现实主义的艺术未必就比抽象的、表现主义的或印象主义的艺术好。在爵士乐的世界里,繁音拍子(ragtime)、新奥尔良音乐(New Orleans)、经典(classic)和摇摆乐(swing)未必就比巴卜(bebop)、重巴卜(hard bop)、拉丁(Latin)、前卫(avant-garde)和融合乐(fusion)等在政治上更正确或在审美上更好或相反。

但乔丹(Jordan,1998) * 的方式却是不同的。在她的爵士散文诗"好消息布鲁斯"中,她推崇比利(Billie)、路易斯(Louis)、尼纳(Nina)和贝希(Bessie),她敬重那些演唱布鲁斯的人。在下面的诗行中是她对比利的赞美(pp. 199-200):

由于布鲁斯离开了我的天空
周一我在追赶

所有周末都在追赶
现在男人必须开疆辟土
但女人却生来是守成支撑
走出去(为了/寻找)爱
忘掉过去的遗憾
我为控制体重而挥汗如雨……
但晚上总是兴奋不已……

如果我想重写
所有的故事/
牺牲品/被动/女性
传统的
宣传
在这里展开
不关谁的事
如果我这样做
我将失落
但
我将被发现
我注定会
在 Billie 的领地
一个怀念的地方
天使在那里学会
歌唱和表演
我心灵的
变奏旋律

炫丽的彩虹切断了蓝天白云,将远处的山峰和我居住的地方联结起来。

每个文本,每个表演的欣赏应该根据它所产生的集体与个人的反应与批判性行动,包括跨越边界的种族、阶级、性别与民族之间的对话。我们探寻每个艺术作品,每次定性研究是如何促进人类行动的发展,促进"抵抗……和批判意识"(hooks, 1990, p. 111)。

这种美学实践也追求美、珍爱美,想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特别是在"穷人的生活中"(hooks,1990, p. 111)。下面是胡克斯的一段描述,她回忆了童年的故居,特别是祖母巴巴(Baba)的房子。回顾童年,胡克斯发现尽管贫穷,生活艰辛,她的祖母——那个黑人妇女却努力地创造着一个美的世界。巴巴的房子清洁干净,里面装满了珍贵的东西。巴巴还会拼缝被子。她将家里的衣物碎布拼成美丽的艺术品,每个小小的房间里都有她亲手缝的被子。

巴巴的房子就像一个艺术馆。夜深人静时,胡克斯会独自一人坐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月光会在地板和墙上留下斑驳的影子。在夜的沉静里,在月光的映照中胡克斯慢慢欣赏到了另一种形式的黑与美。

现在,时间变了,但依然是深夜,胡克斯和妹妹"在想我们的皮肤就像一间黑屋子,一个阴影下的地方。我们经常谈论颜色政治,谈论种族主义创造的一种伤害我们的审美方式,我们谈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黑色……在阴影中我们渴望一种黑的美学——一种奇怪的相反的美学"(hooks,1990,p. 113)。祖母巴巴教会了她怎样做。

审美、艺术、表演、历史、文化教育和政治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因为在艺术的、解释性的作品中,文化中的英雄神话的过去、道德社区感等被创造着。它还指引着未来——回到刚开始的地方,重新想象一下定性研究和解释民族志可以用何种方式推进激进的民主实践的进程,看着这些实践会怎样影响我们。

未 来

当然,做解释研究的人要提出预见时会感到不自在。但是,10 年以后,解释、定性研究、讲故事的实践与政治等领域会是何种局面,这一点必须探讨。如果过去预测着未来,如果 90 年代的影响占很大分量,那么解释正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了后现代和文化多元论的领地。一个新的后解释、后根本主义的范式出现了。这个理论框架将它自己和新的、较少根本主义色彩的解释标准联系在一起。一个受颜色美学和批判种族理论准则影响的更宽泛的理论框架也反映这些标准。

建构在非洲中心论,墨西哥裔、美洲印第安人、亚裔,以及第三世界视野之上的认识论与颜色美学将会繁衍发展。更复杂精致的性别(阶级)认识论将要出现,包括酷儿理论(见 Gamson,本书第 12 章)与颜色女权主义(见 Ladson-Billings,本书第 9 章)。这些解释研究群体及其学者会利用群体的经历作为文本写作的基础,他们追求的文本反映这些群体的逻辑与文化。他们将推进批判种族理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这些关注种族、民族、性别的解释性研究群体将会使解释性标准脱离了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的框架。这些标准将是本土的、审美的、启发式的、存在的、政治的和情感的。他们会将个人推到政治的前台,在那个舞台上社会文本成为了政治表达的工具。

解释性研究群体的突出壮大并不意味着定性研究领域将会陷入诸侯割据或互不往来的局面。界定这个领域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需要四个条件。首先,它反映了这样一种信仰,即人类经历的世界必须从个人所处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其次,定性研究者要坚持从他们自己的传记开始,再研究外在于他们的经历世界。第三,学者们要继续推崇并生产能清楚有力地讲述这些世界的作品。正如卡弗(Carver,1989,p. 24)所认为的,真正的实验者将总是那些创造新的,从

自身发掘材料,并想将这些从他们的世界带给我们的人。这样,定性研究者就会发现新的和不同的方式将他们的解释性研究和不断变化的激进的民主实践形式联系起来。第四,这些文本不仅要描述这个世界,还要改变它。这些文本将会是基于公民的、亲密的、公众的新闻报导的表演方式。它们将创造公民转型,将最少运用社会理论。它们将铭记并表现乌托邦式的梦想,被批判种族理论塑造的梦想,一个自由世界的梦想,在那个世界没有性别、阶级、种族、宗教或民族的偏见与歧视。在第七阶段,定性研究的实践最终会从个人的转向政治的,没有犹豫或阻碍。这次转向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它建立在以前阶段的表述的基础之上。例如,它并不因为政治的取向而抛弃个人的①。[17]

所以,我们相互讲述的故事会变,阅读故事的标准也会变。就应该这样。好的故事总是那些被某些非常了解过去的故事却再也不能够讲出来的人所讲述的故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发生在过去的故事再也不能向他们或我们来讲述了。

最后,作为总结,我寻求一种存在的、解释的民族志,一种可以为文化批判提供蓝本的民族志。这种文化批判扎根于民族志所描写的具体的世界。它理解,所有的民族志研究都充斥着理论与价值。对文化及其形式的描述不可能客观(本书第34章)。从20世纪中叶的美国黑人文化批评家(杜博依斯,赫斯顿,埃利森,怀特,拜尔德温,海因斯)那里,我们现在了解到民族志、审美和政治永远不能绝对分开。民族志像艺术一样,永远都是政治的。

因此,福特(Ford,1950/1998)之后,批判的、平民的、文学的民族志必须满足四个标准。它必须具备文学的匠心和优秀的写作艺术。它必须呈现一个情节跌宕、紧凑但却精辟的叙述。叙述应该基于现实主义的、自然的对话,它还强调可识别的人物。而人物应该出现在生动描写的"难忘情境"之中(Ford,1950/1998. p.1112)。其次,作品应该表现清晰可见的文化与政治问题,包括基于结构的不平等和基于种族、阶级、性别、性等意义取向上的不平等。第三,作品应该阐明一种希望。它应该批判事物存在的方式和想象它们可能怎样地不同。然后,它应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象征与修辞的方式来做这一切。作者做这些时完全沉浸在他们时代的压迫与不公正现象中。他们指引着民族志研究朝向更高的、乌托邦式的、道德神圣的目标。最后,这种表演民族志寻找着新的方式来定位和表现性别化的、神圣的自我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还有对其他写作形式的探索,包括个人日记、自然写作、自然世界所引导的表演文本等(Denzin,1999a;Lincoln & Denzin,本书第41章)。

① 布莱迪向我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Alexie, S. (1993). *Old shirts and new skin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Center. (Used by permission.)

Anzaldúa, G. (1987).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aker, H., Jr. (1997). The black arts movement. In H. L. Gates, Jr., & N. Y. McKay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pp. 1791-1806). New York: W. W. Norton.

Baraka, A. (1997). *The autobiography of Leroi Jones*. Chicago: Lawrence Hill.

Baraka, A. (1998). Black art. In P. L. Hill (Ed.), *Call and response: The Riverside antholog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pp. 1501-150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9.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Copyright by Amiri Baraka.)

Behar, R.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Benhabib, S. (1992). *Situating the self: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 New York: Routledge.

Birringer, J. (1993). *Theatre, history, postmoder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ochner, A. P., & Ellis, C. (1996). Taking ethnography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5, 3-5.

Brady, I. (1998). A gift of the journey. *Qualitative Inquiry*, 4, 463.

Brady, I. (1999). Review essay: Ritual as cognitive process, performance as history. *Current Anthropology*, 40, 243-248.

Branaman, A. (1997). Goffman's social theory. In C. Lemert & A. Branaman (Eds.), *The Goffman reader* (pp. xvi-lxxxii). Malden, MA: Blackwell.

Bruner, E. M. (1986). Experience and its expressions. In V. Turner & E. M. Bruner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pp. 3-3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Bruner, E. M. (1989). Tourism, creativity, and authenticity.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10, pp. 109-114). Greenwich, CT: JAI.

Bruner, E. M. (1996). Abraham Lincoln as authentic reproduction: A critique of postmodern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6, 397-415.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Butler, J. (1997).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New York: Routledge.

Butler, J. (1999). Revisiting bodies and pleasur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6, 11-20.

Carey, J. W. (1995). The press,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T. L. Glasser & C. T. Salmon (Ed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 (pp. 380-402). New York: Guilford.

Carspecken, P. F. (1996). *Critical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e*. New York: Routledge.

Carver, R. (1989). *Fires*. New York: Vantage.

Ceglowski, D. (1997). That's a good story, but is it really 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3, 188-201.

Chandler, R. (1995). Twelve notes on the mystery story. In R. Chandler, *Later novels and other writings* (pp. 1004-1011). New York: Penguin.

Charity, A. (1995). *Doing public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Christian, B. T. (1997). Literature since 1970. In H. L. Gates, Jr., & N. Y. McKay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pp. 2011-2020). New York: W. W. Norton.

Christians, C. G., Ferre, J. P., & Fackler, P. M. (1993). *Good news: Social ethics and the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ough, P. T. (1994). *Feminist thought: Desire,*

power and academic discours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Clough, P. T. (1998).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2nd ed.). New York: Peter Lang.

Cohen-Cruz, J. (1998).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J. Cohen-Cruz (Ed.), *Radical street performance: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pp. 1-6). New York: Routledge.

Collins, P. H.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York: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Collins, P. H. (1998). *Fighting words: Black women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onquergood, D. (1985). Performing as a moral act: Ethical dimensions of 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Literature in Performance*, 5, 1-13.

Conquergood, D. (1992). Ethnography, rhetoric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8, 80-97.

Conquergood, D. (1998). Health theatre in a Hmong refugee camp: Performanc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J. Cohen-Cruz (Ed.), *Radical street performance: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pp. 220-229). New York: Routledge.

Cooke, J. (1980, September 28). Jimmy's world. *Washington Post*, p. Al.

Cruikshank, J. (1997). Negotiating with narrative: Establishing cultural identity at the Yukon International Storytelling Festival.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9, 56-69.

Dash, L. (1997). *Rosa Lee: A mother and her family in urba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Davis, A. Y. (1998). *Blues legacies and black feminism: Gertrude Ma Rainey, Bessie Smith, and Billie Holiday*. New York: Pantheon.

Dawson, P. (1996). Not another fish story from occupied Montana. In R. Newby & S. Hunger (Eds.), *Writing Montana: Literature under the big sky* (pp. 10-23). Helena: Montana Center for the Book.

Degh, L. (1995). *Narratives in society: A performer-centered study of narr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Denison, J. (1996). Sports narratives. *Qualitative Inquiry*, 2, 351-362.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1999a). An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for the next centu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8, 510-519.

Denzin, N. K. (1999b). Performing Montana. In B. Glassner & R. Hertz (Eds.), *Qualitative sociology as everyday life* (pp. 147-158).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1999c). Performing Montana, part Ⅱ. *Symbolic Interaction*, 23, 76-89.

Diawara, M. (1993). Black American cinema: The new realism. In M. Diawara (Ed.), *Black American cinema* (pp. 3-25). New York: Routledge.

Diversi, M. (1998). Glimpses of street life: Representing lived experience through short stories. *Qualitative Inquiry*, 4, 131-137.

Doig, I. (1978). *This house of sk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Donmoyer, R., & Yennie-Donmoyer, J. (1995). Data as drama: Reflections on the use of readers theater as a mode of qualitative data display. *Qualitative Inquiry*, 1, 402-428.

Dove, R. (1998). Taking in wash. In P. L. Hill (Ed.), *Call and response: The Riverside antholog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pp. 1966-1967).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Reprinted from R. Dove, *Selected poems*, 1993, New York: Vantage)

Du Bois, W. E. B. (1920). *Darkwater: 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 New York: Schocken.

Dunbar, C., Jr. (1999). Three short stories. *Qualitative Inquiry*, 5, 130-140.

Ellis, C. (1997). Evocative autoethnography: Writing emotionally about our lives.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115-139).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llis, C., & Bochner, A. P. (1992). Telling and performing personal stories: The constraints

of choice in abortion. In C. Ellis & M. G. Flaherty (Eds.),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pp. 79-101). Newbury Park, CA: Sage.

Ellis, C., & Bochner, A. P. (Eds.). (1996).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Ellis, C., & Flaherty, M. G. (Eds.). (1992).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Fiedler, L. (1988). The Montana face. In W. Kittredge & A. Smith (Eds.), *The last best place: A Montana anthology* (pp. 744-752).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Fine, M., Powell, L. C., Weis, L., & Wong, L. M. (1997). Preface. In M. Fine, L. C. Powell, L. Weis, & L. M. Wong (Eds.), *Off white: Readings on race, power and society* (pp. vii-xii). New York: Routledge.

Ford, N. A. (1998). A blueprint for Negro authors. In P. L. Hill (Ed.), *Call and response: The Riverside antholog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pp. 1112-1114).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0)

Fregoso, R. L. (1993). *The bronze screen: Chicana and Chicano film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ates, H. L., Jr., & McKay, N. Y. (1997). Preface: Talking books. In H. L. Gates, Jr., & N. Y. McKay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pp. xxvii-xli). New York: W. W. Norton.

Glasser, T. L. (Ed.). (1999).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Gonzalez, F. E. (1998). Formations of Mexicananess: Trenzas de identidades multiples/Growing up Mexicana: Braids of multiple ident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1, 81-102.

Graber, D., McQuail, D., & Norris, P. (Eds.). (1998). *The politics of news: The news of politic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Graetz, R. (1997, July-August). Sojourn to the sky: The Beartooth Highway. *Montana Magazine*, pp. 18-26.

Hall, S. (1989). 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 *Framework*, 36, 68-81.

Harrington, W. (1992). *Crossings: A white man's journey into black Americ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Harrington, W. (1997a). Prologue: The job of remembering for the tribe. In W. Harrington (Ed.), *Intimate journalism: The art and craft of reporting everyday life* (pp. vii-xvi).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rrington, W. (1997b). A writer's essay: Seeking 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 In W. Harrington (Ed.), *Intimate journalism: The art and craft of reporting everyday life* (pp. xvii-xlvi).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rris, W. J. (1998). Cross roads blues: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1960 to the present. In P. L. Hill (Ed.), *Call and response: The Riverside antholog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pp. 1343-138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ill, P. L. (Ed.). (1998). *Call and response: The Riverside antholog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ill, R. T. G. (1997). Performance and 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pioneer Colorado.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17, 236-255.

hooks, b. (1990).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hooks, b. (1996). *Reel to real: Race, sex, and class at the movies*. New York: Routledge.

Hughes, L. (1962). *The ways of white folks*. New York: Vintage.

Hughes, L. (1994). *Collected poems by Langston Hughes*. NewYork: Alfred A. Knopf. (Permission granted by the Estate of Langston Hughes.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Jackson, M. (1998). *Minima ethnographica: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proj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enkins, J. E. (1999, May 2). Narrating the ac-

tion while taking part in it. *New York Times*, Arts and Leisure sec., pp. 9, 19.

Jones, L. (1966). *Home: Social essays*. Hopewell, NJ: Ecco.

Jones, S. H. (1999). Torch. *Qualitative Inquiry*, 5, 235-250.

Jordan, J. (1998). *Affirmative acts*. Garden City NY: Anchor. (Copyright© 1998 by June Jordan. Used by permission of Doubleday,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Joyce, J. A. (1987). The black canon: Reconstructing black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18, 335-344.

Kittredge, W. (1987). *Owning it all*. San Francisco: Murray House.

Kittredge, W. (1994). *Hole in the sky: A memoir*. San Francisco: Murray House.

Kittredge, W. (1996). *Who owns the West?* San Francisco: Murray House.

Kotarba, J. A. (1998). Black men, black voices: The role of the producer in synthetic performance ethnography. *Qualitative Inquiry*, 4, 389-404.

Kramer, M. (1995). Breakable rules for literary journalists. In N. Sims & M. Kramer (Eds.), *Literary journalism: A new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merican nonfiction* (pp. 21-34). New York: Ballantine.

Krieger, S. (1996). *The family silver: Essays on relationships among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dson-Billings, G. (1998). Just what is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what is it doing in a "nice" field lik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1, 7-24.

Lather, P. (1993). Fertile obsession: Validity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673-693.

Lather, P., & Smithies, C. (1997). *Troubling the angels: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Boulder, CO: Westview.

Lee, G. (1996). The poet: Bill Evans. In R. Gottlieb (Ed.), *Reading jazz: A gathering of autobiography, reportage, and criticism from 1919 to now* (pp. 419-444). NewYork: Pantheon.

Lemert, C. (1997). Goffman. In C. Lemert & A. Branaman (Eds.), *The Goffman reader* (pp. ix-xliii). Malden, MA: Blackwell.

Limerick, P. N. (1997). The shadows of heaven itself. In W. E. Reibsame (Ed.), *Atlas of the new West* (pp. 151-178). New York: W. W. Norton.

Lincoln, Y. S. (1995a). Emerging criteria for quality in 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ive inquiry. *Qualitative Inquiry*, 1, 275-289.

Lincoln, Y. S. (1995b). The sixth moment: Emerging proble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19, pp. 37-55). Greenwich, CT: JAI.

Lincoln, Y. S. (1997). Self, subject, audience, text: Living at the edge, writing in the margins.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37-5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incoln, Y. S. (1998, November). *When research is not enough: Community, care, and love*. Presidential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 Miami, FL.

Lorde, A. (1998a). Coal. In P. L. Hill (Ed.), *Call and response: The Riverside antholog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pp. 1626-1627).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pyright © 1986 by Audre Lorde, from *Collected Poems* by Audre Lorde. Used by permission of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Lorde, A. (1998b). Power. In P. L. Hill (Ed.), *Call and response: The Riverside antholog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p. 1627).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Reprinted from A. Lorde, *The black unicorn: Poems*, 1978, New York: W. W. Norton)

Lorde, A. (1998c). Stations. In P. L. Hill (Ed.), *Call and response: The Riverside antholog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pp. 1630-1631).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pyright © 1988 by Audre Lorde, from *Collected Poems* by Audre Lorde. Used by permission of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Lubiano, W. (1997). But, compared to what? Reading realism, representation, and essentialism in *School Daze*, *Do the Right Thing*, and the Spike Lee discourse. In V. Smith (Ed.), *Representing blackness: Issues in film and video* (pp. 1-12).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Marx, K. (1983). Theses on Feuerbach. In E. Kamenka (Ed.), *The portable Karl Marx* (pp. 155-158). New York: Pengu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8)

Masilela, N. (1993). The Los Angeles school of black filmmakers. In M. Diawara (Ed.), *Black American cinema* (pp. 107-117). New York: Routledge.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enczakowski, J. (1995).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nography into theater with emancipatory potential. *Qualitative Inquiry*, 1, 360-375.

Neal, L. (1988). *Visions of a liberated future*.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Neal, L. (1998). The black arts movement. In P. L. Hill (Ed.), *Call and response: The Riverside antholog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pp. 1450-1458).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Reprinted from L. Neal, *Visions of a liberated future*, 1988,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Nero, C. L. (1998). Toward a gay black aesthetic: Signifying in contemporary black gay literature. In P. L. Hill (Ed.), *Call and response: The Riverside antholog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pp. 1973- 1987).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Noriega, C. A. (1992). Between a weapon and a formula: Chicano cinema and its contexts. In C. A. Noriega (Ed.), *Chicanos and film: Representation and resistance* (pp. 141- 16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Noriega, C. A. (1996). Imagined borders: Locating Chicano cinema in America/America. In C. A. Noriega & A. M. López (Eds.), *The ethnic eye: Latino media arts* (pp. 3-21).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aget, M. A. (1993). *A complex sorrow* (M. L. DeVault, E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arker, L. (1998). Race is... race ain't: An exploration of the utility of critical race the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1, 43-55.

Parker, L., Deyhle, D., Villenas, S., & Nebeker, K. C. (1998).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1, 5-6.

Pizarro, M. (1998). "Chicana/o power":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for social justice and empowerment in Chicana/o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1, 57-79.

Red Lodge Chamber of Commerce. (1982). *Festival of Nations, Red Lodge, Montana* [brochure]. Red Lodge, MT: Author.

Reason, P. (1993). Sacred experience and sacred scie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2, 10-27.

Reason, P. (Ed.). (1994). *Participation in human inquiry*. London: Sage.

Richardson, L.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M. (1998). Poetics in the field and on the page. *Qualitative Inquiry*, 4, 451-462.

Rinehart, R. (1998). Fictional methods in ethnography: Believability, specks of glass, and Chekhov. *Qualitative Inquiry*, 4, 200-224.

Ronai, C. R. (1998). Sketching with Derrida: An ethnography of a researcher/erotic dancer. *Qualitative Inquiry*, 4, 405-420.

Rorty, R.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en, J. (1994). Making things more public: On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media intellectua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1, 362-388.

Scheurich, J. J. (1997). *Research method in the postmodern*. London: Falmer.

Schwandt, T. A. (1997). Textual gymnastics,

ethics and angst.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305-311).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hange, N. (1977). *For colored girls who have considered suicide when the rainbow is enuf.*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Reprin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Scribner,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Copyright © 1975, 1976, 1977 by Ntozake Shange.)

Sims, N. (1995). The art of literary journalism. In N. Sims & M. Kramer (Eds.), *Literary journalism: A new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merican nonfiction* (pp. 3-19). New York: Ballantine.

Smith, A. D. (1993). *Fires in the mirror: Crown Heights, Brooklyn, and other identiti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Copyright © 1993 by Anna Deavere Smith. Used by permission of Doubleday,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mith, A. D. (1994). *Twilight: Los Angeles, 1992.* Garden City, NY: Anchor.

Stern, C. S., & Henderson, B. (1993). *Performance texts and contexts.* New York: Longman.

Stringer, E. T. (1996). *Action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Tierney, W. G. (1997). Lost in translation: Time and voi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W. G. Tierney & Y. S.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pp. 23-3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rinh T. M. (1992). *Framer framed.* New York: Routledge.

Turner, V. (1986).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Publications.

Ulmer, G. (1989). *Tele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West, C. (1993). Foreword. In A. D. Smith, *Fires in the mirror: Crown Heights, Brooklyn, and other identities* (pp. xvii-xxii). Garden City, NY: Anchor.

West, C. (1994). *Race matters.* New York: Vantage.

Wilkinson, C. (1997). Paradise revisited. In W. E. Reibsame (Ed.), *Atlas of the new West* (pp. 15-65). New York: W. W. Norton.

Wolfe, T. (1973). The new journalism. In T. Wolfe & E. W. Johnson (Ecls.), *The new journalism: An anthology* (pp. 1-52). New York: Harper & Row.

写作:一种研究方法[1]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 拉雷尔·里查德森

作者的目标是(或者说应该是)引起读者的注意……我希望读者阅读文章时,一直看到文章的最后一页。

我带着一种对定性研究极其热爱却有些不太尊重的思想将写作视为一种研究方法,一种发现你自己和你的主题的方式。尽管我们通常认为写作是"讲述"社会世界的模式,但它并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结束阶段的扫荡工具。写作也是一种"了解"的方式——一种发现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通过不同方式的写作,我们发现自己所研究主题的新的方面以及我们与研究课题之间新的关系。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

写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不同于标准的社会科学实践。它所提供的是一种附加的(或曰替代性的)研究实践。在标准的社会科学话语中,获取资料的方法明显地不同于研究报告的写作,后者被假定为一项不具争议性的活动,是关于所研究世界的透明性的报告。但是,当我们将写作视为一种方法时,我们体验到了"应用中的语言",以及如何用语言重新描述世界的存在(Rose, 1992)。进而,我们用语言重新描述世界,在电脑上反反复复地删减文字、查阅词典、移动段落。这个"被语言描述的世界"绝对没有准确、完整地捕捉到所研究的世界,但是我们坚持朝这个方向尝试、努力。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写作支持、鼓励这种尝试,把它作为丰富语言意义之活动的起点。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写作提供了一种研究实践,通过这种实践可以调查我们如何建构这个世界、我们自己和他人;可以调查标准客观的社会科学实践如何不必要地限制我们、限制社会科学。作为方法的写作并不将写作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它提出了学会写作、培养作者的多种途径。

我将本章分为同等重要却形式不同的两部分。我强调同等重要是因为第一

---

① 作者注释:我感谢洛克里奇(Ernest Lockridge)关于本章节的多次讨论与反复阅读。我也感谢博克纳(Arther Bochner),邓津,埃利斯(Carolyn Ellis),法恩(Michelle Fine),莱瑟(Pattin Lather),林肯,莫里斯(Meaghan Morris),范曼尼恩(John Van Maanen),感谢他们慷慨、珍贵的批评。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学生,是他们告诉我他们发现本文的初稿非常有用,是他们给我力量与意愿来修改初稿。

部分是一篇论文,它在修辞上较第二部分有优势。在第一部分,"情境中的写作",我将自己定位为定性研究的读者/作者。然后,我讨论了①社会科学写作的历史根源,②定性写作的后现代主义可能性,③民族志的未来。在第二部分,我提出了一系列写作的建议与练习。

本章节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我自己的研究过程和倾向性。我鼓励研究者通过写作探索他们自己的过程与倾向。我们自己的写作应该会增强定性研究者群体以及其中个人的声音,因为我们将会更全面地展现在研究中,我们会更真实、更投入。

情境中的写作

坦白地讲,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在无数个被认为是研究范例的定性研究中辛勤耕耘。无数的文章被我略略看过就扔在一边。我可能怀着极大的期望预订一本书——其主题是我所感兴趣的,其作者是我想拜读的——但通常所发现的只是文章的乏味。不是因为写作的复杂与难懂,而是因为文章一贯太被动:被动的作者、被动的主题。向我的同事、学生透露我对许多定性写作的不满之后,我发现了一大群类似的不满者。本科生、研究生和我的同事都说他们也认为许多定性研究的写作令人乏味。

我们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研究的主题是固定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定性研究的著作是不卒读的。定量研究可以通过文中的图表与结论小节来解读,而定性研究的意义是贯穿全文的。正如一篇文学作品不等于其"情节简介",定性研究的内容不可能被涵盖在摘要中,定性研究必须仔细阅读而非草草翻阅。其意义就在于阅读。

定性研究可以面向广大不同的读者,不仅仅是对某个主题或作者感兴趣的人。如果花数月或数年的时间做研究,结果却没多少人看,除了对作者的事业之外毫无意义,那么这就显得很愚蠢,甚至是自恋的、完全自我封闭的。能做些改变吗?这就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这样创造那些重要的文本,那些有吸引性的文本,那些不同的文本,创造这些文本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写作视为一种研究的方法。

我写作,因为我想有所发现。我写作,目的是想学习自己写之前所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我受的教育是(你的也许同我的一样)直到我明白想要说什么的时候才写作,直到我的观点都组织好了才开始写。难怪这种静态写作模式和机械科学主义、定量研究如此契合。但是,我认为这种静态写作模式本身是19世纪的前辈们将他们眼中的静态社会世界具体化的一种社会历史发明。这种模式存在严重的问题:它忽略了写作的动态功能和创造性过程;它破坏了早期定性研究者的信心,因为他们的研究经历和这种写作模式不协调;而且它导致形成一批阅读起来没什么兴趣的定性研究作品,因为要忠于模型就要求作者三缄其口,将自

己视为污染源。

定性研究者通常会提到研究者个人技术和能力的重要性。研究者本身(而不是调查问卷或调查录音)就是研究“工具”。研究者的磨练越多,就更有可能做出优秀的研究。学生们被教导要思想开放,要观察、倾听、提问和参与。但是老师教给他们写作的概念是对研究结果的“写作”,而不是将写作视为一种开放的、发现的方法。传统写作是对研究结果的“写作”其实是将机械的写作模式合法化,遏制作者/研究者个人的创造性与理性。

因此,某些文章令人乏味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经历职业社会化、奖赏、惩罚过程之后我们都被同质化了,我们对于自我的感觉被削弱了。在镇压个人声音、接受科学无处不在的声音(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之后,同质化就产生了。我们如何将自我放在我们的文本中?这样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我们如何在培养自己个性的同时宣布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些问题在哲学上和现实意义上都很难回答。

历史背景:写作规范

语言是一种构成性的力量,它创造了一种检视现实与自我的独特视野。制造“事物”总要涉及价值——制造什么、如何给产品命名、制造者与所制造物之间的关系等。写作“事物”也不例外。没什么文本是无取向的(包括本文)。写作的风格既非固定也非中性,而是反映了特定学派或范式之主导地位的历史变化。社会科学写作就像所有其他形式的写作一样,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建构,因而是善变的。

自 17 世纪开始,写作的世界被分为两大不同的类别:文学的与科学的。自 17 世纪以来,文学一直和虚构、修辞、主观性相联系,而科学则和事实、“平实的”语言、客观性相联系(Clifford, 1986, p.5)。文学是“假的”,因为它不像科学,它虚构现实;而科学是“真的”,因为它以一种毫不含糊的声音有根据地“报告”“客观的”现实。

到了 18 世纪,文学受到了更猛烈的攻击。洛克(John Locke)警告成年人放弃修辞性的语言以免“事物”和“思想”之间的渠道被阻隔。休谟(David Hume)形容诗人是职业骗子。本萨姆(Jeremy Bentham)建议理想的语言应该是没有字词只包含意义毫不含糊的符号。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词典追求“永久性地确定字词的唯一意义,就像标准算术术语的唯一意义一样”(Levine, 1985, p.4)。

是 Marquis de Condorcet 在语言世界里首先引入了“社会科学”一词。他认为如果人们使用精确的语言描述道德与社会问题,那么“关于真理的知识”将会是“简单而几乎毫无差错的”(引自 Levine, 1985, p.6)。到 19 世纪,文学与科学分立为两个不同领域。文学与“艺术”、“文化”为伍,它涵盖的是关于“品味、审美、伦理、人道与道德”的价值(Clifford, 1986, p.6)以及多变、模糊语言的权利。而科学所持的信仰是,它的语言是客观、精确、毫不含糊、非情境性、非多变性的。

但是,由于文学写作在重要性、地位、影响和真理价值方面都次于科学,一些文学作者试图使文学成为科学之一部分。到19世纪晚期,"现实主义"主宰了科学与文学写作(Clough, 1992)。巴尔扎克成为文学现实主义运动的急先锋。他将社会视为"历史有机体",它具有类似于"动物种类"的"社会种类"。他认为值得称道的作者必须调查"社会效应"的"理由或原因"——这是社会赖以存在的"第一法则"(Balzac, 1842/1965, pp. 247-249)。

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小说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工具"(Crawford, 1951, p. 7)。左拉紧跟巴尔扎克,论证文学的"自然主义"。在他著名的论文《作为社会科学的小说》中,他指出"回归自然,回归标志本世纪的自然主义进化论,这逐渐地将所有展现人类智慧的作品指引到同一条科学道路之上。"文学即将"被科学所主宰"(Zola, 1880/1965, p. 271)。

随着20世纪的到来,社会科学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事实"与"虚构"、"真实"与"想象"之间原先所假定的绝对分野变得模糊起来。在公众写作领域(或曰新闻界)这种模糊性得到了热烈的讨论。沃尔弗(Tom Wolf)的"新新闻学"(new journalism)指出,作者有意识地模糊"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有意识地使他们自己成为故事的中心(关于新新闻学的深入讨论参见:Denzin, 1997,第5章)。

新新闻作者也闯入了民族志研究的领域,借用其方法,不是以"记者"身份而是以社会分析家的身份报导社会、文化生活。一些文学作者,如 Truman Capote, John Didion, Norman Mailer 等也加入了越界者的行列。文学教授将一小部分后殖民主义作者的小说定位为"民族志小说",一再地唤起人们的兴趣。所谓的"民族志小说"指的是关于文化特征的著述(参见 Ba, 1987; Hurston, 1942/1991)。

到20世纪70年代,跨越不同写作形式的"越界者"创造了一系列矛盾的类型,如"创造性的非虚构"、"派系"、"民族志小说"、"非虚构小说"、"真实的虚构"等。20世纪80年代,小说家多克特罗(E. L. Doctorow)提出"现在没有所谓的虚构与非虚构了,只有叙述"(引自 Fishkin, 1985, p. 7)。

尽管类型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尽管在当代我们所理解的写作是叙述性写作,我认为在文学性与科学性写作之间仍然存在一个主要的差别。这个差别不在于文本是否真正是虚构或非虚构的,而在于作者对文本风格的宣称。宣称写"小说"不同于宣称写"科学",其读者定位不同,对观众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同,对其宣称所期待的评价不同。这些差别不应被忽视或削弱。

无论何时,只要出现写作风格与形式的变迁,我们都可以发现学界对这些变化的论述与探索。今天,许多学科的学者都在探索科学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并且解构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参见 Agger, 1989; Brodkey, 1987; Brown, 1977; Clough, 1992; Edmondson, 1984; Mishler, 1989; Nelson, Megill, & McCloskey, 1987; Simons, 1990)。他们解构性的分析具体表现为,所有学科是如何拥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文学技巧——未必是小说(虚构)写作技巧——和修辞取向,诸如图表、档案资料和第一人称等等。

每种社会科学写作规范都可以仔细讨论,但在这里我只探讨两个方面:比喻用法和写作格式。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方面是因为它们无处不在,我也坚信它们是探索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之写作的合适场所(参见“写作练习”部分)。

比喻用法

比喻,一种文学技巧,是社会科学写作的脊梁。就像人的脊梁一样,它承担着重量,支持着运动,它埋藏在表面之下,将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功能和谐的整体。这个关于比喻用法的比喻表明比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事物探索和理解某事物。这通常以比较(例如,“我的爱就像一只绿青蛙”)或类推(例如,“生命的黑夜”)来进行。

社会科学写作在每个“层面”都使用比喻。社会科学深深地依赖这样一条认识论规则,即“知识和理解一般都是形体化的”(Shapiro, 1985—1986, p. 198)。特定研究的外在比喻将社会科学分析与属于另一领域的“真理价值”取向的分析相联系(Jameson, 1981)。例如,知识的启蒙(enlighten)这个用法就是一个基于光(light)的比喻,德里达(Derrida,1982)称之为知识中心论的观点,是被动地对光线的接收。在如此比喻之中隐含的是一些哲学与价值的取向。这些取向隐藏如此之深以至三流的研究工作也以价值中立的假面出现,企图蒙混过关。

理论总是交织在复杂、系统的比喻之中。看看下列关于理论的论述吧(参见Lakoff & Johnson, 1980, p. 46):

- 你的理论基础(foundation)是什么?
- 你的理论需要支持(support)。
- 你的立场摇晃不定(shaky)。
- 你的论点是分散的(fall apart)。
- 让我们建构(construct)一个观点。
- 你的理论形式(form)需要支撑(buttressing)。
- 在这个框架(framework)之下,难怪你的观点分散(fall apart)。

括号里面的单词表明我们习惯地、无意识运用“理论是建筑物”这一比喻。而且,比喻还建构着我们的理论行动、建构着我们关于理论之内容的信仰。我们试图建立这样一种理论结构,我们将之视为建筑结构(structure),它有形式和基础,然后我们将此理论结构视为大厦,有时它相当的大,有时需要缩小,有时需要解体,或者就目前而言,需要重构。

历史上,理论建构者应用了很多生动比喻。常用的有运动(sport)、游戏(game)和战争(war)等。这些比喻方式不符合许多妇女的兴趣,而且它们有助于形成敌意的、争论的和对抗性的学术氛围。20世纪70年代,女性研究者引进并实践了一个不同的比喻:“理论故事”。个人的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理论的基础。在新的比喻之下,许多女性主义者改变了他们的研究与写作实践;妇女谈论她们的经历,叙述她们的生活,讲述个人和集体的故事,这些都被理解为妇女对其生活的理论化。“叙述”与“分析”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到处都充斥着比喻、功能主义、角色理论、博弈理论、拟剧理论、有机论、社会进化论、社会系统、社会生态学、标签理论、均衡论、人力资本、资源动员、种族暴乱、发展中国家、分层、测试的显著性等等理论都体现了比喻。比喻组织着社会科学研究、影响人们对"事实"的诠释。实际上,"事实"只有在被置于比喻结构之中才是可诠释的("有意义的")。"意义形成"总是有关价值——以一种特定方式形成意义,使某一组"事实"比别的事实更具有特权。

写作格式

除了社会科学写作的比喻性基础之外,写作还有一些既定格式:我们被期待着如何写作,这影响着我们能够写出怎样的作品。例如,社会科学的参考文献系统不鼓励使用脚注。脚注通常表达反方的观点、文章结构和相关的观点。知识的构成是"着重性的","问题"(假设)为中心的、"线性的"、直接的。其他的思想是多余的。以归纳法完成的研究要演绎地来报告;论点摘要在150个单词以内;研究者需要明确地表明某种理论标签。所有这些规范偏好(创造、维持)某种特定的知识构成观念。这些规范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具有巨大的物质与象征的力量。应用这些规范使研究者的作品增加了被"核心"社会科学期刊接受的可能性,但是这对于应用其他写作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并不表明谁具有明显的更大(或更小)的真理价值或意义。

还有一些社会科学写作规范影响着民族志写作。为了将他们的作品与旅行者、传教士的报导,与想像的写作分开来,民族志研究者采用非个人性的第三人称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鼓吹其作品的真实性(参见本书第17章)。范曼尼恩(Van Maanen,1988)指出与传统民族志研究,或曰"现实主义故事"的四条规范:①有经验的作者。作者只在序言中以确定"我在那儿"和"我是一个研究者"的身份事实。②文献风格。或代表典型活动、模式、文化成员的大量具体、独特细节。③文化成员的观点。通过引用、解释、句法、文化事实等推论得出。④民族志研究者万能的诠释。许多经典的社会科学著作都是现实主义故事。其中包括《各就各位》(*Everything in Its Path*, Kai Erickson, 1976)、《街角社会》(*Corner Society*, William Foote Whyte, 1967),《塔利的角落》(*Talley's Corner*, Elliot Liebow, 1967)和《我们的所有亲戚》(*All Our Kin*, Carol Stack, 1974)等。

定性研究的其他种类——如基于生活史或深度访谈的文本——都有自己的一套传统规范(参见 Mishler,1989;Richardson,1990)。在这些定性研究文本中,研究者只是在介绍或方法部分确定其身份。在他们写作的文章主体部分似乎那些文献和引用片段是自然地呈现在那里,是合理的、可靠的、完全有代表性的,而不是作者为了文本面貌而刻意挑选、修剪、排列的。正如文化民族志研究一样,在其他定性研究文本的修辞中也表现出"科学权威"的理论假设。常见的"生活故事"文本包括《痛苦世界》(*Worlds of Pain*, Lillian Rubin, 1976)、《没有年龄的自我》(*The Ageless of self*, Sharon Kaufman, 1986)和《新另类女人》(*The New Other Woman*, Richardson, 1985)。

后现代情境

现在我们很幸运地在一种后现代的环境中工作(参见 Agger, 1990; Clifford & Marcus, 1986; Denzin, 1986, 1991, 1995; Hutcheon, 1988; Lehman, 1991; Lyotard, 1984; Nicholson, 1990; Turner & Brunner, 1986),这是一个多种认识与讲述方式并存的时代。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任何方法或理论、话语或类型、传统或创新的怀疑,因为这些方法、理论等宣称权威知识形式的"正确性"或特权性。后现代主义怀疑所有在本土、文化、政治等方面隐藏或服务于特定利益的所谓真理的宣称。但这并不等于自动地弃用那些被认为是假的或陈旧的了解与讲述的常规方法。相反,后现代主义使用这些标准的研究并引进新的方法,虽然,后者也受到批评。

因而,后现代主义在怀疑情境下不相信所有的方法。这种不相信是平等的,没有任何方法具有特权地位。"科学"对于"文学"的特权——或者从另一角度,"文学"对于"科学"的特权——受到了挑战。但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确实使我们不用宣称知道所有事物就可以知道"某个事物"。具有片面的、地方性的、历史的知识依然可以了解。然而,在某些方面,"了解"更容易,因为后现代主义认识到求知者的情境局限。可以说,定性研究者挣脱了这个圈套。他们不再被迫扮演上帝,写作脱离了万能的讲述者所宣称的跨越时空的一般性知识;他们可以避开关于社会科学客观性的、有争议的宏大叙事,作为情境中的讲述者,他们仍然可以尽情讲述他们所认识到的了解/讲述世界时主观性的介入。

我发现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特别有帮助,那就是后结构主义(要全面了解可参见 Weedon, 1987;了解具体研究背景中该观点的应用,可参见 Davies, 1994)。后结构主义将语言、主观性、社会组织和权力连结在一起。其中心环节是语言。语言并不"反映"社会现实,但它产生意义,创造社会现实。特定语言中的不同语言用法和不同话语将这个世界分成不同的部分,给予其意义,并使意义不相互还原。语言关系到社会组织和权力如何界定与竞争,它是我们对自我的感觉,我们的主观性建构的场所。将语言理解为一种竞争的话语,一种关于意义给予方式和世界的组织方式的竞争,使语言成为了一个探索和斗争的场所。

语言不是某个人个性的结果;相反,语言在具体的历史与地方性的背景下建构着个人的主观性。某件事物对于个人的意义取决于他可能得到的话语。例如,如果在"正常婚姻"、"丈夫的权利"、"殴打妻子"等不同的话语之下来理解,被配偶打可能会有不同体验。如果妇女视男性暴力为"正常"或"正常的权利",那么她可能不乐意视其为"殴妻",因为"殴妻"是不合法地利用权力,是不应该容忍的。与之类似,如果一个男人被置于"童年性侵犯"的话语之中,他可能重新组织、回忆自己饱受创伤的童年经历。因此,经历和回忆在不同社会利益和话语的主导之下会形成相互矛盾的诠释。个人在这场为确定和重新形成记忆的话语斗争中既是场所也是主体。因为个人要服从于许多领域多样化、相互竞争的话语,他的主观性也是变化的、相互矛盾的,并不是稳定的、固定的、僵化的。

后结构主义指出了连续地共同创造自我和社会科学的观点,既两者相互通过对方而达到了解。了解自我和了解主体是相互交织的、片面的、历史的、地方性的知识。后结构主义因而允许——不,鼓励——不,煽动我们来反思我们的方法和探索新的认识方法。

具体地讲,后结构主义为定性研究提出了两点指导:首先,当人们在特定的时间从特定的立场写作时,后结构主义引导人们反思性地了解自己;其次,它使人们不再只尝试写一种想在其中立刻把所有的事告诉所有人的文本。形成我们自己的声音有利于放松我们意识中对"科学写作"的过于执着,有利于它在我们心灵上形成的傲慢态度;写作是一种合法化的了解方法。

创造性的分析实践:CAP 民族志

随着后现代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理论、批判种族理论)的出现,对于传统定性写作实践的批评、定性研究成果等现在在许多场合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科学写作论文并不被视为神圣。民族志研究类型已经边界模糊,扩大了,它变成包括诗歌、戏剧、谈话、读者剧场等部分的类型。这些民族志写作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通过创造性的分析实践(creative analytic practices)得以产生。我将这一类民族志写作称为创造性的分析实践民族志(creative analytic practice ethnography)或 CAP 民族志(CAP ethnography)。这一标签涵盖了新的研究、未来的研究以及旧的研究,无论作者怎样游离于常规社会科学写作之外。

我知道任何概念都存在问题,都应接受批评。对于如何命名这些突破类型的民族志研究,我思考得越多,就越喜欢 CAP 这个缩写词的复杂比喻含义。英语中 CAP 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 caput(意思是头)。用"头"来显示突破性的民族志研究有助于打破思想/身体二元性。"头"既是思想也是身体还能代表更多。CAP 民族志的创造者在运用他们的"头"。该产品尽管受到身体的限制,但是没有头部的工作它就不可能出现。

Cap——既可作名词(产品)也可作动词(过程)——具有多种常规、惯用的意义与联想(帽子、头领、楼顶、小爆炸、放在顶部、超越 、超过等等),折射出这一写作类型的随意性。还有另一些相联系的、拉丁词根词语,如 capillary 和 capitalism 也是有关人的劳动的。

生产 CAP 民族志的实践既是创造性的也是分析性的。那些认为"创造性"和"分析性"是两种相互矛盾、不可调和的模式的奇怪观点就像一颗流星,是注定要消亡的。过去二十年经历了新民族志"类别"的进化、繁殖与多样化。

下面列举了 CAP 民族志多种"类别"中的几种: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参见 Behar, 1993, 1996; Bruner, 1996; Church, 1995; Ellis, 1993, 1995a, 1995b, 1998; Frank, 1995; Geertz, 1988; Gerla, 1995; Goetting & Fenstermaker, 1995; Karp, 1996; Kondo, 1990; Krieger, 1991, 1996; Lawrence-Lightfoot, 1994; McMahon, 1996; Shostak, 1996; Slobin, 1995; Steedman, 1986; Yu, 1997; Zola, 1982),虚构小说(fiction-stories)(Cherry, 1995; Diversi, 1998a, 1998b; Frohock,

1992; Richardson & Lockridge, 1998; Rinehart, 1998; Shelton, 1995; Sparkes, 1997; Stewart, 1989; Williams, 1991; Wilson, 1965; Wolf, 1992),诗歌(poetry)(Baff, 1997; Brady, 1991; Diamond, 1982; Glesne, 1997; Norum, 即将出版; Patai, 1988; Prattis, 1985; Richardson, 1992a),戏剧(drama)(Ellis & Bochner, 1992; Paget, 1990; Richardson, 1993, 1996a; Richardson & Lockridge, 1991),表演文本(performance texts)(Denzin, 1997; McCall & Becker, 1990; Mienczakowski, 1996; Richardson, 1998, 1999a, 1999b),多声音文本(polyvocal texts)(Butler & Rosenblum, 1991; Daly & Dienhart, 1998; Krieger, 1983; Pandolfo, 1997; Schneider, 1991),读者剧场(readers' theatre)(Donmoyer & Yennie-Donmoyer, 1995),回应性阅读(responsive readings)(Richardson, 1992b),格言(aphorisms)(Rose,1992, 1993),喜剧与讽刺文本(comedy & satire)(Barley, 1986, 1988),视觉表现(visual presentations)(Harper, 1987; Jacobs, 1984; McCall, Cammel, & Taylor, 1994),寓言(allegory)(Lawton, 1997, pp. 193-214),对话 conversation (Ellis & Bochner, 1996b; Richardson & Lockridge, 1998)分层叙述(layered accounts)(Jago 1996; Ronai, 1992, 1995),写作故事(writing-stories)(Lawton, 1997; Richardson, 1995, 1997; St. Pierre, 1997a, 1997b)和混合类别(mixed genre)(Angrosino, 1998; Brown, 1991; Church, 1999; Davies, 1989; Dorst, 1989; Fine, 1992; hooks, 1990; Jipson & Paley, 1997; Jones, 1998; Lather, 1991; Lather & Smithies, 1997; Lee, 1996; Linden, 1992; Pfohl, 1992; Richardson, 1997; Rose, 1989; Stoller, 1989; Trinh, 1989; Ulmer, 1989; Visweswaran, 1994; Walkerdine, 1990; Williams, 1991; Wolf, 1992)。

有十多年的时间,我所称的 CAP 民族志被贴上了"实践性"或"替代性"的标签(参见 Van Maanen, 1995),但是这些标签被传统民族志实践无意中再注册为定性研究之标准的、已知的、被接受了的、喜爱的探索模式。我认为这种再注册现在成了不需要的、假的、有害的。CAP 民族志研究既不是替代性的也不是实验性的;这些研究正当其时,它们本身就是社会世界合理、理想的展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民族志研究可能真正成为最合理、最理想的对社会的展示,因为它们邀请人的介入,它们为关于社会的思考开辟了新的空间。

CAP 民族志所呈现的写作过程和写作产品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两者都有特权。产品不可能和生产者或生产模式或研究方法分开。因为所有研究——传统的和 CAP 民族志研究——现在都是在一个更广泛的后现代主义"怀疑"气氛中进行,读者希望也应该知道研究者如何宣称他的发现。作者如何定位他作为知情者与讲述者的自我?这些问题一方面和主观性、权威、反思性以及研究过程紧密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和表现形式密切相关。

后现代主义宣称写作总是片面的、地方性的、情境的,不管我们如何试图压抑,我们的自我总是在场——但仅仅是部分在场,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压抑了部分的自我。在这一前提下研究使我们自由地用多种方式写作资料,讲述又再讲述。研究中不存在所谓的"正确获得"而只有存在轮廓不同、差别细微的"获

得"。运用创造性的分析实践,民族志研究者可以了解主题、了解自我,而运用常规的分析程序、比喻、写作格式等来了解是不可知且不可想像的。即使你选择以常规形式写作论文,尝试不同的写作方法是提高诠释技巧、提高自我意识、给研究带来新视角的非常实际、有效的途径。

全面论述评价新民族志的实践与形式不是本章内容所能涵盖的。本章也不可能囊括前面所讨论的所有那些民族志研究实践——表演作品、读者舞台、博物展览、舞台设计化的研究成果、艺术代表、假设文本等等——尽管我欢迎将这些加入定性研究文库。相反,我想讨论这样一组类型,它们用文学的技巧重新塑造过去的经历、唤醒情感反应。我称之为唤起式表现类型(evocative representations)。我反对向读者提供源于上述实践形式的引用片段,因为片段本身不能公正地对待该类型。我会描述一些文本,但我不乐意再次说明,本章的目的是过程而不是产品。

唤起形式提出的诠释框架要求将它们本身当作文化产品,当作了解社会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唤起式表现类型是使视野透过、超越社会科学自然主义的重要方法。将社会科学置于唤起形式之中揭示了生产修辞的潜在劳动,也揭示了作为人类活动的社会科学的潜力,因为唤起式写作触摸到了我们的心灵。通过它,我们可以体验到自我创造的自我反思、变化的过程。尝试唤起形式,我们和资料形成不同的联系;我们对资料的了解也不同。我们发现自己参与了情感、暧昧不明的情景、临时结果、模糊经历等等;我们努力地为自己、为我们的疑问与不确定性寻找一个文本归宿。

唤起性写作的形式之一是自传民族志(本书第28章对这一主题有详尽论述,也可参见第4章)。自传民族志是高度个人化的,在其文本中作者揭示的是关于他们自己过去经历的故事,将个人故事与文化相联系。作品的威力取决于它们在修辞上被定位为"真实的故事",是有关真实发生在作者身上之事件的故事。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作者可以运用一些小说写作技巧如戏剧性回忆、有力想象、镂空人物、非常台词、双关语、次文本、幻想、前后闪现、语音变化、提喻法、对话、内心独白等等。通过这些技术,作者建构了系列事件或"情节",紧扣诠释理解,要求读者和作者一起充满感情地"重新经历"那些事件。这类作品寻求满足和谐、逼真、有趣等文学标准。某些关于自我的叙述被视为想像的写作,而另一些则被视为追求诚实、揭露性和"较大图像"的个人性的论文。在这两种形式下,自传民族志作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松了一口气,他们不用刻意"为他人讲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文本中的"他人"。

和自传民族志相联系但又未必涉及上述写作策略的是关于写作过程本身的叙述。我称之为写作故事(writing-stories)(Richardson, 1997)。这些叙述关注的是写作产生的情境。他们将作者的写作放置在作者生活的其他部分,例如,学科领域、学术讨论、局部政治、社会运动、社区结构、研究兴趣、家庭联系、个人历史等,他们对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创造性分析实践在不同情境下写作自我提出了批判性反思。他们引起了关于自我与主题的新问题;他们提醒我们,研究是有基础

的、情景的、有根的。他们可以唤起更深层的自我、可以疗伤、增强自我感觉——甚至改变人们的身份认同。

在《游戏场域:建构学术生活》(*In Fid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1997)一书中,我广泛运用写作故事以将我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置于情境之中,形成了一个更符合后结构主义所理解的知识情境化本质的文本。我将论文按年代顺序放置,并分成两堆——"保留"和"抛弃"。当我重新阅读我的第一篇保留论文——中北地区社会学学会的主席发言——之时,那些关于我被系主任资助、边际化、惩罚的记忆重新浮现在眼前。带着这些记忆我写了一篇关于我的院系生活和学科声誉脱节的写作故事。写作故事从情感上并不那么轻松,在写作中我重新回顾那些可怕的经历,但是写作可以释放愤怒和痛苦。许多学界人士阅读该故事之后,认为这和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并未讲述的故事非常吻合。

我按时间的顺序处理保留的文档,重新阅读然后写作由重新阅读所激发的写作故事。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情境。有些故事需要核对我的期刊与文档,但是大部分都不需要。有些故事令人痛苦,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写作,但是写出来就释放了它们在我心里的阴影。另一些故事则是令人高兴的,使我回忆起和朋友、同事、家人一起的幸运故事。

写作故事使我们对自己写作之潜在后果变得敏感,因为我们把有关表现内容的伦理带进了自己的生活——家里或工作场所。写作故事并不是关于"外面"的人或文化——民族志的主题或研究目的——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工作场所、学科、朋友和家庭。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会有什么后果呢?写作故事使民族志的表现形式的危险与辛酸变得更接近我们和更个人化。

每个写作故事都给其作者提供机会,让他就是否和在哪里发表该故事作一个适合情境、伦理的决定。多数情况下,我没有发现反映管理者滥用权力的故事的发表有什么伦理问题,我更多地考虑的是他们所造成的破坏而不是我的故事使他们不舒服。相比之下,当写作我的家庭成员时,我感到受限制。我发表的任何有关他们的文章都要他们核对;至于一些远房亲戚,我改变了他们的名字和身份特征。我近期的一些作品暂时不发表是因为这对我和我的家人、亲戚而言代价太大。

研究生们发现写作故事的思想对于他们思考、写作他们的研究经历很有用。正如劳顿(Lawton,1997)所做的那样,有些人将写作故事作为传统研究方法的替代或补充,用以连接他们研究中的叙述。

写作故事还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微观过程写作故事(micro-process writing-stories)的分类别(参见 Meloy,1993)。谁没有这样的经历:盯着电脑屏幕,阅读他(她)写的一段文字,然后决定改变它?谁的写作不受前面已完成部分的影响?而前面所完成的段落以及对这些段落的阅读怎样"开启了对前面段落反馈的新问题呢?(A. P. Bochner,个人交流,1998 年 5 月 10 日)。一个改变了的自我是怎样通过这种反馈过程而被唤起呢?

和这一分类相联系的是计算机技术和文本页面设置:排版、字体、分页等,这

该怎样做决定呢?对作者和读者有何影响呢?这种简单易行的页面格式和排版风格是怎样有助于或不利于文本的唤起呢?作者怎样发现主题和他们自己呢?这些都是和写作故事相关的问题。

和前面所讨论的两种形式不同,民族志小说这种唤起形式有大量的文献论述(参见 Banks & Bands,1998)(关于这一种和其他种类的更详细的叙述形式参见本书第 17 章)。根据小说家洛克里奇(Lockridge,个人交流,1998),小说写作是运用想象来发现真理,将真理具体化。宣称其作品是小说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赋予其想象以特权,寻求以自己的视角表现社会科学"真理"。他们通常将他们的故事——不管是关于他们自己或群体或文化的故事——置于民族志研究背景之中;他们通过自己的特征展现文化规范。除了自我叙述者这种技巧之外(参见上文),民族志小说作者还可能运用诸如替代性观点、深层个性化、第三人称以及万能的叙述者等技巧(但是我不认为任何民族志小说作者可以依据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观点来进行写作。参见 Lockridge,1987)。

宣称某人的民族志写作是小说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将定性研究视为虚构使作者免于一些约束,保护作者不受刑事或其他控告,还有可能保护被研究者的身份。但是在出版界"文学小说"竞争力低下。很少作品可以成功出版。而且,如果某人意欲通过研究来影响社会变迁,在修辞上,小说是种很不济的写作策略。政策制订者喜好的甚至不是那些宣称是"非虚构"的作品,而是宣称是"真实研究"的成果。

另一种唤起形式是诗歌式的展现。正如罗伯特·弗劳斯特(Robert Frost)所言,"诗歌是两点之间最短的情感距离"——即作者与读者之间。例如,将社会学访谈写成诗歌形式表现了韵文修辞在建构知识方面的作用。当我们读或者听诗歌时,我们不断地被提醒:文本是建构起来的。但是所有的文本都是虚构的——韵文也是;因而诗歌容易造成可靠性、有效性、透明性和真理性方面的问题。

将"资料"写成诗歌形式暴露了约束人们的一种信念,即认为社会科学文本的目的是以独立于情境的事实、主题或观念(它们正是从情境之中产生)来传达信息。似乎我们所录制、记录、编辑、以韵文片段写作的故事是一个唯一真实的故事:一个"科学"故事。标准的韵文写作掩藏了写作该文本的社会学家的手印。

而且,当人们谈话时,不管是闲谈者,讲故事者,被研究者还是被访谈者,他们的讲话更接近诗歌访谈。重视讲话者的停顿、重复、押韵、叙述策略、节奏等,实际上可能比以论文的引用片段形式更能够表现讲话者。进一步讲,诗的技巧——韵律、空间、停顿、头韵、节奏、抑扬顿挫、类音类韵、压韵、脱韵等——深入到了倾听者的身体,即使思想上拒绝,否认这一点。"诗歌首先是语言权利的集中,而语言正是我们和宇宙中所有事物的终极联系。好像是我们能加以利用的力量以一种感性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Deshazer, 1986, p.138)。词语的新组合使我们听到、看到、感觉到世界的新的层面。诗歌因而成了分析社会世界的实际的、有力的方法。

《露易莎·梅(Louisa May)的生活故事》就是挑战认识论假设之诗歌建构的

一个实例(Richardson, 1997)。这是我根据对"露易莎·梅",一个未婚妈妈,深度访谈之长达36页的记录所写成的5页长的叙述诗。在写作该诗时,我运用了科学的与文学的两套标准。它在文学方面(而不是社会学方面)更具挑战性,因为露易莎·梅不用形象比喻,不用感性词语,也很少用成语,因而该诗只能建构在其他一些诗词技巧上,如重复、停顿、节奏、压韵和脱韵等。我没有借她的嘴讲一些词语,因为这会影响我的社会学理性,我用的是她的声音、措辞、南山韵(hill-southern rhythms)和语气。我写她的故事——正如她告诉我的那样——是放在历史的背景下使之产生意义。她的生活故事正如她所讲的那样,是一个"平常的故事"。其政治的、潜在的背景就是我所写的"美国母亲的勇气"。

民族志戏剧是另一种塑造经历而又不丢失经历的唤起形式。它可以从多个"经历过的"角度重构某事件的"意义";它可以使所有相互冲突的"声音"都被听到,减少了研究者不得不充当法官和裁判的压力(Davies et al, 1997; Johnson, 1997);它可以给予那些存在但未言明的事物以声音,例如,佩吉特(Paget, 1990)的民族志戏剧里所描述的"癌症",埃利斯和博克纳(Elllis & Bochner, 1992)的戏剧中的堕胎等。当需要展现的材料不可追踪、不真实、取自多个背景、带有很重情感因素时,戏剧形式比标准化的写作更有可能重新捕捉到经历。

戏剧的建构引发了关于"口头"文本和"书面"文本的后现代论争。谁者为先?哪一个应具有特权,其结果是什么?为何要作"口头"、"书面"二分法?印刷的文本可能被认为是确定的或"合理的"文本,对于那些将出版物凌驾于"本源的"表演甚至过去经历之上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印刷的文本源于过去的经历,被编录为实地笔记,转化为民族志剧本表演、录音,然后重新编辑出版。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合理性宣称又将如何?戏剧的建构提供了多个创造的场景和对合理性的潜在挑战,使"口头"、"书面"两种文本之间界限模糊,产生了修辞取向、伦理问题、权威/作者之对立等。它不仅仅是"谈论"这些问题,它就是问题的本身(参见 Davies et al., 1997; Johnston, 1997; Richardson, 1997)。

最后一种唤起形式是混合类型。作者自由地从文学、艺术和科学类型中吸收素材形成作品,经常打破了三者彼此间的界限。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对于同一主题可能有不同的"手法",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后现代的三角解构(deconstruction of triangulation)。

在传统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使用"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关于作为方法之三角测量的论述,参见 Denzin, 1978; Flick, 1998。关于这种方法的应用,参见 Statham, Richardson & Cook, 1991)。三角测量意味着研究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如访谈法、调查数据、文献等——使研究结果有效化。但是,这些方法具有共同领域的假设,包括假设有一个固定对象可以被三角测量。但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复合类型文本中,我们并不进行三角测量,相反,我们用晶体化(crystallize)方法测量。我们认识到认识世界的途径远远不止"三个方面"。

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文本之有效性的核心代表形象不再是三角形——一种僵化的、固定的、两维的物体。相反,其代表形象是水晶体,它将对称性结合到无限

的物质形状、物质的变形、特质多维性,以及不同视角之中。水晶体大小变化,但形态不变。水晶体是棱镜,它反射其外在,折射其内在,创造出不同的颜色、模式、排列、光芒四射。我们之所见取决于我们的视角。在后现代主义混合类型文本中,不用三角测量而用晶体化测量方法,我们从平面几何转移到光的理论——光既是线条的也是粒子的。

不失其结构的晶体化解构了传统的"有效性"观点(从中我们感到没有唯一的真理,我们看到文本如何使其本身有效),晶体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复杂的、非整体性的对主题的理解。具有讽刺性的是,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越坏。坦白地讲,我们知道总有更多的东西等我们去了解。

前面所提到的叙事诗歌,《露易莎·梅的生活故事》,其建构与被接受是晶体化的一个象征。这个作品为写作、为生活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理论与观点,解构了传统的有效性观念,浏览性地触及一些课题,启发了另一些课题。通过研究与诗的写作我的生活已经被深深改变了,《露易莎·梅》感动了许多不同的读者,甚至激发其中一些人改变他们的研究与写作实践。

在《游戏场域》(Fields of Play)(1997)中某个部分,我讲述了两个相互交织的、关于"写作不合逻辑性"的故事:露易莎·梅的故事和研究的故事——它的产生、发表、被接受和对于我的后果。故事中存在多种不合逻辑性:婚姻生活之外的孩子、用诗歌呈现研究结果、社会科学中女性主义的声音、对民族志学者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对该研究的戏剧性呈现、作者的情感表现、工作乐趣等等。

我曾经相信这个研究故事是完整的,这不一定是因为它是唯一应该讲述的故事,而是因为这个故事公平、老实、真诚地反映了我以前的研究经历。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但是我逐渐认识到,研究故事中所迷失的是指引我成为故事之作者的一些个人的、自传性的经历。

我已经承认"不合逻辑性"的观点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一篇论文中我写道,"我在社会科学中的职业生涯可以被视为一段漫长的走向不合逻辑性的冒险旅程。"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要建构"不合逻辑的文本",包括我本人学术生涯的文本?我和学术界之间的斗争是什么——身在其中却又反对它?别人努力使自己有意义、努力找回压抑的自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和他们的相比较,在伦理、行动等方面到底有何同与不同?

通过暗示、瞥见、延伸的视野等折射"不合逻辑性",我写了一篇有关个人的论文"晚祷告",即《游戏场域》一书中的最后一篇论文。"晚祷告"将我的学术生活置于童年经历与记忆的背景之下,它加深了我关于自我的认识并与学界其他人的经历相呼应。"晚祷告"的写作再次折射了他人的记忆与经历,它也给予我愿望、力量和足够的自我知识来叙述他人的记忆与经历——不管是好还是坏,它给予我契机来重新建构我自己。

在最近出版的有关混合类型的著作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晶体化过程。Margery Wolf 的《讲了三次的故事》(A Three-Told Story,1992)选取同一事件分别以小说故事、实地笔记和社会科学论文等三种形式讲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在他的《酒徒、鼓手和象样的亲戚》(*Drinkers, Drummers and Decent Folk*, 1989)一书中以诗歌、小说、民族志记录和实地笔记的形式描写 Trinidad 山村。在《女生的故事》(*Schoolgirl Fictions*, 1990)一书中,沃尔克丁(Valerie Walkerdine)发展/展示了这样一个主题,即"雄性与雌性是事实地位上的虚构"(p. Xiii),她将期刊文章、诗歌、论文、自己的照片、绘画、卡通以及注释过的录音记录等整合到书中以展现该主题。林登(Ruth Linden)的著作《编故事,塑自我:对犹太大屠杀的女性主义反思》(*Making Stories, Making Selves: Feminist Reflections on the Holocaust*,1992)在一本书中编织了自传、学术写作和幸存者的故事。该书是她的博士论文。范曼尼恩(John Van Maanen)的《实地的故事》(*Tales trom the Field*, 1988)以现实的、坦白的、印象主义的叙述展示了他对警察的研究。莱瑟和史密西斯(Patti Lather & Chris Smithies)的著作《困扰天使:受艾滋/HIV 感染的女性》(*Living with Hiv/AIDS*,1997)运用创造性的文本布局展现了深刻的理论、研究者的故事、妇女支持群体的录音记录以及历史与医学的信息等。多斯特(John Dorst)的《写作的郊区》(*The Written Suburb*,1989)将地理位置视为地点、形象、观念、话语以及文本的粘合剂。斯蒂芬福尔(Stephen Pfohl)的《跳伞咖啡馆里的死亡》(*Deth at the Parasite cafe*,1992)运用了拼贴画策略和不考虑历史演进之并置,模糊了批判理论与军事艺术形式之间的界限。

在一些混合类型作品中,作家/艺术家自由地徜徉于不同的主题之中,突破了我们关于主题和自我如何共同建构的观念。Susan Krieger 的《社会科学与自我:关于艺术形式的个人论文》(*Social Science aut the Self. Personal Essays on the Art Form*,1991)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该书是"研究设计取向的",反映了 Krieger 对 Pueblo 陶工和 Georgia O'keeffe 的喜爱。正如作者所言,"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罐子或油画而不是研究假设"(p. 120)。Trinh T. Minh-ha 的《另类土著女人》(*Woman Native Other*, 1989),作者在该书的每一篇论文中都打破写作规范,在书中混合了诗歌、自我反思、女性主义批判、图片和引文来帮助读者体验后殖民主义。在《我所知道的河流:失落的与解放的生活》(*I Have Known Rivers: Lives of Loss and Liberation*,1994)一书中,Sara Lawrence-Lightfoot 运用小说写作和自我反思的技巧讲述了作为非裔美国人和职业人士的故事。一些文集也反映了混合类型写作。我自己的书《游戏场域:建构学术生活》(*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on Academic Life*, 1997)通过个人的小品文、剧本、诗歌、写作故事,电子邮件信息和社会学论文等形式讲述了我在学术界的智力与政治的斗争。一些文集也代表着混合类型,其中包括:埃利斯和博克纳(Carolyn Ellis & Arthur Bochner)的《调查主观性:关于过去经历的研究》(*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a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1992),贝哈和高登(Ruth Behar & Deborah Gordon)的《妇女写作文化》(*Women Writing Cultrue*,1995)。还有"象征互动研究丛书"(Series of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和《定性研究》(*Qualitative Inquiry*)杂志也混合了多种研究类型。

何去何从?

定性研究者现在所处的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环境是一个有利的环境。它给我们提供机会,使我们回顾、批判并重新形成写作。尽管我们有更多的自由以多种形式将我们的文本展现给不同的读者,我们所意识到的关于作者、权威、真理、有效性、可信性等的约束力却大有不同。自我反思使人们意识到隐藏在我们写作之中的一些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真理的宣称现在不如以前那么有效了;为他人讲述的意愿也遭到质疑。但是,实验文本形式的更大自由未必能保证一个更好的研究成果。写作有价值的文本(畅销的书和论文)的机会很多、前景看好、要求很高。但研究比以前更难,保障越少,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要考虑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是否写作 CAP 民族志论文并使其发表仅仅是那些有清闲学术职位者的奢侈享受。那些教给学生这些不同写作形式的教授是否在虐待学生呢?是否教给学生异教就是扼杀其能力呢?是否会使学生远离其学科呢?(我们可不可以问一问学第二语言的学生这些问题?)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果学生将写作当作研究方法来学习,那么他们的研究应该以何标准来评价呢?这些都是伦理的、教育的、审美的、现实的问题。在我教学、写作和学术讨论中我一直在探讨这些问题。尽管没有确定的答案,关于这些问题我还是形成了许多想法。

写作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我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变成诗人、小说家或剧作家——我们中很少有人可以凭写作在这些竞争性如此之强的领域立足。我们大多数人像 Poe 一样,最多也勉强是个诗人。相反,我的目的是鼓励大家接受和形成自己的声音。通过实验运用观点、口气、文本组织、文本排列、比喻等技巧,研究者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主题的知识得以发展。学生的知识库里因而添加了另一种技术、另一种语言。科学写作技能被去神秘化了。深入地理解了自我使文本也更深刻。当作者将其研究视为过程而不是确定的表现时,即使困扰一些后现代主义读者的研究分析也遭到削弱。

当学生们学习用其他方式写作时,他们并不会丧失科学语言,就像学第二语言的学生不会忘掉第一语言一样(Y. S. Lincoln,个人交流,1998)。相反,习得第二语言在两个方面可以丰富学生:给予他们一条进入新的文化、新的文学的路径;帮助他们更深地理解第一语言,不仅仅是从语法上,而是基于语言来透视这个世界。

以传统方式写作并不阻挠我们有时候以其他形式写作、为其他读者写作(Denzin, 1994; Richardson, 1990)。没有唯一的写作文本的方式,更没有所谓的"正确方式",写作就像湿黏土,它可以被塑造。学习替代性的写作方法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储备,增加了我们可以与之交流的读者的人数和类型。

在我写作本章之时,我假想有四种友好的读者:研究生、好奇的定量研究者、传统的定性研究者和创造性分析的实践者。我想澄清,想传授——而且,想另立宗派。

谁是你的读者?你的目的是什么?理解好如何在修辞上表现你的写作增加了你作品发表的几率,增加了你所希望的读者,解构传统写作的实践使作者更加意识到写作规范,因而更加有能力做出选择。

但是,新的写作方式确实引发了关于判断民族志研究之标准的讨论——是新标准还是传统标准。传统的、有良好愿望的民族志研究者使某些关注合法化,即如果学生选择写作 CAP 民族志,他们的作品将如何评价的问题。对此我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我有一些观点和倾向。

我视民族志研究课题为非常人性化的,总是通过人的眼睛和人们的体会来过滤,既有人类情感的局限也有其力量。科学的上层建筑总是架构在人类活动、信仰、理解的基础之上。我强调民族志是通过研究实践来建构的。研究实践关注的是扩大的理解。科学提供一些研究实践;文学、创造性艺术、记忆研究(Davies,1994;Davies et al,1997)和内省(Ellis,1991)提供另一些研究实践。研究者有许多可以选择的实践,不应该被其他人的思考习惯所约束。

我认为 CAP 民族志研究的标准很高很难,仅仅创造性是不够的。下面是当我写作的社会科学论文准备发表之前需要参考的五个标准:

(1)根本性贡献:这篇论文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生活有贡献吗?作者是否表现了一种深刻的社会科学观点?这种观点如何影响文本的建构?(参见下文"写作实践",有一些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建议。)

(2)审美价值:CAP 民族志不是降低标准而是增加了另一标准。论文在审美方面是成功的吗?创造性分析实践的运用是否开放了文本、引发了诠释性的反应呢?文本是否是艺术性地塑造、是否复杂而又不乏味呢?(创作性写作是一种技巧,它可以通过阅读、课程、课题和实践而得以发展。参见"写作实践"部分所列的建议。)

(3)反思性:作者是否认知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呢?作者如何写作该文本?信息是如何收集的呢?存在伦理问题吗?作者的主观性是如何既充当生产者又充当文本产品的?读者是否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对文章的观点做出判断?作者是否知道他(她)自己了解和讲述他(她)所研究对象时所用的标准呢?

(4)影响力:这对我在情感上或智力上有影响吗?它是否产生了新问题,促使我写作、促使我尝试新的研究实践、促使我采取行动?

(5)对现实的表达:这个文本是否体现了一种镂空的、关于过去经历的象征意义?它是否显得"真实"——是否是一种可信的文学、社会、个人或公共意义上的"真的"记录?

这是我的五个标准。科学是一个镜片;创造性艺术是另一个镜片。运用两个镜片我们看得更深入。我想透过这两个镜片,看到一个"社会科学艺术形式"。

那么,我强烈反对这样的观点:认为民族志应该是"科学之一员",一种有"默许规则"、学徒期和"贸易秘密"的技巧,是一个执行规则,查核"艺术的假装与过分"的"负责任的"旅行者(如教授)(参见 Schwalbe,1995;Richardson,1996b)。这个中世纪的版本制约了民族志的探索,它巡视着智力思考的世界,在思想意识上

用定性研究联合了那些社会科学领域内愿意约束与惩戒后现代思潮的人。但是,约束总是有关身体的。它总是有关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如果中世纪版本获胜,应该被排除在外的是哪些真实的人呢?

我从教学以及与同事的交流中学到的是:学术界的少数派,包括种族的、后殖民的、男女同性恋、身体缺陷者、学生等,发现转向创造性分析实践具有吸引力。这些研究者在希望有机会对"行会"效忠的同时,他们引以为荣的是其对传统,对文化,对他们眼中有意义生活的负责。

我们欢迎这些研究者创造一个丰富、多样化、投入社会、非霸权主义的定性研究者组织。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利——包括血缘身份群体和定性研究群体。种族和性别是符号世界和现实世界建构的轴心。非主流世界深知这一点,并坚持认为这种事实应受尊重(参见 Margolis & Romero,1998)。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模糊会大受欢迎,这不是因为它"时尚",而是因为这种模糊性更真实地贴近生活意义和学习风格。新定性研究群体,通过其理论、分析实践和不同的成员身份,可以超越学术界,揭示社会不公正现象以及减轻它的方法。在定性研究者感兴趣的社会生活内容中,哪有不受异质性群体中研究成员特性的影响的呢?

而且,CAP 民族志现在已经在社会科学界牢牢扎下了根。有很多著名的刊物供学生和其他研究者发表作品。常规的发表 CAP 民族志的期刊包括 *Sociological Quarterly*, *Symbolic Interac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Qualitative Inqui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Qualitative Studies in Psychology*, *Qualitative Sociology*, *Waikato Journal of Education*,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等等。而且,劳特利奇(Routledg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米歇根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萨基出版社(Sage Publications)等出版商也有规律地出版一些知名和不太知名作者的新民族志研究。阿尔塔米拉出版公司(AltaMira Press)(以前是萨基的一个部门)夸耀其发行的优秀的替代性民族志系列丛书,该丛书有助于定性研究模糊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的界限。纽约大学出版社(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也发表了定性研究的心理学系列,这属于创造性分析文本。商业和大学出版社越来越不愿意发表老式的自述,而传统的民族志研究者的写作则更有反思性和自我意识性(参见 Thorne,1993)。即使是那些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人也使它通过对话合法化(Whyte,1992)。在整个社会科学界,常规论文都包括那些跨越学科界限的。有些国际会议整个都是有关这方面的实验,例如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的题为"重新设计民族志"的国际会议以及 2000 年度 Couch-Stone 象征互动研讨会等。

至少有三个著名的诠释研究课题中心开设创造性分析实践的课程——分别是伊利诺依大学(负责人是 Norman Denzin),南佛罗里达大学(主要人物是 Arthur Bochner, Carolyn Ellis)和内达华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主要人物是 Andrea Fontana, Kate Hausbreak)。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民间传说研究(Amy Shuman)和教

育学博士课程中的文化研究(Patti Lather)占有后实证主义的较高地位。突破传统五部分结构的社会科学写作格式的论文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被接受。Elliot Eisner (1996),艺术教育者、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前会长,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观点。他建议小说形式应该被接受为教育学博士论文。学术实践中的所有这些变化是范式变迁的信号。

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社会学还是一个崭新的、反思性、批判性领域。而今天,科学社会学已有了自己的理论、方法和跨学科科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性别"还只是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出现。而今天,性别研究已成为社会科学最大的分支研究领域之一。科学研究和性别研究的兴旺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辨明了曾经错误地限制了知识的社会科学的规范性假设。它们真实地讲述社会科学家的日常经历。新的研究领域常从我们生活中出现——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它们为我们理解这个经验世界提供了替代性的视角。

今天,后现代主义批评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与科学研究、性别研究曾经对社会科学的影响非常接近,原因也相似。后现代主义确认了一些阻挠我们在研究中"真实地"去理解的、非具体的假设,它提供了行之有效的不同的实践。我们感觉到它的"真实"——它所具有的在道德、智力、审美、情感、本能等方面的拉力。每个研究者可能对这种拉力的反应不同,这就会导致写作更多样化,更以作者为中心,降低枯燥乏味感。现在真是繁荣的研究时代。有些研究者甚至称他们的研究是精神的。

从目前来看

民族志生活并不和自我分开。我们是谁? 我们能如何写作我们的研究内容? 与这些问题相联系的是:一个知识体系如何规范自身及其成员,它用何种方法宣称对研究主题及其成员的权威性。

我们已经继承了一些民族志研究规则,它们是专断的、狭隘的、排他的、扭曲的和异化的。我们的任务是寻找一些具体实践,通过这些实践我们可以把自己建构为种族民族志中的种族主体——这能激发阅读和写作。某些研究实践涉及理论框架(知识社会学、女性主义、批判种族理论、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内的研究(这些理论框架挑战权威的基础);关于重要的、个人的、集体的主题的写作;写作享受;同时针对不同写作模式和不同读者的写作实验;将自我置身于多种话语和群体之中;发展批判文化;寻找合适方式写作/提出/教授分化较小、声音统一的内容;揭示制度的秘密;运用权威地位增加多样性,包括学术任职和期刊论文发表的多样性;自我反思性;研究的非历史性;询问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情感上或精神上不要在写作表现形式上畏首畏尾;尊重研究工作的嵌入性和宽广性等。

我不知道民族志的创造性分析实践最终会产生什么。但我知道它的地点已选定,基石已放好,脚手架已竖起,各种各样的冒险家已经进驻其中了。

将来如何

本书的编者确实希望所有的作者都预测一下定性研究的未来。我觉得我似

乎也这么做了。尽管抵制,但是……

四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本科生,非常痛恨那个长达一年的课程"西方文明史"——2500年,五大洲,700个国家,6万亿人名、日期、战争和地点。我想期末考试会要了我的命。但峰回路转,考试除了那些天文数字的"客观"题之外,还有一份拿回家做的论文,题目是"历史的未来是什么?"我在那篇不足十页的小论文里写道,历史既是趋向统一又是趋向多元化的。我的论文得了A+。我觉得自己应该坚持这个观点。对于定性研究的未来我也这么看。对于其应用范围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对于其表现形式我们更欢迎多样化。

定性研究的象征将是"文本"——或其他什么同样飞扬跋扈的形象——但是文本的意义和建构则远远超越了写满文字的纸张、电脑屏幕甚至超文本(即两维的或三维的、折射的、分层的文本)。讨论文学与科学的界限将显得离奇有趣,因为"写作"(在未来被理解为任何文本建构)将常规地被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因此,它将遭遇挑战。

写作实践

> 写作,这种创造性的努力,应该是第一位的——至少它构成你日常生活的某个部分。如果你能应用它,它将是上天对你的恩赐。你将会更幸福、更聪明、更活泼、更有感情、心情轻松、慷慨待人,甚至你会更健康,感冒和失望、烦闷和其他病症也会消失。
>
> Brenda Ueland《如果你想写作》(*Want Write*),1938/1987

在下面的部分,我提出了一些运用写作作为知识获取方法的途径。我选择了一些对学生有益的练习,这些练习将写作去神秘化,培养研究者的声音,服务于知识发现过程。我希望它们也有利于健康。这些练习按文本所讨论的主题组织在一起。

比喻

严格刻板地写作一段之后,运用旧的、老掉牙的比喻会使文章轻松、舒服。写作越严格,灵活性就越少,你的观点会被忽略。如果你的写作是刻板的,你就不能"伸展你的想像力",你就会使人厌烦。

(1)在传统的社会科学写作中,理论被比喻为建筑(结构、基石、建构、解构、框架等)。考虑一下其他的比喻吧,比如将理论喻为疾病什么的。用你自己的比喻来写一段话描述理论。用一个非同一般的比喻来概括理论。你"看"到什么不同、"感觉"到什么不同了吗?

(2)用一个替代的、感性的比喻形容"知识"而不是文本中所提到的中心比喻。如果你重新思考/重新感觉"知识",将之放在声音或触觉背景之下,又会怎样呢?

(3)看看你自己的论文、勾出你所用的比喻和形象。通过那些你自己也未必意识到说了什么的比喻你表达了什么呢?你想这样吗?你能找到改变你"看"("感觉")研究资料、改变你和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比喻吗?你的那些混合比喻是针对你自己的困扰还是针对披着社会科学金色外衣的观点呢?

(4)看看拉科夫和约翰逊(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的《我们生活中的比喻》(*Metaphors We Live By*,1980)。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它涵盖了许多日常生活比喻的实例,以及这些比喻如何影响我们感受、思考和行动的方式。日常生活比喻塑造了你怎样的认识/写作呢?

写作模式

(1)选择一篇代表你们学科主流写作规范的期刊论文。其论点是如何展开的?假定的读者是谁?论文如何表现意识形态?作者如何宣称对资料的权威性?作者在哪里?你在论文的何处?研究的主体与客体是什么?

(2)选择一篇代表优秀定性研究的期刊论文。论文是怎样建立在规范的社会科学写作之上的?权威是如何宣称的?作者在哪里?你的论文在何处?研究的主体和客体是什么?

(3)选择你的一篇课程论文,或一篇已发表的你以为较好的论文。你是如何遵循你的学科规范的?你对自己这样做有清醒的认识吗?你怎样写成这篇论文?哪些部分受到教授的表扬?你如何依据这些规范展开你的论述?你是否通过模糊其词、大讲行话、诉诸权威或其他修辞技巧以闪避一些困难的地方?你的写作排斥了哪些声音?你在哪里?你现在如何感受该论文?你建构论文的过程如何?

创造性分析写作实践

(1)参加或组织形成一个写作群体。可以是写作的支持群体、创造性写作群体、诗歌群体、博士论文群体、或其他形式的群体(关于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写作,参见 Becker, 1986; Fox,1985; Richardson, 1990; Wolcott, 1990)。

(2)在一本创造性写作参考书的指导下工作。这类参考书参见:Natalie Goldberg, 1986, 1990; Rust Hills, 1987; Brenda Ueland, 1938/1097; Deena Weinstein,1993)。

(3)加入到一个创造性写作课题组或课程。这种学习经历对于初学者和有经验的研究者而言都很宝贵。

(4)利用你的实地笔记"写作",将之视为一个练习机会,帮助你扩展写作词汇、思维习惯、对感觉的关注,将之视为一个抵御挑剔的科学声音的壁垒。在哪里比在你做研究的过程中更能形成你自我的感觉、自我的声音呢?将创造性写作技巧运用到实地笔记中。你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你所学习到的关于客观性、科学,以及民族志课题的认识。对于我而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不同的内容贴上不同的标签,在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研究的基础上,我运用

四种笔记,这些可能对你有用:

- 观察笔记(ON):这些是具体而详细的。我愿意将之视为我所见、所闻、所感等的非常准确的记录。因为我通过自己的感觉去体验,所以我和情境贴近。
- 方法笔记(MN):这是给我自己的一些信息,是关于如何收集"资料"的——和谁谈话,如何着装,何时打电话等。我写了大量的这种笔记,因为我热爱方法,我愿意为我的研究过程留下日记。
- 理论笔记(TN):这里包括理论假设,后结构主义的连结,对我所做、所思、所见的批评等。我喜欢写这些是因为它们使我的实地记录文本有了替代性诠释和批判性的认识论立场。它提供了一种方式使我免于局限于对现实的某一种理解。
- 个人笔记(PN):这些是关于研究的情感方面的论述,包括我的谈话对象、我的疑惑、我的焦虑、我的快乐等。我想要我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论文中,因为我知道它们影响到我怎样宣称我的所知、影响我所宣称的内容。我也知道它们是理论假设的巨大源泉,如果在某个背景之下我感觉到某种特定方式,很有可能其他人也感觉到这种方式。最后,写个人笔记是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方式之一,一种将写作视为研究方法、了解自我的方式。

(5)写日记。在日记中,写你自己关于研究工作的感觉。这不仅使你的写作更自由,而且它还是关于自我的叙述性写作或关于写作过程的写作故事的"历史记录"。

(6)写一份自传。这可以是关于你如何学写作的故事:英语课程的纲领(主题句?提纲?五段论文?),社会科学教授的权威言论,老师对你论文的评价,你现在如何写作,在哪里写作,你的特殊的"写作需要",你对于写作和写作过程的感情(这个练习亚瑟·博克纳用过)。

(7)如果你想试验唤起式写作,一个极好的起点,就是把你的实地笔记转化为戏剧。看看你运用了哪些民族志规则(如忠于参与者的言论、忠于讲述者和事件次序等),用了哪些文学的规则(例如,讲述者讲述时间的限制,使"情节"发展,通过动作形成人物等等)。戏剧写作需要伦理的考虑。如果你怀疑这一点,那么比较一下将民族志事件写成"典型"事件和将它写成戏剧的差别,在戏剧中把那些将要在人前表演的你和你的主人都设计成角色。谁是那些所讲出来的词语的拥有者?怎样分配著作权?如果人们不满意他们被塑造成的角色又当如何?礼貌的规范被破坏了吗?在这里试验一下你的戏剧之口语版和书面版。

(8)试验一下将深度访谈转换成诗歌来表现。尝试只用讲述者的词语、节奏、人称、呼吸点、停顿、结构和措辞。你在诗歌的何处?关于被访谈者和你自己,你知道了哪些在你写作诗歌之前所不知道的东西?在科学的名义下,你牺牲了哪些诗的技巧?

(9)试验叙述自我的写作。想想图克曼(Barbara Tuchman)的警告吧:"作者

的目的是——或应该是——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我希望读者一直看到书的最末页。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叙述稳定地向前发展,而不是精疲力竭地停下,而研究中的各个项目不能散乱不堪"(*New York Times*,1989 年 2 月)。

(10)尝试写一种文本,运用不同的字体、字型和文本处理。传统的印刷方式是如何影响你的所知和你获知的方式的?

(11)写一个"分层文本(Layered text)"(参见 Lather & Smithies, 1997; Ronai, 1992)。分层文本是一种将你自己放置在文本中的策略,同时也将你的文本放置在文学和社会科学传统之中。下面是一种可能性。首先,写一段关于某个对你特别有意义的事件的自我叙述。然后,退后一步,从你学科的观点看看那个叙述,在叙述中插入——在开头、中间或结尾部分都可以——相关的分析论述或参考,运用不同的字型,不同的页面排列,不同的分页或其他形式来标明文本。分层可能是多样的,用不同的方式标明不同的理论水平、理论、讲述者等等(埃利斯使用过这种练习)。

(12)尝试其他策略写作新的民族志论文在社会科学方面发表。试试"无缝(seamless)"文本,这种文本将以前的文献、理论和方法等遵循有意义的方式组织起来,而不是分成固定部分(实例参见:Bochner ,1997);试试"三明治(sandwich)"文本,在这种文本形式下,传统的社会科学主题就像夹"肉馅"的"白面包"(C. Ellis,个人交流,1998 年 4 月 27 日);或者试试用"结束语"形式解释创造性文本的理论分析工作(参见:Eisner,1996)。

(13)考虑一个实地研究的背景。考虑你在其中所据有的、各种不同的主体地位。例如,在一个商店中,你可能是售货员、顾客、经理、女性主义者、资本家、家长、孩子等。从不同的主体地位来写作研究背景(或该背景中的事件)。从不同的主体地位来看你"知道"了什么?其次,让不同观点之间相互对话。通过这些对话你发现了什么?

(14)考虑一篇你所写的论文(或实地笔记)。你在文中舍弃了些什么?谁没有出现在文本中 ?谁是被压抑的或边际化了的?从这一观点重新写作文本。

(15)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写作你的"资料"——例如,将之写成叙述文本、诗歌或读者剧场。在每个文本中你知道了哪些在其他文本形式下所未知的内容?这些不同的文本形式是怎样相互丰富的。

(16)从你的观点写一篇关于自我的论述(例如家庭中或讨论会上发生的事情)。然后访谈另一个参与者(例如家庭或讨论会的成员),让他(她)讲讲关于这一事件的故事。将你自己视为他人故事之一部分,就像他人是你的故事之一部分一样。你怎样从他人的视角重新写作你的故事?(这个练习埃利斯用过)。

(17)合作写作是一种超越自己自然主义风格和态度的方式。这种练习我在教学中使用过,它对于写作群体而言应该也适合。每个成员写一个关于他(她)自己生活的故事。可以是女性主义故事、成功故事、寻求故事、文化故事、职业社会化故事、现实主义故事、坦白故事,或其他形式的故事。所有人的故事都复印一份给这个群体。该写作群体然后分化为次群体(我倾向于三人群体),每个次

群体合作写一个新故事,关于其成员集体的故事。这种合作可以采取任何形式:诗歌、戏剧、小说、自我叙述、现实主义等。这种合作写作与整个写作群体都共享。然后,所有成员都写作他们关于合作的感觉以及在该过程中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18)记忆工作(参见:Davies, 1994; Davies et al. ,1997)是另一种合作研究与写作策略。群体所共享的故事先是被讨论,然后重新写作,重点关注每个讲述中塑造故事的话语。当更多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时,人们纷纷记起他们自己故事的更多情节,或者形成了新的故事。参与者们发现了他们故事的共同之处,或许该写作就是 Bronwyn Davies (1994)所谓的"集体自传(collective biography)"。

(19)考虑一段你的学术生涯之前或之外的对你深有共鸣的生活。将这种共鸣感用作理解和报告你的研究的"工作比喻"。学生们运用不可预测的透视镜创造了优秀的研究报告,包括运用舞台剧、插花规则、艺术构成和体育报导等来透视他们自己的生活以及他人的生活。从与你生活产生共鸣的地方开始写作为你形成了一种更完整的生活。

(20)不同的写作模式适合不同的观众和不同的场合。尝试写作同一篇论文适应不同的读者,如学术界读者、贸易界读者、普通大众、政策制定者、学术研究带头人等等(Richardson ,1990)。对于那些可能希望将他们的研究结果友好地与被研究者共享的博士生而言,这种练习尤其积极有效。

(21)写作故事的写作(Richardson ,1997),或写作关于你如何碰巧写作关于你的论文的反思性文章。你的写作故事可能是关于学科政治、院系事件、友谊网络、大学同学关系、家庭,以及个人的自传性经历等。写作故事将你的研究工作坐落于背景之中,将那些可能是孤单的或者看起来分散的研究任务和你生活的潮汐联系在一起。写作这些故事使我们想起了自我和社会科学连续的共同创造。

> 意愿就是做一个你已经知道的事——不存在对此事的新的想像性的理解。目前,你的灵魂变得贫瘠和干涸,因为你如此快地、如此高效地做完一件事又做一件以至于你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的观点闪光。
>
> Brenda Veland,1938/1987



Agger, B. (1989). *Reading science: A literary, political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Dix Hills, NY: General Hall.

Agger, B. (1990). *The decline of discourse: Reading, writing and resistance in postmodern capitalism.* Bristol, PA: Falmer.

Angrosino, M. V. (1998). *Opportunity House: Ethnographic stories of mental retardation.*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Ba, M. (1987). *So long a letter* (M. Bode-Thomas, Trans.).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Baff, S. J. (1997). Realism and naturalism and dead dudes: Talking about literature in 11th grade English. *Qualitative Inquiry*, 3, 468-490.

Balzac, H. de (1965). Preface to *The human comedy*, from *At the Sign of the cat and racket* (C. Bell, Trans., 1897). In R. Ellman & C. Feidelson, Jr. (Eds.), *The modern tradition: Backgrounds of modern literature* (pp. 246-254).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42)

Banks, A., & Banks, S. P. (Eds.). (1998). *Fiction and social research: By ice or fir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Barley, N. (1986). *Ceremony: An anthropologist's misadventures in the African bush.* New York: Henry Holt.

Barley, N. (1988). *Not a pleasant sport.* New York: Henry Holt.

Becker, H. S. (1986). *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How to finish your thesis, book, or arti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Behar, R.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Behar, R., & Gordon, D. A. (Eds.). (1995). *Women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chner, A. (1997). It's about time: Narrative and the divided self. *Qualitative Inquiry*, 3, 418-438.

Brady, I. (Ed.). (1991).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Brodkey, L. (1987). *Academic writing as social practi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K. M. (1991). *Mama Lola: A Vodou priestess in Brookly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own, R. H. (1977). *A poetic for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uner, E. M. (1996). My life in an ashram. *Qualitative Inquiry*, 2, 300-319.

Butler, S., & Rosenblum, B. (1991). *Cancer in two voices.* San Francisco: Spinster.

Cherry, K. (1995). The best years of their lives: A portrait of a residential home for people with AIDS. *Symbolic Interaction*, 18, 463-486.

Church, K. (1995). *Forbidden narratives: Critical autobiography as social science.* Newark, NJ: Gordon & Breach.

Church, K. (1999). *Fabrications: Stitching ourselves together* [Online]. Ottawa: Canadian Museum of Civilization. Available Internet: http://www/grannyg. bc. ca/Fabrications/index. html.

Clifford, J.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p. 1-2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ifford, J., &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ough, P. T. (1992).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Crawford, M. A. (1951). *Introduction to* Old

Goriot. New York: Penguin.

Daly, K., & Dienhart, A. (1998). Navigating the family domain: Qualitative field dilemmas. In S. Grills (Ed.), *Do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Fieldwork settings* (pp. 97-120). Thousand Oaks, CA: Sage.

Davies, B. (1989). *Frogs and snails and feminist tales: Preschool children.* St. Leonards, Australia: Allen & Unwin.

Davies, B. (1994).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and classroom practice.* Geelong, Victoria, Austral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Davies, B., Dormer, S., Honan, E., McAllister, N., O'Reilly, R., Rocco, S., & Walker, A. (1997). Ruptures in the skin of silence: A collective biography. *Hecate: A Woman'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3 (1), 62-79.

Denzin, N. K. (1978).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Denzin, N. K. (1986). A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4, 194-204.

Denzin, N. K. (1991). *Images of postmodern society.*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94). Evalua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e poststructural moment: The lessons James Joyce teaches 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7, 295-308.

Denzin, N. K. (1995). *The cinematic society: The voyeur's gaze.*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rrida, J. (1982). *Margins of philosophy* (A. Bas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Shazer, M. K. (1986). *Inspiring women: Reimagining the muse.* New York: Pergamon.

Diamond, S. (1982). *Totems.* Barrytown, NY: Open Book/Station Hill.

Diversi, M. (1998a). Glimpses of street life: Representing lived experience through short stories. *Qualitative Inquiry*, 4, 131-147.

Diversi, M. (1998b). Late for school. *Waikato Journal of Education*, 4, 78-86.

Donmoyer, R., & Yennie-Donmoyer, J. (1995). Data as drama: Reflections on the use of readers theater as a mode of qualitative data display. *Qualitative Inquiry*, 1, 402-428.

Dorst, J. D. (1989). *The written suburb: An American site, an ethnographic dilemm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Edmondson, R. (1984). *Rhetoric in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Eisner, E. (1996). Should a novel count as a dissertation in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30, 403-427.

Ellis, C. (1991). Sociological introspec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Symbolic Interaction*, 14, 23-50.

Ellis, C. (1993). Telling the story of sudden death.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711-730.

Ellis, C. (1995a). *Final negotiations: A story of love, loss, and chronic illne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Ellis, C. (1995b).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Seeing black and white in a small southern town. *Qualitative Inquiry*, 1, 147-168.

Ellis, C. (1998). "I hate my voice": Coming to terms with minor bodily stigma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 517-537.

Ellis, C., & Bochner, A. P (1992). Telling and performing personal stories: The constraints of choice in abortion. In C. Ellis & M. G. Flaherty (Eds.),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pp. 79-101). Newbury Park, CA: Sage.

Ellis, C., & Bochner, A. P. (Eds.). (1996a).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Ellis, C., & Bochner, A. P. (1996b). Introduction: Talking over ethnography.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13-48).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Ellis, C., & Flaherty, M. G. (Eds.). (1992).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Erikson, K. T. (1976). *Everything in its path:*

De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Buffalo Creek floo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Fine, M. (1992). *Disruptive voices: The possibility of feminist research.*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Fishkin, S. F. (1985). *From fact to fiction: Journalism and imaginative writing 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lick, U.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Sage.

Fox, M. F. (Ed.). (1985). *Scholarly writing and publishing: Issue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Frank, A. (1995).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ohock, F. (1992). *Healing pow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eertz, C.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erla, J. P. (1995). An uncommon friendship: Ethnographic fiction around finance equity in Texas. *Qualitative Inquiry*, 1, 168-188.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Glesne, C. E. (1997): That rare feeling: Representing research through poetic transcription. *Qualitative Inquiry*, 3, 202-221.

Goetting, A., & Fenstermaker, S. (1995). *Individual voices, collective visions: Fifty years of women in sociolog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Goldberg, N. (1986). *Writing down the bones: Freeing the writer within.* Boston: Shambala.

Goldberg, N. (1990). *Wild mind: Living the writer's life.* New York: Bantam.

Harper, D. (1987). *Working knowledge: Skill and community in a small sho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ills, R. (1987). *Writing in general and the short story in particula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ooks, b. (1990).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Hurston, Z. N. (1991). *Dust tracks on a roa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2)

Hutcheon, L. (1988). *A poetics for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Jacobs, J. (1984). *The mall: An attempted escape from everyday life.*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Jago, B. J. (1996). Postcards, ghosts, and fathers: Revising family stories. *Qualitative Inquiry*, 2, 495-516.

Jameson, F.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ipson, J., & Paley, N. (Eds.). (1997). *Daredevil research: Re-creating analytic practice.* New York: Peter Lang.

Johnston, M. (with Educators for Collaborative Change). (1997). *Contradictions in collaboration: New thinking on school/university partnership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Jones, S. H. (1998). *Kaleidoscope notes: Writing women's music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Karp, D. (1996). *Speaking of sad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ufman, S. (1986). *The ageless self: Sources of meaning in later lif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Kondo, D. K. (1990). *Crafting selves: Power, gender, and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a Japanese workpl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rieger, S. (1983). *The mirror dance: Identity in a women's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rieger, S. (1991). *Social science and the self: Personal essays on an art for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Krieger, S. (1996). *The family silver: Essays on relationships among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ther, P. (1991). *Getting smart: Feminist research and pedagogy with/in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Lather, P., & Smithies, C. (1997). *Troubling the angels: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Boulder, CO: Westview.

Lawrence-Lightfoot, S. (1994). *I've known rivers: Lives of loss and liberation.* Boston: Addison-Wesley.

Lawton, J. E. (1997). *Reconceptualizing a horizontal career line: A study of seven experienced urban English teachers approaching career en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Lee, V. (1996). *Granny midwives and black women writers.* New York: Routledge.

Lehman, D. (1991). *Signs of the time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fall of Paul de Man.* New York: Poseidon.

Levine, D. N. (1985). *The flight from ambiguity: Essay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ebow, E. (1967).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 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Linden, R. R. (1992). *Making stories, making selves: Feminist reflections on the Holocaust.*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Lockridge, E. (1987). F. Scott Fitzgerald's *Trompe l'oeil and The great Gatsby's* buried plot.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17, 163-183.

Lyotard, J.-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G. Bennington & B.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rgolis, E., & Romero, M. (1998). The department is very male, very white, very old, and very conservative: The functioning of the hidden curriculum in graduate sociology department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8, 1-32.

McCall, M. M., &Becker, H. S. (1990). Performance science. *Social Problems*, 37, 116-132.

McCall, M. M., Gammel, L., & Taylor, S. (1994). *The one about the farmer's daughter: Stereotypes and self portraits.* Minneapolis: Country Characters.

McMahon, M. (1996). Significant absences. *Qualitative Inquiry*, 2, 320-336.

Meloy, J. M. (1993). Problems of writ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qualitative inqui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6, 315-330.

Mienczakowski, J. (1996). An ethnographic 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ensual theater.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244-266).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Mishler, E. G. (1989).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elson, J. S., Megill, A., & McCloskey, D. N. (Eds.). (1987).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Language and argument in scholarship and human affair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Nicholson, L. J. (Ed.). (1990).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Norum, K. E. (in press). School patterns: A sext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Paget, M. (1990). Performing the tex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 136-155.

Pandolfo, S. (1997). *Impasse of the angels: Scenes from a Moroccan space of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tai, D. (1988). Constructing a self: A Brazilian life story. *Feminist Studies*, 14, 142-163.

Pfohl, S. J. (1992). *Death at the Parasite Cafe: Social science (fictions) and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St. Martin's.

Prartis, I. (Ed.). (1985). *Reflections: The anthropological mus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Richardson, L. (1985). *The new other woman: Contemporary single women in affairs with married men.* New York: Free Press.

Richardson, L. (1990). *Writing strategies: 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chardson, L. (1992a). The consequences of poetic representation: Writing the other, rewriting the self. In C. Ellis & M. G. Flaherty (Eds.),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Richardson, L. (1992b). Resisting resistance narratives: A representation for communication.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13, pp. 77-83). Greenwich, CT: JAI.

Richardson, L. (1993). The case of the skipped line: Poetics, dramatics and transgressive validit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695-710.

Richardson, L. (1995). Writing-stories: Co-authoring "The sea monster," a writing-story. *Qualitative Inquiry*, 1, 189-203.

Richardson, L. (1996a). Educational bird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5, 6-15.

Richardson, L. (1996b). A sociology of responsibility. *Qualitative Research*, 19, 519-524.

Richardson, L.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L. (1998).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Where am I now? *Qualitative Inquiry*, 4, 41-48.

Richardson, L. (1999a). Dead again in Berkeley. *Qualitative Inquiry*, 5, 141-144.

Richardson, L. (1999b). Paradigms lost [Distinguished Lecture]. *Symbolic Interaction*, 22, 79-91.

Richardson, L., &: Lockridge, E. (1991). *The sea monster*: An ethnographic drama. *Symbolic Interaction*, 14, 335-340.

Richardson, L., & Lockridge, E. (1998). Fiction and ethnography: A conversation. *Qualitative Inquiry*, 4, 328-336.

Rinehart, R. (1998). Sk8ing. *Waikato Journal of Education*, 4, 87-100.

Ronai, C. R. (1992). The reflexive self through narrative: A night in the life of an erotic dancer/researcher. In C. Ellis &: M. G. Flaherty (Eds.),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pp. 102-124). Newbury Park, CA: Sage.

Ronai, C. R. (1995). Multiple reflection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n argument for a layered accou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3, 395-426.

Rose, D. (1989). *Patterns of American culture: Ethnography and estrangem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Rose, E. (1992). *The werald.* Boulder, CO: Waiting Room.

Rose, E. (1993). *The worulde.* Boulder, CO: Waiting Room.

Rubin, L. B. (1976). *Worlds of pain: Life in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neider, J. (1991). Troubles with textual authority in soci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14, 295-320.

Schwalbe, M. (1995).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sociological poets. *Qualitative Sociology*, 18, 393-412.

Shapiro, M. (1985-1986). Metaphor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Critique*, 2, 191-214.

Shelton, A. (1995). The man at the end of the machine. *Symbolic Interaction*, 18, 505-518.

Shostak, A. (Ed.). (1996). *Private sociology: Unsparing reflections, uncommon gains.* Dix Hills, NY: General Hall.

Simons, H. W. (1990). *Rhetoric in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Sage.

Slobin, K. (1995). Fieldwork and subjectivity: On the ritualization of seeing a burned child. *Symbolic Interaction*, 18, 487-504.

Sparkes, A. C. (1997). Ethnographic fiction and representing the absent other. *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 2, 25-40.

Stack, C. B. (1974).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Statham, A., Richardson, L., & Cook, J. A. (1991). *Gender and university teaching: A negotiated differe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teedman, K. (1986). *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A story of two liv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Stewart, J. (1989). *Drinkers, drummers and decent folk: Ethnographic narratives of Village Trinida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toller, P. (1989). *The taste of ethnographic things: The senses in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St. Pierre, E. A. (1997a). Circling the text: Nomadic writing practices. *Qualitative Inquiry*, 3, 403-417.

St. Pierre, E. A. (1997b). Nomadic inquiry in the smooth spaces of the field: A pref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0, 175-189.

Tedlock, D. (1983). *The spoken word and the work of interpret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Thorne, B. (1993). *Gender pla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Trinh T. M. (1989).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V., & Bruner, E. M. (Eds.). (1986).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eland, B. (1987). *If you want to write: A book about art, independence and spirit.* Saint Paul, MN: Graywolf.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8)

Ulmer, G. (1989). *Teletheory: Grammatology in the age of video.* New York: Routledge.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n Maanen, J. (Ed.). (1995).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 Thousand Oaks, CA: Sage.

Visweswaran, K. (1994).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alkerdine, V. (1990). *Schoolgirl fictions.* London: Verso.

Weedon, C.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Weinstein, D. (1993). *Writing for your life: A guide and companion to the inner world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Whyte, W. F. (1943).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hyte, W. F. (1992). In defense of *Street corner soci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52-68.

Williams, P. J. (1991). *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 Diary of a law profess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C. (1965). *Crazy February: Death and life in the Mayan highlands of Mexi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lcott, H. F. (1990). *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Wolf, M. A. (1992). *A thrice-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u, P.-L. (1997). *Hungry lightning: Notes of a woman anthropologist in Venezuela.*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Zola, E. (1965). The novel as social science. In R. Ellman & C. Feidelson, Jr. (Eds.), *The modern tradition: Backgrounds of modern literature* (pp. 270-28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0)

Zola, I. K. (1982). *Missing pieces: A chronicle of living with a disabil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人类学诗学 37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 伊万·布莱迪

诗学通常与文学研究相联系。但是，它以好几种方式延伸到人类学，尤其当文本被看成“文化作品”的时候更是如此。① 一个明显的联系就是，人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一门文学性的学科，因为它主要通过文字来传递信息。其语言基础使得人类学与传统诗学研究一样，对文本构造、文本权威、符号行为、论说的语义产品，以及，广义上讲，所有关于模仿的哲学性的与批判性的问题感兴趣。其自身多样化的历史使得人类学总是进行着关于艺术和科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位置的争论，并在排斥艺术或人文方法与解释上的科学取向和排斥科学方法的艺术取向这两个极端上形成两大阵营(Fujimara,1998)。总地来说，人类学的自身定位存在于两者的相互妥协：人类学自视为一种“艺术性的科学”(Brady,1990a, 1993)。这种自身定位使得来自其他学科的各种后现代性的挑战成为可能，包括那些以文学和诗学为旗号的挑战。

文化人类学既涵括个人化的研究，又包括系统化的跨文化比较，因而其潜在的诗学根源有更广阔的基础。这就使人类学家得以在出入一些学科的同时发展他们自己的特色研究，研究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其他文化里以及他们同其他文化的沟通中的那些诗化物的内容和形式②。在这些领域里又需要批判性地考虑各种问题，从文化相对主义到关于文化呈现的不同哲学解释。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其他学科的关注，却受到人类学的忽视。其他学科的理论家也在相同的问题上涉入人类学。然而这种相互涉入却被人类学的“文本性”和文本研究的“人类学化”所掩盖③。这同时也导致关于在多大程度上人类学需依赖其他学科而非开创自身适应性出路以解决所面临的挑战的疑惑。比如，关于“论说的社会学定位，展示论说如何在社会政治竞技场上发挥功能、相互竞争、彼此消灭，以及发

① 参看巴彻勒(Bachelard,1964)的“空间诗学”，巴彻勒(Bachelard,1971)的“幻想的诗学”，布朗(Brown,1977)的“社会学诗学”，和哈林(Hallyn,1990)的“世界的诗学结构”。

② 对民族志学者而言，关注与其他文化交流的诗学其旨趣在于田野工作的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参见：Bruner,1984;Prattis,1986;Van Maanen,1988;Manganaro,1990a;Brady,1991a;O'Nell,1994。

③ 参见：Beaujour,1987,p.470;Fischer,1988,p.8;Burke,1989,p.188;Krupat,1992,p.51-52;Robbins,1987;Tarn,1991,p.63;Tsing,1994;Tames,Hockey,& Dawson,1997。

现论说演变的历史"(Fischer,1988,p.8;Krupat,1992,pp.51-52;Taylor,1996)。

在人类学和其他研究诗学的学科中间有一个著名的环节,那就是结构主义。尽管已不再流行,结构主义,这一由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和考姆斯基(Noam Chomsky),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尤其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在本世纪发展起来的流派,对六七十年代的文本研究有着重大影响①。诗学的概念及其研究被永远地改变了,在这一过程中要将人类学诗学划分清楚也成了一件复杂的事②。这些没有令大部分现代批评家失望,他们乐于找寻传统学科间因相互割裂而存在的缺陷。现在,诗学则史无前例地成为了一个跨学科的话题。然而,人类学家的足迹是独特的,辨识它是可能的。即使人类学对诗学的探寻缺乏学科研究一贯性,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考察人类学家对诗学的运用和考察他们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相似研究的交叉点来发现把握其踪迹。

没有完全背离构成文学作品传统权威的那些共同基础,人类学的诗学研究深入到论述的表现性问题,包括仪式和世界观及其与语言和文化的联系,从部落社会到现代剧场,从而它与大多数学科不一样③。民族诗人——那些从诗学角度研究其他文化的文化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诗人——从来不会忽视建构且促成论述的语言,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④。这也是人类学诗学的课题自然地通常成为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学(它们也有自身的科学梯度和精明的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的部分原因;也是解释其成为经验性、严谨的语义学,以及六七十年代人类学中流行的认知人类学关注的话题的原因;还直接是各种话语中心的产物,包括写作。它们被语言的工具性联系在一起。

在文化上对语言中心地位的强调是结构主义和诗学吸引语言学家的一个最初的原因,同时也是早期在民族志学方面对于逻辑实证主义不满的主要诱因。人种学惯常通过掩饰原作者的主观性及其作品的修辞性作为其具有不偏不倚的客观性的借口。研究者们不断加深对田野调查的相互协作性的认识,越来越需

---

① 参见:Levi-Strauss,1962,1967,1969;Riffaterre,1970;Scholes,1974;Culler,1975,1977;Todorov,1977,1981;Harland,1987。

② 参见:Boon,1972;Todorov,1981;Eagleton,1983;Brady,1991a;Brooks,1994。不断发展的"文化研究"领域在这些方面同样避开学术旨趣及学科划分等问题(参照:Marcus,1998)。虽然这个标签更多地用在了别的书籍和文章之中,但是相比较而言,体现在文学杂志《当代文化批评与诗学》以及《美国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人类学与人文主义》中的学术旨趣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③ 参见:Turner,1974,1982a,1982b;Bauman,1977,1992;Schechner,1985,1995;Graham,1995;Dening,1996;Brady,1999。

④ 例如,民族志诗人安汀(Antin,1983)归纳了人们进行口头交流时的各种行为,他写到:"全世界的人们拥有大量不同的语言,人们宣布、问候、告别、恳求、介绍、询问、邀请、要求、命令、劝诱、乞求、鼓励、请求、回答、提名、报告、描述、叙述、解释、分析、教导、建议、服从、拒绝、道歉、责备、玩笑、奚落、侮辱、赞扬、讨论和闲谈。在这些人们的语言活动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普遍的交流类型,这些就是诗学研究的源泉。如果说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民族志诗学的话,那么就是这里。在这些具有普遍性的交流类型当中,所有语言学的发明开始了。我将民族志诗学中的诗学部分作为那些语言学发明与发现的结构,并通过它探究语言系统的转换能力并发现或发明这个世界本身。"(p.451)虽然还不能作出很好地定位以及对文化过程并没有比对文化产品来的关心,但那些已被发现的结构被置于具体的社会中,也就是这个逻辑的和符号的系统将帮助我们找出研究内容的特征和整个文化的社会关联(包括人类学本身——参见:Boon,1982,1984,1989;Brady,1993)。

要更具反思性的分析视角(如在结构主义方面,符号学家 Umberto Eco 和文学评论家 Roland Barthes 等学者提出的受众理论;而在文学作品的歧义性问题上,前苏联评论家 Mikhail Bakhtin 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这些在总体上促进了语言学及人类学的批判性对话。① 这种对话性质的诗学的一个挑战是它"必须首先辨别和组织不同观点之间的联系:它必须对复杂的话语结构系统有足够的认识,这些结构系统和模式塑造了作者对其表达方式的认识,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人种学者们乐于这种辩论是因为这种辩论界定了自觉的跨文化研究和写作的关系及他们所受到的制约。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与文本研究范式的语言学转向,它运用较为严格定义的语言作为人种学调查研究的关键,到目前为止却被证明是不充分的,或者至少是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全的转向造成了当前在文化民俗学的表征和解释方面的论争,在那里存在许多哲学和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②。

诗学的人类学版本延伸入许多其他学科并因而拥有很广的范围。它一方面包括从对诗的自觉的兴趣,如诗人达弗(Dove,1994)的明快描绘,是"使一个个体的内在世界被他人所理解的艺术"。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正如法国批评家保罗·沃勒瑞(Paul Valery)的诗学概念"那些以语言作为它们的本质和工具,实现于创作和写作中的东西"。从众多的角度来连接繁琐的解释框架,人类学诗学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的探求:民俗诗学(ethnopotics)、文化人类学(literary arthropology)、人类学诗学(anthropological poetry)。

民俗诗学

民俗诗学可能是人类学在诗学领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泰德洛克(Tedlock,1992),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将其定义为"在全世界的语言和文化的范围中对话语艺术的研究"。它主要强调"语音形式的交流。说话、交谈或歌唱的声音塑造出箴言、谜语、陈述、悼词、赞辞、祈祷、预言、公告和描述"。这类研究的目的"不仅是分析和解释口头表达,而且是为了通过记录和翻译使这些口头表达的艺术性得以展示"。自 19 世纪 60 年代文化民俗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在美国出现,文化民俗学家们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努力。

诗人民俗学者罗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在 1968 年创造出民俗诗学一词。他被认为是"美国民俗诗学之父"(Tarn,1991,p. 75)。他这方面的大部分极具指导性的思想已被收集成册。他的这些书也表明了来自其他多种学科学者的灵感,包括各种社会科学家、文化民俗学家和诗人[尤其是索罗(Henry David Thoreau),斯坦(Gertrude Stein),庞德(Ezra Pound),雷姆邦德(Arthur Rimbaud)和布雷克(William Blake)],以及其他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家。罗森伯格的其他著

① 更多的有关对话方面的论述请参看:Tedlock,1983,1987b;Hill,1986;Feld,1987;Holquist,1990;Weiss,1990;Brady,1991b;Bruner & Gorfain,1991;Duranti,1993;Emerson,1997。

② 参看:Harland,1987;Clifford & Marcus,1986;Clifford,1988;Fabian,1994;Marcus,1998;Geertz,1998。

作深至口头诗艺的根源，远至 Pleistocene 后期的相关传统，重至剧院的诞生和土族宗教中的诗艺。而一个不变的主题是如何缩小现代思维在"我们"和"他们"之间设置的距离。这种分离是历史性的，而且这些人为的障碍把我们与当今世界的一些原始部落的传统分离开来。作为众多诗论著作的作者，罗森伯格还与泰德洛克共同资助并编辑了激进杂志《民俗诗学》(*Alcherinal/Ethnopoetics*)。这本杂志描述"非洲、亚洲、海洋岛屿和美洲的土族口述艺人作品的纪录和翻译"(Tedlock, 1992, pp. 81-82)。它热诚地发展民俗诗学，致力于将诗学从西方文献的单一传统中解放出来，并探索新的技术以翻译部落社会诗歌。尽管《民俗诗学》已经封刊，他的实验精神仍是当今民俗诗学的一大特征(Tedlock, 1983, 1990, 1992)。

语言人类学家海姆斯(Dell Hymes)，邓肯(Robert Duncan)和奎沙(George Quasha)，人类学家及诗人迪亚蒙德(Stanley Diamond)和其他像罗森伯格一样有一些人类学或语言学训练的诗人，包括安汀(David Antin)和施尼德(Gary Snyder)，他们富有创意的著作对民俗诗学的历史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影响着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所有对这一领域的发展和维续作出贡献的学者。其中一个就是特纳(Victor Turner)。十五年前，当特纳将民俗诗学和他自己关于意识的著作联系起来的时候，他提出民俗诗学使"身体和精神，无意识和意识，种群和个体之间的深层联系"被重新认识，这种联系自人类学的殖民时期就从未被重视过，仿佛它们与研究目的毫无关系(p. 338)。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当西方殖民者力图用西方文化包围非西方哲学和诗学的时候，西方社会对其他文化，世界观，生活方式的了解日益增加。正是这个时候民俗诗学开始复兴并争取对非西方哲学和诗学的理解和尊重。人类学也力图建立起后殖民时代的自我认同。这些努力与人文人类学的领域直接联系起来。①

人类学家及语言学家巴索(Basso, 1988)指出了另一个存在于民俗诗学的主要问题：话语霸权——当我们使用和展示跨文化经验时，表现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和学术形式中的一种文化偏见。巴索指出"越来越多的语言人类学家承认许多美洲土族的口头文献被错误的分析、展示和翻译"。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洲土族故事讲述者的口头文化产品被展示成一段段散文，并用段落和句子来进行划分"。最近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歪曲。"美洲土族故事讲述者经常用一种有韵律的诗句讲故事。这种表达方式在今天的一些印第安社区还在被使用②。"(p. 809)民俗诗学的任务就是决定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这些诗歌形式的存在，并回答各种相关问题："如果有一个正确纪录的文本，和对该文本使用语言的了解，分析应该如何进行？应使用哪些理论框架，以及该如何修改这些

---

① 例如，参看：Tarn, 1991; Wilk, 1991; Scott, 1992; Brady & Turner, 1994。

② 参看：Rothenberg, 1981, 1985; Swann, 1983; Tedlock, 1983; Tedlock & Tedlock, 1985; Kroskrity, 1985; Sherzer & Woodbury, 1987。关于民间讲述的人类学，参看：Jackson, 1982; Swann, 1983; Sherzer & Woodbury, 1987; Narayan, 1989; Abu-Lughod, 1993; Basso, 1995; Graham, 1995; Candre & Echeverri, 1996; Reichel-Dolmatoff, 1996。

理论框架?"(Basso,1988,p. 809)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横扫人类学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所面对的许多后现代挑战。核心的考虑是文化和历史定位,即对任何事我们都无法采用一种超文化或者说是纯客观的视角。因此学术著作的许多问题显得不可避免,如文化构造性、修辞性、喻意性、立场的强化、不完美带来的混乱,等等。这些不足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并有待更多的讨论。

文学人类学

人们不断地探索着人类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②,格尔兹在人类学领域开创性地对此提出了一些主要观点(1973,1983,1988)。同样的,Hayden White 所注重的"历史的内在文学性"观点也明显地预见到了现在一批理论家和历史学者阅读人类学作品的方式,即需要将创作当作文本纳入到研究中去。因此,是"格尔兹近二十多年来的人类学作品大致确定了人类学最终的但又略显模糊的特性,他认为文化间的互动本身是符号性的,是一套能为跨文化读者所理解的符号系统。"(Manganaro,1990b,p. 15)如果继续探究这个问题,无疑将对人类学目标与研究策略方面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但人类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的关联在有些领域还没有得到深入地研究:"我们有太多的理由需要去重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共通之处,我们已经了解将文学转换成非文学知识的极大可能性。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些不同学科的边缘地带存在着模糊与矛盾"(Miner,1990,p. 12)——在那里存在着问题的主要方面:混乱的边界。然而现在,针对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对象——"文本"与"文化作为文本"——一些人类学家依据格尔兹的理论预设认为,他们的学科在功能上可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的形式,这与那些已进入文学领域主流的批评形式并没有本质区别③。著名的人类学批评家马库斯(Marcus,1998)超越了那种将民族志视为仅仅是理解性地跨文化描述的幼稚观念,他同时赋予诗学以审美价值与权威。他说:"当我们将手头的作品加以艺术化之后,我们的表述将是一种文化进程中的具有权威的表述"(p. 68)。总之,此类作品具有寓言的特征(Clifford,1988),并且是多层次的,它们承载着各种文化特质和政治诉求,这些特质与诉求都体现在"文学现实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术语"之中(Feld,1987,p. 190)。"解释人类学"中为大家所关注的热点皆来源于此类

---

① 参照:D. Tedlock,1972,1985,1987a,1991,1993;Culler,1977,p. 8;Riffaterre,1984;Sherzer,1987;Graham,1995。

② 如果本质上不是文学的话——参看:Spradley & McDonough,1973;Langness & Frank,1978;Dennis & Aycock,1989;Handler,1983,1985,1990;Handler & Segal,1987;Richardson,1990;Benson,1993。

③ 参看:Marcus & Fischer,1986;Handler,1983,1985,1990;Handler & Segal,1987;Fischer,1991;Marcus,1998。

诉求①。

通过思考那些重要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考察作为文本的文化间互动的平衡问题,田野观察者必须学会如何真实地"阅读"②。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马库斯和其他几位人类学家就开始花费大量精力去研究隐喻的效用,去了解文学方法和理论如何才能恰当地运用于他们的作品,运用于对其他文化的研究,包括对特定的地方口语的研究③。同时代的那些丰富的第三世界文学作品是另一类分析对象,这类分析将民族志批评与文学批评结合在一起(Marcus & Fischer, 1986, p. 74)④。这样做非常重要,"不但可以作为一种导向或作为该领域的发展需要,而且还预示了一条可行之路。通过这一途径,民族志的形式可能得以改观,从而能更好地反映各种文化体验,找到既可运用于本土作品创作又可运用于民族志学者田野工作的那种表述方式"(Marcus & Fischer, 1986, p. 74),并且最后会"发展成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批评形式"(Marcus & Fischer, 1986, p. 1;亦参见 Williams, 1998)。

这项工作已在各种民族志与历史学的语境中得到批判性⑤地和创造性⑥地拓展。但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强的文学性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作为一个人类学家该"如何书写"以及"小说在现实主义民族志中的定位"问题(参看 Banks & Banks, 1998; Ellis & Bochner, 1996; Rapport, 1997)。格尔兹(Geertz, 1988)第一个提出了人类学作品中存在的不可避免的虚构性问题。这种虚构性是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事物是建构出来的"。这种虚构(建构)并非不真实,只是不能避免其某些虚构的特征,因为我们通常是选择一种类型的真实作为解释模型或者仅仅因为曾经"来过这里(been there)"就宣称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具有了解释的权威。民族志的权威应该源于一种更具创造性的自足的历史与文化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作者是一个自然的交谈者,在共同建构起来的谈

---

① 当然,主要的特征就是"解释性"。此外,解释人类学作为当代哲学与社会科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组成部分无需:①反经验主义(任何学科若没有经验基础怎么能成立呢?)②反客观性(参见:Brady, 1991b; Rorty, 1979, pp. 361-363; Spiegelberg, 1975, pp. 72-73),或者③反科学性(参照:Barrett, 1996; Holton, 1993; Jennings, 1983; Knauft, 1996; Lett, 1997; Maxwell, 1984; O'Meara, 1989; Sangren, 1991; Shankman, 1984)。但是可靠的社会科学拒绝教条的经验主义,因为这会使注意力过分集中于行为而在一定程度阻碍对意义的研究(参看:Brady, 1993, p. 277, n. 28; Fernandez, 1974; Polanyi & Prosch, 1975; Rabinow & Sullivan, 1987)。

② 特别是模仿格尔兹对巴厘岛斗鸡的典范性的观察。

③ 参看:Marcus & Fischer, 1986, p. 72; Marcus, 1980, 1998; Marcus & Cushman, 1982; Boon, 1972, 1982, 1989; Clifford & Marcus, 1986; Fernandez, 1974, 1985, 1986, 1988, 1989。也参看:Fischer, 1988, 1989, 1991; Fabian, 1990, p. 767:如果作品是对他人文化和政治压迫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继续写作,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助纣为虐; Manganaro, 1990a; Tam, 1991; Karp & Levine, 1991; Said, 1991 & Krupat, 1992; Marcus, 1993。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即在对其他民族生活和习俗进行民族志学描绘过程中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方面,对 Krupat, Mascia-Lees, Sharpe, Cohen(1993)进行了评论。

④ 参看:西尔科(Silko, 1977)和摩麻戴依(Momaday, 1989)的畅销小说,以及施莱特尔(Slater, 1982)关于巴西"*literature de cordel*"的民族志学阐释。

⑤ 参看:Dennis & Aycock, 1989; Rosaldo, 1989; Manganaro, 1990a; B. Tedlock, 1991; Brady, 1991b; Benson, 1993; James et al., 1997; Marcus, 1998。

⑥ 参看:Feld, 1982; Jackson, 1986; Turner, 1987; Dennis, 1989; Fox, 1989; Stewart, 1989; Richardson, 1990; B. Tedlock, 1992; Gottlieb & Graham, 1993; Limon, 1994; Behar, 1993, 1996; Stewart, 1996; Dening, 1998a, 1998b。

话中与对象交流感受。这种对话直接的就是一种“创作行为”(Geertz,1988);民族志知识实际上是“由写作习惯所创造的”(Fabian,1990,p. 762)。由于一般的民族志作品总是着力于对人们生活的记录,这在本质上使此类作品与文学和历史的作品不同(Manganaro,1990b)。但是,除开民族志作品对客观性的要求及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民族志创作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在其内容基础上的自然地或有机地拓展;人类学家“或者致力于先在的叙事结构,或者创造出一种与旧形式不同的新的结构”(Manganaro,1990b,p. 15)。因为不允许通过未结构化的文化或语言学途径讲述事实(因为就历史而言,没有一个故事的结构是无条件的),并且由于其根植于人类学田野工作模糊的跨文化边缘地带,所以民族志的表述可借助这种边缘的模糊性,针对任何话题作出各种强有力的阐释。作为一个“含糊的文本”,①民族志有能力对其研究领域进行进一步地拓展。

由于企图淡化作者的角色、小说的定位以及民族志现实主义传统中含有的文学因素,这彰显出该领域两个未经细致考察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新的,另一个问题是原有的,并有可能出现第三个问题。第一,它显示了一种需要,即批判性地重新审视人类学中唯一成形的诗学流派——民族志小说的作品结构及其现实主义假设②。第二,人们在人类学的很多方面都进行着积极地探索,希望能采取更文学化的方式来促进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民族志经验的交流,包括那些“作者意识(writer consciousness)”浓厚的文学形式(举例来说,作者意识是指与实证主义传统相反,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者和行动者的面目出现)③。虽然现在针对这一话题已有很多不同的表述④,但到目前为止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最为著名的当属 Levi Strauss(1961)的 *Tristes Tropiques*,该书为坚持探索这一人类学主题作了基础性的工作⑤。它“作为一个人类学文本极大地影响着当前人们对人类学存在的表述问题所作的本质性的思考”(Manganaro,1990b,p. 17)。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方面就是当前在民族志和历史学研究中⑥,人类学家更加警惕于他们作

---

① 相关的涉及文本权威和民族志学表述的读物可参看:Geertz,1973,1983,1988,1995,1998;Lanser,1981;Bruner,1984;Fernandez,1985,1986;Webster,1986;Fabian,1990;Weinstein,1990a,1990b;Simms,1991;Tsing,1994;Dening,1996,1998a,1998b;Rapport,1997;Banksh & Banks,1998。参照:Taussing,1993;Motzafi-Haller,1998。针对近来的一种争论,即在历史上的民族志学是谁在为谁说话,可参看:Obeyesekere,1992;Sahlins,1996;Borofsky,1997。参照:Brady,1985。

② 参看:Lafarge,1929;Bohannan,1954;Turnbull,1962;Stewart,1962;Matthiessen,1963,1975;Kurten,1980;Thomas,1987;Handy,1973;Thompson,1983;Jackson,1986;Knab,1995。参照:特纳论文集中的有关论述。

③ 参看:Turnbull,1962,1972;Rabinow,1977;Dumont,1978;Crapanzano,1980;Turner,1987;Dennis,1989;Dennis & Aycock,1989;B. Tedlock,1992。

④ 可特别参照:Gottlieb & Graham,1993;Fischer,1988;Beaujoir,1987;Tarn,1991;Wolf,1992。

⑤ 塔恩赞同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他也许是一个有创新力的作者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功,“他选择了那样一种表达方式”(p.56)。曼加那罗(Manganaro,1990b)补充道:“*Tristes Tropiques* 中那种创作意识不仅体现于作者所采取的文学形式上,还体现在作者在研究其对象时所采取的恰如其分的视角”(p. 16)。另外值得注意的是,Levi-strauss 因为其他作品中的形式主义而广受指责(参看:Eagleton,1983;Geertz,1973,pp. 345-359;Harland,1987;Prattis,1986;Boon,1972,1982;Brady,1993)。博学的列维·斯特劳斯看起来曾经涉及了所有的基本问题。

⑥ 这一主题在邓宁(Dening,1980,1998a),格尔兹(Geertz,1998)和博罗夫斯基(Borofsky,2000)那里也显而易见。

为作者和评论者的角色，同时也更警惕于其创作的作品和所作的评论，特别是涉及人类学方法和理论方面①。

第三，这种新的对创造性结构的重视以及对人类学文本不可避免的复杂性的持续关注，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认识论的混乱。它不但使实证主义与所有后来的解构主义的"取消"相对峙，而且还意味着现实主义传统中作品的"背景意义"的失败，是对那些虚构的科学信念的直接挑战（参照 Barthes，1972）。与科学不一样，文学或诗学将对信息的形式而不是内容的强调当作其主要的任务。在形式主义者看来，我们可在任一文本中找出其文学性并把它称作诗性，诗性指的是一件作品本身的语言特性及其通过自证性的语言形式捕捉对象的尝试（参看 Jakobson，1987）。一个极具诗性的文本，不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在此种意义上其形式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蕴涵了一些不可言传之意；尽管采取的途径不同，但值得肯定的是那些符号涵盖了被表达之物而又没有放弃其基本的与更真实的科学表述相交流的功能（参看 Levine，1987，1994）。观察者想不经过自身而直接去关注所研究问题的"客观面"，这种写作企图实际上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源于一种特殊的假设和愿望，即企图将"文化"转变成"自然"。它将规则和权力等因素隐藏在符号之后，想使它们不为人所见（Brady，1991a，p. 216）。如同艺术，自然科学的叙事是在各种独特的文化习俗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交互产生的。作者以一定的方式运用特定语言代码重构它们，并通过读者的能动阅读过程，使文本的意义最终得以呈现。在这种交互作用中，一个概念可以获得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它缺少确定性，变成一个可操纵的文化符码，我们在追寻它的源头及通常用法之余，发现其语意边缘总是"暧昧"的。所以它不可能是建立在虚构客观性基础上的脱离了文化的纯粹观察。

当然，自然科学需要语言，但它不像文学那样声称或把自己当作是一种"内在（within）"的语言。一名卓越的诗人犹如一位"忘我的艺人"或一位"倾情独白者"，在其文本中体现出语言的"技艺"（诗人的独特感悟表现在诗歌的语言和形式上，只有通过对这种独特感悟的把握才能达到对诗及诗人的理解）。而学术论文的作者则尽力避免表露私人感情（Geertz，1998—）。由于各种不尽相同的写作模式所导致的作者与文本间的割裂，是一个创作上的难题。这也包括当前民族志作品中小说的创作。作者与文本间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对"时间框架"的争论（我们是"现在"而他们是"过去"）②，更不必说在各种过度抽象了的哲学假设方面也存在着分歧，包括观察与交流过程中"客观如实反应"的可能性以及各种相关的客观性问题（Rorty，1979）。所以需要寻求一种恰如其分的语言，藉此现代科学可以了解并把握自身，使其无法言传的部分得以表述，巴希斯总结说（Barthes，

---

① 参看：Fox，1991；Poggie，De Walt & Dressler，1992；Borofsky，1994；Barrett，1996；Jessor，Colby & Shweder，1996；Knauft，1996；Denzin，1997；Lett，1997；James et al.，1997；Layton，1997；Rapport，1997；Marcus，1998；O'Meara，1997。

② 在这问题上重要的评论参见：Wolf，1982；Fabian，1983；Borofsky，1987，2000；Thomas，1989，1991；Dening，1995，1996。

1986):这只能由创作来达到,而这本身就是个语言问题。

自从德里弗斯和莱比诺(Dreyfus & Rabinow,1983)对福柯的思想以及相关的人类学观点进行挑战之后,解释人类学批评的哲学依据以及文本间的转换开始变得困难①。任何对解释人类学与现代科学的真诚地融合(并且,某种程度的与考古学、物理人类学融合——参见 Hodder,1986;Tilley,1990)将不得不解决一个历史性问题,即人类学中认识论旨趣的消解,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起联接。文学人类学作为文本研究中浮现的批判传统的一部分,如果它背离现代科学本质上的解释旨趣,武断地放弃对表述、历史情境和作者等方面的关注,那么它将面临类似的境地。如法比安(Fabian,1990)所言,民族志中对话和诗歌的概念已触及关于融合他者的核心。但是它们只有一条途径来改变民族志的面貌,即只有通过文学的途径,通过辩证的实践的而非仅仅是讲述的途径(p.766)。另一方面,许多参与人类学文学转向的人并没有兴趣用任何方法、理论或语言来中断这种联接(Brady,1991)。在我们试图得出别的结论之前,这是一个备受争议但却更具创造的转向②。有一些为各种激进人类学所主张的观点,比如"人类学是欧美帝国主义时代的侍女"等,奈斯(Nath,1991)认为人类学研究也许可被较为恰当地设想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我们应该坚持这种观点而不应将其提升为"阿基米德式"的基本事实或伪装成一种自感优越的知识来作为一种压迫手段(p.57)③。人类学诗学作为社会科学中一种极富人文主义的独特文学实践已然在我们眼前浮现。

人类学诗学

如果民族志诗学是诗学领域里最显著的人类学活动,那么从相反角度可将人类学诗学定义为是在人类学领域里最显著的诗学活动④。这项工作涉及各种跨文化主题,需要很多从事过其他文化领域所得的经验和各种文化素养。它最显著的特征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内容。在人类学背景下,诗的语言符号包含着对这个世界以及我们所处社会的性质的解说(Brady,1991)。通过诗的描绘,

---

① 参看:Rabinow,1983,1984,1986;Jarvie,1983;Wuthnow,Hunter,Bergesen,Kurzweil,1984;Ulin,1984;Rabinnow & Sullivan,1987;Boon,1982;Swearingen,1986;Loriggio,1990;Brady,1991a,1993;Duranti,1993;Rapport,1997;可参照:斯科尔特(Scholte,1966)较早的思想和近来戴维斯(Davies,1999)致力于人类学认识论的一些敏锐而又可行的论点。

② 可参看:莱克(Reck,1978)的墨西哥人类学。罗斯(Rose,1993)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类型"人类学的消亡和多元化、诗化人类学的诞生的论述。布恩(Boon,1982,pp.9-12)对此种新人类学存在的混乱以及弗莱泽(James George Frazer)略带空想色彩的对新发展的人类学作为民族志学所存在的特殊方面的论述。伯克(Burke,1989,pp.188ff)认为人类学家需"认清存在于自己研究领域内的修辞学因素"(Marcus,1980)。布恩(Boon,1982):现实主义民族志学中有要求"逼真"的原则,那么各种跨文化类型和流派要"具有说服力"同样存在标准问题(p.21)。

③ 更多的像语言游戏或类似的着眼于结构的相关有用的资料可参看:Gellner,1984;de Zengotita,1989;Denzin,1997;Gellner,1998。

④ 在语言学中这两方面就并不是这样,参看:Napoli & Rando,1979;Bright,1983,1985。

虽然在时间的精确性和事件的条理性方面会带点虚构，但人类学诗学总是力求以本真、可信、灵动的方式表现各种跨文化领域的实情及其间的事件（参看Flores，1982，1999；Prattis，1986）。诗的目的并非仅仅为其自身、在其自身或仅仅只是娱乐，它充分发挥其语言特性同时又力求不丧失其表达的历史真实性，从而构成了一个悖论①。但，是诗歌的语言形式使诗歌具有了诗性，而非其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内容。这又涉及作者的自我意识问题，作者在表达中应该或必须涉入多少这种自觉意识从而才能超越传统上科学作品（或观察）有别于其他形式作品的那个界限。

诗学指向审美，涉及意义的生成，在这些意义的基础上我们得以行动与求知（Brady，1991b；Flores，1985）。诗学审美意义的生成可具有各种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诗歌，甚至也不全然排斥坚持相反旨趣的科学观察。虽然诗歌并非科学也不希望成为科学（Diamond，1986c，p. 132），但至少有一些科学作品的作者——民族志学者他们本身同时也是人类学诗人。虽然具有其他多种表述方式，人类学家还是倾向于接受诗歌这种表述方式。人们总是希望发现和探究事物（包括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关系）的多种表述方式。作为多元的表述方式之一，人类学诗学也成了一条描绘事实的有效途径。但是笛卡尔主义批评家提出另一看法：通过诗歌来描述田野调查，那是在以主观形式从事一项客观工作（Tarn，1991，p. 246）。在这一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更多的是以“也许是这样”“可能是这样”而非“就是这样”的形式出现，所以用这种方法研究现代科学和民族志是很成问题的。

过去，诗歌并未受到排斥而在真理领域内占据着较现在远为重要的位置②。2 400年前，亚里士多德赞赏诗歌从历史中获得了普遍的鉴别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具有更高的科学性。以诗歌为媒介，历史经验不会变得更易于理解，它们反而显得更不确定，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却变得更为凝练因而也更为有用（Collingwood，1956，p. 25）。然而，作为一种方法，由于它有悖于启蒙主义精神而被拒绝，首先是因为在一些“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历史追问面前它主张“涵盖事实”而非拘泥于“事实本身”；其次它主张为科学家所不能认可的独立于时间之外的“第五维”（Graves，1971，p. 35；Bruner，1986，p. 52）。这样一来，要将诗歌重新

---

① 悖论的另一面即是困境。正如保罗·迪·曼（Paul de Man）曾经分析的：“语言在本质上试图把握住事物，但绝不可能达到客观事物本身。诗的语言的功能只在于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激活。它总是建构性的，它能不顾及存在而进行表述，但也相应地除了表现出意识的意图之外，它不能为其所表述的内容提供任何基础。”（引自Donoghue，1989，p. 37）

② 参看温德勒（Vendler，1985，1988）关于诗多变的边缘的论述。并非所有的文化都会认同美国人对诗本身就不甚可靠的看法，参看：Bishop & Brasil，1972。洛德（Lorde，1984，p. 87）认为诗并非化美之物，塔恩（Tarn，1991，p. 15）认为诗是人类“生存的价值”，拉维（Lavie，1990）和贝哈（Behar，1993）关于使诗及诗的精神摆脱压迫性背景方面敏锐而丰富的表述。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4）认为诗是一种“分析社会的可行而有力的方法”（p. 522）。

引入任何经验性研究(如人类学和社会科学)都存在着极大的困难①。

因此,诗歌就对人类学构成几个方面的挑战。除研究诗歌的作用、文本的对话形式、特定文化中其形式的多样性等之外,这些挑战还涉及一种创作风格的产生。这一风格力图在系统整合诗歌的各种特性(首要的是凝练性、美学功能、作为手段的隐喻的实际运用)的同时并不牺牲掉民族志本身的特质。在创作人类学诗歌时,作者力图通过文本唤起读者类似的生活体验。这基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假设:基于某种存在的本质,所以人的思维具有普遍的共通性;我们所遭遇的人在观察、思维和叙述等方面与我们存在着同构性(Shweder,1996)。

也许有人可以将如上我们对于诗歌这种表述方式的分析套用到其他所有形式的表述上,但不可否认成功的诗歌作品能在不同的人身上唤起最切身的体验。交流的困境在于事先总是预设了一个一般的中介,但是正如在一些个案(常见于诗歌)中所清楚看到的,交流的目的在于情绪的宣泄,故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激发人们特定的社会性体验(Bourdieu,1991,p. 3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通过诗歌、小说还是戏剧,人类学家邀请我们感同身受"他者的体验,并借用隐喻的魔力达到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深层了解"(Coward & Royce,1981,p. 132)。人类学家(有些本身就是诗人)将这些看作是一种"内在的表述"而非对"价值无涉"的挑战,正如前面所提到过的,这些是人类学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与其他一些人类学家一样,格尔兹因其出色的作品而广为人知③。但是在这一学科内并不存在堪称典范的作品。实际上如前所述,尽管很多人反对学科限制以及社会科学的死板术语而希望自己的作品更为公众化,但是并非所有的人类学家在为找寻更合适的人类学方法而努力。"太过文学"总被视为是在破坏科学的权威④,而这类作者也会被归为"错误"的知识分子阵营,这样就会严重阻碍

---

① 塔恩(Tarn,1991,p.254)视其为一种存在于学术领域间的张力,诗的个人性、政治性与哲学性因素是融入其中的主要障碍。但值得提醒的是,这个看起来无法克服的困难并没有妨碍伟大的艺术家同时又是伟大的科学家(反之亦然——例如,歌德。参见:Gould,1991)。一方被认为没有资格加入另一方(Brann,1991,p. 775),当艺术与科学间的差异被过分夸大时,想象力与推理被视作是敌对的,在这一敌对中存在着以局部代替整体(或反之)的错误(参看:Brady,1991a;Byrke,1989,p.87)。

② 参看其他的人类学人文主义及作品:Wilk,1991;Brady & Turner,1994;参照:Harris,1997,p. 293;Lett,1997。

③ 参看:Levi-Strauss,1961;Turnbull,1962,1972;Van Lawick-Goodall,1971;Harris,1977,1987;Dening,1980;Sahlins,1981,1985,1996;Jackson,1986;Tomas,1987;Rosaldo,1989;Narayan,1989;D. Tedlock,1990;Rose,1993;Behar,1993,1996。法比安(Fabian,1990)曾不无挖苦地写道:"格尔兹因在人类学中启发了一种新的文学意识而受到推崇,其主要原因并非在于他与文学评论家有什么深交,而在于他敢于这样写并玩转了。"(p. 71)弗南德兹(Fernandez,私人交谈,1998 年 2 月 27 日)谈到他自己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1974,1986)时说:格尔兹首先是一个精通隐喻的人。

④ 但是将艺术与科学各自单独出来并且分别发展的话,能够产生很大效果。写小说、诗歌或者非常"文学"的论文集的科学家仅仅看起来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声誉(参见:Levi,1984;Lightman,1993;Sagan,1980,195)。当被问及他的诗歌创作是否促进了其科学研究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兼诗人霍夫曼(Roald Hoffmann)说没有,至少没有直接的关联。写诗对霍夫曼来说能使他感觉自己作为一个人更为完善与人性化,这极大地帮助了他的科学研究(私人交谈,1997 年 2 月 26 日;Hoffmann,1987,1990a,1990b,1995)。即便艺术与科学在实践中是分开的,或在人文主义术语中具有各自的定义,但无法否认两者在功能上的关联。这种功能上的关联也许是不直接、不明显的,并且缺少研究与探讨,但它一直存在着。

他们的学术生涯,在申请研究经费、职位提升以及其他方面受到利益损害(Fabian,1994,p.100;Taussig,1987)。就整个人类学而言(其兴趣在于保存四个分支学科的特征: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物理人类学和语言学人类学),真正的危险在于夸大了的"作者中间主义(author-centrism)"因其本体论意义上的表述、创作及文学形式导致民族志滑到纯粹的修辞学和美学方面(Fabian,1994,p.91)。这样也许会取消客观性问题,客观性是能将传统的科学旨趣与发展的诗学及民族志所需的认识论研究相调和的极少数途径之一,然而这在后现代人类学中已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Fabian,1994,p.91;Megill,1994;Tiles,1984)。我们不得不面对无时不在的如何才能更为有力地表述以及如何选用恰当词汇等问题(Rorty,1981,p.158;Abrahams,1986;Brady,1991b)。

当前的人类学作品殊为可哀、不忍卒读,充斥着自说自话、乏味的术语和乱七八糟的偏见,它需要更为广阔的视角。塔恩(Tarn,1991)认为,后起之秀当中如果有人有不俗表现的话,那是因为他远离学究气太浓的所谓人类学主流并选择人类学诗学的立场。现代人类学应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重新整合其科学研究与人文主义。它应该注重民族志的方法,超越纯文学叙述而努力兼具科学与文学的双重特性,但主要的还是文学特性,从而更适合那些具有一定文学素养的读者(Tarn,1991,p.57)。塔恩(Tarn,1991)尝试性地称某些作者的特殊叙事技巧为"自我人类学(auto-anthropologies)"("个体民族志"、"反思民族志"等,参看Crapanzano,1980;Dumont,1978;Rabinow,1977),他认为这种努力与他的观点近似:"这一流派一直在寻求诗歌与人类学的完美组合(不丧失各自的独立性,也不排除其他任何一种可能性),而要达到这一点,不在于那些无法超越'纯文学'的人类学家而在于谁还拥有着诗性。这是一个语言表达方式问题,即既不失其科学的精确性又要能深入挖掘其文学潜质。而这无疑又像是一种乌托邦,寄希望于诗学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乌托邦,但除此之外也许就更没可能了。"(p.256;Richardson,1994;Rose,1991b)

作为诗人,人类学家仍然必须顾及其读者。对于读者这一问题,诗歌是考虑精英,譬如人类学家,还是作为一种扩大化的民族志传统形式,尽可能多地面向大众(Tarn,1991,p.64)?在市场方面,一些诗人的社会科学作品因其文学性而使其作品品质遭受怀疑,不受人们的欢迎①。但真正的衡量标准又是什么呢?什么样的诗歌才算真正的好或坏?当然也有人在这方面早有整套的理论,从很早开始就有一些批评家以该领域的专家自居并不断地品头论足。在此我不想对他们进行细致分类,特别是他们的职业水平(虽然这与本讨论是相关的)。我更关注里查兹(Richards,1929)的思想,他认为喜欢"好"诗和不喜欢"坏"诗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运用两者作为工具来拓展我们的思维。我们应尽力挖掘诗的潜质而不必去鉴定它的好坏、对错(p.327)。读者在欣赏诗的时候,通常是能动地把诗的形式和内容与自身的情感体验和审美倾向相结合。也许对某

---

① 当然有些例外,参看:Friedrich,1979a;Diamond,1982,1986a,1986b;Prattis,1986;Fox,1989;Stewart,1989;Tedlock,1990;Richardson,1998a,1998b;Flores,1999;参照 Hall,1988。

一具体诗作的价值我们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评估,但对总的诗歌而言我们是得不到一个彻底答案的。因为对诗的理解更多的需要依据特定的情境,同一首诗在不同的个体和不同的文化中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

尽管如此,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最好的诗能够触及你内心某些东西———一种感觉或激情,它超越表象到达你的深心。最好的诗也许它并不带有明显的预言性,却可以带给人深刻的启示与丰富的灵感①。民族志或跨文化的诗歌其有别于其他领域从而得以确立自身的最显著的一点可能就在它们的效果上。由于诗的语词及其独特形式,通过移情,诗歌唤起了人们心中相似的体验。它把握住了人类的普遍性并且透露出某种信息[如罗斯(Rose)1991 所言]:也许我们都是夏安人、阿拉巴霍人和图瓦卢人。最好的诗人能将事物转变为理念,转变成我们社会行动的基础(参看 Rothenberg,1994)。

近来,作为人类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社会活动家的迪亚蒙德(Diamond,1987)在反思美好、丑恶以及诗的升华问题[他质疑基茨(Keats)的一句名言:美丽的事物乃永恒之快乐!],他写到:

> 仅仅增加因美的体验而带来的满足并不足以使人达至巅峰体验。巅峰体验属于超验与文化精髓同时相结合的产物。语言本身是人类的奇迹,是文化的媒介,而文化是沟通的桥梁。客观地理解人的本质,那就是人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文化是意义建构的场所:它描绘了人类社会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地不断创新的奋斗历程,它见证了人类努力建造文明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没有确定性,只有挣扎、尝试、痛苦和感悟。幸福、满足或快乐远非常态,但是我们可以"遭遇"快乐。这种快乐可以在"李尔王"那里找到,他挣扎并陷入言词的漩涡,快乐存在于言词中,存在于他敏锐的感受力中,存在于他对自然及人性弱点的挑战之中。快乐在于挑战在于意义的获得。或是看到负罪的俄狄浦斯那最后沉重的脚步;或是索福克勒斯在一缕阳光中的消散;或是在温尼贝戈人仪式最后,那个忍辱负重的个体最终达到大解脱的那一刻;或是在原始部落所常见的成人仪式上,在那里成长需要忍受痛苦、权力需要努力挣得、"往昔"艰难地与"现在"结合,个体期待着下一次仪式的到来,因为藉此他可以在本部落中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快乐。是这种快乐而不是 Keat 的"美好之物"让人得到巅峰体验。它超出一般审美的界限,打破所有审美方面的正式规则,也越出了一般浪漫想象的范围。我们并不在此讨论想象力的问题,而是讨论体验及其意义的生成问题。最后,我在此谈论的是某种言语之外的神圣之物,但它也只能通过语言才能得以呈现(参看 Burke,1958,pp. 270-271)。

那些真诚而又善感的作者尽力运用手头的语言来把握存在的多样性。民族

---

① 利维特(Leavitt,1997)正在从事一些开创性的工作,涉及诗与预言、语词与权力、预言性的散文与迷醉的经验,从审美的情感的反应到基本的生理的反应以及在仪式、政治、治疗和各种救世运动中不同的文化表达。也参看:Abu-Lughod,1986;Trawick,1988,1997;Dobin,1990;Csordas,1997。

志诗人抛开那种严格的客观分析形式而致力于此种尝试。在所有这些尝试中存在着很多不同:如果是一位艺术家面对一个对象,他相信自己能够诗意地将其表达出来,使这种人类的情感体验不至于受到经验主义的扭曲;如果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就会赶紧通过某种客观的方式将其转变成与前面的艺术家所不同的东西。不管是哪一种方式,这两者都存在问题。科尔里奇(Coleridge)的"老水手的故事"拒绝简化水手、海洋等主题以及对其一些灵感的描述,他认为统计学的表达方式不能形成具有极高诗意和不寻常隐喻的表述①。对事物的诗意表达也许展示了解决问题的新维度,可以肯定,对促进人文主义的关怀将作出意义深远的贡献,但也不可能彻底替代原先的叙述方式。虽然这种诗意的表达可以广泛地被运用于语言、文化和各种体验,但科学和诗歌的语言形式相互对峙并限制了这一进程,从而再次陷入学科间的复杂困境之中: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得到了相同的发展②。这场运动并非没有希望,发生某种变化是可能的,但它还处在这一变动的进程之中。

人类学中有一种争论,并非只针对它的诗人而是针对所有的作者,实际上现在每一门学科都遭遇到话语危机。人类学诗人也许正在为社会科学表述问题的解决探寻着新的途径。我们来欣赏迪亚蒙德(Diamond,1982)的诗作"萨满的歌":

我向着花朵倾诉
我的指尖轻抚过
那惊鸿一瞥间的艳影

你可知道熊
他的身体,我的灵魂
在每一处地方飘升
领略叶片的讯息
和那云
暧昧的如同女子
掠过石头

我曾与水獭一起
躺于白水之底

---

① 参看:弗南德兹(Fernandez,1974)关于在民族志学叙述和更高组织化的表述活动当中对隐喻(比喻)的领悟及运用问题。莱考夫、约翰逊(Lakoff,Johnson,1980)和莱考夫、特纳(Lakoff,Turner,1989)关于日常生活中平常与不平常隐喻的清晰阐述。亚比勒(Abbeele,1992)的旅行作为一种平常的隐喻以及使用问题。弗南德兹(Fernandez,1986),弗南德兹和赫兹费尔德(Fernandez & Herzfeld,1998)的社会和文化诗学在对行为意义的研究中的定位问题。

② 打破这些限制需要了解逻辑实证主义怎会不被当作普遍适用方法的核心而更多的被当作一连串不能被深入研究的事件(例如:意义与行为,美学与情感等)。

河床柔和似绒

你可知道狐狸
隐匿着死亡的消息?

迪亚蒙德不是萨满人,也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他的作品却能与美国本土的文化精神共鸣,比如他的名诗《到西部去》(*Going West*,1986a)①。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是产生于其创作旺盛期的那些作品中,迪亚蒙德反复通过其跨文化的体验和角色来表述"人",并期待着达到最高的审美境界。跨文化探索的每一步都向他展示出清晰而又丰富的体验。他说他的诗歌预示着另一条可能的途径:"问题在此得以解决"。他的诗歌为曾经深受社会压抑和种族迫害的每一个人倾诉:兄弟、亲属、犹太人等。多样化地表达人类的追求、兴趣、过去和未来不再仅是一种可能,而已然成为现实(Rose,1983)。对他而言,任何人同时都是作者、对象和观众。通过诗歌的仪式,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人进入到相互的意识之中。

迪亚蒙德的作品中有两个相关的主题:个体和文化,这也体现在他那颇为煽情的《在美国如何死去》中(*How to Die in America*,1986)。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也许就是因为这种艰难,个体与文化不断地超越困难而得到发展。从土著生番吃人到世界种族文化冲突造成的巨大伤亡,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比夫拉、印度、新墨西哥、达科他、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以及俄罗斯、西班牙、伊拉克、澳大利亚和中国。由于迪亚蒙德力求达到的艺术顶点并没有稳定的文化界限,所以他的诗歌看起来源于各个地方。他通过认真地观察和聆听,努力把握跨文化的各种事物,以期得到丰富的经验。迪亚蒙德认为没有一种文化能在行吟诗人敏锐地探察与深入地发掘中逃脱。他知道人类学正在努力获取这种知识,但他认为如果不关注观察方法和表述方式的话,那么结果将是一无所获的。他将自己沉浸于别人的生活,将最后的生命致力于通过诗歌来表达他这方面的体验,正如他自己说的:"我首先是诗人,然后是人类学家,然后又是诗人。"(私人交流,1983年3月;Diamond,1982;Rose,1991b)他的那些作品表明他并没说错。

迪亚蒙德优美的诗作有没有被较正式而稳固地纳入到民族志研究范围内(参见 McAllister,1998)?他诗作中具有启蒙性的有益反思及其形式上的技巧有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或者把它视为一种全然的虚构,并不去考察它的历史信度,而将其作为属人领域里一种变动不居的尺度?它在我们内心激起一些难以达到的有价值的东西了吗?就如它揭示出了那些我们有所感悟的或争论的关于

① 这与将多重真实的声音表现在一个单一文本或行为中并不一样(参看:Trawick,1997),但迪亚蒙德相信(在其诗中通过设想其他说话者的角色来展现)在一些场合有些人能代表他人说话以有利于所有的人;某些知识的界线能够为洞察力所穿透,这种洞察力不带有帝国主义的或盲目的文化研究,不带有特权以及压迫性的民族优越感。例如,早在迪亚蒙德的《到西部去》(Diamond,1986a)中一只拟人化了的水獭通过表达对逐渐迫近的历史冲突的体验替莫希干人和阿尔冈琴族人(美国土著的典型代表)说:"因为我们知道未来/也因为我们懂得他们(莫希干人和阿尔冈琴族人)的传说/远胜于他们所做的"(p.11)。文化界限间的沟通点往往并不太明显,在种族自豪感严重的地方尤为如此。本土文化特性无需非得翻译成专业术语,因为所有的东西只有在相关背景中才能被正确理解,所以需要了解问题被提出的形式和文化背景以及答案的文化背景。

生活的真理。格尔兹(Geertz,1973)声称所有的民族志都采用虚构的方法——有些内容是建构出来的,有些内容是当下流行的,民族志内容从来没有一个一致的源头。人类学的表达危机更多的直接源于那些探索性的作品。在随后的论争中,那些诗人从未扮演过主角。但可以肯定人类学的基本主题不会因为诗学文本与客观文本的对抗而发生改变。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它们都只是纯粹的文本而已①。

相似的,作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在要求推论精确、方法严格和审查严的西方社会,表述的形式主要取决于问题的性质。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8)说: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将诗歌视作一种报告文学模式,其内容与他们田野作业的学院派传统相左,这就产生了它与人类学传统表述模式的一系列冲突:"这些诗作很少表达丰富的人类学素材,也很少涉及自由个体遭遇陌生文化时所产生的痛苦。"前一代人类学家(Edward Sapir,Loren Eiseley,& Ruth Benedict)创作出了一些非常出色的诗歌,它们在本质上类似于人类学,却为一些非人类学刊物所发表,而人类学刊物却对此兴味索然,它们认为:诗歌只是一种消遣,它不属于这儿。除了被称作与弗莱泽(James Frazer)的诗歌作品有密切联系的人文主义中的"诗歌意识"之外,并不存在一种现成的思想体系能够产生一种人类学中更为特殊的诗歌流派。

伴随着后现代的到来,"文本研究"的兴起以及如雅克布森(Jakobson,1987)和斯特劳斯(Strauss,1962)这样的结构语言学家对语言学的关注,已经出现了更多这方面的作品,这就明显导致了一种思潮的转向。普拉蒂斯(Iain prattis)的《反思:人类学的沉思》(*Reflections: The Anthropological Muse*,1986)可以作为该转向的一个开端,它收集了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诗歌作品及其他一些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反映了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经验。另外,我们还可以回顾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迪亚蒙德和弗里德里奇(Paul Friedrich)发表在人类学核心刊物《美国人类学》(*American Anthropology*)上的诗歌作品②。当一切都还处在不断地争论之中的时候,马库斯(George Marcus)就将迪亚蒙德的《在美国如何死去》(1986)编入《文化人类学》(*Caltural Anthropology*)第一卷。作为《人类学与人文主义》(*Antropology and Humanism*,季刊)的编辑,里查德森挑起了诗歌与小说间的竞争性对话,并使这一特点成为该刊物的特色。编辑特纳继续保持这种特

---

① 并不存在两种语言来分别表述科学和诗,只存在专门的词汇以及游移不定的背景——文化的"前文本"和"潜文本",它们通过有意地操纵确证和引导(也许是误导)一种我们"想要"发现的"事实"。此外,科学文本和诗学文本创作的边界上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科学观察中,坚持消除偏见被视为是必须的,比如揭露种族优越感等。诗学的任务是直接超越行为和文本中观察的偏见,此外还可能做成很多类似的事情,当然其途径和最终目的可能有所不同。同在别处一样,背景是决定意义的关键,有的时候它本身为作者的意图和社会语言学的形式所决定。

② 作为《美国人类学家》当时的书评编辑,我编辑了这些评论(参看:Rose,1983/1991a;Tyler,1984)。泰克斯(Sol Tax)编辑了《美国人类学家》中一篇较早又较为有趣的诗作。匿名发表的"迷惑的哲学博士"(Anonymous,1954)是赫斯考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从西北大学人类学系的公告板上拿下来寄给泰克斯的。那时候的研究生(现为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和诗学学者)费南德兹:"这不是思想的坦塔尼克。"

色,并通过他的诗歌编辑海姆斯进一步拓展了这方面的话题。马库斯的《虚假的月亮》(*Bastard Moons*,1979)、迪亚蒙德的《到西部去》(1986)以及泰德洛克的获奖作品《梦的年历日子》(*Days From a Dream Almanac*,1990)等作品涉及了语言、民族志事实和萨满人的梦等多个主题(1998,p.461)。近来,由巴巴拉(Babara)和泰德洛克编辑的《美国人类学》杂志中包括了弗里德里奇(Friedrich,1995)、海姆斯(Hymes,1995)和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8)的诗歌作品,这些不同主题的作品都集中反映了人类学的经验。一份致力于研究诗歌、诗学和民族志的新杂志——《跨文化诗学》(Cross-cultaral Poetics)由诺瓦克(Mark Nowak)编辑,并于1997 年出版了第一期。现在,由林肯和邓津编辑的《质的研究》(*Qualitation Inquiry*)杂志亦追随这一潮流(参看 Brady,1998a;Richardson,1998a)。它并非是因为要赶时髦而注重诗歌和小说的表达形式,其编辑人员说,那是因为那些社会工作者长期忽视了这种重要的民族志表达与阐释方式(N. K. Denzin,私人交流,1998 年 11 月 8 日)。

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说人类学诗人到目前为止还为数不多,那么人类学从整体上却激发了大量来自另外学科领域的诗人。诗歌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能够找寻到适合的途径与其他领域文化成果相融合,特别是那些"忽视与拒绝"它的学科领域(Turner,1983,p.339)。针对此,塔恩(Tarn,1991)补充道:我们不必过多地回溯到庞德(Pound)、依利奥特(Eliot)、圣·约翰·珀斯(St. John Perse)和希加伦(Segalen),或者尼卢达(Neruda)、瓦勒尤(Vallejo)和帕兹(Paz)等,弗莱泽(Frazer),哈林顿(Harrison)的时代,或《从仪式到传奇》(*From Retual to Romance*)的作者——更不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弗洛伊德、马库斯、迪尔凯姆或者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类学对诗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已经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人类学诗学"流派。该流派致力于将原始而又古老的诗歌通过 20 世纪先进的翻译手段引进到我们现在的文化中来,使之相互碰撞,并使我们的本土诗人得以继续创作世界范围的诗歌。

由于这种相互作用,人类学领域内的诗歌创作便不可避免并且变得理所当然。诗歌作为一种创作形式本身并不代表什么,然而诗歌因其极强的表现力往往能够表达出事物最深的意蕴。它将每一样东西带入生活带入语言(Meschonnic,1988,p.90)。实际上,它是一门艺术,它的魔力超过其他任何一种表达方式(Vendler,1988,p.6)。基于这些原因,诗歌与科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张力事实上是"健康而有益"的(Fabian,1990,p.766),两者实际上是功能互补的。所以(虽然被某些科学家视作"恶梦"),诗人不能保证为科学研究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但它起码可以带来艺术与科学全面接触的可能。写诗可以帮助单个的人类学学者克服研究中某种经验上的陌生感(Fabian,1990,p.766),它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涉及为后现代所关注的民族志研究中的权力问题。诗学对人类学的影响可以一直深入到民族志最基本的理论预设及其方法论层面。这也许是将我们带离分割的学科现状从而找到出路的有效方法。

当然,有很多途径可以到达同一个终点。诗歌也并非是做所有工作的有效

工具。就如谚语所说:如果一个人手头只有一把锤子的话,那么不久,任何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寻求不同或更好的知识的表述中解决知识的生成问题,这是一种再阐释而非克服,这也给语言和文化的概念以及相关问题带来了压力(Fabian,1990,p.766;Friedrich,1979b)。在注重民族志研究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方面,并非只能用诗歌形式来代替传统严格的民族志表述,也并非是二者择其一:保持一种"对话",确定各自的"在场",是为了在任何情形下能够保持彼此的沟通,而并非为了再现这种"对话"本身(Fabian,1990,p.766);或者是在人文主义或诗学要求"和研究对象在一起(being with others)"的主张下,不知不觉地从自然的历史学家滑向吟游诗人、小丑或传教士(Fabian,1990,pp.766-767;Tarn,1991,p.75)。我们在这一方面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与表述方式有关的另一种观点就是反对"别人的就永不是我们的"这样一种观念,主张用第一人称代替第三人称、用民族志本身来书写等。要发展一种可替代的表述方式就必须关注民族志知识生成的第一现场(Fabian,1994)①。虽然诗学屈服于结构主义的某些观点,这使其看起来似乎倾向于认同特殊多样的现象(言语)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的深层次结构(语言),但诗学并没有要求取消这一传统静态的民族志结构主义。很显然,这里存在着转变的余地。但是要达到一种人类学中更为向心或"内敛"的对话,需要对文化的表述层面进行最低限度的本体论关注。对象要能被体现出来,反对将注意力过多放在那些更为有限的范围之内②。

这一旨趣将人类学者和诗人引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哲学领域,由此还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经验领域研究的认识。但也应该记住每一项研究中的创造性源点,也是 Muse 对学者们所作的提醒:"如果我们跌回到传统模式之中,对经历何种体验以及我们如何进行沟通草率地得出结论,并且开始在人类学原有框架内自以为成功地建构诗学,那么人类学也就在那个地方止步了。"在将分析的问题与田野工作的内容很好地结合起来方面,人类学诗学除把握与传递跨文化的诗歌与文学之外,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这需要在民族志研究中渗人更多的哲学眼光,并同时能去除调查中一些不必要的甚至是扭曲的方面。

---

① 关于民族志学知识的产生参看:Borofsky,1987,2000;Geertz,1973,1983,1988,1995,1998;Dening,1980,1996,1998a,1998b;Brady,1991b;Behar,1993,1996。

② 参看:Tedlock,1983,1990;Schechner,1985,1995;Fernandez,1988;Graham,1995;Dening,1996;Taylor,1996。当然,诗歌直接符合行动者的惯例,它对理解本土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源。正如查洛特(Charlot,1985)谈到夏威夷人的诗歌:"事实是诗歌被频繁地用于一些重要的时候,为了达到一些重要的目的,这表明历史学家一直以来忽略了它的作用"(p.29)。参看温德勒(Vendler,1995,p.6)韵律、诗节形式、角色和体裁的历史意义。弗南德兹和赫兹费尔德(Fernandez & Herzfeld,1998)关于"诗歌原理引导情感性的有效的社会互动"(p.94)和它如何与人行为的表现问题普遍相关联。

结 语

现在我们看到,人类学家能更为自由地出入于诗学领域。但一切并没有为人类学家或传统的人类学旨趣所武断地限定和涵盖。作为一般问题(他们自身社会内部或外部的)的观察者,人类学家们本身会由于研究方法和策略的差异而有很大不同,有时候他们会得出根本无法相互比较的研究成果。在此情况下再有其他学科涉入看起来似乎更加把问题复杂化了。但是由于某些共同的原因,这并非不妥。一个原因是,在研究人及其行为的过程中,人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都在找寻各种"让事实说话"的有效途径。他们努力使自己的表达更客观更精确。他们尽力抛开跨文化研究中由于无法彻底避免自身文化所导致的各种可能的偏见,这些先入之见所构造的事实存在着缺陷(参见 Brady,1983,1991c)。如诗人塔恩(Tarn,1991)所言,另一原因在于"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长久隐藏,事实上最终我们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诗如同人类一样具有普遍性。"(p. 14)

人类学拥有发现和评估人类存在一般标准的优先权①。考虑到以往的一些限制,比如不科学的理论建构、语言的偏见、民族志学者和被研究群体间的关系问题、不可能的纯粹客观性以及研究手段的有效性问题等,民族志与整个社会有机体(语言、文化、行为与认识)之间存在着重新沟通的迫切需要②。但在传统上诗人对人类的普遍特性具有不同的把握,他们更专注于内在意义而非外显行为,更注重人文主义的描述而非实证主义的测量。从人类学诗学的观点来看,恢复那种用系统的科学考察来把握人类生活和文化的普遍意义的企图是极难达成的。它需要跨越从一种宏大叙事下降到地方性知识的细节之中这样的巨大落差,同时关注过去二十年那些批判知识分子的研究进展,并且回归到曾被广泛批评过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和假设。另外,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发现的,诗人的特性常从他们作品的丰富细节中展示出来。诗人们相信思想开阔的观察者能从中发掘出人类生活的共性,而不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这些表面的共通性能否为另外的标准证明为一种普遍事实则是另一回事。收集事实的形式多种多样,因此争论在所难免。科学家惯常从大量的特殊现象中筛选并提炼出本质的东西。

那么选择哪一个呢?无论偏向哪端——非理性的艺术,理性的科学——都让我反复提及一句格言:一些事物不可能换用任何别的方法有效地表达出来。但是,如何拓展它们之间的关系呢?断裂正被弥补,我们面临着沟通二者的挑战。人类学诗学大胆地面对这一难题并已着手进行解决。它努力通过这种特定的艺术形式揭示人类生活的共性,与此同时它还保持着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旨趣。科学家和诗人的工作被赋予了最为广阔的互补的视野。一句古老的谚语

① 参看:布朗(Brown,1991)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作品集;也参看:Whitten,1998;Kilbride,1993。

② 参看:Jessor et al.,1996;Shore,1996;Bloch,1998;Brady,1998b;Wierzbicka,1996。

说:多就是一,一就是多。你怎样走取决于你怎样开始。我们是谁①? 谁知道答案? 不用担心,那里似乎不止有一扇门,而且其中一些并没有上锁。



参考文献

Abrahams, R. D. (1986). 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In V. Turner & E. M. Bruner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pp. 45-72).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Abu-Lughod, L. (1986). *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bu-Lughod, L. (1993). *Writing women's worlds: Bedouin 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onymous (J. W. Fernandez). (1954). Puzzled Ph. D. candidate. In S. Tax, This issue and other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742.

Antin, D. (1983). Talking to discover. In J. Rothenberg & D. Rothenberg (Eds.), *Symposium of the whole: A range of discourse toward an ethnopoetics* (pp. 450-4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chelard, G. (1964).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Beacon.

Bachelard, G. (1971). *On poetic imagination and reverie* (C. Gandin, Tran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Banks, A., & Banks, S. P. (Eds.). (1998). *Fiction and social research: By ice or fir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Barrett, S. R. (1996). *Anthropology: A student's guide to theory and metho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Barthes, R. (1968). *Writing degree zero* (A. Lavers & C. Smith, Trans.). New York: Noonday.

Barthes, R. (1972). *Mythologies* (A. Lavers, Trans.). New York: Hill & Wang.

Barthes, R. (1986). From science to literature. In R. Barthes, *The rustle of language* (R. Howard, Trans.; pp. 3-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sso, K. (1988). A review of *Native American discourse: Poetics and rhetoric* (J. Sherzer & A. C. Woodbury, Eds.). *American Ethnologist*, 15, 805-810.

Basso, E. (1995). *The last cannibals: A South American oral hist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auman, R. (1977).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Bauman, R. (Ed.). (1992). *Folklore,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aujoir, M. (1987). Michel Leiris: Ethnography or self-portrayal? Review essay of Sulfur 15, featuring new translations of Michel Leiris's work.. *Cultural Anthropology*, 2, 470-480.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Behar, R.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Benson, P. (Ed.). (1993).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Bishop, E., & Brasil, E. (Eds.). (1972). *An anthology of twentieth-century Brazilian poetry.*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① 一些诗人同一群自我陶醉者、聪明的历史学家和华而不实的集权主义者生活在那里。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定期去拜访他们。研究计划在于考察这些居民的居住动机。问题是每个人都在研究对方,没有人确信谁正在研究谁,或者谁的谈话是支配性的。有人说这种混乱之中存在着秩序。两位诗人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幽灵说:"我们告知你如此"。两位科学家无法理解其主旨和意义。新的方法流派正产生于这种观察现场。一块匾上写着:思的源泉从这里开始,真理的话语在附近出售,请不要虚度光阴。

Bloch, M. E. F. (1998). *How we think they think: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cognition, memory, and literacy.* Boulder, CO: Westview.

Boon, J. A. (1972). *From symbolism to structuralism: Lévi-Strauss in a literary tradi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Boon, J. A. (1982). *Other tribes, other scribes: Symbolic anthropology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es, histories, religions, and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on, J. A. (1984). Folly, Bali, and anthropology, or satire across cultures. In E. M. Bruner (Ed.), *Text, play, and story: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elf and society* (pp. 156-17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Boon, J. A. (1989). *Affinities and extremes: Criss-crossing the bittersweet ethnology of East Indies history, Hindu-Balinese culture, and Indo-European all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rofsky, R. (1987). *Making history: Pukapukan and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of knowle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rofsky, R. (1994). *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Borofsky, R. (1997). Cook, Lono, Obeyesekere, and Sahlins [with commentary]. *Current Anthropology*, 38, 255-282.

Borofsky, R. (Ed.). (2000). *Remembrance of Pacific pasts: An invitation to remake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wen, E. S. (pseudonym of L. Bohannan). (1954). *Return to laughter: An anthropological novel.* New York: Harper & Row.

Brady, I. (Ed.). (1983). Speaking in the name of the real: Freeman and Mead on Samoa [Special sec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5, 908-947.

Brady, I. (1985). Review of *Tuvalu: A history*, by S. Faniu, V. Ielemia, T. Isako, et al. In *Pacific History Bibliography and Comment*, 1985 (pp. 52-54). Canberra: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Brady, I. (1990a). Comment on "Is anthropology art or science?" by M. Carrithers. *Current Anthropology*, 31, 273-274.

Brady, I. (1990b). Review of *The violent imagination*, by R. Fox.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2, 1078-1079.

Brady, I. (Ed.). (1991a).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Brady, I. (1991b). Harmony and argument: Bringing forth the artful science. In I. Brady (Ed.),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pp. 3-30). 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Brady, I. (1991c). The Samoa reader: Last word or lost horizon? *Current Anthropology*, 32, 497-500.

Brady, I. (1993). Tribal fire and scribal ice. In P. Benson (Ed.),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pp. 248-278).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Brady, I. (1996). Poetics. In D. Levinson & M. Ember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3, pp. 951-959). New York: Holt.

Brady, I. (1998a). A gift of the journey. *Qualitative Inquiry*, 4, 463.

Brady, I. (1998b). Two thousand and what? Anthropological moments and methods for the next centur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0, 510-516.

Brady, I. (1999). Ritual as cognitive process, performance as history. *Current Anthropology*, 40, 243-248.

Brady, I., & Turner, E. (1994, June). Introduction. In I. Brady & E. Turner (Eds.), Humanism in anthropology, 1994 [Special issue].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19, 3-11.

Brann, E. T. H. (1991). *The world of the imagination: Sum and substance.* 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Bright, W. (Ed.). (1983). *Discovered tongues: Poems by linguists.* San Francisco: Corvine.

Bright, W. (1985). *Word formations: Poems by linguists.* San Francisco: Corvine.

Brooks, P. (1994).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What happened to poetics? *Critical Inquiry*, 20, 509-523.

Brown, D. E. (1991). *Human universals.* New York: McGraw-Hill.

Brown, R. H. (1977). *A poetic for sociology: Toward a logic of discover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uner, E. M. (Ed.). (1984). *Text, play, and story: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elf and societ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Bruner, E. M., & Gorfain, P. (1991). Dialogic narration and the paradoxes of Masada. In I. Brady (Ed.),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pp. 177-203). 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Bruner, J. (1986).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rke, E. (1958).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Burke, K. (1989). *On symbols and society* (J. R. Gusfiel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ndre, H., & Echeverri, J. A. (1996). *Cool tobacco, sweet coca: Teachings of an Indian sage from the Colombian Amazon.* Devon: Themis.

Chandrasekhar, S. (1987). *Truth and beauty: Aesthetics and motivations In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rlot, J. (1985). *The Hawaiian poetr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Honolulu: Institute for Polynesian Studies.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 &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llingwood, R. G. (1956). *The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ward, H. G., & Royce, J. R. (1981). Toward an epistemological basis for humanistic psychology. In J. R. Royce & L. P. Mos (Eds.), *Humanistic psychology: Concepts and criticisms* (pp. 109-134). New York: Plenum.

Crapanzano, V. (1980). *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sordas, T. J. (1997). Prophec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metapho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9, 321-332.

Culler, J. (1975).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uller, J. (1977). Foreword. In T. Torodov, *The poetics of prose* (pp. 7-13).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avies, C. A. (1999). *Reflexive ethnography: A guide to researching selves and others.* New York: Routledge.

Dening, G. (1980). *Islands and beaches: Discourse on a silent land: Marquesas 1774-188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ening, G. (1995). *The death of William Gooch: A history's anthrop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ening, G. (1996). *Performa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ning, G. (1998a). *Readings/writings.* 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Dening, G. (1998b). Writing, rewriting the beach: An essay. *Rethinking History*, 2(2), 143-172.

Dennis, P. A. (1989). Oliver LaFarge, writer and anthropologist. In P. A. Dennis & W. Aycock (Eds.), *Literature and anthropology* (pp. 209-219). Lubbock: 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

Dennis, P. A., & Aycock, W. (Eds.). (1989). *Literature and anthropology.* Lubbock: 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 Zengotita, T. (1989). On Wittgenstein's remarks on Frazer's *Golden bough. Cultural Anthropology*, 4, 390-398.

Diamond, S. (1982). *Totems.* Barrytown, NY: Open Book/Station Hill.

Diamond, S. (1986a). *Going west.* Northhampton, MA: Hermes House.

Diamond, S. (1986b). How to die in America. *Cultural Anthropology*, 1, 447-448.

Diamond, S. (1986c). Preface.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1, 131-132.

Diamond, S. (1987). The beautiful and the ugly are one thing, the sublime another: A reflection on culture. *Cultural Anthropology*, 2, 268-271.

Dobin, H. (1990). *Merlin's disciples: Prophecy, poetry, and power in Renaissance Englan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onoghue, D. (1989, June 29). The strange case of Paul de M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pp. 32, 37.

Dove, R. (1994, January-February). What does poetry do for us? *Virgini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lumni newsletter), pp. 22-27.

Dreyfus, H. L., & Rabinow, P. (1983).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umont, J.-P. (1978). *The headman and I: Ambiguity and ambivalence in the fieldworking experien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Duranti, A. (1993). Truth and intentionality: An ethnographic critique. *Cultural Anthropology*, 8, 214-245.

Eagleton, T. (1983).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co, U. (1979). *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Ellis, C., & Bochner, A. P. (Eds.). (1996).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Emerson, C. (1997).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bian, J.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abian, J. (1990). Presence and representation: The other and anthropological writing. *Critical Inquiry*, 16, 753-772.

Fabian, J. (1994). Ethnographic objectivity revisited: From rigor to vigor. In A. Megill (Ed.), *Rethinking objectivity* (pp. 81-108).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Feld, S. (1982). *Sound and sentiment: Birds, weeping, poetics, and song in Kaluli express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Feld, S. (1987). Dialogic editing: Interpreting how Kaluli read sound and sentiment. *Cultural Anthropology*, 2, 190-210.

Fernandez, J. W. (1974). The mission of metaphor in expressive culture [with commentary]. *Current Anthropology*, 15, 119-145.

Fernandez, J. W. (1985). Exploded worlds: Texts as a metaphor for ethnography (and vice-versa). In S. Diamond (Ed.), Anthropology after '84: State of the art, state of society, part II [Special issue].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0(1-2), 15-26.

Fernandez, J. W. (1986). *Persuasions and performances: The play of tropes in cul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Fernandez, J. W. (1988). Andalusia on our minds: Two contrasting places in Spain as seen in a vernacular poetic duel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3, 21-35.

Fernandez, J. W. (1989). Comment on Keesing's exotic readings of cultural texts. *Current Anthropology*, 30, 470-471.

Fernandez, J. W., & Herzfeld, M. (1998). In search of meaningful methods. In H. R. Bernard (Ed.), *A handbook of method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89-129). Thousand Oaks, CA: Sage.

Finnegan, R. (1992a). Oral poetry. In R. Bauman (Ed.), *Folklore,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 (pp. 119-12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nnegan, R. (1992b). *Oral poetry: Its nature, significance, and social contex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M. M. J. (1988). Scientific dialogue and critical hermeneutics. *Cultural Anthropology*, 3, 3-15.

Fischer, M. M. J. (1989). Museums and festivals: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s Conference,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eptember 26-28, 1988, I. Karp and S. Levine, organizers. *Cultural Anthropology*, 4, 204-221.

Fischer, M. M. J. (1991).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Inserts for the 1990s: 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 visual virtual-realities, and post-trauma politics. *Cultural Anthropology*, 6, 525-537.

Flores, T. (1982). Field poetry.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Quarterly*, 7(1), 16-22.

Flores, T. (1985). The 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 In S. Diamond (Ed.), Anthropology after '84: State of the art, state of society, part Ⅱ [Special issue].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0(1-2), 27-41.

Flores, T. (1999). *In place: Poems by Toni Flores.* Geneva, NY: Hobart & William Smith Colleges Press.

Fox, R. (1989). *The violent imagina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Fox, R. G. (Ed.). (1991).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Friedrich, P. (1979a). *Bastard moons.* Chicago: Benjamin & Martha Waite.

Friedrich, P. (1979b). Linguistic relativity and the order-to-chaos continuum. In J. Maquet (Ed.), *O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Essays in honor of Harry Hoijer* (pp. 89-139). Malibu, CA: Undena.

Friedrich, P. (1995). The world-listener & Cities (two poem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7, 658-659.

Fujimara, J. H. (1998). Authorizing knowledge in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0, 347-360.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Geertz, C.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eertz, C. (1995). Disciplines. *Raritan*, 14(3), 65-102.

Geertz, C. (1998, October 22). Deep hanging ou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pp. 69-70.

Gellner, E. (1998). *Language and solitude: Wittgenstein, Malinowski, and the Habsburg dilemm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ttlieb, A., & Graham, P. (1993). *Parallel worlds: An anthropologist and a writer encounter Africa.* New York: Crown.

Gould, S. J. (1991). More light on leaves: Can a great artist also be a great scientist? *Natural History*, 2, 16-23.

Graham, L. (1995). *Performing dreams: Discourse of immortality among the Xavante of central Brazil.*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Graves, R. (1971, December 2).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oetry. *New Scientist*, pp. 34-35.

Guetti, J. (1984). Wittgenstein and literary theory. *Raritan*, 4(2), 67-84.

Hall, D. (1988). *Poetry and ambition: Essays 1982-88.*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allyn, F. (1990). *The poetic structure of the world: Copernicus and Kepler.* New York: Urzone.

Handler, R. (1983). The dainty and the hungry man: Literature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work of Edward Sapir. In G. W. Stocking, Jr. (Ed.), *Observers observed: Essays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pp. 208-231).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Handler, R. (1985). On dialogue and destructive analysis: Problems in narrating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1, 171-181.

Handler, R. (1990). Ruth Benedict and the modernist sensibility. In M. Manganaro (Ed.), *Modernist anthropology: From fieldwork to text* (pp. 163-18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ndler, R., & Segal, D. (1987). Narrating multiple realities: Some lessons from Jane Austen for ethnographers.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Quarterly*, 12(4), 15-21.

Handy, W. C. (1973). *Thunder from the se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arland, R. (1987). *Superstructuralism: The philosophy of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New York: Methuen.

Harris, J. (1997). Giotto's invisible sheep: Lacanian mirroring and modeling in Walcott's "Another lif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6, 293-309.

Harris, M. (1977). *Cannibals and kings.* New York: Random House.

Harris, M. (1987). *The sacred cow and the abominable pig: Riddles of food and cul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Hill, J. H. (1986). The refiguration of the anthropology of language. *Cultural Anthropology*, 1, 89-102.

Hodder, I. (1986). *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ffmann, R. (1987). *The metamict state: Poems by Roald Hoffman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Hoffmann, R. (1990a). *Gaps and verges: Poems by Roald Hoffman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Hoffmann, R. (1990b). Molecular beauty.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48, 191-204.

Hoffmann, R. (1995). *The same and not the same.*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olquist, M. (1990). *Dialogism: Bakhtin and his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Holton, G. (1993). *Science and anti-sc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ckson, M. (1982). *Allegories of the wilderness: Ethics and ambiguity in Kuranko narrativ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Jackson, M. (1986). *Barawa and the ways birds fly in the sk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Jakobson, R. (1987). *Language in literature* (K. Pomorska & S. Rudy, E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A., Hockey, J., & Dawson, A. (Eds.). (1997). *After writing culture: Epistemology and praxis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Jarvie, I. C. (1983). The problem of the ethnographic real. *Current Anthropology*, 24, 313-325.

Jennings, B. (1983).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nd policy analysis. In D. Callahan & B. Jennings (Eds.), *Ethic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policy analysis* (pp. 3-35). New York: Plenum.

Jessor, R., Colby, A., & Shweder, R. A. (Eds.). (1996). *Ethnography and human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meaning in social inqui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arp, I., & Levine, S. D. (Eds.). (1991).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Kilbride, P. L. (1993). Anti-anti-universalism: Rethinking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anti-anti-relativism. *Reviews in Anthropology*, 22(1), 1-11.

Knab, T. J. (1995). *A war of witches: A journey into the underworld of the contemporary Aztec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Knauft, B. M. (1996). *Genealogies for the present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Kroskrity, P. V. (1985). Growing with stories: Line, verse, and genre in an Arizona Tewa text.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1, 183-199.

Krupat, A. (1992). *Ethno-criticism: Ethnography, history,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urten, B. (1980). *Dance of the tiger.* New York: Berkeley.

Laderman, C. (1991). *Taming the wind of desire: Psychology, medicine, and aesthetics in Malay shamanistic perform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Farge, O. (1929). *Laughing bo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 Turner, M.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ngness, L. L., & Frank, G. (1978). Fact, fiction, and the ethnographic novel.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Quarterly*, 3(1-2), 18-22.

Lanser, S. S. (1981). *The narrative ac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vie, S. (1990). *The poetics of military occupation: Mzeina allegories of Bedouin identity under Israeli and Egyptian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yton, R.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in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avitt, J. (Ed.). (1997). *Poetry and prophecy: The anthropology of inspir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ett, J. (1997). *Science, reason, and anthropology: The principles of rational inquiry.* Lanham, MD: Roman & Littlefield.

Levi, P. (1984). *The periodic table.* New York: Schocken.

Levine, G. (1987). Literary science—scientific literature. *Raritan*, 6(3), 24-41.

Levine, G. (1994). Why science isn't literature: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ces. In A. Megill (Ed.), *Rethinking objectivity* (pp. 65-79).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évi-Strauss, C. (1961). *Tristes tropiques: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societies in Brazil* (J. Russell, Trans.). New York: Atheneum.

Lévi-Strauss, C. (1962). "Les chats" de Charles Baudelaire. *L'Homme*, 2(1), 5-21.

Lévi-Strauss, C. (1967).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C. Jacobson & B. G. Schoepf, Tran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Lévi-Strauss, C. (1969). *The raw and the cooked* (J. Weightman & D. Weightman,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Lightman, A. (1993). *Einstein's dreams.* New York: Time Warner.

Limón, J. (1994). *Dancing with the devil: Society and cultural poetics in Mexican-American South Texa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orde, A. (1984). *Sister outsider.* Trumansburg, NY: Crossing.

Loriggio, F. (1990). Anthropology,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traditions of modernism. In M. Manganaro (Ed.), *Modernist anthropology: From fieldwork to text* (pp. 215-24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cCannell, D. (1992). *Empty meeting grounds: The tourist papers.* New York: Routledge.

Manganaro, M. (Ed.). (1990a). *Modernist anthropology: From fieldwork to tex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nganaro, M. (1990b). Textual play, power, and cultural critique: An orientation to modernist anthropology. In M. Manganaro (Ed.), *Modernist anthropology: From fieldwork to text* (pp. 3-4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cus, G. E. (1980). Rhetoric and the ethnographic genre i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Current Anthropology*, 21, 507-510.

Marcus, G. (1988). Parody and the parodic in Polynesian cultural histo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3, 68-76.

Marcus, G. E. (1993). A review of *Ethnocriticism: Ethnography, history, literature*, by A. Krupa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395, 766.

Marcus, G. E. (1998).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A new research imaginary for anthropology's changing professional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cus, G. E., &: Cushman, D. (1982).

Ethnographies as tex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1, 25-69.

Marcus, G. E., &; Fischer, M. M. J.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scia-Lees, F. E., Sharpe, P., &; Cohen, C. B. (1993). The postmodernist turn in anthropology: Caution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In P. Benson (Ed.),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pp. 225-248).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Matthiessen, P. (1963). *At play in the fields of the Lord.* New York: Vintage.

Matthiessen, P. (1975). *Far Tortuga.* New York: Vintage.

Maxwell, N. (1984). *From knowledge to wisdom: A revolution in the aims and methods of science.* New York: Blackwell.

McAllister, J. W. (1998). Is beauty a sign of truth in scientific theories? *American Scientist*, 86, 178-183.

Megill, A. (Ed.). (1994). *Rethinking objectiv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eschonnic, H. (1988). Rhyme and life. *Critical Inquiry*, 15, 90-107.

Miner, E. (1990).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omaday, N. S. (1989). *The ancient chil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Motzafi-Haller, P. (1998). Beyond textual analysis: Practice, interacting discours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distinction in Botswana. *Cultural Anthropology*, 13, 522-547.

Napoli, D. J.,, & Rando, E. N. (Eds.). (1979). *Linguistic muse.* Edmonton: Linguistic Research.

Narayan, K. (1989). *Storytellers, saints, and scoundrels: Folk narrative in Hindu religious teachin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Obeyesekere, G. (1992). *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 Meara, J. T. (1989). Anthropology as empirical scie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 354-369.

O' Meara, J. T. (1997). Causa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with commentary]. *Current Anthropology*, 38, 399-418.

O' Nell, T. D. (1994). Telling about whites, talking about Indians: Oppression, resistance, and contemporary Indian identity.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94-126.

Poggie, J. J., Jr., DeWalt, B. R., & Dressler, W. W. (Eds.). (1992).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Process and applic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olanyi, M., & Prosch, H. (1975). *Mea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rattis, J. I. (Ed.). (1986). *Reflections: The anthropological mus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Prattis, J. I. (1997). *Anthropology at the edge: Essays on culture, symbol, and consciousnes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Rabinow, P.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binow, P. (1983). Humanism as nihilism. In N. Haan, R. N. Bellah, P. Rabinow, & W. M. Sullivan (Eds.), *Social science as moral inquiry* (pp. 52-7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abinow, P. (Ed.). (1984).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Rabinow, P. (1986).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p. 234-2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binow, P., & Sullivan, W. M. (Eds.). (1987).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second loo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pport, N. (1997). *Transcendent individual: Towards a literary and libe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Reck, G. G. (1978). *In the shadow of Tlaloc: Life in a Mexican village.*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Reichel-Dolmatoff, G. (1996). *Yurupari: Studies of an Amazonian foundation my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 I. A. (1929). *Practical critic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Richardson, L. (1994).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N. K. Denzin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16-529).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chardson, M. (1990). *Cry lonesome and other accounts of the anthropologist's projec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Richardson, M. (1998a). Poetics in the field and on the page. *Qualitative Inquiry*, 4, 451-462.

Richardson, M. (1998b). The poetics of a resurrection: Re-seeing 30 years of change in a Colombian community and in the anthropological enterpris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0, 11-21.

Riffaterre, M. (1970). Describing poetic structures: Two approaches to Baudelaire's "Les chats." In J. Ehrmann (Ed.), *Structuralism* (pp. 189-230).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Riffaterre, M. (1984). *Semiotics of poet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obbins, B. (1987). Poaching off the disciplines. *Raritan*, 6(4), 81-96.

Rorty, R.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rty, R. (1981). Nineteenth-century idealism and twentieth-century textualism. *Monist*, 64, 155-174.

Rosaldo, R.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Rose, D. (1991a). In search of experience: The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of Stanley Diamond. In I. Brady (Ed.),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pp. 219-233). 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Reprinted fro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83, 85)

Rose, D. (1991b). Reversal. In I. Brady (Ed.),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pp. 283-301). 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Rose, D. (1993). Ethnography as a form of life. In P. Benson (Ed.),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pp. 192-224).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Rothenberg, J. (1981). *Pre-faces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Rothenberg, J. (Ed.). (1985). *Technicians of the sacred: A range of poetries from Africa, America, Asia, Europe, and Ocea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thenberg, J. (1994). "Je est un autre": Ethnopoetics and the poet as othe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6, 523-524.

Rothenberg, J., & Rothenberg, D. (Eds.). (1983). *Symposium of the whole: A range of discourse toward an ethnopoe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gan, C. (1980). *Cosmos.* New York: Ballantine.

Sagan, C. (1985). *Contact.* New York: Pocket Books.

Sahlins, M. (1981).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Structur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dwich Islands kingdo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Sahlins, M. (1985).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hlins, M. (1996). *How "natives" think: About Captain Cook, for exam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id, E. (1991).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Raritan*, 11(1), 17-31.

Sangren, P. S. (1991). Rhetoric and the authority of ethnography. In S. Silverman (Ed.), *Inquiry and debate in the human sciences* (pp. 277-30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echner, R. (1985). *Between theater and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Schechner, R. (1995). *The future of ritual: Writings on culture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Routledge.

Scholes, R. (1974). *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holte, B. (1966). Epistemic paradigms: Some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social anthropological history and theor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8, 1192-1201.

Scott, D. (1992).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 discourse: Aspects of the demon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Sinhala cultural practice. *Cultural Anthropology*, 7, 301-326.

Shankman, P. (1984). On semiotics and science: Reply to Renner and Scholte. *Current Anthropology*, 25, 691-692.

Sherzer, J. (1987). A discourse-centered approach to language and cul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9, 295-309.

Sherzer, J., & Woodbury, A. C. (Eds.). (1987). *Native American discourse: Poetics and rhetor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ore, B. (1996). *Cognition,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mean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weder, R. A. (1996). True ethnography: The lore, the law, and the lure. In R. Jessor, A. Colby, & R. A. Shweder (Eds.), *Ethnography and human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meaning in social inquiry* (pp. 4-5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lko, L. M. (1977). *Ceremony.* New York: Penguin.

Simms, N. T. (1991). *Points of contact: A study of the interplay and intersection of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literatures, cultures, and mentalities.* New York: Pace University Press.

Simpson, D. (1994). Literary criticism, localism, and local knowledge. *Raritan*, 14(1), 70-88.

Slater, C. (1982). *Stories on a string: The Brazilian literatura de cord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piegelberg, H. (1975). *Doing phenomenology: Essays on and in phenomenolog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Spradley, J. E., & McDonough, G. P. (Eds.). (1973). *Anthropology through litera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Stewart, J. (1962). *Curving road: Stories by John Stewar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tewart, J. (1989). *Drinkers, drummers, and decent folk.*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tewart, K. (1996). *A space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Cultural poetics in an "other"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wann, B. (Ed.). (1983). *Smoothing the ground: Essays in Native American oral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wearingen, J. (1986). Oral hermeneutic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literacy: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Cultural Anthropology*, 1, 138-156.

Tarn, N. (1991). *Views from the weaving mountain: Selected essays in poetics and anthropology.*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Taussig, M. (1987).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aussig, M. (1993). *Mimesis and alterity: A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senses.*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L. J. (1996). "There are two things that people don't like to hear about themselves": The anthropology of Ireland and the Irish view of anthropology.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5, 213-226.

Tedlock, B. (1991). Fro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the observation of participation: The emergence of narrative ethnograph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7, 69-94.

Tedlock, B. (1992). *The beautiful and the dangerous: Dialogues with the Zuni Indians.* New York: Penguin.

Tedlock, B., & Tedlock, D. (1985). Text and textile: Language and technology in the arts of the Quich May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1, 121-146.

Tedlock, D. (Trans.). (1972). *Finding the*

center: Narrative poetry of the Zuni Indians. New York: Dial.

Tedlock, D. (1983). *The spoken word and the work of interpret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Tedlock, D. (Trans. & Commentator). (1985). *Popol Vuh: The Mayan book of the dawn of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Tedlock, D. (1987a). Hearing a voice in an ancient text: Quich Maya poetics in performance. In J. Sherzer & A. C. Woodbury (Eds.), *Native American discourse: Poetics and rhetoric* (pp. 140-1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edlock, D. (1987b). Questions concerning dialogical anthropology (with a response from Stephen Tyler).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3, 325-344.

Tedlock, D. (1990). *Days from a dream almanac.*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Tedlock, D. (1991). The speaker of tales has more than one string to play on. In I. Brady (Ed.),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pp. 309-340). 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Tedlock, D. (1992). Ethnopoetics. In R. Bauman (Ed.), *Folklore,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 (pp. 81-8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edlock, D. (1993). *Breath on the mirror: Mythic voices and visions of the living Maya.*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Thomas, E. M. (1987). *Reindeer moon.* New York: Pocket Books.

Thomas, N. (1989). *Out of time: History and evolution in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N. (1991). Against ethnography. *Cultural Anthropology*, 6, 306-322.

Thompson, W. I. (1983). *Blue jade from the morning star: An essay and a cycle of poems on Quetzalcoatl.* West Stockbridge, MA: Lindisfarne.

Tiles, M. (1984). *Bachelard: Science and objectiv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lley, C. (Ed.). (1990). *Reading material cultur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Todorov, T. (1977). *The poetics of prose* (R. Howard, Tra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odorov, T. (1981). *Introduction to poetics* (R. Howard,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Trawick, M. (1988). Spirits and voices in Tamil song. *American Ethnologist*, 15, 193-215.

Trawick, M. (1997). Time and mother: Conversations with a possessing spirit. In J. Leavitt (Ed.), *Poetry and prophecy: The anthropology of inspiration* (pp. 61-7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Tsing, A. L. (1994). From the margin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279-297.

Turnbull, C. (1962). *The forest peopl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Turnbull, C. (1972). *The mountain peopl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Turner, E. (1987). *The spirit and the drum: A memoir of Africa.*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Turner, V. (1974).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V. (Ed.). (1982a). *Celebration: Studies in festivity and ritual.*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Turner, V. (1982b).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New York: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Publications.

Turner, V. (1983). A review of "Ethnopoetics." In J. Rothenberg & D. Rothenberg (Eds.), *Symposium of the whole: A range of discourse toward an ethnopoetics* (pp. 337-34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yler, S. A. (Ed.). (1969). *Cogni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Tyler, S. A. (1984). The poetic turn in postmodern anthropology: The poetry of Paul Friedrich.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6, 328-336.

Ulin, R. C. (1984). *Understanding cultures: Perspectives in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the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Valéry, P. (1964). *Aesthetics* (R. Mennheim, Trans.). New York: Bollingen Foundation.

Van Den Abbeele, G. (1992). *Travel as metaphor: From Montaigne to Rousseau.*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Van Lawick-Goodall, J. (1971). *In the shadow of man.* New York: Delta.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endler, H. (1985, November 7). Looking for poetry in Americ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pp. 53-60.

Vendler, H. (1988). *The music of what happens: Poems, poets, cr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endler, H. (1995). *Soul says: On recent poe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bster, S. (1986). Realism and reification in the ethnographic genre.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6, 39-62.

Weinstein, F. (1990a). *History and theory after the fall: An essay on interpre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einstein, F. (1990b). Who should write history? *SUNY Research*, 10(3), 20-21.

Weiss, W. A. (1990). Challenge to authority: Bakhtin and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5, 414-430.

White, H. (1973).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hitten, N. E., Jr. (1988). Toward a critic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Ethnologist*, 15, 732-742.

Wierzbicka, A. (1996). *Semantics: Primes and univers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bert, J., & Simoneau, K. (Eds.). (1982). *Folk literature of the Mataco Indians.* Los Angeles: UCLA Latin America Center Publications.

Wilk, S. (1991). *Humanistic anthropology.*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Williams, B. (1998, November 19). The end of explana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pp. 40-44.

Wolf, E.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lf, M. A. (1992). *A thrice-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uthnow, R., Hunter, J. D., Bergesen, A., & Kurzweil, E. (Eds.). (1984). *Cultural analysis: The work of Peter L. Berger, Mary Douglas, Michel Foucault, and Jürgen Habermas.*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通过评估理解社会项目



UNDERSTANDING SOCIAL PROGRAMS THROUGH EVALUATION

⊙ 珍妮弗·C·格林尼

社会项目评估(social program evaluation)属于应用社会调查的一个领域,并以其知识主张明确的价值体系、其背景中公开的政治特征、其参与者不可避免的多元性和多种声音而独树一帜①。社会计划评估者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工具,不是为了向做学问的同行们提出一些感兴趣的抽象理论问题,而是针对不同的社会参与者提出值得优先考虑的政策和实际问题,这些社会参与者包括决策制订者、项目管理者、直接的服务人员、项目参与者和其他的一些人。社会计划评估者旨在为身边的服务、计划、政策和公众对话提供信息和提高它们的质量:

> 安尼蒂·巴洛(Annette Barlow)在乔治亚的乡村指导着一个名为"联合之路"的计划。像其他地方"联合之路"的指导者委员会一样,安尼蒂·巴洛的委员会不断要求他们所资助的计划的结果。在乡村地区出生的婴儿会因为出生前的计划而更健康一些吗?那些参与了同龄人指导计划的孩子,他们的阅读水平更高一些吗?那些参与了志愿祖父母计划的老年人,他们是否会更少受到孤立?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有效地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经济的自给能力?
>
> 希古罗(Martin Seguro)是新当选的美国参议员,他发现自己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属于地位较低的少数派成员。在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关系了解得更多的时候,他对国际货币政策,如结构的调整、关税、贸易协定对于这些关系的影响提出了质疑。
>
> 里诺尔兹(Evelyn Reynolds)在她的乡村社会服务部门做了20年的社会

---

① 社会计划评估者工作于政府的各个层次,因此社会计划来自政府机构的内部和外部。他们的工作常常为了知识、发展或义务的目的受计划基金,即政府和资助人的委托(Chelimsky,1997)。实践中的评估者在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生课程或政策分析和评估的研究生课程中已受到训练。除了社会评估,评估还被用于实物(产品评估)、人(个人评估)和私人部门中的计划,如主管人员的提高和人力资源培训。尽管斯克里芬(Scriven,1995)和其他的一些人认为,在不同的评估目标之间评估的逻辑是一致的,我相信它们从本质上构成了不同的任务,并因此需要定性上和政治上不同的反应。在这一章,我将集中于美国公共领域的社会计划的定性评估和它们所包含的政策。我在这里的观点不一定能很好地转移到其他的背景之下,对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判断。

工作服务,主要与公众救助计划和委托人一起工作。计划在这些年来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无条件的救济金增值发展到更为完整的救济金,从一揽子的服务发展到分阶段的福利——里诺尔兹的工作也是如此,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她发现自己的权威越来越小,而责任却越来越大,对越来越少的资源的需求也更加的强烈。她在最近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说道:"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个系统运转得更好。"

格林鲍姆(Thomas Greenbaum)是里诺尔兹所在州的一位社会服务指导者,他在工作中同样经历着压力和矛盾。不同的是,格林鲍姆的压力来自使计划的成本最小化,符合联邦的规章制度,对与院外游说者政治行动的需求之间的冲突作出反应等。

沃尔夫(Michael Grey Wolf)在名为美国主权的运动中活动了十多年。他最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通过比较本地化的和非本地化的公立小学和中学,向他的家乡所在州的本地化学校进行特许学校立法这一目标迈进①。

在本章,我将使用以上以及其他的一些特定的背景材料来将注意力重新调整到评估的社会政治角色上来。我将通过强调评估方法的社会政治方面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些评估方法结合了定性的方法和为适应内外的挑战而发生的变化。本章各个部分的组织将体现这些特点。在以下的两个部分中,一个部分会将评估置于社会政策领域中,另一个部分将定性方法置于社会计划评估的全貌之中。接下来的两个部分将对依赖于定性方法的评估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实践进行描述。基本原理指的是判断这些评估方法是否合理的方法论逻辑;实践则描述方法应用中的关键方面。最后一部分,在历史背景当中,将评估方法与评估重要的理论发展联系起来,并通过当代的竞争将它们引导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计划评估的背景

以上简短的有关项目评估特殊的背景的讨论清楚地表明社会计划评估的政治内在性(Cronbach & Associates,1980;Patton,1987;Weiss,1987)。他们直接与当代美国民主的多元价值观相契合。这些是关于争论激烈的社会政策和计划,关于资源由谁及如何分配,关于相互竞争的既存在于全球领域,也存在于地方社区之中的市民价值观的背景。社会评估计划的核心内容因此交织着关于社会的优先权和方向的政治权力和决策制订。在这种政治化的背景下工作的评估者必须为使他们的信用和潜在影响最大化而成功地调整自己的身份。不同的评估者选择了不同的基础来进行协调,这些不同的基础通向不同的评估目的和角色,但都是与权力相关和都是基于价值观之上的(Greene,1997)。

此外,社会计划评估者的工作是由被评估环境中所选择的成员的利益所引

---

① 感谢拜尔(Alyce Spotted Bear)关于这一评估背景的思想。

导的(这里的利益指的是基于价值观上的对资源的要求)。在所有的评估背景中,常常会有一些对评估来说是竞争的、潜在的受众——那些期望从评估计划中受益的群体和个人,在评估术语中我们称之为股东(stakeholders)。股东的范围既包括有权力的,也包括无权的,从巴洛的联合之路委员会和美国参议院这样的政策制订者和资助者到格林鲍姆这样的计划管理者,里诺尔兹这样的执行人员和沃尔夫这样的倡导者,直到整个的公众,都属于股东的范围。因此,评估者必须通过他们的工作,成功地协调所提出的问题和他们所服务对象的利益,这些协调也无疑是基于价值观之上的。

评估结果不是以去背景化、抽象的或理论知识的形式而是以有利益诉求的知识主张,以对被评估计划的优劣的经验性的价值评判的形式,进入社会计划和政策决策制订的领域。评估者不仅要声称知道什么,他们还必须知道所选择的有利位置的优势何在。总之,评估是关于评价(Scriven,1967)和判断(Stake,1967)的过程。价值观贯穿于评估的全过程,从作为评估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的价值观到作为职业道德标准的价值观,以及作为评估实践的道德目标的价值观(Schwandt,1997b)。因此,除了协调评估目的和观众,评估者还必须协调作出质量判断的标准和条件。这些标准和由此产生的判断不可避免地是基于权力和价值观之上的,并因此事关所有当代民主中的争论和冲突。

为定性的计划评估定位

因为社会计划评估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政治和价值观之中,而同时评估者也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周旋于相互竞争的政治和价值观议程之中,因此对评估者而言,有必要掌握一些不同的引导实践的方法。近来,这些评估者所使用的不同方法不仅仅是方法上的选择,同时也是不同的认识论假设选择(关于知识、社会世界、人性)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的选择(关于社会计划和社会调查所期望的结果)。这些可供选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关于我们知道些什么以及怎样知道)、意识形态立场(关于社会和社区生活的价值)是他们各自方法的组成部分。

表38.1对四类当代的评估方式进行了描述性的分类。和类似的分类一样,各个类型之间的边界只有在对它们进行描述的时候才会清晰起来。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概念的争论、实际的实践和类型的边界一直是相当的不固定。第一种类型在计划评估中代表了历史主流传统,它受政策制订者和资助者的利益所导向,其典型特征是,它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在限定的成本—效率的情况下,与它的关键竞争者相比,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一类型提出了对社会支出中可说明性的反复要求,这些包括巴洛的联合之路委员会对计划结果方面的信息需求,作为州管理者的格林鲍姆在他的社会福利计划中对成本与收益方面的信息需求。同时,在这一类型中,在项目评估所假定的客观性和真理主张的掩饰之下,科学仍被作为调节的理想。

表 38.1 当代正式计划评估中的主要方式

认识论	主要的价值观	主要的受众	擅用的方法	典型的评估问题
后实证主义(Cook,1985)	效率、可说明性、成本-效益、政策启发	高层次的决策制订者、资助人、社会科学团体	定量的:实验和准实验方法、调查、建立因果模型、成本—效果分析	预期的目的是否达到并归功于计划?这一计划是最有效率的选择吗?
功利的实用主义(Patton,1997)	效用、实用性、管理的效果	中间层次的计划管理者和现场管理者	折衷的、混合的:结构的和非结构的调查、访谈、观察、记录分析、小组访谈	计划的哪些部分运行良好,哪些部分需要改进?对于组织的目标和任务,计划是否有效?谁喜欢这一计划?
解释主义,建构主义(Stake,1995)	多元论、理解、背景论、个人经验	计划指导者、职员和受益人	定性的:个案研究、开放式的访谈和观察、记录回顾、辩证法	由不同的股东所经历的计划如何?计划在哪些方面是有意义的?
批判的社会科学(Fay,1987)	解放、授权、社会变迁、平等主义、批判的启发	计划受益人和他们的社区、行动主义者	参与的、行动导向的:在评估议程中的股东参与、数据收集、解释、行动	在这一背景下,计划的前提、目标和行动通过哪些方式来维持权力和资源的不平等?

第二种评估方式类型的兴起与经典实验科学为计划决策的制订提供可信的、及时的和有用的信息的失败相对应。正如早先的实验所清楚显示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是 Head Start 评估;Cicirelli & Associates,1969),实验主义的逻辑不能很好地转化到真实世界的社会背景之中。因此,第二种类型将注意力重新聚集到决策制订者的需求之上,尤其是现场的决策制订者对管理决策有用的计划信息需求方面的实践需求。这一类型可以满足里诺尔兹对有利于计划发展方面的信息需求。因其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基础,这一类型在实践问题的解决上包含了折衷方法的选择。巴顿(Patton,1997)的实用导向的评估是这一类型的典范。考虑到其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基础,他的定性评估的方法也属于这一类型(Patton,1990)。

但正是在第三种类型中,长期根植于哲学和学术的传统如解释主义和民族志学之中的评估的定性方式,已各自寻找到了他们的家园。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评估的定性方法跨越了定性调查的多个"时刻"(参见:Lincoln & Denzin,本书第41章),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模糊类型和表达/合法化危机到今天的实验的后现代主义。评估中大多数的方法共享社会科学知识的解释学观点,促进

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和对定性方法的偏好。同时也受计划评估中反应迅速这一传统的影响(Abma,1997a;Stake,1975),这些方式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过表露它们对背景化的计划的理解,寻求表现最接近被评估计划的股东,即计划的工作人员和受益人的利益和尊重他们的经验。更深入一些,背景化的理解可能也是其他股东的利益所在,比如,亚里桑那州议员希古罗在将国际货币政策和美国的对外关系联系起来时的利益。斯泰克(Stake,1975)、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1981)的早期作品给出了这一类型的轮廓。正如在本章稍后将谈到的(也正是贯穿本书的),这一类型中当代的研究工作正以有效的方式塑造着它自身。

最后,第四种类型代表了"开放意识形态"的评估方法,它明确地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价值观议程,如拉尔辛安(Rawlsian)的社会公平(House,1990)、授权(Fetterman,1994)、批判的种族意识(Ladson-Billings,1998)或社会变迁(Ryan,Greene,Lincoln,Mathison,& Mertens,1998;Whitmore,1994)。沃尔夫在他的评估工作中对提倡本土的美国主权的明确期望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类型。如前所述,所有的评估方式提倡特定的观念和价值观:"他们给予那些持有这些观念的股东以优待,并选择那些能使这些观念能得到实现的方法论。"(Greene,1997,p. 27)第四种类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评估而言,必要的基本原理首先是提倡某些观念和价值观,其次才是对特定的计划的问题的回答。而对其他大多数的评估者来说,回答计划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在当代评估方式的第四种类型中有一些不同的哲学观点,包括批判社会科学、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在评估当中,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民主评估(MacDonald,1976)和行动导向的评估(Carr & Kemmis,1986)是早期的例子。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1989)的第四代因其在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上提倡行动主义意识形态,也保证了检查。

尽管我在表38.1中努力在意识形态、方法论和技术方面将四种类型的评估方式区别开来,但在评估思想中方法论仍占据了支配的地位(Greene,1992;Schwandt,1998)。这一点在通过他们的主要方法来给不同的评估方式命名时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一命名模糊了依赖定性方法的评估方式之间的重要区别,比如Stake,Guba & Lincoln,Patton,Eisner,Schwandt,MacDonald所倡议的那些方法(这一点我已在本书的第一版中讨论过;Greene,1994)。它也将人们的注意力误导到评估是如何进行的(定性地),而不是为什么要进行评估(帮助提高计划、推动民主对话、提倡多元主义)。更进一步,评估理论和实践的方法论主导错误地将评估者研究工作复杂的政治背景简单化。

实施定性评估的判定逻辑

尽管评估中不同定性方法的哲学基础存在着变化,但大多共享一套核心的假设和观点,这些假设和观点可归为建构主义和解释主义。正如施瓦特(Schwandt,1994)所提到的:

> 这些见解的支持者有一个目标,即从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角度来理解生活经验的复杂世界。这一目标被不同地认为是对生活世界、对观点的着眼点、对理解意义或对把握行动者对情景的定义等不同方面的持久关注。构成调查的一般目标的生活现实和特定情景的意义被认为由有社会行动者来建构的,即,特定的行动者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通过长时间的、复杂的,包含历史、语言和行动的过程,建构着时间和现象的意义。

他继续说道:

> 建构主义者深信,我们所习惯遵循的客观知识和真理是观察的结果。知识和真理是被创造而不是由思想来发现的。他们强调现实的多元性和弹性特征——称其为多元是因为现实可由不同的符号和语言进行系统表述,而有弹性的意思是指现实可以被塑造为适合有意识的人类有目的的行为。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调查者寻求对背景化的意义的理解,对既定背景下由行动者经历和建构的人们行为和互动意义的理解。这一目标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区别于物理世界的社会世界不会独立地存在在那里,等待着聪明和富于技巧的社会调查专家们去发现。更确切地说,社会世界的情感、语言、符号、互动、政治的方面和它们的意义都是由人类行动者建构的。这些建构受特定历史的、政治地理的以及文化的实践和话语的影响,受那些进行建构的人的意图的影响,无论他们尊贵与否。因此,这些建构是多种多样的、多元的、偶然的和有背景的。

社会调查的基本任务不是去发现外在世界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特性,不是去回答人群的代表性问题,也不是去提炼和联系所观察到的原因和结果。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去理解在被研究的背景下人们所建构的意义,因为是这些建构构成了社会现实和形成了人们行动的基础。这一任务本身就是解释性的,它需要调查者"去阐明意义建构的过程……对这些意义进行解读;它所提供的是调查者对被研究的行动者的建构的建构"(schwandt,1994,p. 118)。也就是说,解释性的调查者无法知道另一个人的生活经验的意义,只是调查者对所讲述的意义的描述和表现(Lather,1991)。在这些方式下,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调查无可争辩地成为主观主义者的调查,调查者的世界观成为特定背景下对意义的建构和表达的一部分,调查者的偏见、经验、才智和洞察力全都成为被建构和描述的意义的一部分。

价值观因此与认识纠缠在了一起,而认识又与存在和行动纠缠在一起。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解释性的研究是"任何事实都有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能导向不同的事实"(Smith,1989,p. 111)。即,持有不同理想和价值观的人即使在同样的情景下也能建构出不同的意义。对建构主义者而言,解释性的调查推崇生活经验和人类意义的价值观层面,但并不指定或提倡任何特定的价值观。然而,一个特定的建构主义调查的价值观为调查中的意义建构者——被研究的成员、调查者和更大的社会——所持有,因此建构主义是多元的。

从方法论上看，与介入主义者(interventionist)的预测和控制形成对照的是，建构主义以人类调查者作为意义的主要收集者和解释者，使用定性方法，进行自然发生的调查设计，进行背景的、整体的理解，因此是与自然的背景是最一致的(Guba & Lincoln,1989;Lincoln,1990;Patton,1990)。

可能更有意义的是，建构主义支持调查/评估的论述以方法的问题为中心转移到以目的和角色的问题为中心。技术的质量相对于理解的质量和意义来说是第二位的。少数的建构主义者认为任何特定的程序都无助于提高对调查者解释的接受(例如,Barone,1992;Smith,1989,p.160)，而大多数的建构主义评估者喜欢他们研究中的一些程序性的结构。这部分的是因为社会计划评估的背景需要保证方法论的质量和数据的完整性，如果不被至少是一些的评估使用者认为是可信的、能站住脚的、富有启发的、有用的，那定性的评估对社会政策和社会计划所做的贡献就会微乎其微。

在这一方面，评估者为了保证他们的评估知识主张是以经验为基础的陈述，而不是调查者的偏见，因而特别关注条件和方法。从哲学上看，这就引起了一个矛盾:"为建立在非基础性的假设之上的知识提供一个方法论的基础的努力"(Smith,1989,p.159)。接下来的实践部分描绘了评估者这样做的一些方式的轮廓，例如，使用因为悠久传统而受尊重的三角测量程序。这些对条件问题的反应一般都跟随着史密斯(Smith,1989,1990)的领导，他将关注从基础性的方法转移到启发式的程序之上，比如，将程序条件作为判断解释好坏的基础(Schwandt,1994,p.130)。尽管如此，对许多定性评估者来说，基本原理和实践的冲突性的需求，尤其是为保证质量围绕条件和程序的，仍旧很强烈。

超越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对判断今天的许多定性评估的哲学逻辑进行了刻画，但建构主义自身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一些评估者已经加入到这些挑战中来。我将在基本原理的层次上举两个主要的例子①。在本章的结尾部分我将回到当代挑战和未来方向的主题上来。

首先，十多年前，施瓦特(Schwandt,1989,1996,1997a,1997c,1998)就已提出了将实践哲学作为使社会科学的实践和话语概念化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实践哲学关注称为实践的活动的模式，它的主题是一个个体如何作为社会的成员管理他(她)的生活和事务"(Schwandt,1998,p.9)。去实践评估意味着需要从方法论彻底转变到政治—道德的框架，要更少地关注完美和保证我们的知识主张(Schwandt,1996)，而更多地关注于帮助实践者来仔细考虑并发展他们自己明智的实践。

第二，后现代的挑战存在于评估实践所有的当代形式中(Mabry,1997)。例如，在许多后现代的思想中，宣称知道不仅是部分的和偶然的，也是根本不确切

① 这两个例子引自:Greene,1998a。

的。而且,一个后现代的作者是对所宣称知道的知识的建构者,读者也是如此。对这些挑战的反应之一是放弃现代主义的原则和先入之见以有助于真正地实践后现代评估。雅布马(Abma,1997a,1997b,1998)对后现代评估实践提出了一些富有灵感的例子,它们接受后现代的怀疑,但没有向虚无主义让步。例如,雅布马(Abma,1997a)在她的研究工作中提出了"开心"的概念和经验:"一个开心的人不会与将他或她与其个人的信仰太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或她欣赏重新描述的力量,欣赏能使新的和不同的事物成为可能和重要的语言的力量"(p.44)。雅布马还援用后现代作者"自我反身、多种声音、多种解释"(1998,p.434)的文本,以努力将她的评估报告雕琢成为"开放的、模棱两可和不可预见的……没有总结、结论和建议"(1997b,p.106),并因此作为对话(dialogue)的邀请(1998)。

定性评估的实践

至此,我已对社会计划评估的独特背景和特征进行了描述,介绍了当代评估理论和实践的类型,解释了存在于大多数的"定性"评估方式之下的建构主义哲学。现在转入实践的部分,我需要承认的是,在这一领域,评估者在实践中,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方法论上,都极少采取一种"纯粹"的形式。评估现场背景中复杂的、多元的需求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指导实践的框架,并引发它们之间的对话。事实上,今天的评估专家以其辩证的、对话的气质,以其对理解的多种形式和多个层次的开放性,以其对理解的背景需求的反应而显著,而不是他对某一基本原理或方法的坚持。

我将在这里举一个定性评估的例子以展现它的一般特征。在强调这些特征后,我将继续讨论这一方法对评估的挑战。

举例

我们来看对一个州一级水平的福利改革行动的评估,这一改革旨在在接下来的5年中,使目前在州福利名单中四分之三的人得到稳定的工作。此项改革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对目前依靠福利的人来说,要获得长期的经济自足,需要首先集中于"发展人力资本",接着再转向工作场所。这一计划的发展过程包括强化的、因材施教的教育,个人的发展,职业培训和求职活动。

为了向政策的和当地的计划的观众回答这一改革计划的质量和效果等评估问题,定性思维的评估者将必须主要去理解个体的参与者——接受福利的人、计划职员、教育和经济发展领导者——在特定的背景下是如何经历这项计划的。因为计划的质量和效果的意义是在这些背景化的经验下塑造而成的。此项福利改革的定性评估者可能有意抽取集中的数据,收集少数计划社区和参与者以获得具有相关特征(如人口统计学的、经济的和雇佣历史,以及文化规范)的异质性样本,以此得到较为广泛的、所期望的、不同的经验和意义。然后,对于这样的样

本，评估者可能进行长期的现场观察，以对在福利计划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生动的描述并对如何随着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变化进行说明。“人力资本”的概念在这些变化的计划地点是如何被预想到并实现的？对不同的接受福利的人来说，典型的计划经验是什么样的？社区操作者如何界定“长期就业”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不同项目方案中变化多端？

为了理解计划参与者在计划中所发现或没有发现的意义，以及这一意义是如何在计划的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评估者可能会在每一个地点抽取 10 ~ 15 个福利接受人作为样本，进行个体访谈和回顾他们的计划记录。评估者也可能在每一个地点抽取一些计划职员和管理者，一些经济发展领导者，以及一些关键的社区成员，就他们对福利计划的感知和经验进行个体或群体的访谈。新的计划关于对人和经济发展的强调的观点，其范围是什么？新的计划中所培养的经济自足的性质，在社区中存在哪些一致和不一致？作为一种选择，这些计划职员和社区的感知与结构化的、定量的信件调查结合在一起，可能会更有效和更有代表性一些。

然后，评估者会将这些计划实施中的不同个体的故事整合进社区的叙述之中，这些社区叙述将传递评估者对每一研究地点中福利改革行动的背景化的、经验的意义的表达。例如，一个社区叙述可能会强调福利改革计划中“职业提升”的美好设想和所提供的有限的、低技能的教育之间的分离；另一个社区叙述可能会强调计划的行动时间表与一定比例的计划参与者的日常生活节奏和实践之间的互补性。还有一个社区叙述可能集中于将计划参与者的经验刻画成为压抑的和去人性化的，核心的计划职员也对他们最近转移到“最糟糕的邻里福利办公室”而气愤不已。社区叙述可能整体性地描述、分析和解释福利改革行动在每一不同的背景下有意义的联系和分裂。除了描述和分析之外，这些叙述的政治政策和行动解释会借助于一些个体的评估者和股东的价值观和信仰（Wolcott，1994）。

而且，这些社区叙述不只是由微观水平的事件和互动形成，它们同样由宏观水平的经济、政治，尤其是就业市场的因素、力量和趋势塑造而成。如果将这些叙述放在更大的州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之下，它们将会获得更多的意义。而且，对这一改革行动的成本—收益分析肯定是评估所期望的一部分。因此，除了对所选择的社区个案进行集中研究外，评估还获取和分析宏观水平的信息——大多数可能是定量的形式——如福利依赖、经济和就业市场指标，同时还会评估计划的成本和产出。

作为建立在内部经验和意义的基础之上，受制于机会和更广阔市场的约束，这些评估数据将被编入对计划质量和效果的整体描述之中。这一描述可以被提供作为对那些研究过的对象和没有被研究的对象的一个整体性的表述，虽然对这一延伸不是特别的确定。描述当中充满了计划活动中成功和失望的、完成的和未完成的瞬间。因此，这一描述提供了一个背景化的、复杂的、动态的、充满了价值观的，同时也有必要是局部的对福利改革的陈述。尽管整体的、解释学的理

解是定性评估实践的目标,但社会政治背景中的人类现象仍相当复杂。因此,所有解释性理解的表述必然是局部的。

作为故事讲述的评估

如上面的例子所强调的,定性评估是需要讲述故事的叙事技巧——讲述在复杂和动态的社区中个体或群体的故事,讲述能使人们理解这些社区的共性和个性何在的故事,讲述明显带有作者特征的故事(Barone,1992),以及那些旨在推动实践或重构政策对话的故事,通过故事的讲述来达到多元性和复杂性的评价。

作为叙事的技巧,这一评估的方式极其喜欢运用定性的方法,定性的方法需要与被研究环境中的成员直接接触,同时收集用这些成员自己的话表达的经验信息。这样的方法能独具一格地对内在的经验和观点进行理解。现场的观察和个人的访谈因此成为定性研究的主要支柱,同时还有对相关的文献和记录的回顾作为支持。但是,正如以上福利改革的例子所显示的,大多数的评估还需要大的、有代表性的评估参与者的样本信息,或关于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和趋势方面的信息,以及成本—收益方面的信息。为了这类的目的,定量方法在定性评估中无疑是被接受的。事实上,在所有评估实践的类型中,评估者为了获得对计划更广泛和深入的理解,往往进行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收集到的数据之间的对比(Greene&Caracelli,1997)。

好的故事讲述者常常小心地选择环境并丰富地描述他们的环境,并使环境中的参与者的行动能够被解释。在这样的方式下,定性评估由对一个或几个研究个案的精心选择和对个案背景丰富、多层次的描述所构成。福利改革的例子就是由对几个社区的选择所构成,这几个社区是作为工具型个案(instrumental cases,Stake,1995)——选择个案不是依据研究者内在的兴趣,而是考虑所选择的社区能为研究者提供对整个改革行动的理解。由于建构主义的意义深深地根植于背景之中,因此对这些社区的人际关系的、市政的、社会经济的、文化节奏的了解是很有必要的。例如,什么样的社区特征会影响一个计划参与者希望或失望、融入或孤立的感觉,以及这些感觉是如何与他或她的计划经验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更多的定性方法和指标,将这些工具型个案放在更大的州的经济背景之下,这也是建构意义和理解整个改革的重要部分。

作为一种叙事技巧,定性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讲述者——评估者。不同的评估者将讲述不同的故事,更有经验、更在行、更敏锐和有远见的评估者通常能讲述更有意义的故事。一个评估者在他的研究工作中的位置反映了研究者个人的经历和政治偏见,同时也反映了作为一个个体和一个评估者,他在研究中选择推动谁的利益(Greene,1996,p.28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观里,这种类型下的大多数评估者会偏向于那些最接近被研究计划的人的利益,即那些计划职员和参与者。这样的声音和观点是上面福利改革的例子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在建构主义的世界观里,这种类型下的大多数评估者也忠于多元主义并在他们的

故事里表述所有的观点和意义——对一个全面的故事来说,这也是需要的。

最后,评估者不仅要定义和定位研究工作中的自己,还要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在整个世界中下定义和定位(Greene,1996,1998b)。研究者必须对他们的故事带来的影响负责。在他们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之下,这一类型的评估者大多将他们的故事定位为提高特定背景下的实践的指导(Patton,1997),或由不同利益的股东对计划进行学习和观察的机会(Stake,1997),以及定位为重新建构更大的政策对话的工具(Weiss,1998)。同时,建构主义和解释主义可能会将他们的故事定位为一些不断的要求,如关注重要的复杂性、合法的多元主义、构成美国当代政治生活的政治力量。为了在他们所研究的社会实践和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中有发言权,他们不仅需要讲述他们的故事,还必须坚定而自信地为其在社会议程中争取空间。

作为故事讲述的评估所面临的挑战

但是,那些读到或听到评估者关于州一级的福利改革的重要性的故事的人,如果这个故事是个好故事,他们将如何做出决定呢?他们如何知道评估者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不是在鼓吹他们自己关于福利改革的观点呢?评估者如何知道自己的主张的界限何在?作为一个"定性"的评估者,对那些投入到评估中的人,对那些被研究环境中的成员以及更大多数的公民,如何公平和公正地履行他的职责呢?例如,当评估者判断福利改革的方式在这一州是有效的,但福利改革的政策的方向被误导了,这样谁的利益能得到提高呢?

这些问题揭示了在所有的评估类型中,社会计划评估必要的价值观维度。他们对在判断调查的质量(这一故事如何?)和计划评估的质量(这一计划如何?)时所运用的条件提出了异议。他们对评估者在故事中的叙述进行了挑战(你是在鼓吹自己的观点吗?)和对评估的真正目的提出了质疑(谁的利益得到了提高呢?)。正如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与所有形式的评估有关,而且在定性评估中更为显见,因为定性评估明确地承认知识主张中的价值观立场。更成问题的是,定性评估在理论上没有哲学基础,实践中又是多元的价值观取向。对于这些挑战,建构主义对定性评估的辩解并未提供现成的答案,而只能由每位评估者从每一个背景当中去寻找。

在以上的福利改革评估的例子中,评估者可能会依赖可识别的调查条件,如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1985)的可信赖性条件。这些条件(信度、应用性、独立性和一致性)被建构为平行于传统的调查条件(分别是内在效度、外在效度、可靠性和中立性),因此,可以被关键的评估受众、现场水平的计划雇员和州一级的计划决策制订者等认可为熟悉并理解为合法①。为实现这些条件的程序性的指导也是熟悉的,因为它们非常依赖方法论的论点和技术——多样化的抽样,一

① 来自:Lincoln & Guba,1985:评估发现将①与背景化的活的经验一致的时候可信;②在应用于其他相似的背景下时,那些进行应用的人如果认为是可以应用的时候才可行;③当作出的方法决定是可辩解的和合理的时候才可靠;④在推论能通过分析回溯到实际收集的数据的时候是能证实的。

致的三角测量,以及控制偏见。为了接受不熟悉的认识和思考方法,许多重要的评估参与者需要像这些一样熟悉或可识别的评估建构。尽管建构主义思想的特性不像其他一些提议受重视,但如沃尔科特(Wolcott,1990)的理解,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 1989)的真实性,以及行动研究者的证明有理的行动(Greenwood & Levin,1998),这些可信赖性的建构对关注他们故事的可接受性和用处的评估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务实的选择,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的参与者"来说更是如此(Robert Stake,personal communication,1999. pp. 5,6)。

但是,对什么样的目的和目标来说有用呢?尽管其他领域的定性调查为了它们的研究工作,可以不受限制地对不同的政治和行动议程进行实验,但社会计划评估者却受到更多传统和背景的约束。拥护某种主张在许多评估圈子中被视为一个令人不安的幽灵,因为它对无个人利害关系的、中立的评估者的传统立场构成了挑战,这些评估者认为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发现手头上的评估计划的效果(Greene,1997)。但是,在当代社会计划评估中,拥护某种主张作为对某些利益的推动,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对任何一个评估来说,许多有着不同利益的股东需要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在这一点上,较之于其他类型的评估,定性评估在清楚地承认它的偏见的同时,去努力实现多元主义的理念。多元主义的理念意味着对观点和声音的包容,即既能找到直言的股东的观点,也能找到沉默的股东的观点,而后者常常更长袖善舞。但是,这样共同合作的努力将是不足的,因此多元主义的包容性很少能完全实现。

此外,定性评估者知道,他们所宣称的理解是能享受特殊待遇的观点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可避免是利益相关和有偏见的。福利改革评估者,以其建构主义的世界观,在其对计划质量进行判断时,可能会强调成本—收益之上的背景化意义。在相似的方式下,巴顿(Patton,1990,1997)的实用观念能使现场的决策制订者受益,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1989)的第四代评估将维护权力最弱者利益的授权主义意识形态与建构主义哲学整合起来。斯泰克(Stake,1997)的建构主义信念和改革主义观点使人们对那些全力以赴为改革斗争的人产生了同情心。简而言之,尽管否认了拥护某种主张是偏见,但定性评估者还是承认所有评估不可否认的知识,并以他们自己的哲学和个人经历利用了其中最令人舒服的部分。作为社会意义和行动的重要制造者,我自己的知识强调了复杂性和多元主义的重要性。

定性评估的历程

开始

计划评估的建构主义、定性方式伴随着理性思想和社会信仰(Cook,1985; Greene & McClintock,1991)领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在美国的评估团体之中

(Stake,1967,1975)两个有意义的进展①。第一个进展是实验科学作为社会计划评估(和其他应用社会科学)的范式被废黜,自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引导大多数科学实践的实证主义哲学的断裂导致了这一结果②。作为对实验主义的代替,解释主义哲学和定性方法进入评估的论文之中,但对此的争论和探讨也接踵而来。起初,既对方法论基础,也对实践基础进行争论(表现为评估的定性—定量争论,如Cook & Reichardt,1979;Reichardt & Rallis,1994),使得评估的定性方式扎根在许多评估理论家和方法论学家的头脑之中。通过他们合情理和有吸引力的实践,这样的方式在整个评估团体中成为可以接受的替代者。

鼓励并使定性评估方式出现和成长的第二部分变化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美国社会信仰体系的变化。库克(Cook,1985)这样描述这些变化:

(1)随着所感知到的伟大社会的失败,标准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权威也随之下降(参见House,1993)。

(2)随着越南战争、水门丑闻和其他政府的惨败,政治人物的权威也随之下降。

(3)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多元主义的上升,最明显的如人权运动和妇女运动。

在社会思想方面的这些转变与替代范式的出现,包括理解和实践社会科学的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有着相当的一致。

今天与重要评估理论的联系

在当代的形式上,社会计划评估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刚刚开始发展和改进它的理论(Shadish,Cook,&Leviton,1991)。在即将到来的十年中,在重要的理论发展中,有可能继续塑造评估思想和实践的是两个观念:①对计划行动和变化的理论进行改造,这一理论对评估来说,是重要的概念框架;②对评估的主要角色的重新定义,这一角色是作为活跃的、再生的、包容的知识的一个机会,以及对强调评估过程的重新定义。评估理论的这些发展使评估的社会政治角色回到了中心位置,而不是它的方法和技术,也是对评估的教育和行动潜力的评估。他们也从定性的评估实践中,通过对解释方法有意义但不是排他的依赖,通过对建构主义世界观并非彻底的支持来获得力量。下面我将简要描述每一个进展。

评估计划的理论

在美国强大的时候,早期的计划评估被设计成对计划理论的实验性测试,和对计划输入和计划输出之间假定的因果关联的实验性测试。那一时期的评估渴望为计划参与者测量结果并将结果与那些没有参与计划的相似的人进行比较,对于执行的或经历的实际的计划,很少去关注数据的收集。因此,通过这一过程,所观察到的发生或未发生的计划结果是未知的——因此,对这些早期的评估

① 参见本书的第一版中对定性计划评估进行详尽探讨的章节。

② 在有关科学哲学不计其数的著作中,哲学家伯恩斯坦(Bernstein,1983,1992)的作品是其中最易理解的。

所贴的"黑箱"评估的标签表明他们对通常认为是"独立"的研究的反感。正如李·克龙巴赫等(Lee Cronbach et al. ,1980)所观察到的,"一个好的评估问题应得到有差别的答案,而不能将计划、计划的交付和参与者的反应作为未检验的因素而置于一个封闭的黑箱之中"(p.5)。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一些评估理论家(知名的有 Len Bickman,1987;Huey Chen & Peter Rossi,1983;Carol Weiss,1972)开始为"理论驱动的评估"和在理解、评估计划的"理论变化"的指导下进行的评估重新进行辩护。韦斯(Weiss,1998)写道:

> (计划)理论给评估者对于去何处进行观察以及要发现什么提供指导。
>
> 单纯对(计划)理论进行建构暴露出幼稚和简单的期望……在评估开始之前理论可以是一个学习的工具。
>
> 一旦掌握了数据,(分析评价)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描述实际所发生的……这对研究计划中的指导者和职员来说是重要的信息,据此他们可以对理解进行重新思考并对未如期发生的活动进行计划。
>
> 基于理论之上的评估(也)可以提供解释、手段和目的的来历,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地与政策制订者和公众进行交流。

对于基于理论之上的评估,另一个重要的论据是其对可归纳的知识的贡献,这些知识是关于社会介入是如何运行的,以及推动或阻碍社会介入成功的条件和因素(Cronbach,1982;Weiss,1998)。定性评估能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整体性的计划描述能将计划建构转换为不同的社区价值观之下的背景化经验。评估者的计划描述能用人类的尊严与耻辱,成就与失败的故事补充回归系数的不足,比如职业培训计划参与者净收入的增长。计划描述也能以人类多样性的不和谐与复杂来对影响的大小提出挑战,而影响的大小将计划的参与者均质化和聚集起来。确实,对社会问题和如何最好地解决它们日益迫切的对话需要所有评估观点的辩证参与,需要对复杂性、背景化和由评估的定性方式所提供的人类媒介的坚持。

股东参与的评估

为计划理论的改造提供一些参照是一个重要的议程,是对评估的参与和协作方式的拓展与应用(Ryan et al. 1998;Whitmore,1998)。这些方式强调为了提高所有权和评估结果有用性的目的(Cousins & Earl,1995;Patton,1997),或为了推动民主化的社会变化的一些形式,如社会公正(House,1990)或授权(Fetterman,1994)①,股东应积极参与社会评估过程。在这些(诚然是不同的)方法中,参与其中的评估者将评估构建为在某一背景下参与、学习和行动的一次机

---

① 参与性评估的这两组目的反映了它的两个起源:①实用的(Patton,1997)和基于股东的(Gold,1983)评估;②来自于评估领域之外参与行动研究的传统(Freire,1972;Greenwood & Levin,1998)。参见怀特摩尔(Whitmore,1998)关于评估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详细讨论。

会。因此在进行评估的过程中——股东参与其中的方式，哪些特定股东参与，弱势声音如何被听到，谁代表谁说话——这些成为了核心，而正是关于使用了什么方法的问题，甚至不是要得到什么样的实际的结果的问题。

实用导向的参与评估者正推动着评估在组织的学习中所扮演有重要意义的角色，这一角色在组织的发展循环中打造着当代对战略计划的强调和质量管理之间的联系（Cousins & Earl，1995；Patton，1994；Preskill & Torres，1998）。社会行动导向的参与评估者正提高评估的潜在重要性，这一潜在的重要性能帮助我们拓宽和加深对重要的社会事件的深思熟虑和对话（Greene，1997；House & Howe，1998；Ryan et al.，1998）。在参与性评估的所有这些正在进行的发展变化中，定性评估将继续扮演一个中心的角色，尽管这一角色不是唯一的和独占性的。包容而非独占是当代辩证的、对话的评估的重要特征。

未来的方向

正如通过本书所生动展示的，思考和从事“定性研究”的方法在继续发展和变化着。和其他应用社会科学的科学家一样，社会计划评估者也面临着科学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带来的挑战。下面是一些例子①。

对定性数据的特征的挑战

> （定性）访谈从根本上说是不确切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思想、情感、恐惧、权力、期望和需求在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之间复杂的表演无法被捕捉和归类……通过数据简化技术，当我们认为在“解释”意义或一个访谈的意义时，我们在将我们所制造的意义的确定性叠加在不确定性上，用我们的发现和建构将模糊性替换掉。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似乎我们已经“发现”或“建构”了最好的，或最关键的或最重要的解释，但实际上我们在错误地描述所发生的一切……（不是在分析中）研究者将他的解释填充进（访谈者）不确定的开放性中；研究者还将名称、类别、建构、概念性的计划和理论强加在不了解的事情之上，并相信不确定性已被定位、建构和了解。秩序被创造了出来。研究者不安的情绪由此得到了（暂时的）平静（Scheurich，1995，p. 249）。

对作为意义的表达的挑战

> 后现代主义通过挑战我们认可的表达调查结果的形式的假设，由此对表达社会科学调查的新形式开辟了空间。佩吉特（Paget）……指出，“奇怪的是，强调通过对最弱的形式——写作的文本——进行分析，探索它的细节，而忽视了说话者的态度和意图。”……

---

① 这些例子引自：Greene，1998a。

……在创造对调查新的表达中,我们需要努力表达参与者经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和)承认我们在表达的建构中的角色,我们在表达中的声音。(进一步而言)在后现代的语汇中,知识是片面的、有条件的和背景化的,表达也是如此(Goodyear,1997,pp. 64-65,69)。

对我们研究的政治伦理的挑战

我们如何处理“热点”信息呢,尤其是在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妇女和男人被右翼和议会妖魔化的时候?……例如,为了生存,妇女事实上不得不成为福利骗子,对这样的信息,我们该如何去做呢?(“他每月来一次并给我一些钱,我可能不得不受到打击,因为孩子需要这些钱。”)我们所研究的一些对象的用药超过了我们的期望……忽略这些数据是否认经济困难时期的影响,而报告这些数据则冒着可能错误解释的危险。

在历史中的这样一个时刻,当很少有观众愿意去反思社区和国内暴力复杂的社会根基,思考对福利唯一依赖的不可能性,或者去理解充斥于穷人和工人阶级中的复杂性、爱、希望和痛苦,我们该如何处理污染我们数据的旅行者丢弃的臭袜子呢?同时,我们如何能冒着浪漫化的危险,或冒着否认由国家、经济、邻里和亲戚所发起的对穷人和工人阶级家庭的打击所带来的破坏性的影响的危险呢?(Fine & Weis,1996,pp. 258-259)

这些对我们运用建构主义实践社会计划评估的核心构成了挑战,定性的世界观有些令人气馁但没有被击溃。部分是由建构主义发起,他们继续侵蚀着评估对方法论热情和技术专家的专注。即使他们使我们对认知、理解和解释活的经验的自信获得了解放,他们还是肯定了建构主义评估者对这些经验的意义的强调。他们也证实了建构主义评估者对价值观的自我意识,我们在研究中的位置和我们的研究在世界的位置。

作为社会评估者,我们对不同的观众有责任,这些观众既包括有权力的政策制订者,也包括那些我们评估计划所期望的受益者——那些无权的穷人及大多数的公民。因此,我们的工作必须用社会政策制订的政治现实平衡知识建构、解释、表现的社会科学理论。这一平衡不是通过盲从、偏袒,而是通过对包容性、对多元主义明确的承诺,以及对保证所有股东的声音成为对话的一部分的承诺(Datta,1999;House & Howe,1998)。包容性既尊重建构主义的整体论,也尊重民主对话。我们必须承认,进行这样一个明确的承诺常常被视为鼓吹或偏袒,因此我们的挑战成为将这一承诺创造成为公平的、非对抗性的表达(Datta,1999)。

我们并非是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来进行项目评估,而是引导我们的技巧,以使它能对不同的观众作出反应,包容不同的观点,鼓励对话,以及建构多种多样不同的理解和对那些理解的表现。我相信建构主义的、定性的评估类型——以它响应积极的特点和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将活跃在对话性的评估发展中。现在轮到我们每一位建构主义的评估者来争取一席之地了。



参考文献

Abma, T. A. (1997a). Playing with/in plurality. *Evaluation*, 3, 25-48.

Abma, T. A. (1997b). Sharing power, facing ambiguity. In L. Mabry (Ed.), *Evaluation and the postmodern dilemma* (pp. 105-119). Greenwich, CT: JAI.

Abma, T. A. (1998). Text in an evaluative context: Writing for dialogue. *Evaluation*, 4, 434-454.

Barone, T. E. (1992). On the demise of subjectivity in educational inquiry. *Curriculum Inquiry*, 22, 25-38.

Bernstein, R. J. (1983).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ernstein, R. J. (1992).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Bickman, L. (Ed.). (1987). *Using program theory in evalu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Carr, W. L., & Kemmis, S. (1986). *Becoming critical: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action research*. London: Falmer.

Chelimsky, E. (1997). The coming transformations in evaluation. In E. Chelimsky & W. R. Shadish (Eds.), *Evalu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1-26).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en, H.-T., & Rossi, P. H. (1983). Evaluating with sense: The theory-driven approach. *Evaluation Review*, 7, 283-302.

Cicirelli, V. G., & Associates. (1969). *The impact of Head Start: An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Head Start on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development* (Report to the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Athens: Ohio University/Westinghouse Learning Corporation.

Cook, T. D. (1985). Postpositivist critical multiplism. In L. Shotland & M. M. Mark (Eds.),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pp. 21-62). Beverly Hills, CA: Sage.

Cook, T. D., & Reichardt, C. S. (Eds.). (1979).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evaluatio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Cousins, J. B., & Earl, L. (1995). *Participatory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Studies in evaluation use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New York: Falmer.

Cronbach, L. J. (1982). *Designing evaluations of educational and social program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Cronbach, L. J., & Associates. (1980). *Toward reform of program evalu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Datta, L.-E. (1999). The ethics of evaluation neutrality and advocacy. In J. L. Fitzpatrick & M. Morris (Eds.), *Current and emerging ethical challenges in evaluation* (pp. 77-88).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Fay, B. (1987).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etterman, D. M. (1994). Empowerment evaluation. *Evaluation Practice*, 15, 1-16.

Fine, M., & Weis, L. (1996). Writing the "wrongs" of fieldwork: Confronting our own research/writing dilemmas in urban ethnographies. *Qualitative Inquiry*, 2, 251-274.

Freire, P. (1972).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Gold, N. (1983). Stakeholders and program evaluation: Characterizations and reflections. In A. S. Bryk (Ed.), *Stakeholder-based evaluation* (pp. 63-72).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Goodyear, L. K. (1997). *"A circle that it's time to open": Using performance as a representation of a participatory evalua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ornell University.

Greene, J. C. (1992). The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 *Curriculum Inquiry*, 22, 39-45.

Greene, J. C. (1994). Qualitative program evaluation: Practice and promise.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30-544). Thousand Oaks, CA: Sage.

Greene, J. C. (1996).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scientific citizenship: Reflections and refractions. *Evaluation*, 2, 277-289.

Greene, J. C. (1997). Evaluation as advocacy. *Evaluation Practice*, 18, 25-35.

Greene, J. C. (1998a). Balancing philosophy and practicality in qualitative evaluation. In R. Davis (Ed.), *Proceedings of the Stake Symposium o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pp. 35-49). Champaig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Greene, J. C. (1998b). Qualitative, interpretive evaluation. In A. J. Reynolds & H. J. Walberg (Eds.), *Evaluation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productivity* (pp. 135-154). Greenwich, CT: JAI.

Greene, J. C., & Caracelli, V. J. (Eds.). (1997). *Advances in mixed-method evaluation: The challenges and benefits of integrating diverse paradigm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Greene, J. C., & McClintock, C. (1991). The evolution of evaluation methodology. *Theory Into Practice*, 30, 13-21.

Greenwood, D. J., & Levin, M. (1998).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1). *Effective evaluation: Improving the usefulness of evaluation results through responsive and naturalistic approach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9). *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House, E. R. (1990). Methodology and justice. In K. A. Sirotnik (Ed.), *Evalu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pp. 23-36).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House, E. R. (1993).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Social impact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ewbury Park, CA: Sage.

House, E. R., & Howe, K. (1998). *Deliberative evalu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Chicago.

Ladson-Billings, G. (1998). Just what is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what is it doing in a "nice" field lik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1, 7-24.

Lather, P. (1991). *Getting smart: Feminist research and pedagogy with/in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Lincoln, Y. S. (1990). The making of a constructivist: A remembrance of transformations past. In E. G. Guba (Ed.), *The paradigm dialog* (pp. 67-87). Newbury Park, CA: Sage.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Mabry, L. (1997). A postmodern test on postmodernism? In L. Mabry (Ed.), *Evaluation and the postmodern dilemma* (pp. 1-19). Greenwich, CT: JAI.

MacDonald, B. (1976). Evaluation and the control of education. In D. A. Tawney (Ed.), *Curriculum evaluation today: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London: Falmer.

Patton, M. Q. (1987). Evaluation's political inherency: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design and use. In D. J. Palumbo (Ed.), *The politics of program evaluation* (pp. 100-145). Newbury Park, CA: Sage.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Patton, M. Q. (1994). Development evaluation. *Evaluation Practice*, 15, 311-320.

Patton, M. Q. (1997). *Utilization-focused evaluation: New century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reskill, H. S., & Torres, R. (1998). *Evaluative learning in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Reichardt, C. S., & Rallis, S. F. (Eds.). (1994). *The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debate: New perspectiv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Ryan, K. E., Greene, J. C., Lincoln, Y. S., Mathison, S., & Mertens, D. (1998).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using inclusive evaluation approaches in evaluation prac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Evaluation*, 19, 101-122.

Scheurich, J. J. (1995). A postmodern review of research interview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8, 239-252.

Schwandt, T. A. (1989). Recapturing moral discourse in evalu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8(8), 11-16, 34.

Schwandt, T. A. (1994).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human inqui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18-137). Thousand Oaks, CA: Sage.

Schwandt, T. A. (1996). Farewell to criteriology. *Qualitative Inquiry*, 2, 58-72.

Schwandt, T. A. (1997a). Evaluation as practical hermeneutics. *Evaluation*, 3, 69-83.

Schwandt, T. A. (1997b). Reading the "problem of evaluation" in social inquiry. *Qualitative Inquiry*, 3, 4-25.

Schwandt, T. A. (1997c). Whose interests are being served? Program evaluation as a conceptual practice of power. In L. Mabry (Ed.), *Evaluation and the postmodern dilemma* (pp. 89-104). Greenwich, CT: JAI.

Schwandt, T. A. (1998, April). *Recapturing moral discourse in evaluation—revisited.* Keynote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Kelly Conference, Ottawa, ON.

Scriven, M. (1967). The methodology of evaluation. *AERA Monograph Series in Curriculum Evaluation*, 1, 39-83.

Scriven, M. (1995). The logic of evaluation and evaluation practice. In D. Fournier (ed.), *Reasoning in evaluation: Inferential links and leaps* (pp. 49-70).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Shadish, W. R., Cook, T. D., & Leviton, L. C (1991). *Foundations of program evalu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Smith, J. K. (1989). *The nature of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nquiry: Empiricism versus interpretation.* Norwood, NJ: Ablex.

Smith, J. K. (1990). Alternativ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the problem of criteria. In E. G. Guba (Ed.), *The paradigm dialog* (pp. 167-187). Newbury Park, CA: Sage.

Stake, R. E. (1967). The countenanc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68, 523-540.

Stake, R. E. (1975). *Evaluating the arts in education: A responsive approach.* Columbus, OH: Merrill.

Stake, R. E. (1995). *The art of case study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ake, R. E. (1997). The fleeting discernment of quality. In L. Mabry (Ed.), *Evaluation and the postmodern dilemma* (pp. 41-59). Greenwich, CT: JAI.

Weiss, C. H. (1972). *Evalu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Weiss, C. H. (1987). Where politics and evaluation research meet. In D. J. Palumbo (Ed.), *The politics of program evaluation* (pp. 47-70). Thousand Oaks, CA: Sage.

Weiss, C. H. (1998). *Evaluation* (2nd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Whitmore, E. (1994). To tell the truth: Working with oppressed groups in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to inquiry. In P. Reason (Ed.), *Participation in human inquiry* (pp. 82-98). Thousand Oaks, CA: Sage.

Whitmore, E. (Ed.). (1998).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ing participatory evalu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Wolcott, H. F. (1990). On seeking—and rejecting—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 W. Eisner & A. Peshkin (Eds.), *Qualitative inquiry in education: The continuing debate* (pp. 121-152).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Wolcott, H. F. (1994).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data: Descrip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定性研究对政策过程的影响 

INFLUENCING THE POLICY PROCESS WITH QUALITATIVE RESEARCH

⊙ 雷・C・里斯特

二十多年前，科尔曼(James Coleman)写道："既没有方法体系也没有基本的方法论适合公共政策的影响研究，而这种研究却有助于未来的政策。"这一论断至今仍然正确。的确，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出现了更多的方法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概念框架，在那些自称是政策分析家或视自己工作于政策研究领域的人中间造成了混乱，政策研究的和分析的趋势可以说已变得愈发的离心化。一些对当前的政策研究现状进行批评的批评家和随之而来的太多的不同方法论的应用认为，在政策研究技巧方面的进步并没有使对思考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更加清晰。客气一点说，政策研究的方法多样性应该是受欢迎的，因为它们为困难和复杂的问题的解决带来了不同的技术和力量。

政策研究对与政策制定相关的知识基础有离心影响，对于这一论点支持与否，底线大致保持相同：政策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技艺方面的进步还没有对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有意义重大的推动作用。相反，从事与政策相关的工作人员、机构和研究中心的增加已带来了在对问题进行定义的方式、设计及进行研究的方式，以及数据和报告写作方式上的不一致和争论。政策研究者正面临一个多种研究信息过剩的状况。

一个不合直觉的逻辑是：人员的增加、对资源更多的分配、方法复杂性的增长，这些并未带来所期望的或显示出政策问题更大的清晰度和对它更多的理解。相反，现在的努力却带来对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更复杂、更难理解、有偏见的看法。更进一步，正如史密斯(Smith，1991)所认为的，这一更为复杂的趋势已将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置于难以理解问题的境地，同时也无法看到他们的行动对现状产生的影响。

然而，人们也许会承认，早期的分析，如教育或社会福利领域，无论是在设计还是政策方法的应用方面常常不是特别的复杂，但却能使政策制定者受益。换一种说法，一个充斥着华丽的"技术发展水平"的方法论、对细微的差别进行复杂分析的报告，其对有效的决策能提供的指导可能还不如从前。当前主要专注于政策研究工具是否够用，而对其实用性则没有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使得我们的

工作进入了一种模糊的状态之中(Chelimsky,1982)。

如果以上对当前政策研究状况的简要描述大致符合现实的话,则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能进行与政策过程相关的研究,这一假定是否成立?我个人认为这一假定是不正确的。研究有助于作出信息充分的决策,但进行研究的方式有待变革。我们已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我们可能会对好的研究会影响政策过程的观点持有异议。认为研究与行动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这并非一个使我们思考如何使知识影响决策制定的可行办法。研究与行动两者的关系虽然非常的微妙和含糊,但还是存在着关联。这一章旨在分析知识,特别是通过定性研究产生的知识与行动之间的一些关系是如何形成的①。

政策决策制定的特征

政策制定具有多维和多方面的特征。研究(常常是次要的)只是众多的试图去影响正在进行和发展中的过程的来源之一,这些来源常常是充满了矛盾和竞争。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将政策制定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这是一个通过周期来发展的过程,其中的每一个周期或多或少受制于时间、基金、政治支持和其他的因素。这也是一个会围绕其自身,重复同样决策问题,而且经常会没有终结的过程。选择不做出决策常常会是最终的结果。

以上对政策过程的描述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对政策制定传统的理解,即使这一改变不是根本性重构。在传统的理解中,政策领域的决策制定被认为是一个不连续的事件,由一群工作在"实时"状态中的行动者来进行,他们在分析可供选择方案的基础上作出决策。Weiss(1982)对"作为事件的决策制定"的观念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 大众的和学术的著作均将决策制定描绘成一个事件。一群权威的决策制定者聚集在特定的时空中,对一个问题(或机会)进行评论,在对每一个选择的利弊进行或多或少清楚的计算的基础上考虑一些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再依据目标和偏好权衡这些方案,然后选择一个看起来能达到目的的方案。这就是决策(p.23)。

她对以上的观点做了有效的批驳,她写道:

---

① 我想提早强调,在这一章中,我不会对定性研究不同的习惯用法之间的差异进行区别。因此,在接下来的几页内容中,像"定性操作,定性研究,定性方法"指的是同样的意思。我用的最多是本书的书名——定性研究。在这本书中我将区别的工作留给其他的作者。为了不对在使用这些术语背后的细微区别进行辨别,我还想提到其他的四个术语——自然主义的、建构主义的、解释的、人种学的,在本书中对它们的区别进行描述是很重要的,但这并非我的意图。

我还想提前说的是,我不想对不同定性数据的收集策略、分析方式以及它们潜在影响的独特方面进行区别。例如,在这一章中我不会努力显示个案研究与多元方法相比较,会带来什么样的政策相关性或影响。我的兴趣是将定性研究广泛地置于政策领域中,而不是对哪些方法或分析模式能带来什么类型的影响进行一系列的分类。

> 考虑到不同的局、部门和立法委员会之间权威的分裂,以及行动汇聚成为决策的阶段之间的脱节,传统的决策制定模式是对现实高度程式化的演绎。对决策制定者清晰的归类都是很困难的(有时一个居于中间层次的官僚已经作出了关键的行动,虽然他或她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行动是决定性的)。除了"处理"一些令人不快的情形,政策的目标常常是发散性的。明确表达政策作为互动的、有多个参与者的、扩散性的过程,有可能难以区分决策制定者究竟考虑的是哪些观点、衡量的是哪些利弊。

与之尤其相关的是,将决策制定视为一系列不断调适的过程(或中途修正方案)的观点消除了对精确地确认一些事情的束缚,如确切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在这些时间、地点和方式中,研究对政策产生着影响。需要顺便说明的是,因为很少能提供细节,研究对决策会形成影响的观念看起来越来越会成为一个信念。研究者如此频繁地误解决策制定,但还是常常寻求对决策制定的影响,对这一状况值得进行更多的分析。只要研究者假定研究发现必须被应用于一个单一的事件和决策制定的一个不连续的行动,他们将会遗漏那些研究发现在其中会发挥作用的环境和过程。然而,将"事件决策制定(event decision making)"重新定位为"过程决策制定(process decision making)"需要赋予研究"启迪功能(enlightment function)",而不是"工程学功能(engineering function)"(参见 Janowitz,1971;Patton,1988;Weiss,1988)。

将政策研究视为服务于启迪功能,这一观点意味着政策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及其职员一起在随着时间的过去,在创造着一个对问题背景化的理解,建立会随着时间过去而依然存在的联系,并不断努力去探索这一领域新的发展和研究发现。这与工程学的观点形成了对照,它首先会假定有足够的数据来决定政策行动的方向和强度,就像一个人为修建一座桥可以提出细节一样。如果政策方向足够明确,就能收集到与政策发展相关的信息,因此,这一观点可以声称政策行动可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方向的和成功的。

这些评论不能作为对研究或知识无用论的抨击。相反,由研究产生的系统化的知识是决策制定过程中重要也是必要的组成部分。更进一步需要提到的是,在政策领域,很少有足够的基于研究基础之上的信息。William Ruckelshaus 曾提到过,尽管他是环境保护局的行政长官,但他和他的职员在有不足 10% 的必要研究信息时,他作出了许多的决策。除非在政策过程中对政策制定有一个新的考量,政策研究的相关性和作用将不会变得明显起来。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在其中寻求知识与行动之间联系的环境。在这里揭示政策周期的特性就是为了对政策制定进行重新的定义。

政策周期和定性研究

在政策领域有两个层次的决策制定。第一个层次涉及建立政府行动的主要参数,如提供国家健康保险、建立一个国家能源政策、重新建构国家的移民法律或重新检查决定国家财政制度安全与稳定的条件。在这一层次和这些情况下,政策研究提供的信息即使不是零的话也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些国家优先权的设定是一个政治事件,在其中,一群重要的政治家、特殊利益群体和媒体中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产生使问题进入国家议程所需要的注意力。

在这三个领域中,由支持者非正式的联系所建立起来的"铁三角"并不是由政策研究的出现或消失所产生的。某个研究可能会在支持某一问题值得国家的关注的观点时被引用,但将这一问题置于国家议程的更基础的任务则是偶然的。如果想去影响政策过程中这一阶段的表演者,很可能需要通过个人的接触、由组织采取立场或在政策系统中制造足够的干扰(例如,将特殊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反对一个提议,即使这样会使其他的集团获益)来实现。这在实际操作中有利于反对党的利益,因为媒体的影响必须显得"平衡",而反对党可以利用其影响创造一种印象,即对于某个立场没有像别的立场那样形成统一有力的支持。一旦问题是在政策建立的关键行动者或组织的议程中,就有对政策研究进行介绍和利用的可能性。这就是政策制定的第二层次,在这一层次关注于将政策意图转化为政策和现实,本章将对这一层次进行集中讲解。

政策研究在定性研究中的贡献能被充分理解的框架是十多年前政策周期(policy cycle)这一概念的提出(参见:Chelimsky,1985;Guba,1984;Nakamura & Smallwood,1980;Rist,1989,1990,1993)。我将通过政策周期的三个阶段——政策的明确表达(policy formulation)、政策的执行(policy implementation)、政策的可说明性(policy accountability)——来对其进行探讨。这三个阶段有他们各自的秩序和逻辑、其自身的信息需求和政策行动者。更进一步,这三个阶段之间只有一定程度的交迭,这表明它们的确有利于个体的分析和理解。

政策周期中定性研究的机会就这样被每一阶段的信息需求所定义和区分开来。每一阶段所问的问题是不同的,回答这些问题时所产生的信息也被用于不同的结果。下面,我将详细叙述政策周期的三个阶段和定性研究提供信息的方式。

政策的明确表达

奈卡莫拉和斯摩尔伍德(Nakamura & Smallwood,1980)这样定义政策:"一项政策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组建议,从政策制定者到政策执行者都能清楚地说明

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p. 31)。这些建议是由谁、使用哪些相关的政策信息和分析构思出来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对理解政策的明确表达过程提供重要的见解。奈卡莫拉和斯摩尔伍德以对政策的明确表达中的行动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回答这一问题的起始点:

> 一般来说,政策的明确表达中的主要行动者是“合法的”或正式的政策制定者,即那些在政府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有分配优先权和资源的人。这些人包括被选举的官员、立法者和被任命的高层行政长官,他们都必须遵循指定的线路来制定政策……因为这些正式的政策制定者代表了不同的支持者——选举的、行政的和官僚政治的——政策制定过程提供了许多的进入点,通过它们政府之外的利益集团和其他人就能施加影响。这样,政策制定通常包括一些不同的权威或在政府领域内运作的正式政策制定者,此外还有一些来自政府领域之外的特殊利益和支持集团,他们将其需求加于这些正式的领导者身上。(pp. 31-32)

随着政策明确表达过程的开始,产生了一些紧迫的问题,在实际所知道的信息和需要的信息之间的差距太大时,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将所能得到的信息和另外的信息汇集起来。信息需求通常可以被分为三大类问题,每一类都与政策的明确表达高度相关,同时,每一类中都有使用定性研究的重要机会存在。

第一类信息需求考虑对手头政策的理解。这一机制的轮廓是什么?较之从前,现在的机制或条件更大还是更小了,或者没有变化?条件的特性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同样的目标人群、地区或制度现在是否与从前一样经历这一条件?如何能很好地定义这一条件?对这一条件的原因和结果的不同解释和理解是什么?换一个说法,以上问题的实质是在面对问题或条件并需要作出反应时,政策制定者对这些问题或条件进行清楚地定义和理解的一种能力。

林德布罗姆(Lindblom, 1968)在政策制定者努力应对政策问题或条件的定义时,已很好地抓住了他们所面对的一些概念上的复杂性:

> 政策制定者不是面对一个给定的问题,相反,他们必须确定并明确表达他们的问题。美国的几十个城市发生了骚乱,问题何在?是维持法律和秩序吗?是种族歧视吗?是刚刚开始的革命?黑人权利?收入太低?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改革运动的边缘性的法律缺失吗?城市组织的瓦解?疏远?(p. 13)

第二类问题集中于在对这一条件或问题作出反应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初已执行了什么样的计划或方案?这些计划或方案持续了多久?它们成功吗?需要什么样层次的基金和多少职员?人们或制度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最初的行动?他们接受帮助还是拒绝干涉?之前的努力曾提出与现存一致或不同的问题或条件吗?如果是不同的,如何会是现在这个状况?如果是一致的,为什么还需要额外的努力?有同样的利益集团涉入其中吗?如何解释当前利益集团联合体所产生的任何变化?

第三类问题集中于对先前的努力和它们的影响知道多少，这些努力和影响能帮助我们做出现在的选择。与不同层次的成本相比较后对不同层次的努力作出的权衡，这只是与政策选择相关的几种依据之一。在希望看到效果之前，可能还要考虑到必要的时间期限，即在计划发展阶段的时间跨度和最终效果之间进行权衡，尤其是面对短期内解决问题的较大压力时。在这些情况下，就能很好地理解“弱推力，弱效力”的趋势。如果为了使可测量的结果出现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如何才能继续得到公众的支持并保持联合，直到结果出现?

在政策周期的这一阶段，定性研究与信息需求密切相关。关于问题的社会建构，社会条件的不同解释，针对变化而建立和维持的同盟，先前计划和它们的影响，社区和组织对计划的接受性，政策的明确表达中组织的稳定性和聚合性，以及社会条件变化的特性等方面的研究，这些都与所提出的问题密切相关。

在政策过程的这一阶段，定性研究能做出另外一个贡献，即对为执行计划而选择的工具所带来的预期的和非预期的结果进行研究(Salamon，1989)。目前，在政策团体中有这样的需要，即确定什么样的工具在哪一种环境中、对哪些目标人群最有效。在这一领域，系统性的工作做得还很少——这就常常使政策制定者必须对工具之间的利弊进行推测。

通过定性研究来提供这一类的信息能给予决策非常有意义的帮助，例如，在健康、住房和教育方面给接受者是提供直接的服务还是代金券，对于会雇佣失业青年的雇主是给予现金补助还是税收优惠，对信息运动是否提高基金或者是否将提高税收作为不鼓励吸烟的策略，以上的三个例子中各有不同的工具，而且必须在它们中间作出选择。

政策明确表达阶段活动的关键是选择最合适的政策策略来达到预期的目标。而策略设计的核心是选择一个或更多的政府能获得的工具来实现政府的意图。对不同的工具如何被目标人群所理解和反应进行定性研究，这对政策过程的这一阶段来说非常重要。

不幸的是，尽管对这一类型分析的需求非常大，但能提供的却非常有限。在研究团体中，政策工具的定性研究仍是需要进行适当探索的领域。

尽管在这一阶段需要定性研究，但它的应用存在问题同样也是事实。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在政策的明确表达阶段存在的机会中，对委托和全新的定性研究来说都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因此，应用只好依靠当前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定性研究。此处有一重要途径，借助后，针对局部的社会问题，那些好的、精细的定性研究可以进入到政策领域。当政策制定者开始明确表达努力时，他们需要尽快利用现有的研究，这就使那些经过了问题的定义、问题的社会建构、社区研究和最初行动的回顾性评价等过程的研究得到了重视。

在这一阶段，定性研究问题的特性因下面的事实而被强化，即为提出以上三类问题而进行的研究很少能获得资助。如果问题或条件不是很明显，将并不充裕的资金花费在非计划的、“理论”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动力并不大。到了

条件已经发生了足够的变化或成为显性的社会问题时,定性研究因为被紧紧催逼而对时间非常的敏感。政策的明确表达的窗口常常很小或只开放很短的时间,能透过它进入的信息必须是已经准备就绪的,并且是采取能被快速理解的形式。

在政策周期的这一阶段,上述关于定性研究的使用的限制不能被视为对这些信息的使用或相关性的负面判断。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政策的明确表达中当需要相关的定性研究时并不总是能被满足。正如前面提到的,对定性研究的应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领域。但是应用也只是可能会到来,因为那些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开展一个领域研究的学者,他们在开始研究之前并没有假定能影响政策的明确表达。在政策的明确表达阶段很少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新的定性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在政策的明确表达阶段,对定性研究应用的限制更多是来自于政策过程的特性,而不是定性研究的特性。立法的日程、大多数被任命的高级官员任期的短暂、为了其提案能获得通过和实施而疯狂竞争的特殊利益集团、媒体对任何问题缺乏集中的注意力,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对内在问题进行揭示的研究。显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国家有一个可预见的好的未来,健康照顾的分配和质量、移民控制和更广泛的安全、工人和年青失业者的重新培训等方面的问题至今仍停留在国家议程的顶端或顶端附近。随着时间发展,在这些或其他的重要领域,深入的定性研究能为政策的明确表达提供信息。但是,政策系统中的压力和结构性动机会流向其他方向。也就是说,定性研究应运用有快速影响的短期提议来显示敏感性并适应铁三角中既定的兴趣。

总之,对于政策周期的第一阶段,定性研究能发挥较大影响。尤其是对于问题定义、最初行动的理解、社区和组织对特定计划的可接受性、不同介入策略中可能出现的影响(预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来说是如此。这些信息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无价的,但是,正如所提到的,对这些信息的利用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阻碍,如信息是否存在,信息是否能被政策团体所知晓,信息是否能以快速获得到形式被获取。克服这些障碍并不能保证定性研究就一定会在明确表达的阶段被采用,但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如果这些障碍存在的话,定性资料被利用的可能性就彻底消失了。

政策执行

政策周期的第二阶段即政策执行。在此阶段,政策的明确表达阶段所建立起来的政策最初行动和目标被转化为计划、程序和调节。同时,因为政策制定者对有效知识基础的需求,有必要对政策明确表达阶段中所发现的不同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随着政策向计划的转化,关注点转移到政策工具操作活动和资源分配,同时,为了对身边的计划或条件产生最强烈的影响,还需要关注如何以最

有效率和最有效果的方式来利用可以获得的资源。正如普莱斯曼(Pressman)和韦尔德弗斯基(Wildavsky)对这一点所写的:

> 政策暗含着理论。无论是否表述清楚,政策始终指向一条初始的条件和未来的结果之间的因果链,如果X,则Y。通过权威的行动,在最初的条件创造出来后,政策成为计划。X现在存在。通过将行动与目标连接起来建立因果链的第一个联系,计划使理论获得了可操作性。假定X,我们通过行动去得到Y。执行也就是在因果链中建立后续的联系,以此来达到预期的结果(p. xxii)。

政策和计划执行的研究著述显示,完成它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任务(参见:Hargrove,1985;Pressman & Wildavsky,1984;Yin,1985)。下面再次引用普莱斯曼和韦尔德弗斯基(Pressman & Wildavsky,1984)的观点:

> 我们对新计划正常的期望是,他们一般都不会顺利地开始,至少也需要相当的一段时间来开始。所发生的事情总是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需要这么多的努力去使他们运转起来。新计划完全运转起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事(p. 109)。

正是在这一努力使计划运转起来的方法背景下,来自定性研究的数据和分析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政策周期的这一阶段,来自定性研究的信息需求可分为几个领域。首先,执行过程本身对信息有一个比较紧迫的需求。通过个案研究,计划的监控和过程评估,定性研究者能对负责政策最初行动的计划管理人员提供信息。

定性研究能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如计划达到所期望的目标受众的程度、不同地点中执行战略的相似与区别、计划可操作和不可操作的方面、确定送达某些人的服务是否到达、加在负责执行机构或组织的操作性负担(如,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对新政策的最初行动作出有效的反应?)。焦点在于将新计划或政策渐渐转变为现实。这一执行"基础水平"的观点最好通过定性研究来实现。在对执行努力的首次公开展示的研究方面,定性研究较之其他数据收集策略占有明显的优势。

执行领域中服从于定性研究的第二类问题集中于引起政策或计划反应的问题或条件。因为在做出决策的时刻政策团体就已决定对所知道的采取行动,因此问题或条件不会简单地保持平静。在一项政策反应被决定的前后,问题和条件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对定性研究者的挑战在于,即使在执行努力与迅速采取了行动的时候,仍然必须对条件进行追踪。无论条件是提高、恶化还是保持不变,同样的目标人群是否和从前一样参与其中,条件是扩散还是收缩了,计划的目标是否仍与对条件的假设和从前的理解相吻合,定性研究都要对状况进行监测。对于计划是否与当前的条件相符,定性研究能为计划管理人员提供重要的核查。计划管理者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使其服务或介人能符合当前的状况,实施监测条件的定性工作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政策执行阶段,第三类必要的政策问题集中在组织或机构对最初的行动作出反应时的努力。例如,对于了解组织对条件或问题的反应是如何被概念化的,定性数据会有一定的作用。对问题的社会建构在政策的明确表达阶段已被联邦政策制定者所接受,几个月后它是否会被远在几千公里之外处于执行阶段的计划管理者和职员所接受呢?在政策或计划真正开始执行时,理解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政策制定者和计划执行者对政策的意图以及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持同样的理解吗?

对定性数据另一方面的需要是关于组织的反应。这里,可能提出的问题包括,那些负责执行人员的专门知识和资格,管理者和职员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对资源分配的控制,组织结构以及它能否反映最初的宗旨,在竞争性需求中作出决定时组织所采用的方式,组织在定义其在组织中角色时用来廓清误解和模糊时所用的策略,最后,设置什么样的互动信息或反馈系统来帮助管理者通过努力使计划达到政策的目标。如贝恩(Behn,1998)所提到的,在执行过程中,这一类精确的信息对管理者非常重要,他们必须努力探索前进以达到组织的目标。

政策的可说明性

在政策或计划成熟到能提出可说明性、影响或结果的问题时,政策周期的第三个阶段就开始了。这一时期的信息需求,不同于政策周期的前两个阶段,在评估政策和最初行动的结果中,定性研究的贡献是关键的。与问题随着政策周期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变化一样,为回答这些同样的问题所必须的定性研究也是如此。

首先是计划完成了和没有完成什么:计划的目标满足了吗?定性研究在这一方面有特定的作用,比如:一项邻里"犯罪监视"的计划中,社区与警察是否积极地配合;在另一项计划中,无家可归的人作为合适的目标受众是否接受到所许诺的健康服务;在第三项计划中,年轻人所获得的在职培训类型和质量能否使他们成功地获得永久性职位。

在一项计划到达需要进行讨论和评估影响的阶段时,定性研究提供了一个通过其他方式不易获得的视角。定性研究会考虑对期望和非期望的结果,作为计划或政策结果理解和观点的变化,由计划所产生的社会变化方向和强度,用来操作计划管理/组织机构的强弱进行研究。在利用定性研究的发现时政策制定者没有同样有基础的方式来认识计划的影响和结果。

人们也许会传统地认为,这些基础的认识方式应该是政策的定量评估。计划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决定计划的影响所使用的方式时,定性研究能为他们提供应该有多自信的信息。尽管他们的意图是找到一个可进行复杂的测量、高度可靠并能复制的工具,但定性研究才能提出有效性的问题。

可靠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在研究著述中已非常之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仅提

一句，在投入大量时间和努力在测量工具的同时，却没有对他们的测量是否与身边的问题和条件相符合给予同等的强调，以至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不止一次被误导。对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和用公共汽车接送学生的研究，对护理之家中健康照顾的研究就是这样两个领域，过分强调结果和过程的量化，而忽略了未被记录的关键和应该给予关注的方面。

第一类信息需求的另外一面值得对定性研究给予特别关注。经过执行过程，政策最初目标和目的是否处于适当的位置。一个信息不停在政策制定者的脑海中萦绕：不要想当然地认为，通过政策最初的行动建立起来的意图会与执行过程完成后所发现的结果一致。由于不断改变方向、基金水平的变化、职员稳定性、目标人群的变动、政治支持、社区接受性等诸如此类的原因，计划和政策中途需要作不计其数的更正。

通过对定性工作的纵向观察，这些问题能被直接提出来，Blitzkrieg 的计划评估不能简单地找到背后的问题和冲突，这些问题和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并会直接影响计划的方向和成功（Rist，1980）。例如，在一项职员非常集中的提供服务的计划中，如果不考虑人员调整，就可能在任何执行研究中忽略一个关键的因素。但是，首先承认它可能是一个问题，这是定性工作区别于其他研究策略的特点之一。

在一个计划需要被评估影响和结果时，出现了第二类的信息需求，即回答问题或条件是否和可能出现了什么变化。对结果进行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决定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计划或政策与目前状况有什么关系。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是这样，但还是值得清楚地去阐述独立于任何政策或最初行动之外的问题是否会发生变化。从概念上讲，我们所处的状况是，哪些影响会出现，哪些影响不会出现，在一个项目或条件中，结果会不会发生变化。

例如，一项政策正向的结果是条件没有恶化，即最初激起政策反应的初始状况没有发生变化。为了遏止虐待儿童案例的增长而发展当地的介入，这一计划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正向的结果。当然，关键问题是，案例没有增长的结果是归结于介入计划还是其他独立于介入计划之外影响社区的因素呢，如媒体对一个特别残忍的虐待儿童案件的广泛宣传，或对父母在想去伤害孩子时应该如何应对的宣传。

这个例子中的定性研究可能会集中于这样的影响，如吸引那些以前曾虐待他们的孩子的父母的努力，接触那些寻求建立与孩子更好相处的技巧方面帮助的父母的努力，由学校老师、白天照顾者和其他与儿童正在有频繁接触的人所讨论的儿童虐待的模式和趋势，父母现在是否处理以及如何处理可能导致虐待孩子的压力。

以上的讨论同时产生了一个定性研究能在政策周期的这一阶段提供帮助的领域。由于其对在实施定性研究中的问题或条件非常熟悉，这样就能使研究者判断目前的状况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研究表明问题的严重性在下降，因此没有必要对计划作进一步的资助。相反，如果来自定性研究的数据可能

表明,条件已经改变了方向——即转移到一个新的目标人群——因此有必要调整计划的方向。

社会条件不会保持静止不变,条件这一会变化的特征,使得十分必要定期复查最初的政策意图(政策的明确表达)。定性研究者能给自己定位,因此他们能近距离地观测变化中的特征。由于拥有了第一手和接近核心的信息,他们非常适合对政策的明确表达和执行策略提供必要的建议。

在这一阶段定性研究能发挥直接的作用,其中第三类的信息需求来自于对可说明性的关注。这里,定性研究关注于管理监督,头脑中具有清晰目标的组织领导阶层,对过程和程序的注意,这些都能增强组织有效落实政策的主动权,加强对其数据之上的决策制定的使用,增强领导者与职员之间一致的程度。这些问题直接代表了一个组织动员自身来为客户服务的能力。如果一个组织如此定位,很明显可说明性的问题全在于领导者阶层。

对组织有彻底了解的定性研究者处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从这里他可以发现职员的待遇和训练,摩擦和士气低落的原因,在职员和领导者中间服务导向的哲学思想(或缺乏它),职员对计划的活力和价值的信念,计划中用于决策制定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诸如此类。这些是组织生活中真实的定性维度。如果要对任何特定计划性的策略的效率和有效性作出判断,就有必要做这些研究。这些判断成为随后的选择政策工具的核心因素。

无论何时,在计划受到新的资助或重新确定方向,都必须对管理的可说明性进行讨论和评估。这些关注一部分直接是关于问题或条件的影响,其他则是关注组织自身内部的秩序和逻辑。换一种说法,在政策的可说明性阶段,决定条件或问题方面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能直接归结于计划,以及计划是否使它所具有的影响最优化或局部最优化,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同样地,确定影响的出现是政策的明确表达一致的结果还是计划执行特征的结果。如果在一个管理良好的组织中发现一致和强有力的最初行动,就有必要对哪些政策要归结于政策,哪些要归结于成功的执行进行评估。定性研究知道如何去理解这类的评估,但其他方法则没有,因而必须完全依赖代理的方法。

政策工具

迄今为止,都是在对政策周期特征,以及每一阶段对政策制定者和计划管理者的不同信息需求进行分析,阐述定性研究如何在满足政策制定者和计划管理者每一阶段的信息需求方面扮演一个积极和正面的角色。以下的部分,我们的注意力将转移到政策工具之上。

这一强调是重要的,因为对政府可以获取的工具,每一工具如何被有效地用来达到政策目标的深入理解,能为政策周期的三个阶段提供清楚的信息。政策的明确表达阶段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工具——赠予、补助金、税收扣除、贷款、新

的规章、建立政府主办的企业或提供直接的服务，这里只涉及了目前被政府使用的 30 项工具中的 7 项。

一项工具的选择同时也是一项政策选择，对此很少有指导性的数据。进一步而言，在这一方面能帮助政策制定者的研究也非常之少。政策制定者做出的选择要么是基于过去的经验（比如，我们以前用过税收扣除，不妨再用一次吧），或者是因为对某一工具有很明显的赞成或反对的倾向（保守派会抵制直接的政府服务并寻求将活动安排到私人部门中去，如同意公共住房的建设或将国家公园中的场地特许使用权私有化）。宣称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对这一领域都没有兴趣是安全的。除了林德（Linder，1988），林德和彼特（Linder & Peter，1984，1989），迈依（May，1981）和萨拉蒙（Salamon，1981，1989），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经验的领域，很少有相关方面的研究。

接下来确定定性研究针对政策工具有较高价值的四个领域。在这四个领域，目前的研究几近空白。需要强调的是，以下的简短讨论并非对政策研究者在选择工具时定性研究如何满足信息需求确定性的观点，也不是对于不同工具的强弱确定的研究议程。

需要重申的是，很少有研究者已转移到这一困难但与政策高度相关的领域。犹豫不决的原因已经超过了这一讨论的范围，但很清楚政策分析和研究团体已意料之中地远离了这一研究领域。以下主要是在林德，彼特和萨拉蒙工作的基础上，为那些在政策领域对定性研究的新的、未尝试过的方法进行探索的定性研究者提供一个适合的议程，更精细和详尽的研究议程还有待时日。

如上所言，我们将主要讨论四个与定性研究相关的领域，分别是资源集中性、确定目标、制度约束和政治风险。这样分法的尝试性不得不再次进行强调，因为可能还会有很多其他构架政策工具的定性研究方式。基于之前对政策周期的讨论，政策工具定性研究框架是一个矩阵分析，四个领域能在政策周期的每一阶段进行研究，但是无法在此对所有的组合进行一一分析，我们只能集中于比较广的、有助于阐明工具之间利弊的四个方面。

资源集中性（resource intensiveness）指的是操作复杂性、不同选择的成本高低、不同工具给组织带来管理负担程度。不同工具在其复杂性，组织需要技术专家进行管理和经营的需求，其直接和间接的成本，其能直接或间接达到意图的程度等方面的区别很大。随着政策周期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变化，对任何给定工具的这些特性的关注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在华盛顿，在政策的明确表达阶段，主要考虑保持财政的低成本和联邦的最小介入，但在政策执行阶段会带来这样一些后果，如只能为少量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提供服务，通过委托州来进行管理增加了复杂性，同时也降低了直接影响。管理有毒废弃物在某种程度上与上面的例子相似。

对定性研究者来说，挑战是多样的，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会带来更多的对组织直接的关注。但很明显这也是一个在组织内部提出问题并评估组织能力的机会。管理负担虽然不是许多定性研究的主题，但它却是一个政策领域中非常真

实的考虑。了解更多的如何将这一关注概念化,它在政府的不同层次和私人部门内是如何被理解的,不同工具在这方面是如何变化的,部门中的政策制定者对以上这些会有很大的兴趣,对诸如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中覆辙调整和管理疏漏的人来说同样如此。

目前,对管理负担(administrative burden)这样的概念被错误的定义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在没有任何系统研究的情况下,一个人对"管理负担"的定义和经验与任何其他人是一样的——如果他或她有更多的制度上或组织上的影响力会好一些。其他诸如"操作复杂性"和"制度能力"等概念则要相对定义清楚一些。

确定目标(targeting)指政策工具瞄准特定人群、问题或制度的能力。例如,一项工具用来对有精神疾病的无家可归者和退伍军人提供帮助,那它就是很好地确定了目标,这样的工具会与那些在目标特性方面很分散或很低的区别开来,如对个人退休金所赚的利息进行税收减免。

对政策工具来说,目标问题有几个定性研究能发挥作用重要的方面。首先,确定目标的精确性。就刚才提到的例子,定性研究者应该帮助政策制定者完成策略和定义的问题,如决定谁是无家可归的人,谁被诊断为有精神疾病,如何在档案、服务记录等资料遗失甚至当事人无法记起自己名字的时候甄别出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

在选择政策工具时确定目标的第二个方面是工具对调节和调整的服从。如果目标人群的特征开始变化,工具能进行调整来适应这一变化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非常需要弹性,但在其他的情况下则并非如此。例如,选择一项政策工具来对进入到美国的难民人口的波动和变化进行监测,这将是有益的,但在一项权利计划中,年龄是获得服务的唯一条件,这样的情况下则没有必要选择政策工具。

在确定目标中,对由工具和特征需要确定的对不同人群进行的定性研究对政策的明确表达非常有用。在这一领域同样也有机会来探索那些已被一项计划确定为目标的人群是否认为这是事实。如果建立一个社区精神健康中心,一些目标人群会因为"社区健康"而来,另一些会因"精神健康"而来,还有一些目标人群则根本就没有出现,因为他们不确定指的是谁的社区或因为他们不希望邻里中的任何人知道他们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在没有定性信息的情况下将服务连接到目标人群,立即显示出了在缺少目标人群的详细知识的前提下建立服务中心的弱点和不稳定性。

社会精神健康的例子引出了目标确定领域中的第三个考虑——使用中的适应性。社区精神健康中心能作为中心同样服务其他指定人群的需求吗——如营养和教育方面?他们作为中心能服务于老年人、挂钥匙儿童(达到上学年龄,在父母都上班的时候总有一段时间独自在家没人照顾的孩子)、婴儿营养计划等等吗?和在感知其他目标群体时的中立性一样,这里涉及了可塑性和可接受性。可能会有不愿意到精神健康中心的群体,但他们可能会非常乐意在教堂或学校中相见。对这些问题获得认识与在什么地方提供社区服务的决定同样重要。对

这些问题的研究能使政策制定者和计划管理者清楚地明白他们会影响不同策略的成败。

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指的是制度完成所委派给它的任务的能力。在一项政策选择明显地需要依赖一项单一的制度来达到特定的目标时——例如利用公立学校作为给说英语的儿童教授英语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定这项制度有能力去实现。不同的政策行动不计其数的经验不止一次表明,一些制度有时就是没有能力达到预期的目标。

进一步来说,制度本身也会有一些限制,使得达到目标很困难。除了容易预料的资金、职员、设备质量和低的政治支持等方面的限制,还有制度强制性方面的限制。政策制定者在是否允许使用强制的手段征税会对国内税务局这样做的能力产生明显的影响。由于害怕权力被滥用,政策制定者对一些组织的职能较之其他组织做出了更多的限制。这样,那些依赖志愿的服从和只有间接影响的政策工具所面临的限制就不同于其他的政策工具。

据我所知,在制度限制领域,定性研究还没有考虑如何在组织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去除这些限制。也许因为对任何政策工具来说,会从研究影响中去掉限制的方面,因此这样做没有必要。更确切地说,组织的任何限制与其说是操作性的,不如说是哲学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但是,清楚地理解制度能力的问题,理解什么限制了、什么没有限制组织达到目标的能力,这些都很重要。如果政策制定者围绕组织设定一个参数——组织无法清楚地达到目标的程度(如国内税务局和未缴纳的税款),那么就不会忽略内在失利的水平,制度也会因此不用负责。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是政策工具研究的第四个方面,定性研究能对此有直接的贡献。这里的问题围绕对未预料风险、失败的可能性、选择时机的关注。对政策工具的选择取决于脑海中一些或直接或间接的结果。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未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对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必要考虑这些未知结果的风险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政策的成功。

定性研究由于其纵向的特征,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研究,集中于参与者对意义的建构,使得其在评估工具是否有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影响时处于独特的位置。未知结果低的风险——例如,联邦法院提高的安全性——在未知结果的风险相当高的时候降低了不确定性的水平,比如转向整年的学校日程,或因成千上万有精神疾病的人得不到支持或治疗而将他们从制度化的照顾转移到社区照顾。

定性研究能进行研究的另一方面的政治风险因素是政策行动可持续性。通过对政策最初行动近距离的研究,能认识到牵涉到其中的义务,他们对努力的价值的信仰,他们带来或没有带来的政治支持的数量,以及目标人群对他们努力的接受性。如果这些指标都是负的,那么行动的可持续性就肯定很低。

在最好的环境中,政策努力往往难以成功,在所有的指标指向相反的方向时就会更加的困难。定性研究应该提供一个清晰的窗口,通过它来对政治风险进行判断。参与者的理解,是否愿意假定政策本身的因果关联,未知结果风险的程

度，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任何政策工具达到预期结果的可能性。

最后的观察

以上评估了定性研究对政策周期的贡献，通过回顾容易发现，很明显这些贡献潜在的领域要多于实际的领域。在特别针对政策问题的定性研究的当代社会科学中，没有具有广泛基础和持久的传统，尤其是政策周期所需要的时间限度内。但也很清楚作出这些贡献的机会是很多的。问题主要在于将那些研究和学术团体中精通定性研究的人与政策领域中能委托进行定性研究并利用研究结果的人联系起来。要对建立这些联系的不同策略进行分析可能需要单独的一章才行，简单地说，就是需要进行深刻思考和大量探索性努力来将潜在的可能转化为现实。制度文化、学术奖励系统、出版需求、资金来源和方法的限制等众多问题中需要提出来的五个。这些问题之外更根本的问题则是是否有愿望将定性研究直接引入政策领域。这里所写的大多数还是属于推测性的，除非在定性研究者中达成了一致。我相信政策团体已准备并愿意接受定性研究所提供的成果，而定性研究者也应该努力去这样做。



Behn, R. D. (1988). Managing by groping along.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7(4).

Chelimsky, E. (1982). Making evaluations relevant to congressional needs. *GAO Review*, *17*(1).

Chelimsky, E. (1985). Old patterns and new directions in program evaluation. In E. Chelimsky (Ed.), *Program evaluation: Patterns and direct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ba, E. G. (1984). The effect of definitions of policy on the nature and outcomes of policy analysi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42(2).

Hargrove, E. (1985). *The missing link: The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policy*.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Janowitz, M. (1971).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social policy*. New York: General Learning Press.

Lindhlom, C. E. (1968).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Linder, S. H. (1988). Managing support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goals, risk, and policy instrument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7(4).

Linder, S. H., & Peters, B. G. (1984). From social theory to policy design.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4(3).

Linder, S. H., & Peters, B. G. (1989). Instruments of government: Perceptions and contexts.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9(1).

May, P. J. (1981). Hints for crafting alternative policies. *Policy Analysis*, 7(2).

Nakamura, R. T., & Smallwood, F. (1980). *The politic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atton, M. Q. (1988).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Pressman, J. L., & Wildavsky, A. (1984). *Implementation* (3r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ist, R. C. (1980). Blitzkrieg ethnograph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ethod into a movement. *Educational Researcher*, 9(2).

Rist, R. C. (1989). Management accountability: The signals sent by auditing and evaluation.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9(3).

Rist, R. C. (Ed.). (1990). *Program evalu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Patterns and prospects across eight nation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Rist, R. C. (1993). Program eval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Reflections on question formulation and utilization. In R. Conner et al. (Eds.), *Advancing public policy evaluation: Learning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msterdam: Elsevier.

Salamon, L. M. (1981). Rethinking public management: Third-party government and the changing forms of government action. *Public Policy*, 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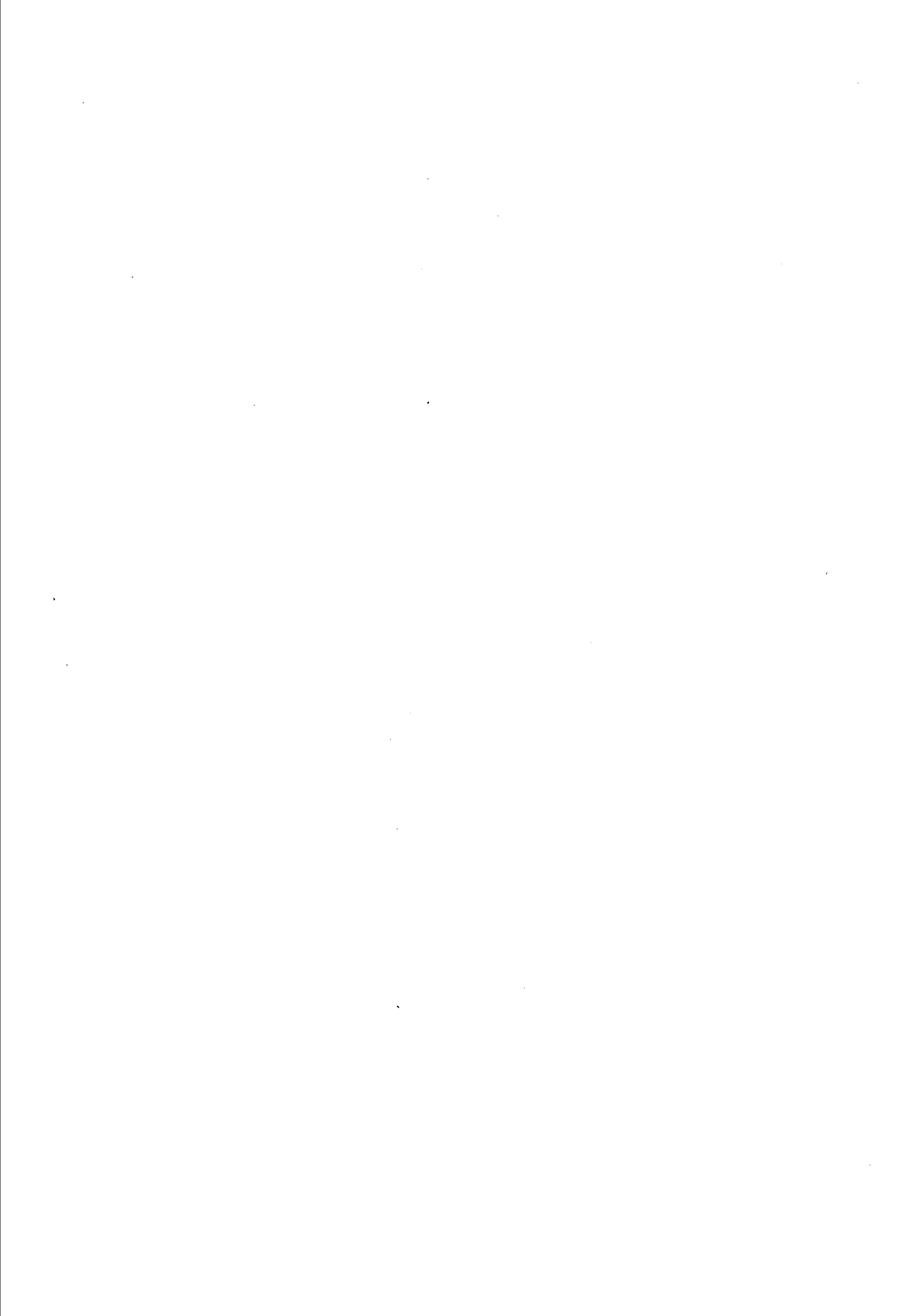
Salamon, L. M. (1989). *Beyond privatization: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action*.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Smith, J. A. (1991).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Free Press.

Weiss, C. H. (1982). Policy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diffuse decision making. In R. C. Rist (Ed.), *Policy studies review annual*. Beverly Hills, CA: Sage.

Weiss, C. H. (1988). Evaluations for decisions: Is anybody there? Does anybody care? *Evaluation Practice*, 9(1).

Yin, R. K. (1985). Study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rograms. In W. Williams (Ed,) *Studying implementation*.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第Ⅵ部分

定性研究的未来

PART Ⅵ THE FUTUR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现在来到结尾部分,但对于一个新的开始来说这也是一个起点,几个观察支持了我们的这一观点。定性研究正继续改变着它自身,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变化使它获得了动力。有性别偏见的、叙述性的转变已经发生。施瓦特(Schwandt,1997,p.40)称之为大E的基础性认识论,已被建构主义、解释学、女权主义、后建构主义、实用主义、批判性种族主义以及其他的一些理论所取代。在被关于道德规范和价值的论述,关于高尚的人、公正和道德社会的对话所取代后,小写e的认识论业已成为一种标准。

本书的所有章节用来证明对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批判性的、解释性的市民社会科学的巨大需求。这是一个既模糊了边界也模糊了流派的解释性社会科学。它的参与者致力于对受政治影响的行动研究和由实践和社会变化所引导的调查。因此,被称之为定性研究的改革主义运动获得了动力,而其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位置也愈发清晰。通过那些行动研究者,我们发现了一系列训练有素的解释性实践,它们将在全球后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公共和私人领域产生根本性的民主化转变,而定性研究穿梭来往于公共与私人、神圣与世俗之间,正是达到目标的手段。

随着范式的转变,对话已经成为在理论框架内和理论框架之间将定性调查、社会人文科学组织起来的通常方式。我们已开始加速向立场认识论转移。已没有人再相信联合性别主题的概念或其他任何联合的主题。认识论透露出了事实的真相,伴着资本主义在扩展它的全球势力范围,对批评的、有多种声音的、后殖民主义的人种学的期望也在随之上升。

我们现在理解了,市民观念的定性研究者使用了一系列重要的实践来使这个世界运转起来,这些实践并非中立的工具。这一类型的研究者历史地和互动地思考问题,总是时刻想到日常生活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构成过程。定性调查的重要实践将研究者转变为一个摆弄方法论的(和认识论)人,这个人是一个艺术家、手艺高明的匠人、蒙太奇和拼贴画的制作者,能运用或超越可视的方法来进行访谈、观察、研究重要文化和进行思考,能作诗、写小说和自我民族志书写(auto ethnography),能建构讲述解释性故事的叙事,能使用定性电脑软件,能做基于文本的调查,能运用焦点小组访谈构

建证词,甚至能进行应用人种学的研究和政策的明确表达。

很明显,与所出现的理解一样,定性研究不断变化的领域也是由一系列紧张和冲突所定义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的每一章中感觉到这些紧张和理解。本书的第十版仅仅是为了总结的目的;我们以问题和命题的形式仅仅列出了其中的一些:

1. 如何将对多种立场的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强调转化为一系列共享的理解——这些理解是关于定性调查对市民社会、市民论述和批判种族理论的贡献的?

2. 如何将我们自身的研究作为研究的主题,引向对他人更大的理解?

3. 如果经验的意义仅仅以陈述的形式给出,那么,民族志的表演转向是否会从努力表达意识流和意识主题内在意义的世界发生转移呢?

4. 女权主义、共产主义和种族基础上的道德准则将如何改变制度性审查委员会呢?

5. 含有新方法和调查策略的解释性范式将会从本书中所出现的诸多范式和观点的互动中出现吗?

6. 如果成为现实,种族的、同性恋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范式将如何适应这一新的综合体?

7. 下一代的文化研究学者,以他们对文本的(叙事的)和前后关系的(民族学的)分析模式的批判性关注,将如何塑造定性调查呢?

8. 下一代的定性研究者如何对计算机辅助分析模式作出反应,尤其是当这些模式在对隐私和个人的、神圣的空间问题进行着重新定义(和侵蚀)时?

9. 后现代、反基础主义的识别力会对写作和表演文本形成他们自己基础的评估条件吗?

10. 在支持局部的解释、对指导"真理"存在与否的质问和对研究过程中主观性的强调这些努力中,后实证主义和他的后继者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1. 在对计划和政策的理解和提高中,包括计划评估和分析的"第六和第七阶段"的定性研究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12. 当所有支持局部解释的后现代世界观消失时,我们如何能继续对话和互相学习呢?

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在此我们仅能简单地谈一些对它们的反应。在结束的章节中,我们将围绕几个基本的主题或问题分成几组来详细地阐述这些反应:文本和声音;存在的、神圣的文本;反省性和在文本中存在;运用连字符;种族和批判的道德意识;文本的主题,包括我们在文本中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以上所列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社会文本、历史、政治、道德规范以及更广阔的解释性范式。

来到未来

由格根双氏写作的第 40 章将定性调查带到了 21 世纪。格根双氏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这一领域充满了创造性、激情、智慧的涌动,相辅相成、起催化作用的对话和投入

变革的一种普遍感受。他们将注意力明确地集中于有效性的危机、表达的权利和定性研究中政治的地位这几点上，对这些难以驾御的逆流进行了分析。

基础性认识论的崩溃已导致了方法论变革，而方法论已建构了有效性的意义。这些变革已塑造了对提高文本反省的需求、文本更大的自我暴露、多种声音、文学表达的类型化形式和表演的文本，它们也逐渐演变成为围绕表达的下一个问题。

表达问题涉及如何在文本中呈现其他人。格根双氏讨论了几种不同的表达类型：授权、联合、分配和多种声音。这些表达的策略汇聚了对政治在文本中的地位关注。我们不能再将意识形态和政治从方法论中分离出来。根格双氏在这一点上非常有说服力。从认识论到本体论，方法总是在更广泛的意义系统中获得他们的意义。与在特定的解释性共同体一样，这些系统自身就被嵌于伦理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正如格根双氏所提及的，对个人的研究支持了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方法总是被移植到我们的政治之中。

重申一点：科学实践并非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1版中提到的，一个后建构主义的社会科学计划是在后马克思主义和有助于解放的女权主义那里，而并非在科学中寻求它外在的基础。一个好的文本是能唤起这些信仰的文本。一个好的文本揭示了种族、阶级和性别如何以它们的方式由互动个体慢慢地成为具体的生活。

格根双氏预测，在将来研究将会变得越来越相关和困难，而运用连字符则会变得容易，因为研究者们总是在连字符的两端。他们同时也看到了平民主义技术的大量涌现，这一技术将用于逐渐削弱我们所知道的定性调查，包括扰乱我们称之为"稳定的"主题(网络自我定位于何处?)。新的信息技术增强了跨时空对话和交流可能性。正如格根双氏所观察到的，我们可能会参与社会科学重建，如果是这样的话，定性调查将在其中起到领导性的作用。

最后，在第六和第七阶段中，我们预料定性文本将没有主导形式；然而，将会有几种不同的混合性文本形式。第一种将是经典的、现实主义的、由后建构主义词汇重新定义的人种学文本，在其中我们将听到更多的第一人称的声音。第二种混合性文本形式将诗歌的、小说的和表演的文本合成为批判性的干预主义者的表述。第三种文本形式将包括证词和第一人称(自有的人种学)文本。第四种形式将是居于第一人称声音和证词之间的描述性评估文本。对这些形式将按照复杂性不断提高的一系列局部的、反基础性的、道德和伦理的条件进行评估。

这些文本形式的变化依赖于对反身的、自我意识主题观念批判性反思。活的经验不能被直接研究，因此我们研究对经验的表述：故事、叙事、表演、戏剧。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到达反身主题的内在心理和内在意义世界。表演民族志中的主题成为了表演者。我们研究表演者和表演，研究将意义连接起来的人，研究在共同创造和共同表演的时候，文化是如何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范式、政治学、伦理学及其他

在我们以写作文化的方式进行着写作并进入定性研究的第七时刻时,许多事情在发生着变化,以前只有一些,现在则有多种历史和理论框架在围绕着这一领域。今天,一批竞争的范式和观点正对基础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构成挑战和形成补充。许多不同的应用行动和参与性研究议程正为计划评估和分析提供信息。

我们现在理解了,我们通过研究别人来认识自己,而我们所得到的许多教训都不是令人高兴的。我们在寻找一套符合后现代主义的新指令,因为旧的道德准则不能对一项有道德牵涉其中的研究进行检验,它们从来就不能将研究者严肃地置于社会的统治机构中。女权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将继续得到发展,在发展的每一步中通过批判性的种族、后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识别力来获得信息。以科学名义行窥阴之实的行为将继续受到挑战。

基于表演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观点,以它们对道德批判的强调,将改变定性研究传统的经验主义传统。科学与伦理之间的分界线将随之被慢慢抹去,一个后现代、女权主义、后建构主义将越来越向道德世界的宗教科学靠拢。

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在回首时借用 Max Weber 的一个比喻,我们是如何被20世纪和它理性的铁笼所围困,我们对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楚。像笼中的一只鸟,由于时间太长,我们已不能看到被捕获的方式。共同参与社会世界的世俗科学使我们成为问题的一部分。纠缠于我们想解开的统治机构中,我们使所发现的知识和权力的系统永久化,使之更加令人难以忍受。要从笼中逃离出来对我们来说还不算太晚——今天我们不就已将牢笼置之脑后了吗?

我们就这样进入或离开第六阶段。在结束的章节我们将阐述我们对下一代定性研究的认识。



Schwandt, T. A. (1997). *Qualitative inquiry: A dictionary of terms.* Thousand Oaks, CA: sage.

定性研究:压力与革新 40

QUALITATIVE INQUIRY:TEN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玛莉·M·格根　肯尼斯·J·格根

定性研究领域为当代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些最为丰富和有益的研究课题。这种丰富性是历史沉淀的产物:相当多的学者由于不满于其学科传统的狭隘性和限制性转而投向该领域;还有一些人也在此找到了发挥其专长和技能的途径,比如说,社会批评和政治激进主义就在这里找到了空间,就像文学、艺术和戏剧等定性研究百花齐放一样。同时,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如艾滋病研究者、市场分析人士、人种学者等等——也都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来为自己的研究寻求新的活力。或许最为重要的还是,发生在知识界的数次理论大讨论(后基础主义、后结构主义、后启蒙和后现代)都汇集到定性研究之中。这种理论上的大交错给社会科学的理解和实践方法带来了重大挑战。

作为理论汇合的结果之一,定性研究领域充满了激情、创新、知识智慧和行动。作为一名研究员,奥利森(Virginia Olesen)是这样描述的:“在教育和护理等重要研究领域,人们对知识论(有关方法、参与者关系、新方式和不断加强的定性方法等)的认真思考还从未像现在这样激动人心”(电子邮件,1998 年 11 月 25 日)。这场正在进行的革命带来了理论之间的互利互惠、平等对话和强烈的参与感,其中也伴随着相反观点、怀疑性挑战和抵抗。本章我们将倾听其中一些反对的声音,以便彰显突出的差异性,并详细讨论未来的种种可能。不过,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平息争论或将本领域引向一致或统一。我们认为这些怀疑和争议为实践中新的对话和革新带来机会,而非新的方法论基础在产生前的阵痛。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正是因为理论之间的这些激烈的对话,新世纪中的定性研究才得以维持其生命力。我们还将探讨我们认为颇有前景的一些研究方法,也就是那些可能对该领域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的挑战。

当然我们并不仅仅就事论事。为使我们的讨论更加深刻和丰富,我们调查了参与本书著述的知名同行以及本书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我们问他们未来五年在定性领域的发展方向,他们目前正在从事什么样的课题研究,他们认为哪些新的方法对他们来说独具吸引力,以及他们的研究生最喜欢何种调查方式。他们的回答非常有包容性、启发性和激励性。我们在此感谢所有贡献了自己的

观点而使本章内容更加丰富的人。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定性研究领域三个具体的争论点:有效性危机(the crisis of validity)、表达的权利(the rights of representation)和定性研究中政治的地位(the place of the political in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我们将回顾每一个问题的主要发展轨迹,并探讨每次争议所带来的发展。在每种情形中,我们将注意那些我们认为最有用的会引起争议的线索和实践。紧接着我们将分析新世纪的重大发展。在我们看来,主要争议所带来的发展为新的重要转变奠定了基础。我们将特别关注关系过程、技术引起的革新以及本体重建等方面的研究。

有效性危机

在过去十年中对定性领域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是关于语言的特性,特别是语言与其所描述的世界之间关系的讨论。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图书馆理论和修辞理论等的发展都向一个关键性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即科学描述可以精确和客观地表现世界的真实存在。至少可以说,这种发展表明语言学的模拟理论是不可能的,也不存在任何与世界完全匹配的描述。人们理解对世界进行的描述,不是来自世界本身,而是来自于世世代代以来我们在文化实践传统中的浸润。我们的描述只要近似这些传统就行了。因此,我们的世界构成来自于理解社群内的各种关系。

正在恶化的方法论基础

这种语言观引起了对社会实践认识论基础的重大怀疑。对普遍的、一般性法则的追求,对事物进行精确描述的科学能力,走向客观真实的科学进步的可能性以及要求科学技术的权利等都遭到了破坏。我们于是面对着邓津和林肯(Denzin & Lincoln,1994)所称的"有效性危机"。如果没有将文字与世界相匹配的正确方法,那就无法证明科学的有效性,而研究者将只能质疑方法论的作用以及评价的标准。就像邓津和林肯所提出的疑问:在后结构主义时期,如何才能评判定性研究呢?"(p. 11)

这些发展也同时激发了定性领域内部的热烈讨论和创造性能量的爆发。对很多定性研究者来说,有效性的批评反映了长期以来以法律为依据的方法论的其他疑虑,因为它们都无法反映人类经验和行为的复杂性。事实上,这些研究人员转而利用定性方法,希望对人类行为进行更为丰富和精细的描述。在这些学者中,许多人都认为经验主义对可测行为的强调忽略了人类理解的关键性成分,即当事者的个人经验。这两种观点——即相比定量方法而言,定性方法对社会世界更为忠实,以及人类的个人经验很重要——在今天的定性研究学者中仍然有着勃勃生机,并且都有不同的理论研究来支撑(Strauss & Corbin,1990,1994),比如说现象学(Georgi,1994;Moustakas,1994)和女性主义观点(Belenky,Clinchy,

Goldberger & Tarule, 1986; Brown & Gilligan, 1992; Harding, 1986, 1991; Komesaroff, Rothfield & Daly, 1997; Miller & Stiver, 1997)。

然而,随着有效性批评的结束,他们对曾经支持过他们的忠实的定性研究者反咬一口。如果不接受语言是现实的图画或地图这一观点,那么定性研究者就没有理由声称其方法在对现实的精确性或敏感性方面优于定量方法。要说明一个人,一篇一千字的描述文章不会比对这个人进行的标准化测试所得出的数值更为有效。同理,有效性批评对语言能充分描绘个体经验这一假设也提出了质疑(Bohan, 1993; Butler, 1990)。这些批评者问道:文字是如何反映或描绘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把"经验"理解描述为特定情境与文化历史的产物似乎更好,在这种特定的情境或文化历史中人们学会对自己和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描述根植于处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团体的创造意义的过程(请参见:Bruner, 1986, 1990; Gergen, 1992; Morawski, 1994; Sarbin, 1986)。

正在形成的方法论革新

虽然有时候这些怀疑主义被指责为偏执的虚无主义,但它们确实对定性研究有着巨大的直接影响。由于努力采用新的方法来发现和记录真实情况,方法论上发生了巨大的革新。在这里,我们将讨论其中的四种:反省(reflexivity)、多重表达(multiple voicing)、文学表现(literary representation)和表演(performance)。它们各自的意义部分来源于它们对研究和表现,即观察或"收集数据",和随后对此过程的报告的传统二元体系进行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由于观察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的解释,并且研究报告基本上也是一种解释行为,因此,研究和表现是密不可分、相互缠绕的(Behar & Gordon, 1995; Gergen, Chrisler & LoCicero, 1999; Visweswaran, 1994)。这一点我们将继续探讨。

反思

最初的几项革新曾强调反思。调查者寻求各种途径来向读者演示它们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他们在此研究方面进行的个人投入、他们在工作中的偏差、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惊喜和推倒重来的努力、他们借用文学修辞进行报告研究结果的各种方式,以及(或者)他们避免或压抑部分观点的方式(请参见:Behar, 1996; Kiesinger, 1998)。Rosanna Hertz 为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如下的详细阐释:

> 在投入到意见和反思的研究中后,我发现自己在思考如何将自己的意见与无任何个人经验的工作结合起来时更加地自由了。我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我会将自己的经历和观点带到研究课题中来。我仍然相信,作为社会科学家,我的首要义务是将我研究过的人的故事讲述出来。但我同时也发现,他们的描述已经在我的研究对象和我的对话中被构建出来了(电子邮件,1998 年 4 月 9 日)。

这种形式的自我揭露最近带来了自我民族志书写(autoethnography)的繁荣

(Ellis & Bochner,1996)。调查者深入研究他们的个人历史是如何影响人种调查的。然而,这里将本体和客体并列起来的目的不是要让读者停下来想一想各种偏见,而是要丰富人种学报告的内容。读者会发现主体/客体的二元关系正在恶化,也知道面对世界的同时也是在面对自己。在所有这些反省行为中,调查者放弃了"上帝之眼的观点(the God's-eye view)",而是从历史、文化和个人角度来看所从事的工作。对自我民族志书写而言,研究和报告或表现之间的脱离同样也受到了挑战。不仅要认可个人在观察行动中的投入,而且还是研究的主体。虽然反思是对调查理论的有益补充,但无法完全推翻有效性的概念。最终,反思的行动要求读者接受其真实性,也就是说,它们是在尽职尽责地努力"讲述真实的情形"。这样,我们便开始了对反思进行在观察行动中的个人投入不仅要被认可,还要被视作研究的目的之一的无限循环。

陈述多种意见

拒绝有效性的第二种重要途径是在研究报告中放弃单一的陈述,而通过多种陈述方式来使其相对化。这有多种不同的做法。比如说可以邀请研究主体或被研究者去就研究报告进行描述、陈述或解释(Anderson,1997;Lather & Smithies,1997;Reinharz,1992)。研究者也可以寻找对某事持有不同观点的研究对象,然后收集不同的意见,不强迫观点的统一(Fox,1996)。或者,研究人员也可以反省式地选择一些他们认为比较弹性的、不至于得到单一和一致结论的问题(Ellis,Kiesinger & Tillmann-Healy,1997)。一些研究者还会就某一主题进行共同探讨,这样他们的结论就不会排除少数派的观点。陈述多种意见有着很大的前景,因为它在识别有效性问题的同时还能提供大量的解释或观点(Hertz,1997)。这样,怀疑就被潜在的实际多样性所替代。

不过,陈述多种意见并非没有自己的复杂性。其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便是,作者/研究者应如何处理他们自己的意见:是将其作为多个意见中的一个呢,还是因为其有专业知识背景而赋予其优越性?另一个问题是作者和参与者真实身份的识别;如果我们认识到存在多种意见的可能性,那显然参与者都有着多种意见(Franklin,1997)。那么,这多重意见中哪一个会被用在研究中呢?为什么?同时,又有哪些被抑制了呢?雷恩哈兹(Shulamit Reinharz)提出该问题的方式对于进一步的讨论有着重要的启示:

> 在很久以前完成的一个课题中,我留下了详细的现场笔记……我追溯了这一年中我提到自己时所采取的方式,看看我的本体的不同部分在时间推移中的相关性。我把这些"自我"看作是在研究过程中自然产生的。首先,我与其他组内成员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对本体的定义。接着,其他差异一点点地凸显出来。随着这些差异的凸显,人们渐渐了解了我的不同方面,这使他们向我讲述不同的事情。这又使得我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不同角度认识了他们……因此研究时间长短的不同产生不同的知识。乍看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比如说,一天的拜访与一年的实地研究其结果自然会

不同。但这种差异未曾得到解释或证明。我认为我的笔记即说明了该过程(电子邮件,1998 年 4 月 18 日)。

最后,朝着多样性方向努力并不总会各方面都成功。一般情况下,调查者都起着最后著述者(或不同意见协调员)的作用,结果就成了包容、强调和综合的仲裁者。著述者的文学素养对读者而言往往是看不见的。

文学风格

针对有效性批评的第三大反应是对风格化表现的运用,特别是运用写作来取代传统现实主义的“讲述事实(truth telling)”。比如,调查人员的描述可能采取小说、诗歌或自传式创造的形式。文学风格的运用向读者表明:说明并非对世界的“映射”(事实上,这种比喻也是有漏洞的),而是向某对话群体进行的解释性活动。对许多定性研究者而言,这种写作格外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更大的陈述范围,并能赢得学术之外的读者(communication studies p. 298, 1999; Diversi, 1998; S. H. Jones, 1998, 1999; Richardson, 1997, 1998; Rinehart, 1998)以及做重要的政治工作。这种写作形式为创造性的陈述提供了巨大空间,但却容易被批评为意见太过单一。孤独的著述者以其绝对的修辞统领着这个散漫的领域。不过,革新又一次取代了批评:文学风格可以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以应对这种批评。比如,在其关于“万人游行(Million Man March)”后非洲裔美国人关系的论文中,奥斯汀(Austin, 1996)与其中的一位参与者共同创作了一首叙事诗,以下为部分节选:

> 非洲人都一样
> 不管身在何处,她告诉我
> 原原本本
> 我看着她,笑了
> 就像一位优秀的研究者那样
> 问道
> 怎么会这样
> 我无法解释,她说
> 用那样的音调
> 就像奔涌的河流。
> (pp. 207-208)

反省和陈述多种意见带来的许多问题也可被归结到非传统的各种写作形式上来。虽然这些革新避免了传统的文学形式的某些缺陷,但认为它们并不适合于科学陈述的人仍然普遍存在。在提到表演时,批评的声音就更大了。

表演

最后,为在保持意见的同时摆脱客观性的束缚,越来越多的学者转而把“表演”作为研究/陈述的一种形式。有一种观点证明了这种转变的合理性。这种观

点认为,如果就像有效性批评者所声称的那样,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区别主要就是文本传统的问题,那么,科学写作的形式并非就是陈述所能采用的惟一方式。虽然视觉上的各种辅助工具(比如电影和摄影)也已被接受为"捕获现实"的一种手段,但它们一般都被当作写作传统中的补充形式。不过,当我们认识到交流媒介本身对我们的研究对象有一种格式化的影响时,作为记录工具的电影与表演(比如"为一群观众制作的电影")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Gergen & Gergen,1991)。由于这种模糊性,研究者开始认真考虑在艺术和娱乐界作为研究及陈述的各种交流性表现形式——绘画艺术、电视、戏剧、舞蹈、魔术、多媒体等。在转向表演这种形式的过程中,调查者再次回避了对真实的令人迷惑的种种观点,同时扩展可以激励对话的交流范围。

对该研究/陈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有卡尔森(Carlson)的《表演:一份重要介绍》(*Performance: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96)和由凯希(Case),布里特(Brett)和弗斯特(Foster)编辑的《表演概览》(*Crusing Performative*,1995),以及下列作品:Blumenfeld-Jones,1995;Case,1997;Clark,1996;Denzin,1997;Donmoyer & Yennie-Donmoyer,1995;Jipson & Paley,即将出版;Mienczakowski,1996;Morris,1995 & Van Maanen,1995。与定性领域关系密切的一个例子是由 Jim Scheurish、Gerardo Lopez 和 Miguel Lopez 创作的有关墨西哥裔美国移民生活的表演作品。该表演包括音乐、电视和幻灯片的形式——几种形式同时进行。另外,还有一份剧本要求演员和观众的共同参与。关于有效性问题,Scheurich 指出:"始创者并没有就这些经历与墨西哥裔美国移民生活的关系性质提出假设"(电子邮件,1998 年 4 月 19 日)。该表演确实给观众提供了更多参与的可能性,但也给了他们随意发挥的机会。卢塞尔和博恩(Russell & Bohan,1999)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了科罗拉多州法律的第二修正案的内容(该修正案取消了对性歧视的法律追索权)。利用从反对该法律人士的访谈笔记中获得的主题和陈述,研究者帮助创作了两个高度精细和复杂的艺术题材:一个是分成五部分的宗教剧 *Fire*,作者是一个职业作曲家,由一个技艺高超的合唱团在一次全国性比赛中演唱;另一个是一部专业制作的电视纪录片,由 PBS 播出。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感觉到许多界限是模糊的,比如说在专业人士和业余者之间,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以及表演者和观众之间。

丰富抑或腐蚀

从通信者的反应来看,他们在这些突破性探索中的投入很可能会大量增加。就像弗劳(John Frow)所说的:"我将去往何处?我愈来愈怀疑知识性话语所遵循的协议和对所谓'专业'知识流派的局限性探索……在我看来,当我试图摆脱日常学术争论的限制性和确定性时,对非线性和回归式文本结构的运用就越来越难以避免了"(电子邮件,1998 年 4 月 5 日)。查马兹(Kathy Charmaz)也写道:"对我而言,第一要考虑的事是完成一本关于研究报告撰写手册。我采取的方法是将各种定性分析的方法与写作技巧结合起来……这些技巧都是被专业作家所

采用的"(电子邮件,1998 年 5 月 30 日)。同样,Jim Scheruich 也说:"我利用电视寻求一种更多维的媒介。我喜欢在文字上增加一些视觉和听觉效果。虽然我并不想讲传统的故事,但我也喜欢有故事性的东西。我认为该媒介支持了意义的多层次性"(电子邮件,1998 年 4 月 19 日)。

但是,虽然这些探索都伴随着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激情,一些定性研究者却因为这种逐渐脱离传统的标准而越来越不安了。于是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言辞,比如自恋、狭隘、自我表现等。在这点上,马尔库塞(George Marcus)指出:"我们书写的有关反省、主观性和主体间的权力等一些东西中的新思路……和某程度上的回归实践都在按常规发展,差不多是这样的;同时,研究条件(特别是实地研究)现在应该受到注意"(电子邮件,1998 年 4 月 4 日)。马尔库塞认为,人类学家必须继续进行长期的、艰辛的工作,以达到"详尽描述"的要求,不要被其他追求偏离这一目标(Marcus,1998)。克拉夫(Clough,1997)指出自我民族志的写作与电视戏剧的共生关系以及"对理论上的批评性干预保持距离"(p. 101)。类似的是,蒂尔尼(William Tierney)担心通常"尝试性的文本不过是文字的试验罢了。我们中的批评家越来越怀疑文学上的文字技巧没有任何变化可言"(电子邮件,1998 年 4 月 10 日)。我们在调查中遇到的最刺耳的文字来自希尔弗曼(David Silverman),他写道:"过去的 20 年为快餐式的,或很快就被其他方式所归并的形式所困扰。后现代主义(Foucault,Latour)的精华将被并入冷静的制度化实践的研究。'玩乐和游戏'(文字游戏、试验性的写作等)将被摒弃。无尽的开放式访谈将成为 Oprah Winfrey 所回避的方法"(电子邮件,1998 年 4 月 3 日)。

有效性展望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种批评不顾后果,其作用可能是减少后劲,回归传统或终结方法试验。它还可能彻底毁掉整个领域,因为研究者可能干脆停止对话、自行其是。然而,这些结果既不幸又没有保证。开始时,一些人可能会不负责任地回到传统的做法上去——就像有效性批评从来就不曾出现过一样。同时,那些进行新的探索的研究者无法断言有效性批评的合理性。对他们自己来说,根本就没有可提供这些保证的理由。再者,统一化的调查领域也是几乎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这种调查注重一致性和概念上的严格性,这样的话所有的方法都是被预先规定好了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重新调用生成性压力这一比喻,而不是缺乏交流的、犹如一盘散沙似的学术领域。如果把这些革新和它们的批评放到欣赏性的对话中去(我们认为应该这样),那该鼓励什么样的新途径呢?会开辟什么样的前景呢?从不同的对话中我们发现,以下方面比较重要。

再构有效性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有效性的讨论已经陷入僵局。一方面,坚持描述和解释是对研究客体的透明反映的研究者缺乏这样做的理由,因此他们很容易受到毁灭性的逻辑攻击。但对这一做法提出批评的人最终也是无法证明其批评的合理

性;他们的批评所依赖的也正是同样的假设,即语言是与客体相对应的。这样,就有必要讨论重新构建有效性的概念,而不是重新例示现代主义的客观真实性,或是放任自流。至少,我们重新思考语言参照问题是有益的。如果研究或者批评是"关于"一些事物的,而且这种关系并非一种"模仿"的话,那么,还能做出其他的设想吗?即使是那些在作品中利用虚构的各种类型或表演的人,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作品当成纯粹的娱乐;一个潜在的假设是: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理解。Frow 的公报为我们重新思考语言参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 "文本(text)"和"会话(discourse)"的概念指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异质性:也就是说,不能简化为"语言"或符号之外的现实。相反,它是语言和其他符号(如图标)、社会关系、已构建的环境、已加强的制度化结构、角色和权力分层结构,以及各种实体等的不同的混合。我相信只有在此基础上,文本性和散漫性的比喻才能起作用而不至于简化为语言或社会关系(电子邮件,1998 年 4 月 5 日)。

现在我们开始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丰富的意义上来讨论语言参考的作用。如果参考来源于这样的异质性,那我们就得重新考虑获得有效性的途径,以及是由谁、为谁和在何种条件下获得的。

我们也可以放弃对有效性的关注,这是不少人的选择,其中包括本章的几位评审员。鉴于其被争论不休的以及可能毁灭的未来,他们提醒我们最好避免使用这个词。然而,对我们来说,重新建构这一概念似乎是更好的方向。在这一点上,拉舍(Lather,1991,1993)关于有效性的论述尤其具有启发性。拉舍提出了一个用以重新建构有效性概念的"非比寻常的列表":讽刺性有效性(ironic validity,突出了语言在描绘世界时的种种不足),超逻辑有效性(paralogic validity,与语言的不可判定性、局限性、似是而非、断续性和复杂性相关),"根茎"有效性(rhizomatic validity,采用"主根"的比喻作为象征,表示传统的研究程序是如何被破坏、新的局部性确定的理解规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花哨有效性(voluptuous validity,"过分""不紧密""危险"和"无限制的",将道德和认识论结合在一起)。麦考塔格特(McTaggart,1997b)也提出了一个有效性与参与性行为研究的关系问题。他建议通过在不断变化的相关社会实践中的功效研究来重新建构有效性的概念。"我们对有效性的考虑必须涉及更多知识以外的东西……(它必须)有足够的全面性,以便在对其他更无生气和分离的社会调查进行犀利和摧毁性的批评时反映社会行为研究者所专注的内容(pp. 17-18)。围绕该观点进行对话对于重新建构有效性概念意义重大。

情境知识

与有效性的重构有着密切关系而本身又有诸多问题的是对情境化知识的探索。就像哈拉维(Haraway,1988)以及其他理论家所提出的,该概念主要是为改进功能和协调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而服务的。因为很少有传统主义者希望人们相信他们的解释是对他们所想要描绘的主体的唯一说明,同时也很少有建

构主义者会坚持"唯有文本",只有情境化的真实,意即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真实",而且是像编排索引一样来表示它们的特定情况(请参见:Landrine,1995)。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日落"描绘的是傍晚的天空中沉下去的太阳,而同时宇航员们会说:"太阳是不会下沉的。"各种描述和说明只要是不违背当地传统对普遍真实的理解就是有效的。在这一点上,霍尔斯泰因(Jim Holstein)认为他的研究是"努力观察那些已被构建的、短暂的、超现实的东西,同时又不放弃对真实世界(即使偶尔它有时候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可靠)中生活经验的经验分析(电子邮件,1998 年 4 月 23 日)。

不过,虽然开了个好头,我们仍然需要对情境化知识概念上的可能性进行更深入的对话。说任何事物对某个人、在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都是有效的,这是一句无趣的话。这个结论会关闭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对话,并导致相互之间互不理睬。这样的结果将导致社会科学调查的终结。因此需要进行情境有效性是如何实现、保持和推翻的对话。进一步需要讨论的还有:不同的定性方法在这方面是如何和为谁发挥作用的?它们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有效性的?

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是在定性研究圈内发展出不同的方法,以便情境化知识可以建立各种富有成果的(而不是相互抵触的)关系。我们的调查方法往往支持(或"增强")的是某些特定的群体。这个结果既可以有助于这些群体的情境化知识,又可以减少或抹杀各种可能的现实。于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研究处在各种竞争性、相互抵触的"情境"中产生富有成果的交流的调查方法。我们发现 Yen Espiritu 的话对这点很有启发性:

> 我在想肤色研究学者是如何通过研究其他"其他人"而扩展其"我们自己"的领域的。比如,我研究菲律宾裔美国人,而我自己的出生地为越南,那么我在做研究时就不会是"客观的"局外人,而是作为一个与研究对象有一些共同的生活经历、同样来自亚洲的移民。我不是说那些共同的奋斗经历可以赋予我在菲律宾裔美国社区中的"局内人地位",但我确实可以说,这些经历使我可以在研究中用到一种比较性的视点,这种视点是暗示性的、本能的,来自我自身的认同和立场的。这些暗示的、比较性的方面很重要,因为它们允许我们突出种族差异及其区别性的功能力量(电子邮件,1998 年 4 月 12 日)。

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种需要是为了增加话语和实践两大领域之间的的对话(请参见:Cooperrider & Dutton,1999)。这一点在本章的后面还将进一步讨论。

修辞学/政治学的考虑

最后,我们目前的争论可以通过扩展修辞学/政治学的考虑过程而得到丰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有效性适用于多种调查的问题限制在特定文化中的不同方法/陈述所起作用的范围之内。在社会科学探索对文化生活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估计不同方法/陈述形式之间的比较价值呢?社会政治对现

实主义/客观主义中的家长式的、殖民主义的、个人主义和霸权的方面的批评不断增加(Braidotti,1995;hooks,1990;Penley & Ross,1985;Said,1978;Smith,即将出版)。虽然这代表着重要的开放,但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从修辞角度,对许多人认为的现实主义取向的积极功能的研究还是太少。比如,统计学的语言不过是修辞的一种形式而已,但这种修辞对某些观众而言和在某些情形下,它可能比个案研究、一首诗或自我民族志的报告更为有力和更有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未曾探索前面讨论过的新发展的不同社会政治学和修辞学上的含义。比如,对多种意见或虚构风格的探索是否会消除或提升观众的兴趣或投入?就像古布里厄姆(Jay Gubrium)在对该研究表示了保留意见之后所说的:"这些东西是很吸引人的,对我来说,它们本身是非常重要的"(电子邮件,1998 年4 月2 日)。不过在一个常常要求对严肃问题提供清晰和理性回答的社会,这些形式未免显得不太实际、无关紧要甚至不够严肃。正如 Linda Smircich 所说:"我在一个商业学校中……思维和研究的最主要形式还是实证主义/定量的/功能主义,并且目的是为了管理方面的利益……我很难碰到一个大胆的学生,敢于挑战这些传统上的障碍"(电子邮件,1998 年4 月23 日)。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我们必须继续研究社会功能和不同交流模式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可能要问,自我反省和自我民族志的报告是否会以个人经历凌驾于社会或公共行为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些倾向在满足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时是否也存在一些错误?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对许多正在出现的方法论的不同修辞/政治资产及义务进行大规模的比较性分析。林肯(Lincoln,1995,1998)对定性研究标准的分析为该对话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另请参见:Garratt & Hodkinson,1998)。然而,仍然需要能对话语的各种形式的相关反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陈述的权利

对经验主义研究进行的批评反映曾经激起了对定性领域的第二次波澜,这一次主要是针对陈述、控制、责任和分歧方面的问题(Tierney & Lincoln,1997)。福柯(1979,1980)的关于权力/知识的专题论文或许是对这些批评所做出的最集中的描述。对福柯而言,产生知识的领域(包括社会科学)是权力的源泉,并且由于它们的描述、说明和评价经由教育和其他实践进行了传播,它们便扩大了潜在的征服范围。比如,正如精神紊乱的概念和精神科职业的诊断性分类被所有与此问题有关的专业和外行人所认同的那样,文化向精神病学权力的退让也是被公认的。这种观点对学术圈来说是一剂清醒剂。还要面对更多痛苦的问题:研究工作在何种程度上使文化方面的常识和未经细察的现实转变为学科话语?如何在目前的研究基础上促进学科的发展?什么时候研究者能通过他或她的研究对象来建立个人或组织权威?研究工作是否要为监督机构服务,以便增加它们

在控制研究对象方面的能力?

由于人们对社会科学调查的日益抵触,对这些问题的质疑也在不断增多。女权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满的群体之一,她们指责研究文献对女性的忽视和限制(Bohan,1992)。少数民族成员则越来越意识到人文科学研究对长期以来他们对公共媒体歪曲或错误报道他们生活的批评置若罔闻。精神学的建立是职业群体中最早受到抨击的对象之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同性恋活动分子强迫精神学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这一分类中划分出来。还有,非洲裔美国人曾因社会科学文献将其描述成缺乏才智或犯罪的一类而愤怒地发出了声明。同样,老人、艾滋病人、“精神病幸存者”和其他许多人也都纷纷质疑:科学家是否有权来陈述(利用)他们的经历、行为和/或传统呢?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有效性问题一样,这些批评对未来的研究带来了困扰。

不过,这些观点也都有其局限性。一旦发展到极致,就会如同它们所质疑的对象一样问题重重。作为对福柯批评的回应,人类科学研究经常通过反霸权的方式发挥着作用,政府制度、经济控制、教育机构和媒体等都成为批评的焦点。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样的研究可以作为一种抵制和社会公正的力量。而且,搁置所有知识方面的要求可能会在事实上终结所有的传统(种族和宗教等),这些传统所依赖的正是“描述世界”的能力。此外,这些要求和对利益群体的批评也有其局限性。对个人来说,对自我陈述权利的要求与人类科学家的其他许多相冲突的要求是同时存在的,这些权力包括言论自由、从自身角度讲明事实、做出科学贡献以及追求自己的道德情操。自我陈述可能是好事,但不是唯一的好事。进一步说,自我陈述的定义也并非没有任何疑问的。如果必须下结论的话,没有人可以有为他人说话或描述他人的权利。甚至有人可能会质疑个人陈述自身的可能性问题,因为要这样做的话,必须得用到其他人所说的话。那么孤立的个人就不会有私人的意见,也不会有私人经历的有关陈述。如果不依赖于他人所说的话,我们就无法获得他人的理解。

扩展方法论领域

由于这些理论争辩同时存在,我们仍然需要对研究过程进行更为宽容的和互相对应的看待。与本章中心点相一致的是,我们将这些不同的压力看成具有潜在的生成性。它们已经促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成就,并同时为一个创造性的未来设定了发展目标。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来自定性领域的三大成就吧。

授权研究

或许,授权研究是对陈述的批评性考量的最为显著的反应,同时也是定性领域中发展成绩喜人的一项课题。在该课题上,研究人员提供了他或她的技能和资源,以帮助各种群体研究共同感兴趣的课题。参与行动研究是这一类中发展得最好的一个(Lykes,1996;McTaggart,1997a;Reason,1994;Smyth,1991)。在有关授权主题的一个变体中,安德森(Anderson,1978,1990)已经针对培养各种社区

之间的联系(否则这些社区之间就会产生敌对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安德森花了许多年呆在费城的公共寓所和大街上,他创建了一些重点群体,收集了大量经常光顾街角和其他公共场所的人们的叙述。他的最新作品(*Code of the Street*, 1999)的读者对象不仅是社会学家,同时也包括公共政策策划者、邻居群体、教育家以及其他与各种客户人群有关的人。在不放弃对街道"代码"的意义及其功能进行说明的前提下,安德森提出了一套解释性的框架,该框架对社会的边缘和主流人群都同样有意义,也因此它可以起到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桥梁作用。这种努力旨在减少相互间可能普遍存在的不尊重和异类的感觉。

结合陈述

如前所述,运用结合陈述来处理有效性问题在陈述上也有分歧点。当研究者以参与者的身份进行调查和写作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而且陈述部分也越来越多地是由两者共同控制。在早期的这类工作中,研究参与者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不过,研究者也会经常以一种微妙但却强有力的手法,通过编辑和解释来表达各种意见。作为弥补,一些研究者现在会请参与者本人书写他们的研究说明。其中最具创意和影响最广的例子就是拉舍和史密西斯的报告《困扰天使》(*Troubling the Angel*, Lather & Smithies,1997)。它讲的是调查者参与艾滋病毒携带妇女支持小组的工作。该报告包括这些妇女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她们期望把她们的情况告诉世人的第一手陈述。这些调查者并没有对他们的立场遮遮掩掩,而是花了大量篇幅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和理解。为了弥补这种陈述方式所带来的对医学、经济和治疗方法描述的不足,拉舍和史密西斯补充了许多正规的学术和科学资料。而在出版之前,他们把整本书拿给参与者看,以倾听他们的意见。

分散陈述

为回答对陈述的批评,一些研究者也开始探索分散陈述的方法,即调查者试图规定有关对话关系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弗克斯(Fox,1996)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她把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观点与一名儿童性虐待幸存者的相关经历结合了起来,并附带有难得的虐待者本人的观点。该陈述立足于多次内容广泛的开放式的访谈以及作者在参与对被判罪的性虐待者进行的一次治疗过程的观察。该报告采用三栏的格式,分别代表三方的观点。这种行文格式鼓励读者考虑相互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三种不同观点。所有语言都是当事人的原话。虽然选择和编排是由弗克斯完成的,但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阅读并对所有材料做出评论。这样,文章的编排有助于对情感——矛盾、悲伤、愤怒和感情——的完整描述。弗克斯把自己儿时被性虐待的经历也加了进来,这样就打破了作者置身事外的传统。

分散陈述的另一形式是由一个三人研究小组提供的,他们同时也互为研究对象(Ellis et. al,1997)。在五个月的时间里,这三个人相会于不同的场合来讨

论食欲过盛的问题。他们中的两个有着饮食紊乱的历史。其结果是他们共同写了一篇描述在一家高级餐馆就餐的文章。该场景很容易激起人们的兴趣,因为他们倾注于食物,并且在描述其他知道自己"问题"的人的点餐和饮食时,他们可以对待复杂的关系。他们共同之作的行文显示出了各自描述中的个人内心活动和积极参与。与前面讨论的弗克斯的陈述(引用语用空格分离,个人观点被清楚陈述)不同的是,该陈述是笼统的一体。这样的话,读者可以通过每位作者几乎同时进行的内心反应获得一个总体认识("上帝之眼")。比如,读者可以发现,点甜食为何对每个妇女来说都很重要,以及每个人是如何解决这种人际关系问题的。这种陈述上方式的试验开拓了令人欣喜的新视野。

政治的地位

争议的第二个方面与有效性和陈述的问题密切相关,但性质截然不同。其核心是有关研究者的政治或价值介入。三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好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政治或价值中立。意识形态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决定研究内容或研究结果的使用方式,但方法本身应该是不带意识形态的。然而,随着后现代对有效性的批评变得愈发复杂,有一点也越来越清楚,即要想将研究方法与意识形态分开并非易事。一方面,方法的内涵和重要性需要从更广泛的内涵网络(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中获得,而这些内涵本身又都结合在一起构成意识形态和道德传统。比如说,为个体做心理试验是假设个体在人类事务产生过程中心理作用的中心性。这种类似特权也被定性方法用来获得更多的个体经历。这样,两种方法都间接地支持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假定研究者与研究客体(研究对象/客体的二位体)相分离的研究方法也都赞同对世界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以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相分离的基本条件。

有关政治的这种扩展的认识对研究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那么主要的挑战就是进行深入表达研究者个人的政治和价值的研究(Smith,1999)。换句话说,如果科学从其他意义上说是政治性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坚持让研究工作更有效地达到目的。同样,在缺乏固定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定性领域,政治介入通常都可以自由产生各种方法,服务于它们的政治或价值目标(Crawford & Kimmel,1999)。

正是对这种方法论的政治潜能的认识才导致了目前定性领域内部的强大压力。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些派性极高但又相互独立的目标——女权主义、同性恋激进者、种族意识提升、反殖民主义等①。每个群体都有其特定的关于"好"的标准,同时暗示那些不积极参与的人是不够"好"的甚至可能是个障碍。很多人也

① 法恩(Michelle Fine,个人交流,1998)对此提出质疑:"难道只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男女同性恋……是政治的吗?过去的右翼、主流和普通心理学怎么样?难道它们不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吗?这些规则难道不同于明显的政治(或左翼)性的工作?"

都希望看到定性研究带有特定的政治立场。比如说,就像林肯和邓津(Lincoln & Denzin,1994)所提出的:"后结构社会科学所追求的外在基础不是科学,而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和女权主义的立场……好的文本是要能调动这种目标的。好的文本揭示出种族、阶级和性别是如何在互动个体的具体生活中发挥作用"(P.579)。然而,对其他人来说,这种政治的接合威胁到他们之间的对话。许多人的研究兴趣于是转向其他群体——老人、受虐者、病人、残疾人等;还有一些人则发现悠久传统中的重要价值并通过研究来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组织领导人等。

但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吸引意识形态目标的相同逻辑才开始在这些目标上变得更具反省性和批评性。如果说这一后现代转变破坏了有效性的要求,那么它同时也开启了政治或价值介入的空间。然而,所有服务于基于意识形态研究的现实都同时受到了质疑。如果不能合法地通过观察的方法了解真实的话,那么,关于贫穷、边缘化、压迫等的描述同样也只能是比喻上的。如果能从经验科学中排除理性和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基础,那也就能同时排除价值批评。同时,由于这种形式的批评日益清晰,它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压力。那些在后现代争论中曾经支持其事业的政治派别转而谴责它们是"相对主义"、"保守"和"不相关"(请参见:Reason,1994)。

由派性到多种意见

从政治派性问题的争议中我们又可以找到拓展定性方法潜能的机会。或许该领域最突出的成就是对多种意见的概念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在学者中存在一个普遍的倾向(至少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即假定本体的一致性。由于受到理性和道德内化的启蒙主义影响,他们特别注重一致性、统一性和目标明晰性。理想的学者应该知道他或她自身的立场,并对其关于"好"的定义负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声称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男权主义者"或者"Gray Panther"。不过,就像后现代文献中所称的"自我之死"一样,社会建构和对话等日益清楚地表明,对自我的单一或一致的定义不论从学术还是政治上看都是有问题的。暂时搁置对多种意见的支持有很多好处。特别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无论是在我们学者内部还是在我们的研究参与者中间都存在着多样性,包括相互竞争且往往相冲突的价值观、政治取向、对好坏的理解、欲望的概念以及我们作为人的"自我"意识(Banister,1999)。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也可能会接受与它们完全敌对的意识形态。

多种意见主体的观点提供了突破定性领域普遍存在的敌对现状的重要途径。布莱岛蒂(Braidotti,1995)是一位女性主义理论家,她的"游牧的主观性(nomadic subjectivity)"的概念对这一点很有用。游牧意识"需要对中心以及任何真实身份的原点进行完全分解"(P.5)。穆菲(Mouffe,1993)是一位政治理论家,他认为自由社会主义关于身份的概念"允许构成个体的身份的多样性"(P.84)。我们认为,多种意见的假设打开了通向新方法的大门。我们已经接触过多种意见进入解释领域的各种方法——研究参与者的意见、科学文献、调查者

的个人意见以及媒体等(Ribbens & Edwards,1998)。不过,对多种意见的质疑日显强烈,因为我们对研究各方可能"持有不同意见"这一点非常敏感。问题是,研究者是否会让参与各方(包括他们自己)对后工业社会生活中典型的矛盾和各种复杂性表达他们不同的意见。一些学者正在朝各个方向努力(参见:Jacobs, Munor & Adams,1995;Richardson,1998;Travisano,1998),但还没有什么突破。其中的两个研究运用了不真实写作的方式,作者允许用多重描述进行删除、修订和改变其自身的身份和活动。重新塑造的角色有脱衣舞者、舞蹈家、摔跤选手、研究者和教授(Ronai,1998,1999)。将角色描述和反省性评论相分离的表演作品同样也能破坏单一意见主体的立场(Gergen,即将出版)。

新世纪的研究议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定性领域内一些普遍性争议的问题,重点放在对未来发展有利的机会上。在最后的一章里,我们希望能够探索未来发展的三个领域,它们都与先前讨论过的话题密切相关,同时也会极大地扩展可能的领域。我们认为,如果沿着这些方向走下去的话,可能会改变对方法论的认识以及对社会科学及其研究对象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可能更积极地进入文化生活领域,改变人们的普通意识和行为方式。这些都会遇到挑战,但我们认为关于定性方法的对话正使我们走向革新。以下我们将简单介绍研究作为关系过程、技术前景以及重塑西方自我概念的发展前景。

作为关系过程的研究

我们发现,定性领域已经成为陈述形式的一种重要创新源泉。比如说,反省性、文学形式和多种意见的试验已经为研究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早些时候,我们曾强调过研究和陈述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任何形式的记录或描述同时也是一种陈述形式。但同时陈述也不可避免地是"为了读者"。比如说写作就是为了让读者进入一种特定的关系。至少,写作的行为能同时定位自我和读者,并赋予双方在特定关系中的身份和角色。从这种意义上说,陈述的每种形式(就像舞步一样)都会支持某种关系形式而反对其他形式。这样,社会科学写作的各种类别——从神秘的和民主的到娱乐性的,都支持区分不同的关系形式(Gergen,1997)。从更广的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中不同的陈述形式本身就都是对特定文化生活的反映形式。

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一起参加到对现有陈述形式的批评中来,同时也可以考虑一下方法论在其所支持关系方面的未来发展。比如说,传统意义的很多写作都倾向于维持特权的结构:我们以"知者"的地位针对"不知"的读者进行写作。这种形式近似于独白,因为我们假设读者是没有机会参与的,而大众也无法干涉作者的遣词造句。我们也已经看到,定性领域内的不同写作尝试打开了新

关系形式的大门。比如说,新的写作形式使得作者放弃了权威地位,并鼓励读者进入一种更为平等的关系。对未来的最直接挑战是要扩展陈述形式以实现特定的关系目标。我们如何才能使关系的具体过程,以及具备积极潜能的更具体的过程自由地服务于文化呢?

这里我们或许要问法恩(Michelle Fine)所问过的问题:"定性研究的哪些要素有助于民主/革新实践、社区组织、进步的社会政策以及使公众民主地参与社会批评?"(个人交流,1998)。为了说明这一点,Arlene Katz 及其同事为了加深对老年人医务工作者的理解,组织了一个老人团,作为其哈佛医学院的学生对话资源(请参见:Katz & Shotter,1996)。传统的"研究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被定位为忍受疾病或其威胁的"文化圈内人"。同样,为能提供直观的生活场景,一些研究者向贫民区居民提供照相机或摄像机,这样,"研究对象"变成了既是学习者,又是老师/信息提供者/表演者。而且,公众对话项目已经创建了几种方法,以使观点严重对立的人(如 prolife & prochoice advocates)聚集到一起进行有效的对话(Becker,Chasin,Chasin,Herzig & Roth,1995);David Cooperrider 和他的同事创建了一种交流的方法,称之为"欣赏性的调查(appreciative inquiry)",这种方法完全改变了组织或社区内本来可能敌对的成员关系(参见:Cooperrider,1990;Hammond,1996;Hammond & Royal,1998)。从所有这些例子来看,几种新的关系形式已经成型了。

可以说,这些研究中存在一种可以完全重塑研究概念及实践的潜能。如果我们放弃长期存在的研究范围的概念,而代之以陈述关系的概念,那么,那些以前作为研究对象及研究结果的读者就变成了关系的参与者。并且,如果我们摒弃研究即积累结果(静态的或僵死的发现)的传统目标,而代之以产生交流过程,那么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变成建立有效的关系形式。研究者就不再是被动的、为与一小群研究者的读者进行交流而产生陈述结果的旁观者,而变成积极的参与者,形成生成性的交流关系,建立持续的对话,并延伸市民研究领域。比如说,我们已经就交流、有关偏见的民族对话以及社区复兴("市民社会")等方面的全球论坛的价值进行过大量的讨论。但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努力极其分散,而且也罕见地吸引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参与。目前,我们创建社会形式的技能还非常微弱。面临着重新概念化研究的挑战,我们能够也理应成为关系实践的领头羊。我们将很快回到这个话题。

技术的挑战

大众技术的广泛传播(包括电话、收音机、电视、汽车、公共交通系统、飞机旅行、大众出版以及计算机通信)形成了 20 世纪最重要的文化革命。关于这场变革的研究愈来愈多,而这种变革对研究方法的意义却鲜有问津。蒂尔尼在写给我们的信中说:"我一直感觉到,我们的下一代做定性研究的方法会由于科学技术而产生巨大的变化"(电子邮件,1998 年 4 月 10 日)。这一点我们完全赞同,这不仅仅是因为技术发展增加了研究的新领域(如互联网交流,MUD 在线文字游

戏),也不是因为现在的研究者比以前更有效地接触到很多研究人群,而是因为科技的飞跃发展产生了界定研究方法以及对研究进行重新思考的新途径,包括研究者、被研究者和读者的身份。我们先来讨论概念问题,然后再讨论方法论的含义。

对研究者而言关系重大的是正在消失的研究对象的问题。传统的研究方法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客体。研究人员可能花数年时间来研究某个特定人群或亚文化,几年之后,研究者就可以发表研究结果,并希望其研究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有启发性。其潜在的假设是,研究对象会是比较稳定的,研究本身也会保持相关性。可是,随着通信技术在全球的传播,意义建立的过程也在加速变化。价值观、态度和观点都迅速改变,相关的行为模式也会随之而变。事实上,一项研究的暂时相关性会受到愈来愈多的限制,文化分析的半衰期也逐渐缩短。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传统的研究/陈述方法是否已经愈来愈不能适应当代形势?比如说,当作为共享某种意义和行为模式的人群对其文化的理解发生改变时,我们又如何进行不同文化或亚文化研究呢(Hermans & Kempen,1993)?文化在任何地方都像组成文化的人一样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S. G. Jones,1998)。

正在消失的研究对象促使一些研究者将自己想像成新闻记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即当今世界的评论员,而非为知识的发展添砖加瓦的人。我们的使命应该是对此时此地而非彼时彼地的文化对话做出贡献。然而,这一结论也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当通信联系延伸到各个角落时,意义的相互依赖性大大提高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传统概念是在较低科技条件下成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忽视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细察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研究对象的身份被掩盖了,对他们活动(当然是价值负载的)的描述也会有很长的时效性,并且只在很小的科学家群体中交流。随着高科技通信技术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参与者的个人身份越来越被容易地被追踪得到(想想对互联网隐私权的挑战),一个人向研究者传递的信息可能会被随即传给更多的人群。而且,这些技术也增强了在研究中运用政治和道德要素的意识(Ceglowski,即将出版)。于是,受邀参加课题研究的人可能会产生抵触情绪,或者把它看成是一次改变信仰的机会。比如说,电话研究人员都很清楚,人们对"研究赞助方是谁"以及"研究结果将如何使用"这两个问题通常都非常敏感。我们目前面临着有点类似于当代物理一样的情境。我们不再是研究独立的个体(社会原子),相反,我们进入了一种关系领域,在该关系中,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并且,就如海森堡效应一样,每当我们开始一项研究时,我们也就改变了该领域的组成。作为研究者,我们必然会打乱已有的关系体系,并且,研究结果本身也会为以后带来一系列不可预料的事件。

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三大重大研究课题摆在社会科学家面前。首先是建立对话社群。如果社会研究对象不断变化,而我们的研究又必然会改变这种过程,那么就更有必要建立形成积极对话的研究课题。互联网是这种研究的重要情境。比如说,考虑一下万维网的政治结

构。数以千计的政治、宗教、种族和以价值为中心的群体都在提供各种研究课题。人们可以像加入民主党、共和党或改革派一样很容易地加入新纳粹、三 K 党或德鲁伊教。然而,这些群体在形式上都基本上是向心性的,它们要求其他人加入其相对封闭的意义派系,事实上它们不会产生意义构建之间的对话。但特别是在相互敌对的群体之间,建立积极的对话又显得极其重要。在我们看来,培养不同群体之间对不同观点进行在线交流的研究工作非常有益。进一步说,对于许多无法与别人进行会面,但又与其有着共同的重要利益的人来说,通过计算机进行交流是很有必要的。再者,研究人员也可以主动地提供这样的途径。

"渠道法"的发展,即通过技术手段让公众了解边缘或受压迫群体的声音、观点、需求和理想,也会受到支持。这种努力在目前的出版物中显而易见。在过去的几年里,社会研究者在陈述下等社会群体的声音和境况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们的读者群只是有限的专业人士。由于有了因特网,作品的可见度和有效的交流都大大提高,这从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草根运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本将被政府民兵铲除的群体,后来由于他们通过因特网将其境况公布于世,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处境。全世界上无数组织都来帮助他们,这些组织同墨西哥政府官员直接进行强烈的交涉,最后使得政府停止了相关政策。这些工作正是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要鼓励的。

最后,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点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技术革新会带来可以看成是"动态实验室"的创建。也就是说,技术条件允许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社会实验——创造新的交流条件来提供可能的未来条件意识,或者实现那些未来条件。就像恰帕斯州的政治事件一样,草根文化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因特网技术已经极大地促进了计算机社群(参见:S. G. Jones,1998;Markham,1998;Porter,1997)及场景的发展,在这些场景,个人可以尝试多重身份或加入新的或虚构的身份(Rochlin,1997;Turkle,1995)。那么,作为一个研究社群,我们就面临着从理论和政治的抽象转变到构建能够展现未来的虚拟社会的可能性。这种虚拟社会能使我们尝试各种关系过程,比如说减少冲突、压迫和仇恨的对话形式,或者为参与者提供新的、促其成长的经历。在一个相关研究课题中,荷兰公共管理学者 Paul Frissen 及其同事与相关的政策制定者一道,共同探讨政府是否应该及如何制定和执行因特网交流的法律。认识到互联网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革,Frissen 及其同事创建了一个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管辖的虚拟社区。在没有征询公众意见的情况下,该社区产生了一套自己的互联网交流"法律"。然后,政府官员被邀请到这个世界中同参与者对话,感受网络权力,并探讨网络权力开放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渗透式的、对虚拟但却可感知世界的研究,参与者与政策制定者都丰富了自己的视野(Gergen,2000)。我们认为,创建实验性世界的可能性是巨大的。

定性方法和自我的重建

绝大多数的定性方法都包含许多个人主义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比如说,要把研究重点放在个人经验、感觉、身份、苦难或生活经历上,就要假设个人思想的

最初状态。要运用研究方法来说出“他人”之所想实际上是赞成自我/他人差异的形而上学。同样,赞成分层和独白的陈述形式也倾向于接受“知者”的概念。甚至对研究报告作者身份的认同都构成独立的、包含自我的个体世界。一般而言,定性方法维持着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上的个人主义态势。同时,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随着后现代、建构主义和对话式陈述的涌现,我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个人主义传统的局限性,包括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局限性。再者,就像许多定性领域的革新开始提出的那样,除此传统之外,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可以称之为“关系的”。当方法论对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对话和共建关系,研究者与其读者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以及任何可能延伸到社会的关系中意义上的讨论变得愈来愈敏感时,个人就不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了。我们非常有效地创建了关系过程的现实。

正是因为如此,在共建的叙述、多意见方法、参与性表演、相连和分散的陈述以及参与性的行动研究等的革新就远不只是延伸了方法论的领域。相反,在推翻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时,它们开始构建一种新的意识形式。这里我们指的不是个人思想,而是完整的连通性。对话的方法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格根(Gergen,即将出版)曾向一个八名妇女讨论小组提出更年期的话题,以反对妇女更年期的医学陈式,并开启意义建构的新空间。通过这样的对话,该小组对衰老过程有了新的、更积极的看法。关于同样的话题,哈格和她的学生(Harg,1987;Crawford,Kippax,Onyx,Gault & Benton,1992)也曾安排了这样的场景,让妇女相互分享情感经历。通过相互对话和解释,她们能够重构自己的过去,并对文化给女性的影响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这些例子中,对话被放在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在延伸之前提到的对关系研究时,我们可以看到利用研究来建立扩展原始场景的对话的潜力。研究的目标于是成为建立激励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可能会在不断扩大的网络中产生不断的变化。

在我们看来,这些工作还仅仅是建立新的研究方法论,以及最后自我关系重构的开始。这样的方法论更加适合于正在出现的概念,如公共记忆、分散认知和关系情感。那些说明个人思想形成的关系过程的概念更需要这样的方法。随着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发展,定性研究或许会在文化革新过程中扮演一个关键性角色。

结 论

在本书1994年的版本的引言中,邓津和林肯曾断言:“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混乱、不确定、多种意见文本、文化批评以及新的实验性作品将越来越普遍”(P.15)。他们同时指出:“定性研究领域是由一系列的压力、矛盾和犹豫所定义的”(P.15)。这种分析对他们的预言是一个很好的支持。随着各种批评和试验的出现,他们提出的压力、矛盾和犹豫都变成了现实,但在我们看来,它们很难说

是堕落的象征。相反,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我们不断超越着早已确立的各种领域,如剽窃、反省和创建等,从而体现了定性研究的生命力所在。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改造社会科学面貌的革新力量。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毁灭的冲动,发号施令的欲望和一致性/单一性的理想,我们就可预见定性研究的持续繁荣,充满偶然性和开拓性。特别是,如果我们能证实个人关系中心性的意义,并认识到在正在出现的技术领域中这些意义的实际表现,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参与到社会科学的重建,并改变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轨迹。

Anderson, E. (1978). *A place on the cor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erson, E. (1990). *Streetwise: Race, 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erson, E. (1999). *Code of the street*. New York: W. W. Norton.

Anderson, H. (1997). *Conversation, language, and possibilities: A postmodern approach to therap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Austin, D. (1996). Kaleidoscope: The same and different.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206-230).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Banister, E. M. (1999). Evolving reflexivity: Negotiating meaning of women's midlife experience. *Qualitative Inquiry*, 5, 3-23.

Becker, C., Chasin, L., Chasin, R., Herzig, M., & Roth, S. (1995). From stuck debate to new conversation on controversial issues: A report from the Public Conversations Project. *Journal of Feminist Family Therapy*, 7, 143-163.

Behar, R.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Behar, R., & Gordon, D. A. (Eds.). (1995). *Women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lenky, M. F., Clinchy, B. M., Goldberger, N. R., & Tarule, J. M. (1986). *Women's ways of kn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voice, and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s.

Blumenfeld-Jones, D. S. (1995). Dance as a mode of research representation. *Qualitative Inquiry*, 1, 391-401.

Bohan, J. (Ed.). (1992). *Seldom seen, rarely heard: Women's place in psychology*. Boulder, CO: Westview.

Bohan, J. (1993). Regarding gender: Essentialism, constructionism, and feminist psychology.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7, 5-21.

Braidotti, R. (1995).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rown, L. M., & Gilligan, C. (1992). *Meeting at the crossroads: Women's psychology and girl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net, J. (1986).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Carlson, M. (1996). *Performan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Case, S.-E. (1997). *The domain-matrix; Performing lesbian at the end of print cul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ase, S.-E., Brett, P., & Foster, S. L. (Eds.). (1995). *Cruising the performative: Interventions in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ethnicity,*

nationality, and sexual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eglowski, D. (in press). *Research as relationship*.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hasin, R., Herzig, M., Roth, S., Chasin, L., Becher, C., & Stains, R., Jr. (1996). From diatribe to dialogue on divisive public issues: Approaches drawn from family therapy. *Mediation Quarterly*, 13, 4.

Clark, C. D. (1996). Interviewing children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 show and tell. *Canadia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5, 74-78.

Clough, P. T. (1997). Autotelecommunication and autoethnography: A reading of Carolyn Ellis's *Final negotiation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8, 95-110.

Communication Studies 298. (1999). Shopping for family. *Qualitative Inquiry*, 5, 147-180.

Cooperrider, D. L. (1990). Positive image, positive action: The affirmative basis of organizing. In S. Srivastva & D. L. Cooperrider (Eds.), *Appreciative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The power of positive thought and action in organizatio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Cooperrider, D. L., & Dutton, J. E. (Eds.). (1999).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 of global change: No limits to cooper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awford, J., Kippax, S., Onyx, J., Gault, U., & Benton, P. (1992). *Emotion and gender: Constructing meaning from memory*. London: Sage.

Crawford, M., & Kimmel, E. (Eds.). (1999). Innovative methods in feminist psychology [Special issu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3(4).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1994). Introduction: Entering the fiel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17). Thousand Oaks, CA: Sage.

Diversi, M. (1998). Glimpses of street life: Representing lived experience through short stories. *Qualitative Inquiry*, 4, 131-147.

Donmoyer, R., & Yennie-Donmoyer, J. (1995). Data as drama: Reflections on the use of readers theater as a mode of qualitative data display. *Qualitative Inquiry*, 1, 402-428.

Ellis, C., & Bochner, A. P. (Eds.). (1996).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Ellis, C., Kiesinger, C. E., & Tillmann-Healy, L. (1997). Interactive interviewing: Talking about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R. Hertz (Ed.), *Reflexivity and voice* (pp. 119-149). Thousand Oaks, CA: Sage.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 Gordon, Ed.; L. Marshall, J. Mepham, & K. Soper,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Fox, K. V. (1996). Silent voices: A subversive reading of child sexual abuse.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330-356).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Franklin, M. B. (1997). Making sense: Interviewing and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In M. Gergen & S. N. Davis (Eds.), *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gender* (pp. 99-116). New York: Routledge.

Garratt, D., & Hodkinson, P. (1998). Can there be criteria for selecting research criteria? A hermeneutical analysis of an inescapable dilemma. *Qualitative Inquiry*, 4, 515-539.

Georgi, A. (1994).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Gergen, K. J. (1994). *Realities and relationships: Soundings in social constru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ergen, K. J. (1997). Who speaks and who responds in the human sciences?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0, 151-173.

Gergen, K. J. (1999).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Gergen, K. J. (2000). *The saturated self* (2nd

ed.). New York: Perseus.

Gergen, K. J., & Gergen, M. M. (1991). From theory to reflexivity in research practice. In F. Steier (Ed.), *Method and reflexivity: Knowing as systemic social construction* (pp. 76-95). London: Sage.

Gargen, M. M. (1992). Life stories: Pieces of a dream. In G. Rosenwald & R. Ochberg (Eds.), *Storied lives* (pp. 127-14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Gergen, M. M. (in press). *Impious improvisations: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in psychology.* Thousand Oaks, CA: Sage.

Gergen, M. M., Chrisler, J. C., & LoCicero, A. (1999). Innovative methods: Resources for research, teaching and publishing.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3(4).

Hammond, S. A. (1996). *The thin book of appreciative inquiry.* Plano, TX: CSS.

Hammond, S. A., & Royal, C. (Eds.). (1998). *Lessons from the field: Applying appreciative inquiry.* Plano, TX: Practical Press.

Haraway, D. J. (1988).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 575-599.

Harding, S.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 (1991).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ug, F., et al. (1987). *Female sexualization: A collective work of memory* (E. Carter, Trans.). New York: Verso.

Hermans, H. J. M., & Kempen, H. J. G. (1993). *The dialogical self: Meaning as movemen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ertz, R. (Ed.). (1997). *Reflexivity and vo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oks, b. (1990).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Jacobs, M.-E., Munor, P., & Adams, N. (1995). Palimpseest: (Re) reading women's lives. *Qualitative Inquiry*, 1, 327-345.

Jipson, J., & Paley, N. (Eds.). (in press). *Daredevil research.* New York: Peter Lang.

Jones, S. G. (Ed.). (1998). *Cybersociety 2.0.* Thousand Oaks, CA: Sage.

Jones, S. H. (1998). Kaleidoscope notes: Writing women's music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Qualitative Inquiry*, 4, 148-177.

Jones, S. H. (1999). Torch. *Qualitative Inquiry*, 5, 235-250.

Katz, A. M., & Shotter, J. (1996). Hearing the patient's "voice": Toward a social poetics in diagnostic interview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3, 919-931.

Kiesinger, C. E. (1998). From interview to story: Writing Abbie's life. *Qualitative Inquiry*, 4, 71-95.

Komesaroff, P., Rothfield, P., & Daly, J. (1997). *Reinterpreting menopause: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issues.* New York: Roufledge.

Landrine, H. (Ed.). (1995). *Bringing cultural diversity to feminist psycholog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Lather, P. (1991). *Getting smart: Feminist research and pedagogy with/in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Lather, P. (1993). Fertile obsession: Validity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673-693.

Lather, P., & Smithies, C. (1997). *Troubling the angels: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Boulder, CO: Westview.

Lincoln, Y. S. (1995). Emerging criteria for quality in 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ive inquiry. *Qualitative Inquiry*, 1, 275-289.

Lincoln, Y. S. (1998). From understanding to action: New imperatives, new criteria, new methods for interpretive researchers.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Education*, 26, 12-29.

Lincoln, Y. S., & Denzin, N. K. (1994). The fifth moment.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75-586). Thousand Oaks, CA: Sage.

Lykes, M. B. (1996). Meaning making in a context of genocide and silencing. In M. B. Lykes, A. Banuazizi, R. Liem, & M. Morris (Eds.), *Myths about the powerless: Contesting social inequalities* (pp. 159-178).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Marcus, G. E. (1998).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A new research imaginary for anthropology ' s changing professional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kham, A. (1998). *Life online: Researching real experience in virtual spa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McTaggart, R. (Ed.). (1997a).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ntexts and consequenc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McTaggart, R. (1997b). Reading the collection. In R. McTaggart (Ed.),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ntexts and consequences* (pp. 1-24).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Mienczakowski, J. (1996). An ethnographic 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ensual theater.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244-266).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Miller, J. B., & Stiver, I. P. (1997). *The healing connection: How women form relationships in therapy and in life.* Boston: Beacon.

Morawski, J. G. (1994). *Practicing feminisms, reconstructing psychology: Notes on a liminal scien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orris, R. C. (1995). All made up: Performance theory and the new anthropology of sex and gender.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567-592.

Mouffe, C. (1993). Liberal socialism and pluralism: Which citizenship? In J. Squires (Ed.), *Principled positions: Postmodernism and the rediscovery of valu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oustakas, C. (1994). *Pbenomenological researcb metb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enley, C., & Ross, A. (1985). Interview with Trinh T. Minh-ha. *Camera Obscura*, 13-14, 87-103.

Porter, D. (Ed.). (1997). *Internet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Reason, P. (1994). Three approaches to participative inqui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324-339). Thousand Oaks, CA: Sage.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bbens, J., & Edwards, R. (Eds.). (1998). *Feminist dilemma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ublic knowledge and private liv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chardson, L.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L. (1998). Meta-jeopardy. *Qualitative Inquiry*, 4, 464-468.

Rinehart, R. (1998). Fictional methods in ethnography: Believability, specks of glass, and Chekhov. *Qualitative Inquiry*, 4, 200-224.

Rochlin, G. I. (1997). *Trapped in the Net: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computer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nai, C. R. (1998). Sketching with Derrida: An ethnography of a researcher/erotic dancer. Qualitative Inquiry, 4, 405-420.

Ronai, C. R. (1999). The next night *sou rature*: Wrestling with Derrida ' s mimesis. *Qualitative Inquiry*, 5, 114-129.

Russell, G. M., & Bohan, J. S. (1999). Hearing voices: The use of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3 (4).

Said, E. W. (1978). *Orientalism.* NewYork: Pantheon.

Sarbin, T. (Ed.). (1986).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buman conduct.* New York: Praeger.

Smith, L. T. (in press). *De-colonizing methodology: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London: Zed.

Smith, P. (1999). Food truck ' s party hat. *Qualitative Inquiry*, 5, 244-262.

Smyth, A. (1991). The floozie in the jacuzzi: The problematics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for an Irish woman. *Feminist Studies*, 17, 7-28.

Strauss, A. L.,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Strauss, A. L., & Corbin, J. (1994).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n overview.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273-285). Thousand Oaks, CA: Sage.

Tierney, W. G., & Lincoln, Y. S. (Eds.). (1997).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ravisano, R. V. (1998). On becoming Italian American: An autobiography of an ethnic identity. *Qualitative Inquiry*, 4, 540-563.

Turkle, S.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Van Maanen, J. (Ed.). (1995). *Representation in etbnography.* Thousand Oaks, CA: Sage.

Visweswaran, K. (1994).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第七阶段 41

THE SEVENTH MOMENT: OUT OF THE PAST

⊙伊冯娜·S·林肯　诺曼·K·邓津

我们曾在本书第一版的结语中提到过，“书写”在目前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大量的作品充斥着对过去的误读和对未来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这里，我们将再次描绘定性研究的美好前景，对这种美好前景的设想建立在我们对“第七阶段”的一些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将对该阶段进行界定并对其核心特征进行一番描述。另需说明的是，本书对这“第七阶段”富有前瞻性的归纳都建立在我们当前所做的阅读的基础之上①。

我们的讨论共分四个主题。首先，如同我们曾反复观察到的那样，定性研究的历史由一个个断裂的片断组成，它的发展并非是以明显的渐进的方式由一个阶段推进到下一个阶段。这种断裂呈现出循环性与阶段性，所以现阶段时髦的理论也许会继续流行，但也有可能正好相反。比如就拿当前的后现代主义来说，它反抗现代性，但总有一天也会出现一个与之相反的“阶段”，该阶段肯定鲍斯(Boas)、米德(Mead)、本尼迪克特(Benedict)、斯特劳斯(Strauss)、贝克尔(Becker)、戈夫曼(Goffman)和芝加哥学派等，并且会认为我们当前的这一阶段充满了混乱与缺陷而令人难以接受。

其次，我们的一些假设建立在定性研究内部所具有的张力之上，定性研究本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中包含着一个捉摸不定的内核。我们看起来越来越远离宏大叙事以及那种单一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典范。那个捉摸不定的内核涉及定性研究的人文主义职责，即用性别的、历史的和互动的行动者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这一职责使得定性研究倾向于自由与激进的政治理念。行为主义、女性主义、分析批判主义、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同性恋、种族主义等方面的研究者都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认为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必须着眼于那些一直为这一社会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所压迫的那些个人和群体，关注他们的需要、梦想和诉求。

这一职责规定了定性研究的一个永久但又不断变动的核心。这个核心使新

---

① 传统时期(1900—1950)、现代主义时期(1950—1970)、类型模糊时期(1970—1986)、再现危机时期(1986—1990)、后现代或实验主义时期(1990—1995)、后实验研究时期(1995—2000)、未来(2000—)。

的受压制的声音得以成为讲述的对象。比如,女性主义和批判种族主义都曾清晰地指出了它们各自与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批判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些表述重新定义了先前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也包括经验主义、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第三,我们希望将"表演"引入定性调查之中,越来越多的作者将其文本"表演"出来。在民族志领域,表演总是价值涉入的(Conquergood,1985,p.2)。这种表演要求观众将其理解加入表演中从而创造出新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表演者和观众都成了评价者。如果文化就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表演,那么表演者表现出来的行动范围、意义甚至含混和矛盾都使文化被批判地、鲜活地显现出来(Conquergood,1985)。这些表演文本是定性研究最终的研究界限之一。这就是特纳(Victor Turner)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1986,p.25),一种虽有点陈旧但又极富新意的研究途径,这将永久改变"定性研究"的方法论,与此同时它将有别于"定性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其他阶段及其内容,并赋予"定性研究"以新的意义。

第四,就未来而言,"第七阶段"关注价值涉入的谈话和神圣的原文的发展。"第七阶段"要求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起成为批判性对话的场所,在此场所中讨论民主、种族、性、阶层、国家、自由等。

如上这四个主题仅仅是我们预测中的"第七阶段"在未来的大致轮廓。我们试图制订出一个方案来联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对未来的设想当中,我们将讨论的话题组合在以下几个主题(或问题)里面:文本与诉求、基于经验主义的表演性文本、回归到权力行为的叙述、文本的反思性与脆弱性、调查研究作为价值涉入行为以及批判的道德意识。如上这些都是第六、七阶段的显著特征。

对当前的判断

考察我们对这一复杂领域的定义,略微改换一下对这种定义的说法即是:定性研究是一个各学科间的、跨学科的以及有时候是反学科的领域。它横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定性研究可以同时涉及很多事物,具有广泛的示范性。它的实践者注重多元方法的研究价值。他们采用自然主义观点并且对人类经验进行解释性理解。同时,这一领域具有内在的政治化倾向。

定性研究同时具有两方面的张力。一方面它具有宽泛、解释性、后实验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敏锐的批判力等特征;另一方面,它更为狭义地定义了人类经验中的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概念。

在第七阶段,所有这些张力将继续在如下六个基本的主题当中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地体现出来。

第一个主题涉及基础主义的崩溃。当前这一阶段的部分特征就是对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的不断批判。这种批判伴随着正在进行的自我批判

与自我评价两个方面。这方面的每一点成果都力图找寻自身在当前阶段中的位置,争论着它们与后实证主义以及反基础主义之间的关系。

对此,史密斯和迪默提醒我们,"经验主义的消隐"创造了人类叙述的新空间以及对人类各种形式的知识的新的判断标准。正如史密斯和迪默所指明的,相对主义并不关乎典范的选择;它关乎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关乎日常生活,关乎不得不找到一种帮助我们判断的新的理性,因为基础主义的标准不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

第二和第三个主题是我们所谓的话语危机与合法化危机。这两个危机分别针对的是他者和文本中他者的表达以及在文本中我们所争取的权力。虽然这些危机已持续二十年了,但对此的批评只是到最近才全面展开。第四,在性、种族、阶层和第三世界等不同方面一直存在各种不和谐音。

第五,纵观其整个历史,定性研究往往依据变化了的科学、道德和宗教的叙事而被重新定义。维迪奈和莱曼在他们的殖民地人类学研究中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与宗教只在意识形态层面是分离的,但在实践中,宗教与科学不断地发生着相互作用。两系统之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模糊。批评家越来越多地将科学置于一个神秘的分析性框架之内(Rosaldo,1989,p. 219),尽管旁人想象其为一种严肃的认识论(Bateson,1979)。另一些批评家逐渐使科学远离其经验主义基础,而更靠近一个批判性的解释框架,这一框架强调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Clough,1992,pp. 136-137;1998)。第六,试图从现象中抽象出概念来的调查研究作为一种价值行为使我们回归到关于伦理和真理的对话。

总而言之,这六个主题及其策略当中存在的张力将有助于继续界定21世纪开始十年定性研究的核心与边缘。我们从当前存在的情况开始来展开我们的讨论。

应对当前

我们需要继续确定如下几个方面:

- 定性研究者并不是一个外在于和高于文本的客观的、权威的和政治上中立的观察者。
- 定性研究者无法摆脱开特定历史文化情境的限制,在这一点上定性研究者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Bruner,1993,p. 1)。
- 意义可以被认为是"根本上歧义的,常常是开放的,并且每一个筹划都包含着权力"(Bruner,1993,p. 1)。
- 定性的调查可恰当地被理解为是一种公民性的、共享的、协作的方式。它将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结合进一个涉及价值的正在进行中的对话当中。

纠正错误和回顾过去

"第七阶段"从三方面来阐述如上所提的内容。首先,继续增强其批判性;其

次,试图纠正某些错误。定性研究与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倾向于从一种理论范式过渡到另一种理论范式,从批判种族理论到同性恋理论,从语言学到后结构主义,从后现代到后人文主义等。在这种变动中存在一种倾向,即排斥宏大的理论视角;同时存在一种真正的需要,即布鲁纳(Bruner,1993)所主张的,要回归到"以往文本的原初状态"(p.24)。我们需要这种回归有两个理由:首先,我们需要重新研习这些文本并考察对它们的批判标准在今天是否依然有效。第二,我们需要学习这些传统作品中最好的部分,并理解在这种"以往"的视角下面,作者是如何实际地完成其作品的。

必须提醒的是,对那些早期阶段作品的回顾是在不同抽象层面上进行操作的。虽然殖民主义、实证主义的民族志也许已经过时,但其中一些观察、访谈、个案研究和文本分析的基本策略和技巧仍旧构成着第六、第七阶段研究的基础。与此相类似的,虽然扎根理论的方法有其缺陷,但从对世界的观察与相互作用中构建理论的一般方法是不会变的。

第三,正如我们在这本书的第一版中所主张的,现在正是时候继续推进这种被称作定性研究的多学科融合的计划。太多批评只会窒息这一计划,而且这种过多的批评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后结构主义无止境的自我注释能产生无数的文本,但缺少实际的人类经验作支撑,所以这些都是无意义的。后结构主义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批判也可得出相似的结论。没有"对话"出现,这些叙述对想要了解世界的人们没有多少帮助。

基本的主题很简单:怎么才能最好地描述和阐释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的经验?话语危机与合法化问题就是基于这一点产生的。

话语危机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在话语危机下面我们试图找寻一些问题的答案。谁是"他者"?我们能否准确地表达"他者"的经验?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该如何创造一种社会科学来把握"他者"?对这些问题的简短回答则是,我们已经在不断推进各种大范围的研究并将"他者"纳入其中。对有些学者来说,这意味着调查研究方面的合作及其成果的相互分享(参看本书第3章、第9章、第22章、第23章、第38章、第39章)。这些研究工作涉及许多制度设置,包括医疗、教育、合作和社会福利等制度安排。

因为针对的是"他者",所以需要一种呈现式的调查方式。在其中,"他者"受训练致力于他们自己社会和历史问题的解决,然后帮助他们应对传统的和当代的压迫,这些压迫根植于体现他们社会特征的文化与各种器物之中。在本书中,凯米斯和麦克塔格特(第22章)以及格林尼(第38章)讨论了进行这种调查的各种方法,包括在调查研究中进行合作与评价的一些主要形式。

因为在被研究对象——"他者"中同样存在着社会科学家,所以可以通过合著的方式来研究问题。并且仍然因为研究的是与我们相异的群体——"他者",所以那些由不同的声音所构成的文本(参看本书第28章、第36章)内部常存在

矛盾,读者常常需要依据其个人经验来仔细挑选相关的内容。还是因为调查的对象是"他者",所以在调查中需要包含一系列亲身经历、个体叙述、生活体验、诗化表达以及有时候略显虚构的文本(参见本书第20章、第21章、第36章),这些文本使得"他者"能够诉说他们自己的生活。调查者的角色仅仅是将田野文本、研究文本以及被调查群体整合起来,以确保他者的声音能被听到。有的时候,"他者(对象)"是受过训练的,特别是当他们具备知识生产的能力并进入一些特定的精英团体比如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的院系等。本书的第9章详尽地分析了这一主题。

问题的关键是,"他者"本身和更多的主流社会科学家都认识到并不存在所谓没有杂质的纯粹的事实。来自大学院系或者更高等学术机构的话语因其优势的地位而具有非同一般的权威性。

奥利森(第8章)论述了在表述"他者"的经验时存在的一个困难,即最后形诸文字的到底是谁的文本。在一篇以批判女性主义为视角的文章中,作者也坚持认为不论定性研究者自身如何想要一视同仁地看待一切,也无法解决如上这一个主要的矛盾。在研究者的研究过程中存在着权力、知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研究对象常常有被那些民族志学者操纵与歪曲的危险。另外,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研究的最终结果太多地为研究者所控制。因此,甚至是以研究对象本身的视角来写的文本——比如,女性写关于女性的文本——其文本巩固的恰恰是她们最反对的那种权力关系。要解决此类问题就需要学术成果能够被以制度化的与相互协作的方式共享。

文本中作者的定位

如上对女性主义表述困境的解决方式提出了一个作者在文本中的定位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们应如何"书写"的问题直接相关,按照一种虚假的二分法来讲就是作者本人应该在科学的专业的文本中占据多大范围的空间(Bruner,1993,p.2)。错误地将作者自我与文本自我进行分割是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的,即文本不涉入主观因素是可能的。当然,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正如格尔兹(Geertz,1988)曾强调的,所有文本都是一种个人陈述。

这种对该问题的正确分析展示出了文本的私人性、主观性和诗性。如埃利斯和博克纳(第28章)、里查德森(第36章)所观察到的,存在很多途径使作者回到定性研究文本之中。可以记录下自身虚构的叙述,可以创作表演性文本,田野访谈可以转换成诗歌文本,简短的故事和戏剧同样也可以完成这种转换(第15章)。作者可以进入到研究过程的对话之中,也可以用叙述者的方式来写作,"直接地作为一个角色或通过多个角色,或一个角色可以表达不同的声音,或作者可以先进入文本然后再脱身出来"(Bruner,1993,p.6)。

合法化危机

很明显,批判种族主义理论、同性恋理论和女性主义越来越远离后实证主义

的模型。本质主义认识论的瓦解导致了这种合法化危机。当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想要赋予文本以权威的时候,这种危机就产生了。文本的权威是指声称任何文本是准确的、真实的和完美的——是"上帝的观点"。文本是否忠实于它所要表达的那个个体?文本有无权力断言它是对世界的更为全面的真实记录,并以此维护研究和研究者的利益?

这并非是一些不合逻辑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我们自身及我们的工作。虽然社会科学家也许会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但我们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面对着这两个危机。

通往未来之桥:朝向神圣的对话

我们设想21世纪定性研究的调查模式应同时是小规模的、经验主义的、自我民族志的、敏锐的、表演性的和批判性的。这是一种消除了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中的传统特征的调查形式。没有什么是价值中立的。它力求将自身根植于某种神圣性并与大自然以及外面的整个世界相联系(Christians,1995,p. 129)。它力求将自身深深嵌入神圣的和地方性的历史叙事当中,并力图阐明它与重构了的、道德的和神秘的自然世界的某种关联(参看:Abram,1996,p. 269;Christians,1998,p. 3;Kittredge,1996,p. 4;Macnaghten 和 Urry,1998,p. 7)。这种调查模型寻求一种神圣(sacred)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能确认思维与自然界之间基本的伦理的统一(Bateson,1972,pp. 336-337;Bateson,1979,p. 213;Bateson & Bateson,1987,pp. 8-9,11;Christians,1998,p. 3)。这种神圣的、经验的认识论使我们与地球、自然以及更为广泛的世界之间形成一种非竞争性的、没有等级差别的关系(Bateson,1972,p. 335;Reason,1993)。这种神圣的认识论是政治性的,涉及统治、整合、情感、社区、契约、价值涉入的观察者等方面。

这种认识论恢复了曾为启蒙主义所排斥的价值观(Christians,1997,p. 6)。正如我们曾在第一部分的介绍中所提到的,这种神圣认识论建立在哲学人类学基础之上,"不论阶级与种族,所有的人都值得尊敬并具有庄严的地位"(Christians,1995,p. 129;参看:Christians,1997,p. 13;1998,p. 6)。正是基于此,人类伦理才得以重视生命的神圣和人格的尊严,强调尊重事实以及崇尚和平(Christians,1997,pp. 12-15)。这种神圣认识论质问存在于当今世界的种族、阶级、性别的压迫(Collins,1990,p. 227;West,1989)。

自贝哈(Behar,1996)和约翰逊(Jackson,1998)之后,这一研究取向在文化中出现经验主义危机时就显现出来,在确认某一事实时亦显现出来,这种事实就是认为人必须"对被抛入的这个世界有所判断,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必须选择自己的生活并且感到他们有权力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有权力自由处事"(Jackson,1998,p. 208)。这种民族志审视并努力阐明人与人之间的爱、失落、痛苦、快乐、羞耻、暴力、背叛和尊严等。这些研究着重自我与他人相互依存并彼此接受远甚

于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和敌视(Jackson,1998,p.208)。

这种叙述原则拒绝退回到那种过于抽象的宏大叙事当中。这是一种方法,可以避免生僻的术语和难懂的表述。这种原则提倡地方性,关注行为如何构造意义。这种原则将文化看作是由即兴的表演所构成的一个复杂过程,它试图理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建构。它提倡自我民族志,关注个人的理性计算、神话和民间传说。

将言说还原成一种权力运作(Jackson,1998,p.35)——最简单的民族志装着权力的利齿。它考察人们的交往中权力的实际运作方式,这种权力意味着授权,涉及稀缺资源的分配。日常生活的权力运作展现于人们的行为文本与叙述内容之中,这些言行显示了人们的各种体验。

在杰克逊(Jackson,1998)最近出版的书中有一个故事——"一个河中小岛"可作例子。那是一个名叫戴斯蒙德(Desmond)的男子,居住在一条河流中的小岛上,他饱经风霜、赤着双足、瘦长而又结实,是一个半土著居民。一个星期天,杰克逊和他妻子(弗兰希恩)以及两个小孩(海迪和尤舒亚)去拜访戴斯蒙德。杰克逊描述到,他们坐在离戴斯蒙德的小屋不远的一块草地中央。戴斯蒙德正在卷着一支土制纸烟。海迪问他想不想尝试正宗的香烟,她将一包温菲尔德牌香烟和一个打火机丢了过去。戴斯蒙德不得不俯身向前去捡烟和打火机,他突然说:"不要将东西丢给我!不要把我当狗一样对待!不要让我去捡它们,如果你想给我的话就应该走过来放到我手里。这样的话,我会愉快地接受的。你知道我在救济处是怎么对人们说的?我对他们说,请举出一个曾为你做过任何一件事的白人。"杰克逊回答说:"我们是白人。"戴斯蒙德反驳道:"对,你们也许是好人。但我不知道你们到这里来是否别有用心。"

可以看出,戴斯蒙德认为杰克逊和海迪侵入了他的生活并冒犯了他的尊严。而且很明显,他倾向于认为白人总是这样对待土著居民。

在杰克逊(Jackson,1998,p.204)、韦斯特(West,1989,p.233)、科林斯(Collins,1990,pp.226-227)和杜博依斯(DuBois,1903/1989,p.9)的基础上,我们寻求一种能起到弥补作用的、面向实际的并且具有前瞻性的民族志,它将告诉我们如何关心和尊重他人,如何通过互补的而非破坏的方式将这个世界协调起来。这种民族志将研究者的叙述转变为被研究者的述说,转向与我们的生活相连的那些重要片断——杰克逊的女儿将香烟丢给戴斯蒙德的那个场景。

这种取向要求我们将自己显现在文本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遍性与独特性的结合,我们这一历史时期存在的危机与经验的普遍性通过我们的独特性体现出来。社会科学通过这种方法来描绘和表述某一特定文化的危机。它努力将这些危机与公众、媒介和各文化机构联系起来,将个体转变为政治的公开的场景:本周的电影是关于这个或那个私人问题的。

在这过程中,这种民族志试图更充分地理解特定文化内部各种相互作用的和相反的情况,并且使各种关系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民族志学者研究人们抵抗那些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过程中试图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叙事的那些重

要时刻。我们来看埃利森(Ellison, 1964, pp. 307-308)关于帕克(Park, 1918, 1950)作品中美国黑人形象的评论:黑人更倾向于言谈而非行动,倾向于安于现状而非变革。黑人天生的性情不似犹太人那样充满理想主义,也不似印度人那样善于反省,也不似盎格鲁萨克逊人那样自视优越。他主要是一名以自己的名义热爱生活的"艺术家"。他的职业是表演而非行动。可以说在种族中他是一名女士。

埃利森(Ellison, 1964)回应道:帕克的比喻充满了复杂的动机,可以产生无数的折衷与妥协,甚至让人无所适从。想像一下单是这种教学对黑人学生会产生什么效果!因此那些最初作为民主姿态的一部分而开始的东西,最终却以种种不愉快而告终。

定性调查研究通过经验主义的、解释性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文化批评的蓝图。这种批评根植于由民族志所凸显出来的特定世界。它认为所有的民族志都是内含价值判断的理论。考察一种文化及其表述方式,发现并不存在价值中立的民族志,不存在纯粹的客观(Smith & Deemer, 第 34 章)。民族志、美学和政治学不可能完整地被区分开来。民族志与艺术类似,总是政治性的。它如同政治行为一样反映着特定的历史时刻。

相应地,自弗德(Ford, 1950/1998)之后,一种批判性的和文学性的民族志必须达到四个标准。第一,其作品必须能熟练运用各种文学表现手法——一种写作艺术。它的叙述应当既引人入胜又能涉及最具体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源于真实自然的交谈,并且从中能够揭示出一些令人难忘而又普遍公认的特征。这些特征应在一些经细致描绘而"令人无法忘记的场景"中被体现出来(Ford, 1950/1998, p. 1112)。第二,其作品应能清晰阐述各种文化的、政治的问题,包括社会结构中的不公正,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内容。第三,其作品应能清晰地表述政治方面的期望,能够说明事情是怎样的并能设想事物如何才能得以改善。最后,它应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符号的与修辞的方法来达到如上的要求。作者们完全为他们的时代的强制性与不公正所包围,他们将其民族志旨趣直接指向更高的、理想化的目标。

这样的作品因其公开的价值判断和批评意见,以及因其政治的和道德的取向而显得偏执一端,往往容易受到攻击。这种政治性的脆弱超越了贝哈(Behar, 1996, p. 177)所提倡的人类学。将个体带入人类学并非仅仅是一个如何书写的问题;令人感动流泪的也并非仅仅是因为故事,并非仅仅是因为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将个体及其体验表达出来(Behar, 1996, pp. 19, 167)。

这样的作品会激怒读者或让其失望,激发读者在现实生活中采取行动,使他们重新反省构建自身及其社区的那些道德术语。这种方法敢于通过特殊的、个体的手段来批评现状。因此,埃利森用自己的经验去评论帕克的关于美国种族关系的理论。同样道理,杰克逊以戴斯蒙德拒绝海迪的香烟作为例证来说明对土著居民明显的文化偏见。

从另一方面来讲,贝哈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是一种现代主义者的情绪,是这

一时代保持对个人问题与公共话题间的割裂的产物。在其私人体验、恐惧和困惑被公开以后，贝哈的“自我”变得脆弱。他的脆弱假定了一个多元的自我隐藏于很多面具之后。但是很难说清贝哈的“脆弱”的确切含义，它是否意味着如同处于后现代那样，在一个时代中没有什么可以隐藏或不被看见。正如克里斯(Kris)在他著名的歌曲《我和博比麦吉》中所说的，如果自由仅仅意味着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话，那么“脆弱”意味着什么？经验主义的研究者不再有地方可供隐藏。个体化叙述涉入民族志文本成为一个可供讨论的问题。现在，书写本身被用来为达到更高的目标服务——经验性地进行社会批评和想像新的自我构建。

一种脆弱的、表演性的民族志同时具有三个特征。一方面，它提倡行动的、价值涉入的社会批评；第二，在此过程中，它要求人类学家时常要将好的或坏的故事与大众传播、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等背景相联系。这种结构性转换将另一层面的东西引入了研究视野。通过把个体与历史、政治等相联系的方法，作者将故事置于时代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它指明了不断变化的具体的地方性状况，因此为从特殊到普遍的推理提供了一个基础。

在此过程中，作者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故事”——一个与学术研究、科学、媒介以及大众文化相关联的多元、个性化文本(Denzin, p. 116; Ulmer, 1989; White, Mogilka, &Slack, 1998)。这些“自己的故事”的文本在效用上与那些个人神话集、即兴的公开表演的故事差不多。这些叙述首先是那些个人记忆中的伤痛、某种顿悟以及成长中经历的一些危机。作者把这些记忆中的特殊时刻转变成能将此种经验表述出来的那些个体的、群体的、流行的或是专业性的评论性读物。通过阅读这些评论性作品，作者形成了“自己的故事”。通过这些表述，作者就对先前曾用别的方式进行叙述的故事享有了所有权。相应地，原先的表述也被更适合表达个人的、政治的和群体的目标的叙述所代替。

这些新文本的实际效果，那些价值涉入的评论性的叙事、移情及其所达到的经验的转换，都决定着这些文本的真实性(Jackson, 1998, p. 180)。这些文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是否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了“真实”的世界(Jackson, 1998, p. 180)。这世界常常而且早就为文本所建构。Rorty(1979)也坚持这种观点：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面镜子。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是由文本构造出来的。

第三，这种表演性的人类学寻找一种将处于本民族特有关系中的独特个体进行定位与描述的新方法。它寻求作品创作形式的突破，包括个人的日记、接近自然的作品和表演性文本(Berry, 1981; Hasselstrom, Collier & Curtis, 1997, p. xv; Rawlins, 1994; Stegner, 1980; Turner, 1986)。用人类学家的观点来看，这些用第一人称书写的文本关注作为意义点的行为与体验(由于重视行为所暗示出来的内容，所以它并不企图去干涉他人的思想，不想去争论一个具体的行为在他人那里具有什么意义)。

一种神圣的人类学倡导那些细小的表演仪式，它们能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整合起来，因为在那些时刻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日常生活表象背后的东西。因此

这种属于下个世纪的解释人类学将倡导这一全人类的计划,致力于文化融合的事业。这些场景展示了自然和文化社会中组织的神圣性(Bateson & Bateson, 1987, p. 9)。这些都告诉我们如何践行如上所谈到的神圣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

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更具解释功能的民族志,并以此来达到更高更神圣的目标。我们似乎别无它途。我们正处在这门学科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十字路口(Lincoln, 1998)。韦斯特(West, 1994)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墨守成规毫无希望地进入21世纪"。但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有足够的智力、幽默、想像、勇气、耐心、热情、虔诚和意志去迎接这个挑战吗?"(p. 159)

话语危机:新旧两种声音在当前的冲突

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等各种新的或旧的理论流派都针对当前的情况提出了解决我们上面所提危机的方法。这股潮流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很多社会科学家现在认识到,迄今为止没有一种理论是完整的,在我们达到对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之前,在我们能够确信一种较为完整的理论之前,我们需要采用多种视角听取多种声音。

现在看来,现代主义者梦想一种科学而又完美的叙事已不再可能。在后现代语境中,上述梦想实属无益。后现代主义者挑战现代主义者的信念,即挑战企图将世界上所有文化全部有机地整合到一起的那种信念。藉此我们可以部分地定义后现代主义,它们具有这样的信念: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一种单一的理论能够很好地整合并充分表达所有民族的梦想、激情和体验。

批判主义理论家

正如金彻勒和麦克拉伦在本书第10章所提到的,批判主义理论,从法兰克福到年鉴学派、世界体系学派、参与行动研究学派一直是定性研究领域的主要流派。批判主义者的旨趣在于建立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力求坚持某种不同的视角。这种方法主张要有自己的观点而非被动地采用即便是大多数人的观点,这在保罗弗赖尔(Paolo Freire)的一本描写巴西人的书中清晰地得到了展现。他的作品得到了一批想要探索一种"解放的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的激进牧师和学者们的热烈回应。这种"解放的神学"提倡平等主义,目的在于推翻各种专制压迫,通过赋予边缘群体、穷人、默默无闻的人和申诉无门的人以权力来实现社会正义。这种理想并不亚于那些激进的社会革命,那些革命要求重新审视历史文化遗产,要求社会正义、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及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建立。

女性主义研究者

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科学、宗教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中缺少一种声音、一种形

象。三个不同群体——女性主义哲学家、科学家和神学家——都参与到这个话题中。每个群体都对解决"如何进行定性研究"这一问题发挥了不同作用。

前面两个群体——哲学家和科学家——表明了两种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认为传统科学一直维持着一种启蒙主义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的前提就是认为有一个散乱而独特的"社会事实"存在于某个地方并与我们所经验的事物相异,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去发现这些散乱的事实并把它们揭示出来,因为这些都是"真理"的基础。

后结构女性主义强烈要求取消经验科学与社会批判之间的差别。他们寻找与传统经验科学的旨趣和标准无关的一种价值涉入的社会批判。他们认为传统科学运用其权威将原先一些广为人知的东西隐藏起来(Clough,1992,p. 137)。女性主义者对这一切都进行质疑。他们认为社会批判应从传统科学那里取回权威并在一种客观社会科学的界限与框架内创造出新的研究主题。这种社会科学"放弃对数据的单纯收集而代之于对信息处理、经验科学、文学、电影、电视以及网络等各种表达形式地重新审读"(Clough,1992,p. 137)。

第二个关注点就是女性主义哲学家注意到了一些独特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科学方法的几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各种研究主题都应符合客观性要求,科学方面的客观性是可能的,所以构建一种没有偏见的科学是可能的。奥利森在本书第 8 章回顾了这个话题,详尽说明了将研究中的目标、主题以及参与者客观化之后的消极后果。

解放神学与女性主义神学处于这些问题的中心。他们提出了一些难题:在教堂、科学、艺术以及文学当中女性、有色人种、穷人、无家可归者和饥饿的人,他们的地位究竟在哪里?

边缘群体和同性恋理论的学者

另一群相关的学者对定性研究也起到很大的影响。边缘群体和同性恋方面的学者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即历史是否有意忽视或误读了他们的声音和文化。这些学者当中新一代的成员大多是有色人种,他们质疑历史上和当代的社会科学家们的作品的真实性与精确性,认为当很多视角和表述被忽视或歪曲以服务于占支配地位的主流的利益时,就不可能获得一幅最终完整的理论图景。这种质疑的后果有两个:一方面是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反思,另一方面是那些被长久忽视了的理论视角重新得到关注,这一方面历史的和科学的作品数量正在不断地增加。拉德森-比林斯在本书第 9 章中概述了这方面的文献以及其中主要的思潮、轮廓和争论。她批评了传统科学在解答这些问题时的无所作为。

因而,我们描绘了当前的思潮——第六个阶段。这是一股混乱的思潮,充满了多元的声音、实证的文本、断裂、矛盾、话语危机、自我评论、新伦理以及工业技术等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正朝向未来迈进,尝试地去描述第七阶段的思潮。几个较为持久的主题已然出现:他者的声音及在场;社会文本;独特性、人文主义和技术。

展望未来

我们不可能预言未来,但我们可以展望未来,因为所有的未来都不可能与过去截然分开。的确,很多思潮都是交迭行进的。一切皆取决于读者在思潮中所选取的内容,实际上是读者选择了未来。

他者的声音

纵观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定性研究仍然相当重视研究者的"到土著中去"。但是今天谁还用这个词汇呢?一些北美的中产阶级民族志学者对他们那些仍在这样做的同行表示不屑。现在没有一个人会严肃地谈到"到土著中去"。事实上,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不再提及它,但犹如恋人间的沉默那样,话语的缺席有时却可以包含更为丰富的内容。在这里,现在的研究者都竭力去倾听隐然出现的"他者"的声音。

"土著"这一词汇的消失意义重大。它的"沉默"具有震撼性。在后现代社会,我们继承着我们自己留给自己的以及留给追随我们的学生的那些遗产。"到土著中去"作为一个范畴充分表明了我们对科学客观性的错误认识以及由过去殖民时代所造成的意识上的扭曲。我们尽力找寻摆脱传统客观性的人为架构从而能使我们的文本更具意义的那种方法。我们尽力提出我们自己的术语——"批判的主观性"。我们一直承认我们作品当中存在着一些因殖民主义所导致的缺陷,"土著"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这点,所以使用这个词本身就是不恰当的。

但是,我们作为田野工作者的自负是远比政治上的错误更糟糕的事。我们怎么能认为我们自己是文明的、客观的,而我们之外的另一个群体却是不文明的,或者他们在一个被假定的文明进程中远远地落后于我们呢?在本书的第 2 章,维迪奈和莱曼考察了这些观念的发展史,这些观念加强并支持了"到土著中去",导致了这一专业性的错误。问题的关键是启蒙主义遗产让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撰写出关于他者的完整、真实、客观的文本。

因此,我们不喜欢再过多地听到有关"到土著中去"。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很少哀悼它的逝去。相反,我们今天更加努力去接近我们所要描述的那些生活。在本章及以后的章节中有很多的例子讨论这些。现在我们要展现的不是我们能够过那样的生活,而是我们十分接近那样的生活并可以开始了解人们是如何构建他们的世界的。

社会文本:讲述来自田野的故事

这将我们带到了第二个主题。我们非常关注如何对"田野故事"进行分类。我们现在知道,在"现实的"与"自述的"故事间起码的相异之处(Van Maanen, 1988)。在文本中,许多学者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更深入的理解,更深入地融入进

他人经验之中,他们尝试着不同的形式、格式、语态、外形及风格。在本书中,里查德森精彩动人的描述让我们领会到了当代民族志学者强劲的文学描述风格。

对文本创作的各个方面的尝试有几方面资源可供利用:我们对"他者"表述的关注;我们在对现实主义文本进行几乎是彻底地或至少是重大地修改的执着;我们对文本定位问题的领悟;我们所知道文本的特殊背景。我们知道它们或明或暗地反映出了我们作为个体的社会学家的工作。我们很少去在意作为科学工作者的"客观性",我们更注重通过我们所创作的文本提供给读者一些关于他者的强有力的、直觉的、感性的、历史的和诗歌的移情体验。

关于如何表述的问题仍然存在,实际上永远解决不了其内部存在的那种张力和矛盾。一方面我们关心作为一种同构形式的文本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所有的文本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政治与文化情境之中。我们自身也如同我们所创作的文本一样,无法超越这些限制。

因此我们将继续进行各种尝试,在此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多一些"自嘲",少一些自愚。由于不断地借鉴其他东西,文学的流派也将逐渐增多。民族志内部的张力将继续存在并且会贯穿整个民族志的发展进程,但是公开地或私下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会比当前更多。

缺陷与真理,缺陷对真理

门楚(Menchu,1984),这位女性及她所撰写的书曾引起了轰动。一方面,读者对书中提到的内容十分同情,此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在西班牙犹太人(主要是具有欧洲血统的危地马拉的土地所有者)控制下的危地马拉当地居民的苦难。如人们所预料的一样,这些西班牙犹太人控制着国家军队,那是一支由欧洲后裔军官、正规军和当地士兵组成的军队。

辩论的另一方则是由学者(Gugelberger,1996; Stoll,1999)和其他人组成的。他们仔细地研究,拒绝甚至谩骂门楚这样的作品,因为作为一部编年体,书中对一些(或者是所有的)事实的描述有明显的错误而令人置疑。在文化斗争中,激进的右翼人士被指控为"左倾自由主义",他们利用书籍宣传一些以拉美解放运动为主的自由主义内容。在门楚中描述的所谓的事实并不是真实的,其中的见闻和经验缺乏依据,是不完全的,但它所起的效果却很大,而且几乎是压倒性的(Lincoln,2000)。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类似门楚这样的文本呢? 莱弗利(John Reverly)在他所写的章节中用分析的方式提出了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与其将这类作品看成是欧洲标准的产物,不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它们。它们其实是进入弱势群体的桥梁,它们可以使我们进入边缘人的生活,那些边界上的居民先前从未能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借助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表现自己的权力。他们告知世人其对权力的控制,表明他们重新获得了用自己的语言为自己说话的权力。他们拒绝他们的故事仅由别的人来讲述,因为他们带有政治偏见并在利益上是不一致的。

他们还表示,尽管斯托尔(Stoll,1999)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会对认识论的基础

进行辩论,但是他们的论点时常带有很强的政治性(Beverley,1996;参见本书第21章、第20章)。作为研究者,特别是女权主义者,认识到个人是具有政治性的,认识论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怎样"知道取决于我们知道"什么"、从"哪里"知道以及我们曾经历过"什么"。认识论意义上权力涉入的讲故事的惯例导致了西方民族志传统的不稳定性、脆弱性以及易于遭受威胁的特征。《我,丽格伯塔·孟珠》引起的轰动效果正是标准与目的相吻合的结果。因而,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真理形式:由各种具体经验形塑而成的公民社会学。

正如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老的文本,看它们能否教给我们什么,包括它们的目的和作用。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公民社会科学这一主题,将其源于大众并为了大众这一特征作为我们的编辑方针。很明显,这种亚社会科学,一种来自变革的呼声,被从欧洲中心主义和主流的声音所设想的公民社会科学中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催生并发展起来。《我,丽格伯塔·孟珠》以自己的方式从根本上将民族志作为一个完整的流派进行了重建。这种重建也许最终会包括生命历程,自我民族志,"自己的故事",自传,评论性杂志及这个流派中其他的叙述方式。这种表述作为一种批评民族志的形式突破了原来的限制从而开辟出了另一条途径。

继续进行

在第六个阶段我们面临了另一个问题。关于先前范例的争论集中在"竞争者"范例是否值得去做(Guba & Lincoln,1981,1989;Lincoln & Guba, 1985),学生和其他人的加入对选择并运作非常规的科学模式是否有用。史密斯和迪默(第34章)的研究表明这种争论非常愚蠢(尽管对双方的对话可能有利)。确信学生和新的加入者曾经对范例做出选择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加以运用,这至少可以使我们避免过早草率地"结束对话"。但是史密斯和迪默明确指出,现在已不是有关范例的选择问题了,更重要的是关注我们所继承的这个世界。最近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我们相信并不存在"上帝之眼",不存在"没有声音",也不存在"全都是声音"。我们不必选择勤奋工作以进入到后现代社会。确切地说,我们已经继承了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不再回到过去。不是我们选择了后现代,而是后现代选择了我们。

这些研究成果和经重新定位的争论所隐含的意义,实际上相当复杂。在"伟大的范例之战"中,我们来了又去。争斗已然结束。当我们还在不断争斗的时候,我们所为之争斗的那些界线、边界不断地被重新绘制,直到它们变得了无意义。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后现代主义。当现代主义的时代结束时,后现代主义这一历史时刻来临了。这一时代充满了偶然性、多元化、模糊性、去中心化,它从昨天的确定性中脱离出来,充斥着以往从未听到过的嘈杂声。今后的很多年间,我们也许仍能听到现代主义的回声。可以确切地说,即使一个新的时代意识已然成形,我们较为保守的知识分子或组织(如大学)仍将长期地依附于现代主义的形式与结构。

谁的自我？什么/哪个自我？

我们还面临着关于“自我”的问题：谁的自我？什么自我？哪个自我？欧洲中心主义的宏大叙事逐渐消隐、多元化声音渐趋中心、边缘和中心的竞争、“真实自我”的解构——所有这些都在表明虚构出单一、真实自我的那个时代曾经到来又最终消逝了。除非做有关想像力虚构方面的心理分析，事实上很难知道是否真的会失去自我。实际上我们面对着多种身份：由我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形成的身份，身处某一领域而被赋予的身份。身份是我们的遭遇与自我之间、不同领域的内外之间、经历与时间之间等相互作用的产物。通往我们的自我的桥梁如同通往我们的对话者的桥梁一样多，每一条途径都使我们得到新的领悟，想像我们存在着什么的可能性，想像我们会如何发生改变，想像我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些的。

范例及方法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都伴随着人类精神的繁荣。正如启蒙运动开启了人类摆脱神学教条的束缚而自由选择生活的可能性一样，抛弃我们社会科学中僵硬的欧洲中心主义也就为人类精神的繁荣再次提供了可能性，这是对人类精神、人类群体以及人类欣欣向荣的一种新的感悟。我们不认为自我多元化是一种精神紊乱的症状，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可能性与潜力。反思性的自我可以自由地选择、处事、扮演新角色和与人建立新的关系。多元自我亦受复杂的社会科学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力进行解释。

格根双氏（第 40 章）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后时代（post-post period）—后后结构主义（post-poststructuralism），后后现代主义（post-postmodernism）——即一个需要重建的时代。这对我们的“表述”意味着什么呢？民族志的实践仍旧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事情永远不会相同。我们正身处一个新的时代，在这里多元化文本、文化批评、后经验主义作品变得更普遍，如同田野工作、分析和文本间的交流采取更为反思性的形式。

我们换一种说法来描述这一时代，如同贝里（Thomas Berry）所评论的那样，我们正处于两个叙事（story）之间。旧的叙事不再发生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它已不再适合。但新的叙事尚未就位。因此我们正在寻找新叙事的片断，发现它们讲述故事的方法，收集各个部分以使其完整化，但实际上完整的新的叙事还没来到我们跟前。因此我们是最后的修理工，正试图将一种新的叙事修补到一起，我们开始怀疑将永远无法获得旧的叙事曾具有的统一性、平滑性和完整性。我们将不同的碎片集合起来，但手头的东西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它们具有很多的形状。

慢慢地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未来可能不止一种形式，一个片断，而是很多；不是一种声音，而是多种；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多个；很多的故事、戏剧、小说、寓言、回忆、历史记录、自传、诗歌以及其他文本，它们告知我们生活的方式，拓展我们对他者的理解，提供给我们进行文化批评的素材（Marens & Fischer，1986）。由于后现代的压力，现代主义者的计划被阻断，变为被贝里称作的“旧故事”。

结论:第七阶段

很难知道生活在确定性的时代和生活在极不具有确定性的时代哪一个会更容易些。*Megatrends* 的作者奈斯比特(Naisbitt,1982)观察到:

> 我们生活在两个时代的过渡时期。那些希望把握这种不确定性的人往往远远地走在那些还停留在过去的人的前面。这是一个变革和问题丛生的年代。
>
> 尽管这一过渡期是不确定的,但是它是一个伟大而动荡的时期,充满了机遇。如果我们学会如何使我们的研究领域变得不确定,我们将比稳定时期获得更多的成果。在稳定的年代,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名称,都有自己的位置,而且我们很难改变它们。
>
> 但在过渡时期,如果我们对前方的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准确的概念以及开阔的视野,那么我们在个人的、专业的及制度的层面就会具有很大的操纵能力及影响力(pp. 249-252)。

我们相信 Naisbitt 给出的建议:当我们敢于抛弃对过去事物的确定性和绝对性的依赖时,我们将会有大量的机会在未来实现我们的愿望。

结语

对于"我们要向哪里去?"这一问题还没有清楚的答案。同样道理,"定性研究的未来将会怎样?"也没有答案。我们这样讲并非离题,因为这暗示了我们实际上没有方向。正如一些存在论与认识论它们本身存在着矛盾是件平常的事那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在本书里一定要得出一个关于定性研究未来的共同的答案。如同列维斯特劳斯的修理工一样,我们通过拼凑与整合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以"书写"为职业的修理工并不仅仅只是简单地顺应潮流,在很大意义上,他们也是发明家。因为这些修理工知道他们的工具很少,合适的部件也不多,所以他们变成了发明家。他们发明了"修补"的方法,他们反复使用织物及布料做出了漂亮的棉被。如同禅宗里 Pirsig 的英雄和摩托车维护技师一样,他们知道哪些东西需要特殊的修补,没有东西比铝制的库尔啤酒罐做成的铝条好。他们没有上过艺术课,但他们已经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在以书写为职业的"修理工"那里,发明不仅是必需的,亦是永无止境的艺术创造的要求。

定性研究方法因此变成了一种"发明",讲故事——表述——变成了一门艺术。即使是修理工,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并不是按照标准来工作,并且我们开始认为不再有任何标准存在(如果以前曾经存在过的话)。因此我们只能进行修修补补,也许会相互讲一些拼凑起来的故事。有些故事可以使我们分享研究中的一些深层次内容;有些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对错或减轻压力;有些可以帮助我们懂得我们为什么做、怎样做和做了什么;而有些仅仅是在说着一些不同的事。

也许这本书本身就属于第六个阶段,也许这是我们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来观察我们所处的位置,考虑我们的去向并试图设想一个新的未来。也许我们要求作者所做的是给这个第六阶段下个定义并推测第七阶段的可能形态——第七阶段是指一种叙事稳固下来之时,还是指各个领域和学科仍处于混乱之时。这本书,作为一种努力也许会成为史料,成为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而我们自己无法框定和把握这种发展的本质。

我们相信我们正平稳地跨越时间的桥梁进入到第七阶段。我们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前景,但是我们能够辨别出它的轮廓。首先,除我们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希望社会科学能够反映出更多的实情,不能像政治性团体那种搞研究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我们应该忠实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我们对公民社会学的迫切要求(见本书第 5 章;第 35 章)并不是没有危险。也许我们会发现越是频繁地去研究这些群体并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就越得不到经费来维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还发现这种工作与其他一些相比更能使我们从象牙塔内走出来。可以肯定的是,与传统的民族志研究相比,这种工作的劳动强度更大也更费时(Lincoln, in press)。我们呼唤公民社会学,基于此我们认为田野工作不仅与社会学相关联而且还广泛置身于大范围、丰富的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之中。公民社会学表现出了整个新一代定性研究工作者:教育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和医学工作者、医护工作者、通讯和媒体专家、文化研究人员及其他。

这项工作中的价值涉入问题不容忽视。以往存在的各种社会科学,不仅不曾解决人类存在的突出问题,而且在很多时候甚至使情况变得更糟(见本书第 4 章)。与价值问题同等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依据对特定人类共同体的理解所从事的研究的有效性问题。相互间离散的社会科学总是仅仅关注对自身具有意义的那些事物、社会目标和知识分子利益。在第七阶段我们面临一个选择,即决定融入还是脱离于我们所研究的那个特定人类共同体。我们想要了解想要有意义地生活,这只能是在共同体之中。我们现在有机会作为在那居住的知识分子和作为沟通中介重新加入到共同体中去。

在公民社会科学中,与其学科旨趣的表达相伴随的是一个既有趣又有意义的方面,即它暗示着启蒙主义的手段与结果的二元论的终结。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很多阶段,手段与结果被谨慎、客观地区分开来。这种社会科学显示了手段—目的二元主义的结束。在公民社会科学中,民族志的目的是促成一个强大、公正、平等的共同体,该目的常与达到目的所需的手段相互妥协。在第七阶段,社会科学的手段(方法)在对共同体做出贡献的同时得到发展、提炼,并因其促成了共同体内的良性差异、社会公正以及平等机会(即平等的获得物质、社会、教育和文化方面资源的机会)受到珍视,而这些成果也正是民族志所要达到的目的。方法的竞争是为了保持研究的生命力和活力,帮助我们深刻理解怎样才能创造出人类的辉煌。

我们还看到在“范例具有怎样的意义”与“我们如何去接受它们的结论”方面正在出现一种对话(Lincoln, in press)。大量的方法、范例及可信赖的建议使我

们看不到一种真相:许多单独的研究者和典范的遵从者,即便他们研究的着眼点很不相同,但也能得出非常相似的结论。例如女性主义者关注女性的认知方式,其观点和种族与人种学家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种族与人种学家也同样认为,那些与主流、专家和传统科学认识论不同的非主流认知方式为我们了解人类社会生活复杂的多样性提供了很大帮助。批判主义者及一些研究生命史的学者直觉地认为认识论就是政治,两者在"我们如何看待有效性和事实"这个问题上有相似的主张。

我们有机会进行更有成效的对话,不是关于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新的典范,而是讨论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的相似之处。我们看到过很多通过对田野工作方法的反思而揭示出的相似的事物及各种密切关系。如果第七阶段仍然可以规划的话,那么在典范和方法的拥护者间的这种对话就可以很好地进行了。

这个阶段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边缘与中心的游移不定。原先的中心消解了,边缘正在逐渐占据中心的位置。新素材、新故事、新评论、新方法、新认识论观点、新有效性形式、新文本、新表述等都在表明一个并不稳定的新中心的产生。以前与欧洲几何学刚性的外形相似的"中心—边缘"结构现在具有了流动性,发生了化学反应般的变化。边缘移向中心,中心移向边缘,一切以新的方式被重构。方法、方法论、研究实践和认识论等方面的发展,使得有关中心和边缘的所有概念发生了变化。这些都是前一代人所难以想像的——或者即使在本书第一版发行时也未曾料到。

不论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上,我们都希望本书是对那些新故事、即兴之作、实验、补充说明、对话等的及时的整理。新的叙事远没成熟,我们仍在等待着另一个荷马的到来,他不仅能将我们对这一神秘土地的零碎观感完整地连缀起来,而且还为我们划分出新的章节。当我们揭示出指导我们创作的特定文化结构及其文化实践时,我们想起我们作为故事讲述者时所具有的那种感染力。这些结构和实践让我们看到了某些一致性,使我们即便不凭借它们(结构教给我们讲故事的特殊方法)也能创造出意义来。抹去将自我、他者和历史分割开来的那些界线,我们正在学习如何讲述新故事,这些故事不再被包含或限制在过去的叙事之中。因此我们开始共同着手新的方案,这个方案除它本身之外并没有对文化结构及实践有一个系统的了解。

最终测定的东西将会是稳固的,但所有定性研究者的研究内容会经常发生改变,这些内容就是从日常生活以及互动个体角度研究人们的各种体验。这些个体可以一起也可以单独地创造并体验历史,而这些历史是由"过去"这个幽灵传承下来的。



参考文献

Abram, D. (1996). *The spell of the sensuous.* New York: Vintage.

Bateson, G.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Ballantine.

Bateson, G. (1979).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New York: E. P. Dutton.

Bateson, G. P., & Bateson, M. C. (1987). *Anger's fear: Towards an epistemology of the sacred.* New York: Macmillan.

Behar, R.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Berry, W. (1981). *Recollected essays: 1965-1980.*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 Giroux.

Beverley, J. (1996). The real thing. In G. M. Gugelberger (Ed.), *The real thing: Testimonial discourse and Latin America* (pp. 266-286).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runer, E. M. (1993). Introduction: The ethnographic self and the personal self. In P. Benson (Ed.),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pp. 1-26).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hristians, C. G. (1995). The naturalistic fallacy in contemporary interactionist-interpre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19, pp. 125-130). Greenwich, CT: JAI.

Christians, C. G. (1997). The ethics of being. In C. G. Christians & M. Traber (Eds.), *Communication ethics and universal values* (pp. 3-23).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ristians, C. G. (1998). The sacredness of life. *Media Development*, 45(2), 3-7.

Clough, P. T. (1992).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Clough, P. T. (1998).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2nd ed.). New York: Peter Lang.

Collins, P. H.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Conquergood, D. (1985). Performing as a moral act: Ethical dimensions of 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Literature in Performance*, 5, 1-13.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u Bois, W. E. B. (1989).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Bantam.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3)

Ellison, R. (1964). *Shadow and a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Ford, N. A. (1998). A blueprint for Negro authors. In P. L. Hill (Ed.), *Call and response: The Riverside antholog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pp. 1112-1114).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0)

Geertz, C.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1). *Effective evaluation: Improving the usefulness of evaluation results through responsive and naturalistic approach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9). *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Gugelberger, G. M. (Ed.). (1996). *The real thing: Testimonial discourse and Latin Americ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sselstrom, L., Collier, G., & Curtis, N. (1997). Introduction: Grass widows and wrinklebelly women. In L. Hasselstrom, G. Collier, & N. Curtis (Eds.), *Leaning into the wind: Women write from the heart of the West* (pp. xiii-xxi).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Jackson, M. (1998). *Minima ethnographica: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proj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ittredge, W. (1996). *Who owns the West?* San

Francisco: Murray House.

Lincoln, Y. S. (1995). Emerging criteria for quality in 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ive inquiry. *Qualitative Inquiry*, 1, 275-289.

Lincoln, Y. S. (1998, November). *When research is not enough: Community, care, and love.* Presidential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 Miami, FL.

Lcoln, Y. S. (1999, June). *Courage, vulnerability and truth.* Keynote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 "Reclaiming Voice II: Ethnographic Inquir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 Postmodern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Lincoln, Y. S. (in press). Varieties of validities. In J. S. Smart (Ed.),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14). Lexington, MA: Agathon.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Macnaghten, P., & Urry, J. (1998). *Contested natures.* London: Sage.

Marcus, G. E., & Fischer, M. M. J.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nchú, R. (1984). *I, Rigoberta Menchú: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 (E. BurgosDebray, Ed.; A. Wright, Trans.). London: Verso.

Naisbitt, J. (1982). *Megatrends: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 New York: Time Warner.

Park, R. E. (1950). Education in its relation to the conflict and fusion of cultures. In R. E. Park, *Race and culture* (pp. 261-283). Glencoe, IL: Free Press. (Reprinted from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13, 1918, 38-63)

Rawlins, C. L. (1994). The meadow at the corner of your eye. In D. Clow & D. Snow (Eds.), *Northern lights: A selection of new writing from the American West* (pp. 389-395). New York: Vantage.

Reason, P. (1993). Sacred experience and sacred scie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2, 10-27.

Rorty, R.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aldo, R.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Sartre, J.-P. (1981). *The family idiot: Gustave Flaubert*, 1 821-1 857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egner, W. (1980). *The sound of mountain water: The changing American Wes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Stoll, D. (1999). *Rigoberta Menchú and the story of all poor Guatemalans.* Boulder, CO: Westview.

Turner, V. (1986). *The antb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Publications.

Ulmer, G. (1989). *Teletbeory.* New York: Routledge.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bnograp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est, C. (1989). *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 A genealogy of pragmat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West, C. (1994). *Race matters.* New York: Vantage.

White, C. J., Mogilka, J., & Slack, P. J. F. (1998). Disturbing the colonial frames of ethnographic representation: Releasing feminist imagination on the academy. *Cultural Studies: A Research Annual*, 3, 3-27.